

淳安 历史

他对淳安先贤的长久凝视，使时光深处漫漶的淳安历史，逐渐清晰起来，且有了质感，有了生气，有了风云激荡……

的 32 张 面 孔

鲍艺敏

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淳安历史的32张面孔 / 鲍艺敏著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23.1

ISBN 978-7-5171-4362-8

I. ①淳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(2023)第005838号

淳安历史的32张面孔

责任编辑: 史会美

责任校对: 王建玲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6号院B座6层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010-64924853(总编室) 010-64924716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 电子邮箱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荣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23年4月第1版 2023年4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20印张

字 数: 248千字

定 价: 78.00元

书 号: ISBN 978-7-5171-4362-8

《淳安历史的32张面孔》编纂委员会

主 任：郑志光

副 主 任：徐夏冰

委 员：邵全胜 余运德 邵红卫

主 编：邵红卫

编 委：王顺民 黄筱康

设 计：方家明

自序

一个个高贵的身影从我面前走过

《淳安历史的32张面孔》与大家见面了。里面收录了我近年所写的三十二位淳安历史人物。

淳安建县已逾一千八百年，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有两类人物可谓影响深远。一类是对历史发展进程具有直接作用或产生重大影响的，如方腊、杨桂枝等人。一类是对淳安文脉具有疏通或引领作用的。所谓文脉是用文字传播思想、传递文化、传承文明。他们是文化的启蒙者，是文化的创造者，是文化的引领者，是文化的践行者。

《淳安县志》收录了民国之前的百十来号淳安人，有的脉络清晰，家学传承有序；有的一鳞半爪，生平著述无遗；有的踪迹不明，隐逸史海无考。我大致梳理了一遍，汉代的方储，是淳安方姓始祖方纆之孙，汉章帝、汉和帝时在京为官，他类似于诸葛亮、刘伯温诸谋士，观天文地理，测阴阳五行，难以一下讲透，我们还是绕过去吧。

绕过了汉代，无论如何绕不过盛唐。既然绕不过去，那就从皇甫父子说起。

皇甫湜是中唐时期一个传奇般的人物，幸好有了他，淳安文坛才不寂寞。他恃才傲物、特立独行，是一个有性情的名士形象。他与韩愈、白

居易、李翱、李贺、柳宗元、贾岛等都是朋友，他甚至说白居易的文章是“下里巴人”，他自己才是“阳春白雪”。他酒后挥笔而就的那篇“重修福先寺”碑文，就连文坛领袖裴度也是连看三遍才始明白，惊呼“奇文”，并且甘心付出天价稿酬，每个字三匹绢，碑文共计三千二百五十四字，得绢九千七百六十二匹，至今怕也无人超越。他惊世骇俗，率性放达，活得很纯粹，在他身上我看到一个“真”字，看到了一种文化自信。

其子皇甫松是晚唐花间派的领军人物，著作有诗词、赋、小说等，而尤以词最为著称，客观地说，他的词作影响了百年以后的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，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得到王国维等人的高度评价。

有宋一代，我觉得钱时是真正意义上的理学家，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视。当我读到他的《融堂书解》一书时，有一种“目击道存”的感觉。同时期像方逢辰、詹仪之等人，我没有在他们存世作品中找到这种认同感，虽有些发散性的论述，谈不上系统性，更别说开宗立派，构筑严密的理论体系。理学说到底是一门“功夫学”，讲究践行和修为，好比你去登山，山腰的风景与山顶的风景是不一样的，人家站在峰顶“一览众山小”，你身处半山腰只能是“云锁雾绕辨不真”。

有人翻过目录或许心存疑虑：宋代詹骀不是淳熙状元吗？为什么没有人选呢？大众对状元热衷度高，总是津津乐道，戏剧中极力搬演，家谱上也是大肆渲染，多具脸谱化倾向。就目前为止，詹骀的籍贯存有争议，况且，我没有看到他的存世著述，对其文字的品位和思想性，不得而知。我个人倾向于透文见人，如此，更真实可信，文字可以传递出一个人的生存状态、思想层级、情感趣味。历来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与苦难相伴而生的，并非应酬和应奉催生的。后人从你的文字中读出门道，体悟真谛，自然从心里尊你一声老师，获得认同。像郑板桥那方印章“青藤门下走狗”，终身服膺，甘列门墙。

淳安文化也好，文脉也罢，核心因素是人物，是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轨迹，一个个人物的活动轨迹构成了一个个文化现象。在选择人物方面，一是看现有资料是否充实，二是看该人物对淳安文脉的影响力。你在某时某阶段，或许风头无两、盛极一时，但若干年后，绝少有人提及。有人恰恰相反，在世时沉寂少闻，去世后被人追捧，原因何在？或浪里淘沙，或披沙拣金，取舍不由人为，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。

明清是淳安文脉的高光时期，明代尤甚。淳安历史上官至一品的就有三位，他们是胡拱辰、商辂、徐贯。且均集中在明英宗到明孝宗这几十年时间。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，他们用自己的文化人格，书写着淳安历史的文化之魂。

古代社会“学而优则仕”，读书人是社会的主流。而书中我选择了一位底层人物——阿寄，他是徐家的老仆。在阿寄身上完美诠释了士大夫眼里的道德标准——“忠孝廉耻勇”，以至于《明史》《浙江通志》《严州府志》等正史均为其立传。冯梦龙更是将其改编为小说，收录在《醒世恒言》中，广为流传。

阿寄的故事借助文字传播开去，必然关乎教化，就像如今的道德楷模一样，具有榜样的力量，在底层社会产生巨大的震撼力，无形而深远；主流社会也乐意助推他们的道德事例。从阿寄经商还可以折射出明代中叶锦沙村（威坪蜀阜村）资本主义萌芽，雇佣关系确立，商业贸易活跃，水陆交通繁华，以及禁奴体制的瓦解。

从唐到宋，从明到清，再到民国，一个个高贵的身影从我面前走过，沉默不语，待我审视。他们有人曾经高居庙堂之上，有人则身处江湖之远，但无一例外，他们都对淳安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，关注他们、解读他们，其实就是关注、解读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有他们的序列，通过习得，可以融入我们的精神血脉中。

山河大地与人文历史,不可分割,互为表里。淳安地理产生淳安人物,它蕴含着逻辑的某种必然性,恰如古人所说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,人物的性格与生养他的这片土地息息相关。

我从事文物工作,平时对一些考古发掘多有了解关注,考古可以准确测量出土文物的质地、器形、大小、重量,可以测量出来,但却很难“测量”出古人。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据此建立“模板”学说,他认为考古不能只靠归纳,还要靠演绎,从上往下把那些理论演绎下去。

历史人物亦然,掌握了他的资料,不等于掌握了这个人。只有透过他生长的环境、他留存的文字、他活动的轨迹,才能演绎出他真实的人生。在《淳安历史的32张面孔》材料收集和写作的过程中,我通过这种演绎得出一个个结论,若每个人用一个字来概括,我觉得胡拱辰为“忍”,商辂为“恕”,徐贯为“狠”。

“忍”通常表现为克制力强,做事不刻意为之,却往往能踏罡步斗,暗合天意。为人处世态度谦和、举止文雅,典型的“温良恭俭让”。

“恕”是以仁爱之心去待人,不计较别人的过失,能宽恕体恤别人。处世风格如春风拂面,润物无声。

“狠”则容易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,矛盾焦点,压力山大,动力也更大。行事风格干脆利落,快刀斩乱麻,不留余地,不拖泥带水。

我想这样的演绎,符合人物身份,符合性格特征,符合命运归宿,读者也觉得是那么回事,具备认可度。历史还是那段历史,人物还是那些人物,材料还是那堆材料,因为方法和视角不同,演绎的结果自然就不同。

是为自序。

鲍艺敏
壬寅暮春于千岛湖

目录

DIRECTORY

- 001 不羁之才皇甫湜
- 009 花间派词人皇甫松
- 016 “圣公”方腊
- 023 瀛山达人詹仪之
- 035 恭圣仁烈皇太后杨桂枝
- 053 理学名家钱时
- 060 “石峡三贤”方逢辰
- 069 遗民诗人何梦桂
- 078 富山先生方一夔
- 090 “白衣太史”徐尊生
- 097 徐岷的戏剧人生
- 105 承上启下余思宽
- 115 “诤者”徐鉴
- 125 “良御史”应颢
- 134 “三元宰相”商辂
- 154 “忍者”胡拱辰
- 166 “狠人”徐贯
- 177 “达尊者”徐楚

- 186 提刑官徐廷绶
- 195 倚剑长叹话詹理
- 205 阿寄的荣耀
- 212 文化守护神方应时
- 222 “吾溪书院”山长徐应簧
- 230 文韬武略方学龙
- 237 “清朝耳目”毛一鹭
- 245 大明忠魂汪乔年
- 254 “松凉夏健人”方象瑛
- 265 “文中三豪”毛际可
- 273 “天下第一廉吏”徐士讷
- 281 “通经者”方燦如
- 290 政商翹楚王文典
- 298 折戟沉沙邵瑞彭
-
- 307 后记

不羈之才皇甫湜

幸好有皇甫湜，盛唐时期淳安的文坛才不寂寞。不独淳安，即便立身群星璀璨的中唐，他一点也不逊色。

他率性放达，特立独行，恃才傲物，桀骜不驯。他活得很纯粹，是一个性情中的名士，从他身上，我看到了一个“真”字，明白了什么叫文化自信。

让我们走近中唐，走近皇甫湜，走近大师。

皇甫湜(777—835)，字持正，睦州新安(今淳安)人，中唐著名诗人，古文运动的追随者。进入中唐时期，随着李白、杜甫的相继离世，韩愈、白居易、皇甫湜、李翱、李贺等人接踵文坛；中唐文风兴盛不衰，依旧是那么疾风劲厉、惊世骇俗。

皇甫湜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熏陶，热衷于追求功名、安邦定国、救济苍生。为了实现抱负，未及弱冠他便走出家门，漫游各地。这时期，他不屑于走科举入仕的道路，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，希图靠某个有力人物的荐举而入卿拜相。皇甫湜曾在《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》中回忆自己第一次拜见顾况时的情形：“以童子见君子于扬州孝感寺。君披黄衫，白绢鞞头，眸子了然，炯炯清立，望之真如白圭振鹭也。即接欢然，以我为扬雄、孟子……”

贞元十二年(796)四月前后，扬州孝感寺内，一个初出茅庐的乡间少

年，带着自己的诗文，独自一人去拜谒著作佐郎顾况。此时的顾况“不能慕顺，为众所排”，贬谪途中，在孝感寺小住。皇甫湜或许也游历到了扬州，听到顾况的行程，便决计拜见自己心中的偶像，他只想得到一个求证。

顾况打量着站在面前这个十八九岁的少年，气貌刚质，眼无惧色，锋芒逼人，与自己年轻时候有几分相像，当下便有些喜欢。一经交谈，便觉他言辞犀利、气势雄奇，恍如扬雄、孟子出世。

顾况是何许人也？是曾慧眼辨识还不曾出名的白居易的人。白居易于贞元三年（787）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，刚到京城，便拿着自己所写的诗歌去拜见著作佐郎顾况。顾况看到诗稿上“白居易”三个字，便笑说道：“此地米价正贵，居住不易啊！”边说边打开诗稿，待看到第一首诗：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不由得赞叹着说：“能写出这样的诗句，居住下来就容易多了。”后来，顾况经常向别人夸赞白居易的诗才，白居易的诗名从此传开了。

顾况为人怪诞，洒脱不羁，文风亦一如其人，意境奇特，骏发踔厉。给少年皇甫湜留下深刻印象，此后他的人生轨迹或多或少追随着他的影子。

皇甫湜自得到顾况的奖掖，信心爆棚，随后赶赴长安科考，想要一举中第。未曾料天不遂人愿，功名无望。落榜后他在京城等地结识了独孤申叔、刘敦质等朋友，遍游了中原大地，顺便南归睦州老家小住。其《东还赋》云：“归去来兮，将息我以倦游……朝吾既去夫帝乡，越嵩华而并河。经淮水兮凌大江，抵扬州之寄家。”

初出茅庐的皇甫湜，面对现实不得不低垂高傲的头颅。此后，他又远游岭南，郁郁苦闷，不甚得意；不久改投江西观察使李巽幕下，作《上江西李大夫书》，但满腔热情换来的只是李巽的轻慢。他坐了冷板凳。心高气傲的皇甫湜如何受得了这等待遇，收拾行装，打道回府。《让风》有诗云：“昨以南昌，迄于建康，悠悠三千，厥路何长……今由建康，抵于我家。”这次回

家一待就是数年，直到贞元十九年(803)，皇甫湜再度进京，得以结识韩愈而名扬京师。那年血气方刚的他二十六岁。

韩愈这一年由国子监四门博士晋升为监察御史，他性格直爽坦率，“鲠言无所忌”，敢说大家不敢说的话，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，操行坚定纯正，却不善于处理一般性事务。这些脾性与皇甫湜都非常相似，况且两人关于文学方面见解契合，有反对骈文贵族化的倾向。韩愈为此提倡古文运动，主张“以文载道”，创立一种新的文体，其标准是“惟古于词必已出”和“文从字顺各识职”。皇甫湜立即被韩愈的主张所吸引，后来他与李翱都成为这场古文运动的主力军。他在《题浯溪石》一诗中，对韩愈推崇备至：“退之全而神，上与千载对。”

韩愈虽年长皇甫湜九岁，却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他身兼功名，处处提携皇甫湜，逢人便说：“从吾游者，李翱、张籍其尤也，而不及持正(皇甫湜)。”视他为自己衣钵的承继者。无怪乎在韩愈病逝的长庆四年(824)，特意写信给皇甫湜，嘱托他替自己作墓志。十二月丙子，韩愈病逝，次年正月，皇甫湜作《韩文公墓志铭》《韩文公神道碑》。

皇甫湜在长安期间，除了顾况、韩愈、独孤申叔、刘敦质之外，还结识了白居易、李翱、柳宗元、贾岛、牛僧孺等人。唐末王定保所撰《唐摭言》，记述了大量唐代文人名士的遗闻佚事，多记正史所不详述者，其中就有关于韩愈和皇甫湜为牛僧孺延誉之事的记载：“(牛僧孺)先以所业谒韩愈、皇甫员外……二公访之，因大署其门曰：‘韩愈、皇甫湜同访几官先辈，不遇。’翌日，自遗阙而下，观者如堵，咸投刺先谒之。由是，僧孺之名，大振天下。”

牛僧孺曾是唐穆宗、唐文宗时的宰相，考取功名前也去拜谒皇甫湜，希冀得到他的认同。当时有一种说法：“韩文公、皇甫湜，贞元中名价籍甚，亦一代龙门也。”可见当时皇甫员外的名望之高。

皇甫湜尽管已名满京华，却仍想售于帝王家，取得功名。不意次年暂停贡举，皇甫湜只得离开长安转投荆南节度使裴均幕下；裴均人品不佳，喜欢侍奉权贵，为宦官宴文场养子。以皇甫湜这样做岸不屈，正直孤高的性格，做了裴均的幕僚，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。

也是皇天佑人，三年后的元和元年(806)，皇甫湜三十岁，终于如愿考中进士，与韦处厚、李绅等同榜。元和三年(808)，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“贤良方正直言极谏”科考试，与牛僧孺、李宗闵直陈时政，受到主考官赏识，得上第。因他三人策文中均有言辞抨击宦官，触动了宦官集团利益。恰巧此时，裴均回朝欲谋一京官，遂利用皇甫湜等人策文来做文章，相关人员均遭贬谪。关键时刻，白居易挺身而出，作《制科人状》为皇甫湜等人辩诬，但未起到实质作用。皇甫湜被黜为陆浑(今河南嵩县)县尉，离开了长安。

此间，他与韩愈、李贺等多有诗词唱和；韩愈的《寄皇甫湜》读来尤为感人：“敲门惊昼睡，问报睦州吏。手把一封书，上有皇甫字。拆书放床头，涕与泪垂泗。昏昏还就枕，惘惘梦相值。悲哉无奇术，安得生两翅？”情动于中而发之于外。

元和五年(810)，年方二十岁的李贺来长安举进士，被流俗攻讦，谓李贺父名“晋肃”“晋”“进”嫌名，人曰应避家讳，不得应举。皇甫湜不惧人言，“质之律、稽之典”，竭力为李贺辩护。为此，李贺把皇甫湜引为知交。李贺向有“鬼才”之称，早先也是皇甫湜的铁杆粉丝，他曾高度赞颂皇甫湜：“云是东京才子，文章巨公。”

皇甫湜素有青云之志，现实中屡受挫折，情绪低落，整日借酒浇愁。李贺写诗为之解嘲，有《官不来题皇甫先辈厅记》为证：“官不来，官庭秋，老桐错干青龙愁。书司曹佐走如牛，叠声问佐官来否？官不来，门幽幽。”

皇甫湜官卑不调，苦闷困顿，后经辗转，“出使黔中”“也困公安(湖北

公安县)”，皆因其不愿阿谀逢迎、特立独行的个性使然。仕途坎坷的他还常因“乘酒使气”，触犯同僚，而求分司东都。到了洛阳，皇甫湜时常与白居易交往，因他官俸微薄，窘迫非常，入冬以后竟到了“门前没车迹，烟囱不冒烟”的境地。

百无聊赖的日子里，他似乎清醒了些，作《醉赋》一篇以期反省：“予尝为沉湎所困，因作《醉赋》，寄任山尹君。君嗜此物，亦以警之尔。”困守东都，终于因一个人的到来有了转机。大和八年(834)，晋国公裴度留守东都，召皇甫湜为留守府幕僚。

裴度历仕唐穆宗、唐敬宗、唐文宗三朝，数度出镇拜相，他有政治家的眼光，对文士多有提携，为世人敬重。次年，裴度重修洛阳的福先寺，想请白居易作一篇碑文，信都已经写好了。作为幕僚的皇甫湜闻讯大怒，上门指责裴度说：“白居易乃下里巴人，我才是阳春白雪。你何必舍近我皇甫湜，而远取白居易。请从此辞！”皇甫湜平日就不拘礼节，桀骜不驯。裴度见属下在自己面前发火，也不与之计较，反觉得自己有点失礼，委婉向他道歉说，“像先生这样的大手笔，我怕请不动您啊”，于是恳请皇甫湜来作这篇碑文。

皇甫湜更不推辞，即请斗酒，酣饮之下，援笔立就，总计三千余字。正可谓“皇甫斗酒文三千，太白遗风诵佳话”。裴度取过一看，不明其意，其文辞奇谲，用典艰深，他连着看了三遍，方始看懂内容，惊讶道：“真乃高人也！”

于是，吩咐手下以“宝车名马，增彩器玩，千余缗酬之。”皇甫湜瞥了一眼小校呈上的礼单，不但不领情，反而大怒，说裴度看不起他，“何相待之薄也？”嫌礼物太薄，自己的文才高雅，文思奇崛，要求“每字三匹绢，更减五分钱不得”。裴度听了小校的回答，大度地说：“不羁之才，值这个价。”让手下按照皇甫湜要求速去办理。碑文数下来共计三千二百五十四字，得绢九千七百六十二匹，如此高额的稿酬旷古未闻。当时运送丝绢的车辆，从

留守府衙到皇甫湜居住的正郎里，一辆紧挨着一辆，望不到尽头，轰动了整个洛阳城，市民争相围观，以为奇谈佳话。

皇甫湜自视甚高，一般不轻易出手。他曾对裴度差遣的小校说：“某之文，非常流之文也。曾与顾况为集序外，未尝造次许人。”皇甫湜只给顾况的诗集写过序，这次他主动请缨，一方面是自己生活困顿，连锅都揭不开。另一方面是感念裴度知遇之恩。但一码是一码，感恩归感恩，身价不能掉。我们不难理解他开出如此天价稿酬的动因，实质是为心目中文人孤标和清高的形象，不如此不能彰显其要义，不如此不能彰显其分量。

裴度自己也是个文人，《全唐文》存其文两卷，《四库全书》也有诗文收录。他的文学主张与皇甫湜正相反，反对文辞奇诡，倡导“不诡其词而词自丽”。以他的学识和眼光，与其说认可了皇甫湜开出的天价，不如说认可了他们心目中一个孤标、清高的文士形象。

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，不是空穴来风，文章的变革，需要有大无畏者去推动，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。皇甫湜在阐述韩愈反对因袭、主张独创的理论时说：“夫意新则异于常，异于常则怪矣；词高则出于众，出于众则奇矣。”绝不人云亦云，敢于创新。基于此，便不难理解他说白居易为“下里巴人”的意思，不存在人身攻击，纯粹是文学主张不同而已。

皇甫湜耿直不作，天性使然，有才气不被重用，郁郁不得其志，清高孤傲是浸透骨子里的；虽寄人篱下，又不想贱卖自己，于是就有了这种极端方式并享受其中：“毫无愧色，欣然受之。”

这乃是大唐气象，大唐的风度和风骨，兼收并蓄，包容一切。皇甫湜的狂傲与裴度的大气，相得益彰，他们互相成全，彼此默契。他们的官阶差了好几个品级，却不妨碍他们平等地以文对话，崇尚才华，致敬学问。李白“杨国忠捧砚，高力士脱靴”的故事，正是唐朝政治清明、经济繁荣、百姓富足、文化自信的表现，共同构建了一个大唐盛世。

《太平广记》是宋代李昉等人所撰的纪实小说，里面关于皇甫湜的记载我们无法详加考证。其中一段描写皇甫湜急躁的脾气，非常有趣，想来也符合他睚眦必报的性情。

有一天，皇甫湜被蜂蜇了手指，卞急躁怒。他让家中仆夫及邻里的小孩，将树上的蜂巢取下来装在畚箕里，并出高价买下来。不一会儿，所有的蜂子都飞聚到他家庭院中。于是，他又让家人仆夫将蜂捉住，再用砧板、杵白砸烂捣碎，将它们的汁液用布绞取出来，以解蜇手之恨。

然风云突变，黑云翻墨，一场横祸倏忽而至，冥冥之中似有定数。

次年，即大和九年(835)，唐文宗“甘露之变”后，皇甫湜在文坛的声音便戛然而止，一切归于沉寂，从此再无任何关于他的行实记载，享年五十九岁。白居易惊闻噩耗，在《哭皇甫七郎中湜》悼云：“志业过玄晏，词华似祢衡。多才非福禄，薄命是聪明。不得人间寿，还留身后名。《涉江》文一首，便可敌公卿。”白居易似乎也在暗示着什么，“不得人间寿”，难道是遭遇了什么飞来横祸，死于非命？

“甘露之变”是文宗皇帝与宦官仇士良之间的一场宫廷争斗，许多朝廷重臣被宦官杀死，家人因受牵连而遭灭门，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达千余人。桀骜不驯的皇甫湜不会趋炎附势，依附宦官，他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恰在情理之中。一个文坛教主一般的人物，一个啸傲孤直的标杆轰然倒下，中唐时期的文坛突然陨落了一个皇甫湜，显然也会落寞孤寂、暗淡许多。

据载，皇甫湜死后归葬县南三十里。

现存诗文四十五篇，有《皇甫持正文集》传世。文章体裁涵盖杂著、论序、制策、书、记、碑铭等，内容丰富，特色鲜明。其生平事迹见于《新书》卷一七六中《韩愈传》附《皇甫湜传》，《唐阙史》卷四及《因话录》《唐摭言》《太平广记》等文献。遗憾的是，那篇天价“福先寺碑文”和白居易诗中

所说《涉江》一文，均亡佚不见，就连碑石也人间蒸发了，许是老天不愿意这样的奇文久留凡间吧。

斯人远去遗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风流。

花间派词人皇甫松

皇甫松，字子奇，自号檀栾子，睦州新安（今淳安）人。皇甫湜之子，宰相牛僧孺的表甥。皇甫松屡屡不第，后期隐居不出，死后得唐昭宗追赠为进士。其生卒年不详。

《花间集》记载的诸词人中，俱称官衔，而独称他为“皇甫先辈”。先辈是唐人对进士的称呼，说明他一生并未入仕。皇甫松的著作有诗词、赋、小说等，而尤以词最为著称，他是晚唐花间派的领军人物。

幼年皇甫松有一个严厉的父亲——皇甫湜。父亲的教育甚至超出了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的大众版本，堪称奇葩。据《唐语林》卷六载：“一日命其子录诗，一字误，诟跃呼杖，未至，啮其臂血流。”因为抄录诗词写错了一个字，父亲等不及棍棒到手，一口咬住儿子的手臂，直至出血方才罢休，不是罢嘴。

皇甫松的性格具有两面性，一方面，敬重自己的家世，其父皇甫湜乃文坛奇才，古文大家，官至工部郎中，一生著作颇丰，皇甫松曾在《自纪》诗中叹言：“吾家世道德，旨意匡文明。家集四百卷，独立天地经。”（姚铉编《唐文粹》卷十五上）诗中他以家族传统为豪，以道德文章来标举，以匡正文明作旨归。另一方面，他性格既狂傲又懦弱，既想出仕又欲归隐，始终处于矛盾之中。如他在《大隐赋·序》曰：“栾子，进不能强仕以图荣，退不能力

耕以自给。上不能放身云壑，下不能投迹尘埃。似智似愚，人莫之识也；如狂如懦，物不可知焉。酒泛中山，适逢千日；萍漂上国，迨逾十年。遨游不出于醉乡，居处身同于愚俗。”

此外，父亲皇甫湜宦海沉浮，失意苦闷，常常借酒浇愁，曾作《醉赋》以自省：“予尝为沉湎所困，因作醉赋。”父亲嗜酒的习性也影响了儿子皇甫松，在其诗词歌赋中也多有涉及酒的话题，甚至写了酒令专著《醉乡日月》。这是一部关于唐代酒令文化的著述，里面详细记载了唐代通行的各种酒令和行酒的规则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风尚，以及饮酒文化的盛行。

《唐摭言》载：“（皇甫）松，丞相奇章公表甥，然公不荐。因襄阳大水，遂为《大水辩》，极言诽谤。”皇甫松与牛僧孺是表亲关系，当年其父皇湜对牛僧孺有提携知遇之恩。按理说牛僧孺应该举荐皇甫松才是，但不知何故，牛僧孺自长庆三年（823）任户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后担任宰相一职，登上了权力的顶峰，前前后后，长达十余年时间，并不曾举荐过皇甫松。皇甫松求牛僧孺举荐受挫后，写了《大水辩》，指责牛僧孺，以此发泄自己的不满，但他依然没有放弃科场。

唐代康骞在《剧谈录》中载：“自大中咸通之后，每岁试春官者千余人。其间章句有闻，亹亹不绝。如皇甫松以文章著美……厄于一第。”可想而知，才气和傲气兼具的皇甫松，求仕之路竟然止步于科场，会有多郁闷难遣，遂寻访郭隗台古迹，联想昔日燕昭王之事，置千金于台上，广招四方贤良，心中激奋之情，喷涌而出，随即赋《登郭隗台》诗一首：

燕相谋在兹，积金黄巍巍。

上者欲何颜，使我千载悲。

此孤寂郁闷，怀才不遇之境况，与陈子昂的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，何其相似。

晚唐时期的皇甫松与中唐时期的父亲发出了同一个疑问：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？千百遍的追问，千百回也绕不过去。从小呕心沥血，发奋苦读，只为了利济苍生、一展宏图，所谓“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。可咋就这么难呢？

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皇甫松在泥泞艰难的科考路上苦苦挣扎，反反复复爬起又跌倒，他由奋激转而消沉，转而寻求个体生命价值，转而沉湎于诗酒与女色。如《抛球乐》词，全然是醉里看花：

红拨一声飘，轻裘坠越绡。带翻金孔雀，香满绣蜂腰。少少抛分数，花枝正索饶。

金蹙花球小，真珠绣带垂。几回冲蜡烛，千度入香怀。上客终须醉，觥杯且乱排。

酒筵上歌舞伎乐，抛起绣球，传着花枝，饮着美酒，妆容游戏之场景呼之欲出。

父亲皇甫湜文章追求“意新”“词工”，他也是这样要求儿子的。严苛责罚下的皇甫松不负父望，词曲精妙，意新气清，可惜这般文思和才华，恣意挥霍在那酒筵歌舞中，随着曲尽酒阑飘零风尘，与功名无缘，与济世相悖，与初衷相违。严厉的父亲已然逝去，叛逆的个性缺了管束，犹如脱了缰绳的野马，任尔纵横驰骋。

晚唐的官场上少了一个皇甫松，词坛上却平添了一个大家。有了皇甫松的加入，唐朝词的艺术性也得到了很大提升，词体文学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。杜牧、段成式、张希复都曾填过词，但作品比较平庸，这种现象，到

了皇甫松、司空图的出现，才有了明显的改观。《花间集》录有皇甫松词作十二首，《全唐诗》共收有十八首，除了《采莲子》《抛球乐》《浪淘沙》《怨回纥》《杨柳枝》诸词为五七言外，其余都为长短句，有《天仙子》《摘得新》《梦江南》。另有《大隐赋》《续牛羊日历》《醉乡日月》等。

皇甫松的词大多清新、活泼、隽永，较少淫靡格调，在花间派词人中是难得的。花间派词人共有十八家，词作五百首。五代后蜀赵崇将这些作品编为《花间集》十卷，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词集。这十八家除温庭筠、皇甫松是晚唐词人外，其他皆为五代人，而且大部分是西蜀词人。该集将温庭筠、皇甫松列入卷首，表明他两人乃是花间词派的源流所在，有开山立派之功。温庭筠比皇甫松早逝，也是屡试未第，一生坎坷，终身潦倒。

在词风格调上论，五代词人词句浓艳，多写淫靡奢侈的生活，女人的姿色风情、浓艳香软。相比之下，皇甫松的作品则清新秀雅许多。李冰若《栩庄漫记》评曰：“子奇词不多见，而秀雅在骨，初日芙蓉春月柳，庶几与韦相同工。至其词浅意深，饶有寄托处，尤非温尉所能企及，鹿太保差近之矣。”确为公允之论。

如《摘得新》一词：

酌一卮，须教玉笛吹。锦筵红蜡烛，莫来迟。繁红一夜经风雨，是空枝。
摘得新，枝枝叶叶春。管弦兼美酒，最关人。平生都得几十度，展香茵。

此词调为教坊曲，乃皇甫松首创。文句清丽，在景物描写中，寄寓着人生的感慨，花无长红，人生苦短，莫要辜负眼前的良辰美景。顺世沉浮，与时消息，强求偏执于事无补。

清词论家况周颐在《蕙风词话》中说：“词以含蓄为佳，亦有不妨说尽者。皇甫子奇《摘得新》云：‘繁红一夜经风雨’……语淡而沉痛欲绝。”皇甫

松妙用短暂的春景，映照人生恒久的悲哀，“好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花落空折枝。”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得意之时须尽欢。

皇甫松曾说过：“吾将居常待终而已矣……苟求仁而得仁，又何荣而何欲？世事纷纷，生涯促促，亦何为乎黥金，亦何为乎泣玉！悠哉已矣，胡不顺时而从俗耶。”（李昉等编《文苑英华》卷九十九）好一个顺时从俗，从此混迹勾栏，放浪形骸。皇甫松的词一旦配上乐，便能歌舞弹唱，浮生若梦，归宿缥缈；舞女们唱尽人生悲欢，皇甫松阅尽人间春色，才子佳人，夫复何求？皇甫松用自己的行为替《摘得新》一词做了注脚，里面饱含悲凉无奈，令人痛彻心扉。与他早期《自纪》后半段吟唱的：“寄言青松姿，岂羨朱槿荣。昭昭大化光，共此遗芳馨。”那种凌云壮志、傲然独立之气势，简直判若两人。

花间派之前的诗词，出现“酒”的频率也很多，譬如曹操的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”画面中，“酒”作为道具，是用来配战马、配宝剑、配弓矢、配盔甲，出征壮行的；是拓土开疆、建功立业、开国定都、庆功伟业的。即便同朝代诗人王翰的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，也是在马背上痛饮的，画面中，我们看到的是号角、战鼓、刁斗与毡帐，甚至还能闻到空气中飘散着的腥膻之味。皇甫松诗中之酒，搭配的是红唇美女，是金孔雀、绣蜂腰，是香艳的脂粉气。

皇甫松用自己精湛的古文功底玩词曲、玩流行，玩出了一个流派——花间派，不知是幸抑或不幸？作为开山鼻祖，皇甫松影响了百年以后的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。柳永的词大多赠给了歌女，也是用来配乐弹唱的，夜夜笙歌。他四次应试不第，满腹的才华官场不取，只得献给欢场。好在晚年，仁宗开了恩科，授睦州团练推官，比起皇甫松算是幸运，终归是入了正途。

王国维先生从《花间集》《尊前集》《全唐诗》中辑得《檀栾子词》二十二首，为我们研究皇甫松的艺术成就提供了佐证。尤其对皇甫松《梦江南》

一词评价很高，说它“情味深长，在乐天(白居易)、梦得(刘禹锡)之上也”（《人间词话》）。

比如《采莲子》(其二)：

船动湖光滟滟秋，贪看年少信船流。

无端隔水抛莲子，遥被人知半日羞。

读罢掩卷，口舌留香。湖光依然在我们眼前荡漾，水波映照秋色，采莲船中有一位少女，被对岸一位英俊少年所吸引，正目不转睛、出神凝视间，船儿悠悠、随流而动，泛起微波澜，采莲少女浑然不觉，痴情萌态跃然纸上。这少女憧憬与渴求着她的爱情，并鼓起勇气跃跃欲试。

湖水滟滟起波，少女内心也泛起了波澜，她大胆抓起一把莲子，向对岸的帅小伙抛掷过去。这个动作把江南水乡勇敢求爱的女子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。喜欢就是喜欢，不藏着掖着。

皇甫松不愧是词作高手，他的高妙之处在于，故意避开对岸小伙子的反应，是喜是恼且不去说，转而把笔墨探触到采莲女的内心世界中。此刻，采莲女正低着头、红着脸，羞赧窘迫了半天哩。原来，刚才抛莲子的戏谑之举被人远远地看到了，她正为自己的冒失心生悔意，为何不等没人时再抛呢？平白惹人取笑。“无端”两字极为精准，是少女下意识的一种心理状态，把初恋少女纯情可爱的一面展露无遗。

他的词作清新隽永，音韵天成，既有文人诗词的含蓄委婉、洗练纯净的特点，又有民间歌词中大胆直率又朴实的风格。符合钟嵘《诗品》所赞美的“即目”和“直寻”相近。钟嵘赞美那些不用典故、直抒胸臆的“即目”“直寻”之作是最好的抒情诗。实况实境，直堪入画。《采莲子》就是这样一幅江南水乡的风情画。

再如《梦江南》：

兰烬落，屏上暗红蕉。闲梦江南梅熟日，夜船吹笛雨潇潇，人语驿边桥。
楼上寝，残月下帘旌。梦见秣陵惆怅事，桃花柳絮满江城，双髻坐吹笙。

这首小令是《梦江南》二首，亦颇富有诗情画意，是一首难得的佳作。所谓“诗有天机，待时而发”。全词借梦中所见所闻的动人境界，描绘了江南水乡梅雨季节的风光，寄托了作者思念故乡的缱绻之情。全篇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地，作者把自己的感触，全部隐藏到具体的景物背后，含而不露，词中没有直抒自己如何思念江南故乡，而是通过白描的手法，勾勒出江南暮春雨夜一幅幅动人的画面，如“夜船吹笛”“桃花柳絮”，有颜色有声音，作者的怀乡之情若隐若现寄托在字里行间，平和淡远，悠然绵长，读来情深意切，真实感人。

虽说皇甫松流传下来的诗词数量不多，但品位和质量皆属上乘之作，一举奠定了皇甫松作为晚唐花间派词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略觉遗憾的是，在皇甫松之后，皇甫一脉在淳安似乎找寻不到踪迹，不但宋元明清的进士名录中没有，就是前几年编纂出版的《淳安姓氏》一书，里面三百多个姓氏中，诸葛、欧阳、上官、申屠这些复姓人数虽少，却未绝迹。其父皇甫湜自称安定人。安定朝那是皇甫湜的郡望，在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一带，皇甫氏是安定的著姓。他们南迁睦州具体时间虽不可考，但据我掌握的资料推测，应在唐代贞观年间，皇甫松的曾祖父辈上定居淳安的。

“圣公”方腊

走进淳安博物馆“历史厅”，观众往往驻足停留在一块天然的鹅卵石面前，好奇打量一番。它呈不规整的椭圆形，四面皆刻有文字。灯光柔和地投射在刻石上，它肌理清晰，光滑呈褐色，阴刻的楷书铭文遍布四周，字口大小参差，深浅不一。这便是国家一级文物“方腊起义刻石”。

随着展台缓缓地转动，观众可以识读上面的铭文：“庚子十月初九日，睦州青溪县万年乡方十三作逆，名腊，妻姓邵。至十二月出洞，初五烧人家屋，打到杭州，便打秀州，城不开。丑年三月，天兵捉焉。四月七日，辛太尉入洞，收下入京，改为严州淳安县。丰源院僧用琴记。”

此刻，观众心里一定有了疑惑，鹅卵石的硬度不低，为什么一个叫“用琴”的和尚，会费这么大劲儿，刻石记录这样一件俗事呢？

时间回到九百多年前，北宋宣和二年(1120)春，青溪(今淳安)知县陈光，此刻正催促衙役征用民夫，上山采挖花石，以完成苏杭“应奉局”指派的官差。青溪山清水秀，山中盛产奇花异石，特别是境内东南山脉，有两种石头更是远近闻名，一种是茶园石，用于亭台牌坊，起楼造园，坚固美观，无比适用。再有隔壁赋溪玳瑁岭一带，高山深处，藏着各种千姿百态的奇石，突兀峥嵘，怪石嶙峋，有像石笋、石柱、石峰的，更有似石猴、石狮、石象的，鬼斧神工，惟妙惟肖，有园林假山的天然造型。

政和七年(1117),宋徽宗欲在汴京东北方向造一座万岁山“艮岳”。山周延绵十余里,园林宏伟,遍植奇花异木,云蒸霞蔚,仿佛蓬莱仙境一般。为了搜罗这些珍品,特设了苏杭“应奉局”,宰相蔡京推荐朱勔负责此事。朱勔在江浙一带尽力搜罗,青溪县首当其冲,成为重灾区。

凡是“应奉局”看上的奇石异木,不论是高山绝壑,还是深水激流,不计民力也要搬运出来。运送花石的船只,每十船编为一纲,所经州县,途中如有遇阻,遇桥拆桥,遇房拆房,甚至凿城垣以过者。搞得民怨沸腾,苦不堪言,有人迫不得已,选择逃离家园。

青溪县上年频受水旱之灾,粮食歉收,民多饥色。况稻禾未熟,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,百姓食不果腹,采挖花石是个体力活,稍有不慎便倒毙不起。知县陈光不管百姓死活,如有不从,轻者拷打,重者入狱。

万年乡邦源里碣村(今洞源村),方腊正式拜汪公老佛为师。说起方腊这位师傅,一言以蔽之:神龙见首不见尾。有人说他是陇西人,有人说是中原人,还有人说是越国公汪华的后裔。汪公老佛云游四方,布道传教,借以寻访豪杰之士。他到了万年乡地界,偶遇方腊,见他龙行虎步,竟有王者之气,暗吃一惊,晓得是个成大事的人。遂与之结交,宣讲教义。方腊虽半信半疑,听上去却十分受用,心生向往之意,遂加入。

宣和二年(1120)十月,小雪节气,山里变得寒凉肃杀,帮源里正方有常一家的漆园,显得异常冷清。方腊为避人眼目,选择此处作为联络点,准备举事起义。方有常二儿子方熊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,告诉了他当里正的老爸。“这还了得?”老爸赶紧派他去县衙告发。方腊见机事已泄,遂带领议事者一千人等,截杀方有常一家老小,只有季子方庚一人越墙逃脱。

消息走失,事关生死。与其坐以待毙,不如铤而走险。汪公老佛掐指一算,“九宫飞星犯北方,天灾人祸躲不了”。太岁庚子年,既然不太平,我们今日举事也算顺应天意。于是,方腊便在漆园召集了上千人,进行誓师大

会。方腊站于高坡地，大声说道：

今赋役繁重，官吏侵渔……独吾民终岁勤劳，妻子冻馁，求一日饱食不可得……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，近岁花石之扰，尤所弗堪。诸君若能仗义而起，四方必闻风响应，旬日之间，万众可集……十年之间，终当混一矣！

方腊极具煽动性的一席话，喊出了老百姓的心声。青溪境内百姓但闻轻徭薄赋，立马揭竿而起。一时间，天风激荡，波涛云涌，起义队伍迅速聚集数万人。

真是应了那句话：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”

李埴《皇宋十朝纲要》卷十八《徽宗纪》载：“宣和二年（庚子年），十月，丙子（初九日），睦州青溪妖贼方腊反，据帮源洞，四出焚掠，聚众几万人。”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五四《方腊之乱》载：“徽宗宣和二年（1120）冬，睦州青溪民方腊作乱。”《桂林方氏宗谱》及杨仲良《续通鉴长篇纪事本末》等记载，方腊别称方赖、方癩，又名方十三，青溪帮源洞（今洞源村）人。

方腊在帮源洞揭竿起义后，于十一月初一日即建元“永乐”，自号“圣公”，立子毫为太子，任方肥为丞相，汪公老佛为军师。“置官吏将帅，以巾饰为别，自红巾而上凡六等”，起义军在镇压了当地劣绅及地主武装后，随即遭到了两浙路都监蔡遵、颜坦的征讨。宣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（1120年12月20日），蔡遵、颜坦率官军五千人逼近万年乡，在距万年乡东南二十里地的息坑埋锅造饭，不料方腊军师汪公老佛，早已预设伏兵，张网以待。此役全歼了蔡、颜官军，史称“息坑大捷”。

次日，起义军乘势而进，一鼓作气占领了青溪县城，处决了县尉翁开。十二月初二日，又乘胜攻占了第一座州城——睦州，并占据遂安、寿昌、分

水、桐庐等县。随即挥师向西，攻下歙州。镇守将军是号称“病关索”的宋军东南第三将郭师中，也不敌方腊义军，郭师中与部众三千余人尽数战死。

歙州一役，起义军士气大振，举兵向东攻克富阳、新城（今新登），直逼杭州。杭州是两浙路首府，又是“造作局”所在地，“花石纲”的指挥中枢。起义军一个个恨得牙根痒痒，攻打起来格外卖力。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杭州城被攻陷，首先在城外开化寺六和塔附近打掉了宋军的据点，烧毁开化寺，使之片瓦无存。两浙路最高军事长官制置使陈建，以及廉访使赵约都做了义军的刀下鬼。

起义军所到之处，犹如风卷残云一般。

这就是石刻所记“至十二月出洞”的具体含义。

“初五烧人家屋。”这是石刻纪实较为关键的一句话，它也是石刻之所以存世的主要原因。据《严州图经》及《淳安县志》载：“丰源院在县东北安乐乡，五代贞明二年（916）建。”丰源即今文昌镇王家源村这条山源，距青溪县城约六十里，与分水县（现属桐庐县）的塔岭为界，是起义军进攻分水、桐庐的必经之路。

因方腊起义军“不事神佛”“尤憎释氏”（庄季裕《鸡肋篇》），因此，“逢庙即烧”（《桂林方氏宗谱·方庚传》）。我们查阅了有关地方志也证实了这一点。如建德市的甬顺庙，富阳区的净明寺、妙智寺，於潜的治平寺，东阳的禅林院，浦江的惠香教寺、明德教寺等均被烧毁。此外，如淳安的县学、桐庐县学、青田县儒学、丽水县府学先师庙、石门县学官、黄岩县文庙、歙州学宫、衢州学府等孔舍儒学，还有一些道观，凡在义军声威所及之处的，均被捣毁。

丰源院自然是难以幸免的。作为一个脱离世俗尘缘的僧人——用琴，如果不是危及其基本的生存，很难想象他会涉足时务，去刻石纪实而让它遗存人世。

失控的洪流不受制约，必然泛滥。一时间，苏州的石生，湖州归安县（今吴兴县）的陆行儿，婺州兰溪市的朱言、吴邦，永康市方岩山的陈十四，处州（今丽水）缙云县的陈箍桶，台州仙居县的吕师囊，越州（今绍兴）剡县的仇道人，衢州的郑魔王等，纷纷结集徒众响应，起义队伍像滚雪球一般，不断壮大。

江南告急，警报入京。起义军摧枯拉朽的气势，让汴京城内的徽宗寝食不安。他连忙下诏罢止苏杭“造作局”和“应奉局”，罢免朱勔父子官职，以此来缓和矛盾，消除紧张的局面，好让百姓感受他的“皇恩浩荡”。另派童贯任江、淮、荆、浙路宣抚使，谭稹为两浙路制置使，率领京畿禁军及秦、晋二地蕃、汉兵计十五万人，前往杭州、歙州和睦州镇压。

方腊占领杭州后，于宣和三年（1121）正月，兵分南北两路，继续进军。南路，向婺州（今金华）、衢州、处州（今丽水）等地推进；北路，方腊指派方七佛率领六万土众挥戈北伐，一路攻克宣州（今安徽宣城）宁国，围困广德（今安徽广德）军。另一路起义军于宣和三年正月十九日（1121年2月8日），攻下崇德县（今桐乡崇福镇），便打秀州。方腊进攻秀州的目的，是为了北上夺取金陵作准备，实现划江而守的战略目标。

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。秀州（今嘉兴）的前统军王子武“职战”，知州宋昭年“职守”，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场面：“（秀州守军）长兵在前，短兵在后，弓矢分左右翼，夹射遂启门，鼓噪而出；太守复率百姓登城，擂鼓发威以助之……贼大骇，奔溃，追奔数十里，斩首五千级……”（《嘉兴府志》卷三十一）。加之，童贯所部王禀的宋军前来救援秀州，前后夹击，使方腊义军秀州之战失利，“攻城不开”。

秀州失利，杭州也就失去了屏障。宣和三年二月十八日（1121年3月8日）杭州失守，使方腊起义军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逆转。三月初一日，方腊虽然亲率义军企图夺回杭州城，与宋军王禀等部激战于城外，但因力量对

比悬殊而失利，不得不朝原进军路线败退。王禀等则乘胜追击，这就是刻石中的“丑年三月，天兵捉焉”。丑年，即宣和三年（1121）辛丑年三月，方腊起义军开始败退，“天兵”追捉方腊起义军。这里的“捉焉”，并非在三月即捉住了方腊，因三月廿二日至三月廿七日，富阳、新城、桐庐、睦州再相继失陷，直至四月十九日，王禀等部才攻陷青溪县城。四月廿四日，宋朝官兵汇集帮源洞，血战帮源。“四月七日，辛太尉入洞，收下入京。”

据《宋史·韩世忠传》及《淳安县志》载：“四月，童贯合兵击方腊于帮源洞，腊等尚二十万，与官军力战而败，深居崖屋为窟，诸将莫知入，王渊裨将韩世忠，潜行溪谷间，问野妇得径，即挺身仗戈直捣其穴，格杀数千人，擒腊以出。辛兴忠（辛太尉）领兵截洞口，掠为己功，并取腊妻，子及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（一为三十九人）于洞石穴中……”当时，韩世忠只是一名裨将，这项功劳被记在了“兵截洞口”的忠州防御使辛兴忠账上。方腊等首领被捕以后，不久就被送往杭州“宣抚司”。同年七月，被童贯“槛送”京师开封去邀功。宣和三年八月廿四日（1121年10月7日），方腊等在开封被腰斩于市。

方腊被俘后，五月，睦州青溪县即改为严州淳安县。万年乡亦改为威平乡。这就是“丰源院僧人用琴记”刻石关于方腊起义全过程的纪实。刻石记载的关于方腊首义和被俘的时间、地点以及义军攻打赵宋王朝州、县的路线，都与史书、志书、宗谱所记载的相吻合。

丰源院和尚用琴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、目击者，又是寺院被烧的受害者，他刻石以记文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而且是刻记在一块天然鹅卵石上，文字通俗，内容具体，没有蓄意造作的成分，可以作为考证方腊起义这段历史的实物史料。

方腊自号“圣公”，改元“永乐”，提出了人“不分贵贱，平等均富”的口号纲领，以及“轻徭薄赋”的治国理念，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。在不到半

年的时间里，连续攻克浙江、安徽、江苏、江西境内六州五十二县，占据东南半壁江山，他俯瞰中原，欲与朝廷分庭抗礼，划江而治。

这难道是一介草莽具有的胸襟和气度？方腊起义虽于宣和三年（1121）失败，却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衰亡，仅仅过了五年，宋高宗迁都于杭州，建立南宋王朝。

淳安历史上，有陈硕真反唐，接着是方腊反宋。陈硕真反唐并不顺应历史潮流，初唐时期政治清明，唐高宗李治承继了父亲唐太宗“贞观之治”的盛世，老百姓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改善，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，皇帝本人也崇尚节俭，并不奢侈荒废，反唐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。与陈硕真相比，方腊反宋更在情理之中。宋徽宗为了一座万岁山，遍及江南搜罗奇石异卉，朱勔更是借机强取豪夺，弄得人心惶惶、民怨四起。当时的淳安就是“花石纲”的重灾区。如此劳民伤财，不得人心，合该是北宋王朝的气数将尽。

方腊起义确实顺应了历史发展，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农民起义，矛盾的焦点无一例外，集中在朝廷与民众间，引燃的具体事件千差万别，方腊恰时恰地引燃了“花石纲”这根导火索，顿时形成了燎原之势。在这样的背景下起兵反宋，可见方腊是有战略眼光的，也符合皇朝更替的周期性规律。

瀛山达人詹仪之

1169年冬，时南宋乾道五年，通往郭村瀛山书院的官道上，一辆马车急速驰过，纷纷扬扬的尘灰散尽，竟飘逸着一缕书香墨韵，轮蹄碾过的黄土印痕，望去像极了鸟虫篆文。村民正疑惑间，马车在拐角处詹府门前缓缓停了下来，但见车上下来一个儒雅的读书人，四十岁模样，风神俊貌，遗世独立。

他，便是理学巨擘朱熹。

朱熹与詹家、与瀛山、与书院，自此结下深厚的情缘，始终割舍不断。

詹氏家族地位显赫，皆有功名，平时迎来送往的图景，不免让人想起刘禹锡的诗句：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”村民眼中的詹家，是那样的高不可及。詹仪之的父亲詹棫，有兄弟五人，依序为詹林、詹至、詹厚、詹怪、詹棫，都是进士出身，号称“五子登科”，且同朝为官，放眼整个遂安县城，当是首屈一指。村民不用猜便知，来客定然是奔詹府去的。

此时，詹府主家的是詹仪之。

史载“公方占家食”，这一年，说他恰巧赋闲在家。

詹仪之，字体仁，号虚舟，南宋郭村人。绍兴二十一年(1151)举进士，累官吏部侍郎，集英殿修撰，知静江军府事，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(相当于明清时期的总督，人称帅司)，赐紫金鱼袋。秩满进敷文阁待制，官至二品。

其祖父詹安，太学生，授迪功郎，与程门四先生之一的谢良佐友善。为方便宗族子弟读书，他曾在瀛山构筑书院。据明万历壬子本《遂安县志》载：“瀛山书院，在县西北四十里。宋熙宁间，邑人詹安辟建于山之冈，凿方塘于麓，其孙仪之与朱晦翁往来论学于此。”

仪之幼承庭训，尤好理学，有志于学问。

朱熹此番前来就是与之探讨“格致”之学。

何谓“格致”之学？朱熹的解释较直白：“格，至也；物，犹事也。穷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极处无不到也。”（《大学章句》）又说：“致，推极也；知，犹识也。推极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也。”（《大学章句》）格物就是至物，通过对事物的接触、感知和观察，达到对事物本然之“理”的认识，进而穷尽事物全体之“理”。

此刻，瀛山书院“丽泽所”，朱熹下榻处。但见朱熹双眉微蹙，在狭小的屋内来回走动，心中涌动着：太极、阴阳、理气、知行、正心、诚意、格物、致知……要将它们组织、糅合、条理、序化，有步骤，利践行。

他这次意欲将“格致”学系统化来。

窗外天空低垂，彤云密布。

“先生在吗？”詹仪之手提书匣，上山看望朱熹来了。他带来的是谢良佐先生的遗稿。此时，天空飘飘洒洒下起了鹅毛大雪。朱熹忙开门相迎，瑞雪扑面而来，朱熹不禁打一个寒战，他接过詹仪之手中的书匣，顺手置于案头，便索性伴着詹仪之信步闲庭，观赏起雪景来了。

詹仪之望着满庭乱舞的雪花，兴之所至，当即口占唐诗一绝道：“北阙彤云掩曙霞，东风吹雪舞山家。琼章定少千人和，银树长芳六出花。”

朱熹听罢，不动声色，撩起长袍张罗了一些雪花，顾谓仪之道：“詹兄方才说‘银树长芳六出花’，不知雪花为何是六出的？”

仪之见问，若有所思，道：“天公造物，自然之妙也。”

朱熹微微颌首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天下之事，皆谓之物；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；物之有理，格而后知之。”

朱熹边说边将长袍上的雪花，指示给仪之道：“雪花有六出，也有五出、四出，此乃空中气流冲击碰撞所致。只要我等用力勤，则事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也。”

仪之拱手相道：“先生见教极是，于细微处见精神。然詹某尚有一事未明，‘理’是在事物之先固有的，还是在事物之后才有的呢？若说在事物之先便有此‘理’，则事物岂非多余？若说在事物之后才有这‘理’，则辨之何益？”

朱熹沉吟片刻，断然道：“‘理’与事物本无先后，‘理’非别为一物，它存在事物之中，若无事物，则‘理’亦无挂搭处。”

詹仪之听闻，豁然贯通，随即口吟一联赠送朱熹：“紫阳学问当千古，白鹿规模又一天。”

这是詹仪之与朱熹的初次论道，句句藏匿机锋。

三年后，也就是乾道九年（1173），詹仪之出任信州知府前夕，再次邀请朱熹来瀛山书院讲学。朱熹欣然前往，时值春夏之交，万物复苏，生机盎然。

朱熹讲学以启发为主，而非灌输记问之学。学生可以和老师意见相左，甚至激烈辩论，互相碰撞启发，这便是教学相长。詹仪之时而参与教学，时而参与辩论。瀛山耸秀叠翠，学术空气浓厚，一时远近学子云集，草木沾香，声名远播。

朱熹在书院讲学之暇，常与詹仪之往来徘徊于登瀛桥、得源亭和方塘之间。

方塘不大，半亩有余，水极清澈，平静如镜。塘中小荷已露出尖尖的头角，驳坎上柳枝摇曳。詹仪之情绪极佳，他忽有所动，手指方塘，顾谓先生

道：“你看这天光云影，山峦翠岚，在荷叶间穿梭、变幻、游走，俱在方塘之中一一呈现，敢问先生，此中之‘理’何在？”

朱熹顺着詹仪之手指方向望去，顿时心有所触，他想起了昨晚再度披阅上蔡先生（谢良佐）遗稿，内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天下之物，有生意是为仁。”生意就是生气，就是活的生机、活的灵魂，周而复始，流转不息。朱熹面对方塘，犹如面对着一面镜子，照见万物也照见自己的内心，似银瓶泻地一片清辉，他灵光乍现，当即诗兴涌动：

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

问渠那得清如许，惟有源头活水来。

沉吟片刻，道：“不妨就叫《咏方塘》吧。”

詹仪之连声赞道：“妙，妙，妙。尤其末句‘惟有源头活水来’，可谓以一‘理’喻万‘理’，尽得‘格致’风流啊。”

好一首《咏方塘》，从此成为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，也是朱熹“格物致知”理学思想的精华所在，他巧妙、有机地活用了上蔡先生的“生意”说，且将方塘水和源头活水这两者联系在一起，从极寻常的自然现象中悟出带普遍意义的生活哲理，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。

此后，詹仪之出任信州（今上饶）知府。

作为地方行政长官，他明理思辨，关心学问之道，为此，他组织了一场“世纪之辩”：辩论时间在淳熙二年（1175）；辩论地点在江西铅山鹅湖寺；他邀请了朱熹、张栻、吕祖谦、陆九龄、陆九渊作为辩论双方人员；以朱熹为首的理学，命题是“格物致知”，以陆九渊为首的心学，命题是“心外无物”。辩论双方针锋相对，且都是学派创始人，史称“鹅湖之会”。

这场顶级的学术交锋，对当时的思想界和后世学人产生了积极而深

远的影响。

詹仪之组织“鹅湖之会”后，与朱熹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谋面，各忙各的。詹仪之位居官场，身不由己，三年后他出任广西转运使，治所在静江（今广西桂林），此时的静江知府是张栻。朱熹则在各地讲学，两人主要是通过书信保持联系，继续探讨“格致”之学。通过《答詹体仁》——朱熹回复詹仪之的来信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学者的通病：“湘中学者之病诚如来教，然今时学者大抵亦多如此。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，又有一种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，亦非小病。”（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八）

朱熹给詹仪之的书信，据我所知，大略有《答仪之书》《答詹帅书》《与詹帅书》《上仪之书》《与詹体仁书》等。

我们今天非常有幸，能够看到朱熹《与詹体仁书》真迹。

《与詹体仁书》这封书信，因为首句有“春雨复寒”字句，按惯例名之“春雨帖”。

这封书信是詹氏墨宝之一，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书信内容如下：

熹窃以春雨复寒，伏惟知府经略殿撰侍郎丈。闾制威严，神物拥护，台候动止万福！熹区区托庇，幸粗推选。但祠禄已满，再请未报，前此延之。诸人报云，势或可得，未知竟如何？居闲本有食不足之患，而意外之费复尔百出不可支。吾亲旧有躬耕淮南者，乡人多往从之，亦欲妄意为此。然尚未有买田雇夫之资，方此借贷。万一就绪，二三年间或可免此煎迫耳。衰病作辍，亦复不常，此旬月间，方粗无所恼，绝不敢用力观书。但时阅旧编，间有新益。如《大学》格物一条，比方通畅无疑，前此犹不免是强说。故虽屡改更，终不稳当。旦夕别写求教，前本告商省阅，有纰漏处，痛加辨诂，复以示下为幸也。桂人蒋令过门相访，云尝上疏论广西盐法，见其副封，甚有本末。渠归必请见，因附以此。勿遽不暇详悉。未有侍教之日，临风惘然。切乞以

时,为国自重,有以慰善类之望,千万至禱!

右谨具呈

二月廿七日宣教郎直徽猷阁朱熹劄子

朱熹给詹仪之写这封信的时间是淳熙十二年(1185)二月廿七日。朱熹时年五十六岁,詹仪之六十三岁。

书信抬头称詹仪之为“知府经略殿撰侍郎”,此时詹仪之任职的全称应是“吏部侍郎、集英殿修撰、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”,所以朱熹省称为“知府经略殿撰侍郎”。

朱熹这里所说的“祠禄已满”是什么意思呢?这是宋代特有的一种现象,谓之“祠禄官”。一般由年老的大臣充任,他们可以不理政事,而俸禄照常领取,以示优礼。这样的“祠禄官”需要有人荐举,也有一定的名额。詹仪之作为经略安抚使是有权举荐的,所以他举荐了朱熹。但不知何故,朱熹落选了,他的生活陷入拮据困顿,以至于有“食不足之患”,连吃饭都成了问题,到了靠借贷度日的境况。尽管生活窘迫如此,朱熹治学未敢懈怠,他“时阅旧编,间有新益”,对原先写的文章再作修订,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收获。

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,朱熹把詹仪之当作知交。本来像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事情,读书人是难以启齿的。有人会提出疑问,朱熹落款不是写“宣教郎直徽猷阁”的官名吗?

“徽猷阁”原本是宋徽宗时建造的,用来收藏哲宗御制、御集的,政和六年(1116)九月,增置直徽猷阁。南宋时期沿用,只是个贴职,无职守、无所掌,为从七品官。宣教郎乃迪功郎的别称,官阶更低,是朱熹最初入仕时被授予的,相当于八品官。可见,此时的朱熹正处在闲居期间,没有俸禄就失去了经济来源。

为弄清詹仪之的行踪,我查阅了《桂林市志》,上面有他在桂林期间题刻的摩崖石刻。后又在桂海碑林博物馆廖先生处得到证实,詹仪之题刻的摩崖石刻竟多达13处。其中位于隐山北牖洞的摩崖石刻题记内容如下:

淳熙戊戌(1178)岁六月丙戌,廖重能置酒,约詹体仁、张敬夫(张栻)登山观,泛舟西湖,荷花锤未盛开,水光清静,自足消暑。视北牖洞之前有胜地,体仁欲为小亭名以“招隐”。敬夫北归有日,不及观斯亭之经始,独预书“招隐”二字以贻之。

可见,至少在淳熙五年(1178)六月,詹仪之已经在广西转运使任上,隐山招隐亭也是由他主持修建的;九年后,他还在灵剑江修建了寻源桥。此外,桂林叠彩山风洞、普陀山弹子岩、象鼻山水月洞等处,也都有他的题诗、题名、题记的刻石。他宦游桂林的时间与史书记载基本吻合。

据《景定严州续志》记载:“除公吏部侍郎,知静江府,因任六年,官鬻弊革。”他出任静江知府兼经略安抚使的时间是淳熙十年(1183)四月(《南宋经抚年表》),到他因广西盐法事被革职,离开桂林的时间是淳熙十六年(1189)正月,与《景定严州续志》所载的“因任六年”相符。

淳熙十六年二月,詹仪之因“广西盐法”被革职,退归故里。

广西盐法自绍兴年间实行客钞(私商卖),三十余年未变。范成大于乾道七年(1171)出知静江,改为官般,即由官府设转般仓于适中地,转盐就商,或待官卖。因为食盐关乎民生,私商为了赚钱,或囤积居奇,或待价而沽;官卖也好不到哪里去,少数官员垄断卖盐权,从中渔利,老百姓苦不堪言。所以,范成大之后一时私卖,一时官卖,更易不定。

詹仪之帅广西后,大多数时间实行私卖,中间一段时间也实行官卖。据《景定严州续志》记载:“代者飞语中公,有袁州行。”《宋元学案·丽泽学

案》也说：“（詹仪之）累官吏部侍郎，知静江府，已而以蜚言谪袁州。”代者是谁？流言蜚语又说了些什么？代者即新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应孟明，他向孝宗皇帝上奏状告詹仪之：“盐钞抑勒民户，流毒一方，欲得复旧以解愁怨。”

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正月，詹仪之以“罔上害民”之罪，责授安远（今北京城西南）军节度行军司马，袁州（今江西宜春）安置。此间，二月初二日，正值孝宗禅位于光宗，“光宗登极，念公故官僚，许自便。既归而歿，公论惜之。”詹仪之虽被贬官，但他并未赴任，归家不久即病逝。

詹仪之死有冤屈。广西盐法实行客钞，其实是孝宗皇帝准许的，淳熙十年（1183），诏广盐实行钞法，罢官般官卖。淳熙十一年（1184）四月，“诏广西经略詹仪之，运判胡廷直，开具到现行盐钞，已为详细，可恪意奉行”。（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一四九）“如是，则一路二十五州，无不均被圣泽。折苗科敷之弊，可以永革，而民力裕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一四九）

詹仪之这些政绩恰成为他以后被贬官革职的罪状。

是年七月，仪之回到家乡郭村，不久病逝。

次年，朱熹来到瀛山致奠，写有《祭詹侍郎文》：

维绍熙元年（1190），岁次庚戌，七月癸丑，朔十有一日，癸亥具位，朱熹谨致奠于近故经略阁学侍郎詹公之灵。呜呼！世之学者众矣。其所以为学者，类不过出入乎口耳之间。求其笃志力行，以期入乎圣贤之域者，则鲜矣！惟公粹美之资，得于天禀，孜孜学问，乐善不倦，其尊闻行知之效，见于日用之间者，在家在邦，随事可纪。盖一本于中和，而行之以慈恕，信乎所谓，志于仁而无恶者矣！晚登从班，出镇南服，急于救弊，以绥其民，故不暇计百全之利，而其害有出于意虑之外者。上虽不获已于积毁之言，然暂谪而亟还之，则既有以知公之无罪矣！众亦咸谓商度、财利、钩校、米盐，本非

所以烦儒学老成之士，莫不冀公之复起，而有以卒究其所学之蕴也。不谓归未及门，而遽以病告税驾，未几而遂至于不起。此则有志于学者所以叹息流涕而遗恨于无穷也。熹辱知惟旧蒙念亦深闻讣，逾年一奠，莫致其为愧负，盖不胜言緘词寓哀，尚祈鉴享。呜呼哀哉！

祭文情真意挚，读罢潸然泪下。在他眼里，詹仪之资质美、禀赋高，追求学问之道，“孜孜学问，乐善不倦”，为人则“本于中和，行以慈恕”，即便如此，仍然遭到流言蜚语的攻击，以至获罪。朱熹接下来这段话算是替詹仪之鸣不平：“晚登从班，出镇南服，急于救弊，以绥其民，故不暇计百全之利，而其害有出于意虑之外者。上虽不获已于积毁之言，然暂谪而亟还之，则既有以知公之无罪矣！”

朱熹在祭文里讲得比较委婉，詹仪之为了安抚百姓，急于救弊，无暇顾及自身的周全，却遭到流言的恶意中伤，其实皇上知道詹仪之无罪，之所以革他的职也是权宜之计，是迫于“积毁之言”。

朱熹来到瀛山下写下这篇祭文，是在绍熙元年(1190)七月，距离詹仪之去世正好一周年。

记得1994年，我在《可爱的杭州·淳安卷》里，写过詹仪之的文章，标题是《日以问学的詹仪之》。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查阅了许多资料，只知他的卒年而不知其生年，故对此我始终存疑。

去年我写了一篇关于瀛山、关于汪建功老师为恢复书院奔走呼吁的文章，题目是《一座千年书院的背影》。汪老师后来找到我，说我读懂了他，走进了他的内心。从汪老师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他对我的信任，为此我感动不已。在一次通话中我向他提出了心中久存的疑惑。詹仪之墓志铭里有记载呀，汪老师回说，家里有《詹氏宗谱》的复印件。

次日，我按约登门造访。

汪老师拿出《东源詹氏宗谱》，看谱头重修序款是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版本，早期序款有宋政和版的，其次明洪武戊辰（1388）、永乐甲辰（1424）、宣德壬子（1432）、万历甲寅（1614），以至清乾隆等款，家谱传承有序。其卷九《墓志》有《阁学侍郎詹公墓志》：

公以宣和五年（1123）六月辛丑生，用考致仕，恩补将仕郎，登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进士第，历舒州宿松簿，绍兴府余姚县丞，知湖州乌程、常州宜兴二县，入御史台为主簿。出知台州，移信州（今上饶），提点广南东路刑狱，就改转运判官，又易广西路转运判官，提点荆湖南路刑狱。召拜吏部郎中，枢密院检详文字，由起居舍人兼太子侍讲，迁起居郎，权吏部尚书，兼太子左谕德，遂为吏部右侍郎。以集英殿修撰，知静江军府事，兼经略安抚使，赐紫金鱼袋。秩满进敷文阁待制……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七月丙寅，终于正寝，享年六十七岁。

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墓志铭有詹仪之明确的生年——1123年，以此推算，享年六十七岁。

接着再浏览下去：

葬于县西新安乡芹下源，元配余氏，继配叶氏，俱先公卒，追封新安郡夫人。子男三人，尊祖，修职郎，衢州龙游县尉；怀祖，承直郎，南康府（江西庐山）通判；彭祖，文林郎，绍兴府诸暨县知县。女五，长适进士杨九功，次适进士余朴功，三适乡贡进士吴硕中，四适修职郎温州乐清县知县陈铭，五适宣教郎荆湖北路常平司干办公事周环。

落款为“孙男登仕郎孝本等立石”。孝本是尊祖的儿子，他对自己祖父

的生平记载当是值得信赖的。

詹仪之原配夫人余氏、继配夫人叶氏早于夫君去世。三个儿子都有功名在身；五个女儿也均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好人家。这是一个根深叶茂的宦宦之家。

根据“葬于县西新安乡芹下源”这句话，我推知他葬于现在的浪川乡新桥村。经了解，詹仪之墓位于新桥村后山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村民开辟茶园时意外发现了该墓葬，由于当年文物保护意识淡薄，村民没有报告县文物部门，而是自行挖掘，平整了土地，随葬品也遭到严重破坏，事后县文管会只征集到三条铁鱼，现藏淳安博物馆。

詹仪之虽然距离我们八百余年，但瀛山有他的余绪，书院是他的归宿。他与明代的方应时一并列入了乡贤祠。

邑人余凤鸣，清道光乙未(1835)恩科举人，曾任湖南衡阳、通道、桂阳等县知县。他曾在《瀛山书院詹先生祠记》中说：

先生沉潜圣学，南宋时读书邑西瀛山之双桂堂。下凿方塘活水一渠，清浅可爱，朱子就而商补传之义。半亩方塘之句，由此咏焉。阙后有《与詹侍郎书》，有《答詹侍郎书》，有《答詹帅书》。反复以“格物致知”之理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之旨，《太极》《西铭》之解相商榷。至《祭侍郎文》，则曰尊闻行知之效，见于日用。直以中和慈恕，志仁无恶相许。夫人品为朱子所推重，其为圣贤之徒可知。学问于朱子相考稽，其能阐明圣道又可知……自宋而元而明，道学衰而先生之双桂堂以废。邑侯宛陵周少峰先生倡复旧迹，堂仍旧名，增格致堂于其前，颜曰“瀛山书院”，而祠于其后，以祀朱子，配先生于左侧。

詹仪之道德垂范后世，配祀朱文公祠是实至名归，复建的瀛山书院也

应给他留有一席之地。行文至此,我顿觉一身轻松,既为詹仪之,也为自己20多年久存的旧案有了一个确证。

我觉得文章观点和视角是否新颖独特,读者诸君自有评判,但若一篇文章能解决至少一个具体问题,就犹如在浩瀚的史海中,通过点滴钩稽,对某个人物或事件,进行精准定位,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坐标,这对于笔者来说则是莫大的鼓舞。

如若要给詹仪之一个准确的定位,我觉得用“瀛山达人”正合适。达者,通达无碍也,无论为官、为学还是为人,他都当得起这个名号。

恭圣仁烈皇太后杨桂枝

她一生都在书写传奇。

她从一个平民蝶变为大宋皇后、皇太后。

她集权势与才艺于一身。她融胆识和智慧于一体。她用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叫“巾帼不让须眉”。

她便是谥称“恭圣仁烈皇太后”的杨桂枝。

时间回到858年前，南宋绍兴三十二年(1162)，南宋第一位皇帝高宗让位于养子赵昚，是为孝宗，开启了政治清明、百姓安康的“乾淳之治”。也正是这一年的二月十二日子时，淳安潦家源山坞(今里商乡皇后坪村)一户农家小屋，诞生了一个女婴，那夜清亮的啼哭声，响彻整个山坞，不独惊扰了这个小小的山村。此后这个女人更是震动了南宋，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。

话说是夜掌灯时分，杨纪早早请了稳婆来家，妻子张氏今日临盆。晚饭后妻子肚子隐隐作痛，杨纪不敢怠慢，却又插不上手，坐在堂前候着动静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恍恍惚惚看见一个白发老头进得门来，手里拿着一枝丹桂，递交给自己。杨纪犹觉诧异，丹桂并非属于这个季节，鼻子里扑进一股丹桂香气。他心想种在庭院也好，于是起身来到门外，但见满院紫气氤氲，不禁有些看呆了……

“生了，生了，是个女娃。”

杨纪猛然被叫声惊醒，耳边传来阵阵啼哭之声，穿云裂帛，好生清亮。他忙起身随稳婆来到屋内，但见母女平安，皆大欢喜。

这一年杨纪三十八岁，此前原配刘氏已为他生了四子一女，长子次山、次子岐山、三子望山、四子冯山。大女儿名叫兰枝。杨纪望着眼前的女婴，想起刚才那个梦境，忽有所感，故对张氏说，小女就叫桂枝吧。

桂枝自幼性幽含雅、温婉聪慧，很讨四邻喜欢。杨纪也把小女视若掌上明珠，在家督责几个儿子读书时，常让桂枝伴随左右，说也奇怪，杨桂枝小小年纪竟对诗赋韵文表现出浓厚兴趣，缠着阿爸问这问那。杨纪寻思桂枝若是男儿身，将来定是往功名路上奔的，远超过她四个阿哥。

母亲张氏觉得女孩子家舞文弄墨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不如让她去学些琴艺歌技的才艺，也好贴补家用。杨纪认为张氏说得有道理，便在桂枝十岁那年，将她送到妻子在临安府的一个人称“张夫人”的远房亲戚处，在其开设的民间教坊学艺。

临安府的这位张夫人可是这一行的头魁，非浪得虚名，收徒也是有讲究的，有“五看一亮”的规矩。“五看”即是：一看台面，看你的扮相、样貌和台风；二看骨骼，骨骼清奇者，单看背影都能吸引人；三看灵巧，看你的机灵劲儿，能否与观众沟通互动；四看人品，须品行端正，不可惹是生非；五看资质，包括本人的天资和家庭的背景，非良善人家的孩子不取。“一亮”就是亮嗓清唱几声，嗓子是爹妈给的，后天很难练成。一开嗓就知道你是不是吃这碗饭的料，如果是这块料，加上训练，功夫很快就能上身，否则终身也是半吊子，上不了台面。

这么一套程序下来，张夫人对杨桂枝甚是满意，脸上依旧平静，慢悠悠说道：“留下吧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养母了。”

杨桂枝从此迈入教坊，在养母近乎苛刻的督导之下，她开始在行内崭

露头角。

南宋定都杭州之后，宫廷教坊已经名存实亡。赵升的《朝野类要》记载：“今虽有教坊之名，隶属修内司教乐所。然遇大宴等，每差衙前乐权充之；不足，则又和雇市人。近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，多是市井歧路之辈。”

《梦粱录》也有类似记载：“向自绍兴以后，教坊人员已罢。凡禁庭宣唤，径令衙前乐充条内司教乐所人员承应。”卷二十载：“绍兴年间，废教坊职名，如遇大朝会、圣节，御前排当及驾前引奏乐，并拨临安府衙前乐人，属修内司教乐所集定姓名，以奉御前供应。”由此可见，南宋宫廷不再豢养固定的乐工以专事教坊的演出事务，改为向临安府或者民间宣唤。

孝宗皇帝更是出了名的节俭，不肯用乐。但居在慈福宫的吴太后喜欢听曲。吴太后是高宗的皇后，高宗禅位之后，吴太后被尊号寿圣明慈太上皇后。太后欲听曲，也只让内侍传临安府乐人进宫演唱，而临安府拿得出手的乐人并不多，常延请张夫人的教坊充任，张夫人不敢丝毫怠慢，亲自入宫献唱，颇得太后欢心，故每有赏赐。

这一日，吴太后在后宫闲坐，忽顾左右说：“都大半年了，记得张家，今安在啊？”内侍回道：“听说病了，有个女儿颇是水灵聪慧，样样活儿不输于张家哩。”吴太后来了兴趣，道：“是嘛，便唤了来唱一曲罢。”

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所谓“理应明宣，术宜秘传”，杨桂枝这几年在养母调教下，不但人出落得花容月貌、艳压群芳，技艺更是闻声即悟、按节能歌。杭州城内的王公贵胄皆争相追逐，以一睹桂枝芳容为幸事。

而张夫人深谙奇货可居的道理，等闲场所轻易不让桂枝露面，吊足了看客们的胃口，要的就是个一鸣惊人的效果。这不，机会说来便来了。

张夫人在病榻前，唤过桂枝嘱咐道：“平日教你的宫廷礼仪，合当派上用处了，你的唱功早不输我，此番入宫，太后跟前好生用心，以后就看你的造化喽。”

杨桂枝不禁有些伤感，垂下两行清泪，泣道：“母亲身子骨要紧，费心将养着，桂枝都牢记下了。”

鸾车佩铃一路驶向深宫，内侍引着桂枝往慈福宫逶迤而来。但见她轻启莲步，娉娉婷婷，楚楚的身材尤招惹人眼目。桂枝面对宫苑美景，并不东张西望，而是不紧不慢跟在内侍后头。到了宫闱，内侍先让桂枝候着，自行入内请旨去了。

太后吩咐：“宣。”

桂枝被引到吴太后跟前，头也不敢抬起，先伏身拜倒下去，连声叩道：“民女杨桂枝恭请太后慈安。”太后略一抬手道：“起来。今年多大了？”桂枝起身回禀：“民女今年十三岁了。”口齿清晰，音色清亮。

吴太后点点头，“嗯”了一声，随即觑得杨桂枝一眼，道：“模样好生俊俏，不知唱得可好？”

桂枝见问，一点不显生分，目视太后回礼道：“民女这便献丑了。”边说边准备妥当，遂轻启雏喉，执板清唱了一段《曲子词》，融乐、辞、唱一体，声字清圆，忽而如黄莺出谷，忽而似敲冰戛玉，悦耳婉转，余音绕梁……

太后一时竟听呆了，许久方回过神来，叹道：“模样好，唱功更胜张家一筹，不用回去了。”回顾左右：“领这孩儿去德寿宫乐部吧。”

史书上称杨桂枝“善通经史，能小王书”，加上模样可人、聪慧伶俐，“举动无不当后意”，一时间竟成了吴太后身边的红人。除了唱曲，桂枝平日有事没事还常和吴太后闲聊，还会把与太后一起的日常生活，写成《宫词》拿给太后看，讨得太后欢心。宫词是古代一种诗体，主要描写宫廷生活，以七言绝句居多。

这一日恰是上元节，禅位的高宗摆驾慈福宫，与吴太后一起宴饮赏梅，节庆观灯。家宴不能无乐，不能不唱曲，太后早早唤得桂枝前来。桂枝见太上皇和皇太后推杯换盏，兴致甚高，机会难得，自然十分卖力，席间把柳苏

晏词轮番献唱，时而低婉，时而激越，随着情绪起伏，那声音继而也时如竹籁，时如玉振，变幻莫端。把一千人等听得如醉如痴、如梦牵魂。太上皇眯着醉眼，问太后道：“太后哪里寻得这等才色的女子？只顾自己消受。”吴太后佯嗔道：“这孩儿确是本宫选取，却不敢藏私，去岁就送德寿宫乐部了。”德寿宫便是太上皇的退居之所，孝宗为此上尊号“光尧寿圣太上皇”。一时弄得太上皇无话可说，摆摆手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太后喜欢就自个儿留着吧，朕已不胜酒力，先行回宫去了。”

众人恭送太上皇起驾回宫。

桂枝掩不住有点小兴奋，让内侍取过笔墨，即兴赋诗一首，呈与太后看。太后就着灯下阅去，一笔隽秀的王体小楷，诗词也应景，写的是：

元宵时雨赏宫梅，恭请光尧寿圣来。
醉里君王扶上辇，銮舆半仗点灯回。

太后不觉惊讶道：“你还有多少才艺是本宫不晓得的？这诗文书法都是跟何人所学？好生了得！”

桂枝跪禀道：“是民女养母张夫人处学得。”

“不要一口一个民女，从今往后本宫就叫你桂儿吧。起来说话。”太后一面吩咐桂枝，一面收回视线又叹道，“这手字体清雅得很，本宫也是不及的。”

桂枝起身回道：“琴棋书画皆乃小技，于道未尊，不值太后谬赞。像太上皇、太后和皇上这样，把天地作棋盘，万民作棋子，奉天行道，造福百姓，方为人中龙凤哩！”

太后听了杨桂枝这一番话，不禁愕然道：“你小小年纪胸中竟藏着这般丘壑，已然难得。只可惜了是个女儿身。”吩咐左右，“以后让桂儿留在本

宫,随时听用。”

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插曲,可见吴太后有多喜欢杨桂枝。一次,吴太后在沐浴,宫女们因为嫉妒杨桂枝,存了心要整治她一番,故意撺掇她说:“桂儿快来看,这是太后的衣服,多漂亮呀,要是我们桂儿穿在身上,一定像仙女一样美哩。”少女杨桂枝爱美,自然也喜欢漂亮衣服,经不起宫女们几次三番怂恿,果真穿上太后的衣服炫美一番,惹得宫女艳羨嫉恨不已。待吴太后沐浴更衣,宫女就告了杨桂枝一状,说她偷穿了太后衣服,在宫里走来走去,是僭越行为,大逆不道。吴太后听了非但没有责罚杨桂枝,反而把告状的宫女训斥一通:“瞧瞧,就你们这些小心眼,保不齐人家桂儿将来就穿这样的衣服,拥有本宫这样的地位也未可知!”一番话说得宫女们咋舌而退。

杨桂枝从此待在吴太后身边,一晃就是二十年。

绍熙五年(1194)六月戊戌,孝宗去世,光宗因病不能出宫,有御笔批出:“处理朝政多年,想退下来赋闲。”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奏请:“臣等乞请立皇子嘉王为太子,以安人心。”得到旨意:“皇子嘉王可以即皇帝位。”不料嘉王赵扩听闻却坚决推辞,道:“万万使不得,恐怕担上不孝的名声。”

赵汝愚神情肃穆道:“国不可一日无君,现在中外恐慌,万一发生变故,将置太上皇于何地?”

赵扩一时间六神无主,情急之下,他想到了太皇太后,于是匆匆赶往慈福宫,借问安的由头,欲得到太皇太后一个准信。

时值仲夏,宫苑中百花盛开,姹紫嫣红,杨桂枝除了书法有精进外,绘画技法幸得画院待诏马远亲授,也是工写相兼,得心应手,画啥像啥。这不,太皇太后正在后宫观赏杨桂枝的《百花图卷》哩,这会儿正画着蜀葵图,见她有题画诗曰:“花神呈秀群芳右,朱炜储祥变叶新。”

太皇太后面对此画,忽而伤感道:“昨日一花开,今日一花开。今日花

正好，昨日花已老。始知人老不如花，可惜落花君莫扫……”口中的诗尚未吟完，但见内侍匆促禀报：“太子求见太皇太后。”

“快宣。”

太后方于榻间坐定，太子赵扩已到了跟前，先说了一些问安的话，随后说出自己的担忧。太皇太后正色道：“太子所虑那是小孝，自古说：‘小孝孝于庭闱，大孝孝于天下。’天子应当以安定社稷，稳定国家为孝，你不必多虑，择日即位吧！”

赵扩听罢，一颗心方始定了下来。此时他才注意到太后身边有个风姿绰约的小美人，立刻被其迷人的韵致吸引住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。杨桂枝何其机灵，岂不知太子目光中的含义？她情愫暗生，脸颊顿时飞上红晕，娇羞地埋下头去，心跳不止。太后也已觉察到这两人的异样，眼里看破，嘴上不去说破，只叫太子速去准备登基大典。

太子赵扩自从慈福宫辞别后，整日里郁郁寡欢、魂牵梦绕，心心念念的只有杨桂枝那娇羞的样貌，至于自己如何被人扶进白色帷帐，披上黄袍，坐登大宝，接受百官立班朝贺，如何向天地、宗庙、社稷祭告，改明年为庆元元年(1195)等一干事情，都未免记忆模糊。慈福宫的近侍私下常议论，说宁宗皇帝真懂孝道，最近经常跑去问太皇太后安。

太后听在耳里，也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只不说在嘴上。她虽然有意撮合，但也顾忌桂儿的出身，好在宁宗即位之初，自己已经同意册立了北宋名臣韩琦六世孙女韩氏为皇后。心想：“看这新皇帝痴情桂儿，桂儿也心仪皇帝，两人眉目传情，何不成全这对鸳鸯？”

庆元乙卯年(1195)二月，太后在慈福宫摆设家宴，乘酒酣耳热之际，太后拉过桂儿的手，郑重其事地对宁宗嘱咐道：“新君莅国，凡事当以国体为重，本宫已是八十岁的人了，不劳皇帝事事挂念，今日便把桂儿交于你，望看在我的面子，今后好生待她。”

时宁宗二十七岁，杨桂枝三十三岁了。这对彼此相思已久的鸳鸯喜出望外，双双拜谢过太皇太后，辞别回宫。宁宗等不及，次月便进封桂枝为平乐郡夫人，此后，这对姐弟恋恩爱有加，几乎年年进封。据《宋史·后妃传》记载：“三年四月，进封婕妤。五年，进婉仪。六年，进贵妃。”

说来也巧，杨桂枝刚晋封为贵妃，不久韩皇后病重驾崩，谥号“恭淑”。中宫一时未有归属。朝中议论纷纷，形成了两派阵营，有说立杨贵妃的，有说立曹美人的。韩皇后是宰相韩侂胄的侄孙女，她一死韩侂胄便在宫中失去了靠山，他欲在宫中继续擅权，心中十分忌惮杨贵妃。他总觉得杨贵妃没有那么简单，无形之中有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朝臣，令他非常不爽。而曹美人性格柔弱恭顺，与世无争，自己完全可以掌控，最为放心。礼部侍郎史弥远与韩侂胄素来面和心不和，只要韩侂胄反对的他就支持。两路人马都在暗中较劲。

杨桂枝洞悉情势，心想皇上倚重韩侂胄，史弥远的力量还是单薄了些。皇上的性格她是知道的，厚道温和，决断迟疑，要是让皇上自己挑选，准保左右为难。他既喜欢曹美人，也深爱着自己。而自己的命运不能掌握在别人手里，现在正是关键时刻。她心中已然有了主意。

史载：“杨性机警，颇涉猎书史，知古今事。”在这一场皇后争夺之战中，善通经史、知晓古今的杨贵妃自然懂得“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”的道理。

这一日，杨贵妃登门看望曹美人，她拉着曹美人的手说道：“你我姐妹，平素相处不错，皇上欲立中宫，不外乎你我两人之间选取，我们不妨各自摆设酒宴，邀请皇上临幸，觐望圣意，如何？”曹美人听了频频点头，觉得是个好主意。

杨贵妃大度地说道：“你是妹妹，就先设宴吧。”

曹美人心中窃喜，嘴上还是推辞了一番，按约在宫中摆下酒宴，早早让人去请宁宗赴宴。不知什么缘故，天色向晚，才见皇上銮驾缓缓驶来，曹

美人望眼欲穿，当下接入，请帝上坐，自己侧面相陪，这边酒还没过三巡，那边忽见宫女来报：“贵妃娘娘来了。”

曹美人心中一惊，暗暗叫苦，虽有百般不乐意，还得起身相引，延席入座。杨贵妃目视宁宗道：“陛下待我们两姐妹不能分出厚薄，可要一碗水端平，曹美人处已经赏光，是该转幸妾身处了吧？”

一旁的曹美人急得涨红了脸，搁下玉箸，忙起身阻拦，想要皇上多饮几杯。宁宗面有难色，举着酒盅放也不是，喝也不是。杨贵妃灵机一动，笑盈盈道：“妹妹莫要着急，且放宽了心，陛下到妾身处一转，又可再回到妹妹这里。”

宁宗顿然释怀，连声应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遂起身挈杨贵妃便走。俟皇上到了自己宫中，岂有再放走的道理？杨贵妃捡点酒肴，挨着皇上入席，又是唱词又是行酒令，长夜未央，银缸绿酒，贵妃娇媚欲滴，宁宗醉意渐浓。一个是如花解语，一个是玉山半颓。宁宗乘着酒兴，正欲帮贵妃宽衣解带，杨贵妃左推右挡，意欲让皇上立自己为皇后。

宁宗咕哝道：“朕便立你为皇后。”贵妃喜道：“君无戏言，皇上须立个字据才好。”笔墨俱是现成，宁宗遂提笔写下一行字：“贵妃杨氏可立为皇后。”贵妃依偎宁宗身边，仍然不依，拉着宁宗的手，娇滴滴道：“皇上再写一张罢。”宁宗复又写了一纸交于贵妃。

杨贵妃马上将宁宗御笔交给近侍，如此这般，仔细嘱咐一番，随后把宁宗拥入帐中，龙凤呈祥去了。

次日早朝，百官列班，但见一官员急匆匆上殿而来，从袖中取出御笔，高声宣布杨贵妃为皇后。韩侂胄与一众官员惊掉了下巴，取过诏书验看，的的确确是御笔无疑。看官，昨晚杨贵妃为何要宁宗书写两纸？原来她心思缜密，考虑周详，最担心韩侂胄反对，以致封诏驳还，所以一纸照常例颁发，一纸遣人秘送其兄杨次山处，让他宣示朝堂，双管齐下，免生变数。韩

侂胄至此方知大局已定，无法变更，只得听任百官准备册后典礼，择吉日举行。

杨次山入宫有必要交代一下。据《宋史》载：“次山……补右学生（太学生），后受职官中，次山遂沾恩得官，积阶至武德郎。后为贵妃，累迁带御器械、知阁门事。”杨后册立，又有升迁，此乃后话。

杨皇后一径册立，即大赦天下，百官多半也有封赏加秩，韩侂胄竟然被晋封为太师，这倒是令他没有想到的。心中更是对杨皇后刮目相看，认为这个女人绝非等闲之辈。

时间到了开禧元年（1205），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，开始总揽军政大权，他有了出兵伐金、北定中原的想法，下令各军做好行军的准备。他任命旧日僚属苏师旦为枢密院都承旨，指挥军事；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，程松为四川宣抚使，吴曦为副使；北伐的主力分布在江淮、四川两翼。

不料吴曦已在四川暗通金朝，做了里应外合的内奸。他派遣门客去金军，密约献出关外阶、成、和、凤四州，换取金朝承诺，让他来当蜀王。金人指令吴曦在金兵临江时，按兵不动，使金兵无西顾之忧。吴曦一一照办，面对金军，吴曦下令撤退，宋军溃败，金军入城陷关，如入无人之地。西线有了吴曦做内应，金军部署兵力集中东线作战，溃郭倬于宿州，击李爽于寿州，败皇甫斌于唐州。

次年六月，韩侂胄为了封堵悠悠众口，罢免了军事指挥官苏师旦、邓友龙，任命丘密为两淮宣抚使。丘密上任伊始，便放弃泗州，退军盱眙。金军抓住机会，分兵九道出击，形势顿时逆转，由宋军北伐变为金军南侵，一时间光化、枣阳、江陵、信阳、襄阳、随州、滁州、真州都被金军占领。到了年底，金军秘密派人联络丘密，示意讲和。

西线吴曦叛变，东线丘密主和，主张北伐的韩侂胄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当中，朝中责骂之声不断，韩侂胄孤立无援，就连宁宗也不再信任他。

韩侂胄主战北伐，想要收复中原，一时竟在宋朝成了如秦桧一样的奸臣，遭人唾骂。史学家蔡东藩有评语可谓一语中的：“（秦）桧主和，侂胄主战，其立意不同，其为私也则同。（秦）桧欲劫制庸主，故主和；侂胄欲震动庸主，故主战。（秦）桧之世，可战而和者也；侂胄之时，不可战而战者也。”

杨皇后的机会来了，韩侂胄命悬一线。

韩侂胄的感觉没有错，背后盯着他的那双眼睛，始终不曾离开过他。开禧三年（1207），韩侂胄决意再度整兵出战，他起用辛弃疾代替苏师旦来指挥军事，命令下达不久，十月三日，辛弃疾就因病而逝。朝中主和的大臣议论纷纷，推举史弥远弹劾韩侂胄。史弥远心里也不踏实，一时举棋不定，他想到了杨皇后，于是入宫来见。

杨皇后宽慰道：“此事莫急，须找个稳妥人先面奏圣上，视圣意如何再弹劾不迟。”杨皇后乃召入太子赵询，如此这般吩咐一番，让他去面禀父皇。

赵询俟宁宗退朝，当面禀陈道：“侂胄仓促用兵，不顾百姓安危，已是败绩连连，今欲再启兵端，恐危社稷！”

宁宗漫不经心道：“朕自有分寸，你且回去罢！”

赵询谏言，杨皇后尚在一旁，见宁宗犹豫不决，遂从旁进言道：“侂胄奸邪众人皆知，只怕他权势遮天，不敢明言罢了，如今陛下又听任他起兵，闹得中外汹汹，群臣恨不能啖其肉、寝其皮，陛下犯不着替他担责。”

宁宗嗫嗫嚅嚅道：“待朕查明，再行罢黜。”

杨皇后道：“侂胄在满朝文武中皆安插了亲信，陛下深居九重，如何能够查实？此事不得再犹疑，唯有懿亲方可用心去查。”宁宗方始点头答应。

杨皇后见自己的话起了作用，但以她对宁宗的了解，这个作用只是暂时的，因为宁宗总决断迟疑，她怕韩侂胄耳目遍布，夜长梦多，事不宜迟，遣人连夜召入史弥远商议。

杨皇后密语史弥远道：“有两件事你速去办理，一是联络朝臣，准备奏

章连名弹劾侂胄；二是反水侂胄亲信，让他们认明情势，好自为之！”

史弥远得旨退归，马上联络礼部尚书卫泾、副枢密钱象祖、著作郎王居安、右司郎官张镒、参政李壁等往来谋划。

俗话说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韩侂胄亲信早已将侦报的疑情禀告于侂胄。侂胄将信将疑，没有十分当真。

这一日，韩侂胄来到都堂，迎面碰到李壁，漫不经心问道：“听闻有人想要改变目前局势，参政可晓得这回事？”

事发突然，李壁毫无思想准备，见侂胄当面问起不禁面红耳赤，吞吞吐吐答道：“不曾晓得……”俟韩侂胄离去，李壁慌忙将此事报知史弥远。

弥远大惊失色，又去与张镒商议。张镒一咬牙道：“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杀了侂胄万事皆休。”

史弥远听罢踌躇再三，事关重大不敢独断，交代张镒道：“待我讨得懿旨，你们再下手不迟。”于是急速入宫，面禀皇后。

杨皇后见机事泄密，不免沉吟道：“侂胄手握重兵，一旦他先发制人，宫廷必生大乱，届时，尔等命不保夕矣。礼有经权，事有缓急。今日之事，也只能如此了。”言罢，起身去了屏风后，不一时交了一道密旨给史弥远，嘱他速去办理。

史弥远不敢耽误，连忙出宫，找到禁军统帅夏震，说手上有一桩奇功让他去办，问敢不敢做？夏震满脸狐疑，待史弥远说出原委，夏震依然不信。直至史弥远袖出密旨，夏震方道：“君命在此，震理当效死！”夏震领命而去，统领禁军三百人，埋伏在韩侂胄上朝的必经之处，俟机诛奸。

时十一月初三，韩侂胄和平常一样坐着轿舆去上朝，当走到六部桥时，前头突然冒出一队人，拦住了轿舆的去路。只见为首者挥手喝道：“圣上有旨，太师已罢平章军国事，立即退出去！”韩侂胄诧异道：“圣上若果真有旨，我为何不知？”

夏震更不待言，令部卒一拥而上，围了轿輿竟往玉津园来，到了园内，将侂胄一把拖出，喝令跪接圣旨。夏震宣诏曰：“韩侂胄久任国柄，轻启兵端，使南北生灵，枉罹凶害，着罢平章军国事……”

语音未落，一部卒取出铜锤，猛向韩侂胄头颅敲去，顿时倒毙。傍晚时分，杨皇后得报侂胄已死，遂告宁宗道：“陛下，侂胄被禁军砸死在玉津园里了。”

宁宗摇摇头道：“这没影子的话，朕如何信得。”直到三天后，朝堂上始终没见到韩侂胄，宁宗方始相信皇后所言不虚，至此，乃下诏历数韩侂胄之罪，颁示中外，并抄没家产，查得各样珍宝、乘舆御服等不计其数。

有罚必有赏，按部就班来。另授钱象祖为右丞相，兼枢密使，卫泾、雷孝友参知政事，史弥远同知枢密院事，杨次山晋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玉带；夏震升任福州观察使。改第二年为嘉定元年。

杨皇后治理后宫也是井然有序，一丝不乱。人们都说皇后会用典，这个“典”，既是法典，又是文典，是文章典故的意思。指明了夸杨皇后胸有学识，才能服众。

平心而论，宁宗皇帝的智商较为平庸，对于政事很少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凡是大臣的奏章，一律批“可”，弄得群臣无所适从，有时候明明意见相左，截然不同的两份奏疏，得到的批复却是一模一样的“可”字。好在杨皇后足智多谋，给了宁宗不少建议，久而久之他竟有些依赖皇后，杨皇后不愿给人留下“后宫干政”的口舌，不到万不得已自己并不出面。

宁宗即位之初，大臣黄裳和朱熹都曾向皇帝建言：“政出中书，万事坐理，此正得人君好要之道。”这是在提醒宁宗防范出现一人独断、群臣拱默的局面。从后期宁宗的表现看，大体上接受了士大夫的建议，加上宁宗本人理政能力不足，皇帝亲揽权纲、一人独断现象似乎没有出现，但却导致了韩侂胄这样的权相独断专擅之弊。皇权弱则相权强，这种局面并没有因

为韩侂胄之死而有大的改观。

空缺的位置总有人去替补，何况是丞相之位。嘉定元年（1208）十月，史弥远在恰当的时机和背景下担任了右丞相，从此开启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擅权之路，可谓“一侂胄死，一侂胄生”。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，便是敢于擅易太子。

嘉定十三年（1220），太子赵询病逝，年仅二十八岁。宁宗无嗣，另立皇弟沂王之子赵贵和为储君，赐名赵竑，授任宁武军节度使，封祁国公。赵竑平日喜欢弹琴，史弥远投其所好，选送了一个擅长弹琴且容貌姣好的美女给他，作为安插在赵竑身边的耳目。

赵竑浑然不觉，反视其为知音，有什么心里话也常对她诉说。

一次，赵竑指着墙上的一幅地图对她说：“这是最南边的琼州、崖州，日后我若得志，一定要将史弥远流放到这些地方去。”平日里还给史弥远起了一个外号，叫“新恩”。美女不解，问“新恩是何意？”赵竑愤愤地说：“就是新州和恩州。”意思要把史弥远贬谪到这两个地方去。新州指广南东路，即现在广东新兴一带；恩州是今广东恩平一带，常为官员贬谪之所。又尝言：“弥远当决配八千里。”

史弥远得知美女的密报，内心惊惶不已，太子这样看待自己，日后太子即位，自己哪里还能有好果子吃。他一面让美女继续监视太子，一面在思虑着如何处置太子。

一场宫廷政变正在悄然无息地酝酿。

嘉定十七年（1224）九月，宁宗病重，史弥远假借探望之机，历数皇子赵竑之过，说他玩物丧志，不堪重托，又转白宁宗，说沂王嗣子有个叫贵诚的，今年十九岁，凝重端庄，品学醇厚，言谈得体，绝非凡品，意思是让宁宗易储。宁宗昏昏沉沉看着史弥远，未置可否。

史弥远见此光景，心中顿时凉了半截，退归宅第，立马遣人到沂王府，

找到贵诚转达易储意。来人道：“此丞相之意，今日将心腹语相告，望能明示，好去回复丞相。”

贵诚初闻易储事惊诧不已，旋即镇定下来，拱手相道：“烦请转告丞相，兹事体大，需待禀过绍兴老母。”

贵诚果然言谈得体，既不答应也不拒绝，而是留有回旋余地。史弥远得到这个回复，心里便有了底，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，这分明是默许。既然这样还等什么呢？他立即入宫来见宁宗。

一进宫便见太医们神情肃穆，一片忙碌。他觉得气氛不对。内侍也慌乱了，有些语无伦次地说皇上病沉，已经不能说话了。

事不宜迟，史弥远从福宁殿退归，心里已然有了决定，富贵险中求，拍案定乾坤，不能错失眼前这个良机。他假传圣旨，诏立贵诚为皇太子，赐名昀，授武泰军节度使，封成国公。

不出旬日，时九月十八日，宁宗驾崩。

帝星陨落，注定是个不眠之夜。

戌时，天地昏黄，万物朦胧。右丞相府，史弥远焦躁不安，在屋里来回走动。他想自己假传圣旨，废了济王赵竑，重新立了赵昀为太子，此事皇后并不知晓，若得不到杨皇后的允诺和首肯，那是万万行不通的，弄不好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。今日之事，如之奈何？

情急之下，他想到了一个人，那便是国舅杨次山，也只有他的话皇后会听。一会儿顾自摇摇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可惜故去五年了。”咦，何不让他两个儿子出面呢？史弥远灵光一现，连忙遣人去请皇后的两个侄儿杨谷和杨石。

亥时，定昏。夜定人不定。

杨谷、杨石先后乘舆来到右丞相府，史弥远上去迎着，来不及寒暄，将前因后果大略告知，也顾不得什么丞相脸面，近乎哀求道：“两位贤侄，此

去面见皇后娘娘，务将废立之事入白，讨得皇后一个允准的口信，弥远拜谢了！”

杨谷、杨石急忙扶起史弥远，口里应着，拱手别去。

子时，夜深。杨皇后得报杨谷、杨石求见，心中顿生疑惑，待听完两人禀明事由，不禁惊愕道：“太子竑乃先帝所立，岂可更易？史弥远胆大妄为，擅自废立，去，告诉他不可！”

史弥远闻报，立觉后背发凉，冷汗直淌。但他定了定神，直觉皇后并不喜欢赵竑，平日言谈举止也有点讨厌太子。于是他认定皇后迟早会松口。他转而向杨谷、杨石一揖到底，道：“此事急迫，还有几个时辰新君就要登大宝，劳动两位贤侄，急速禀明娘娘，拜托，拜托！”

宫漏夜残，烛影月蚀。杨谷、杨石走后，杨皇后睡意全无，她在想史弥远的用意，自从韩侂胄死后，史弥远把持朝政，权倾朝野，现在竟连太子都敢擅自废立，今夜摆明了是在试探本宫态度，如若放任下去，岂能把本宫放在眼里？是该杀一杀他的威风了，再熬他一熬。

丑时，鸡鸣。这一夜，从宫里到丞相府，杨谷、杨石来来回回折腾跑，全身衣服湿透，又热又累。这已经是第六趟来回了，此刻灰头土脸又折返丞相府，苦不堪言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娘娘终究不肯松口，丞相还是另请高明吧。”

史弥远听罢，浑身瘫软，一屁股跌坐在地，泣声道：“贤侄再去求求娘娘，天明，新君即将登位，怕来不及了。”

这一夜，史弥远被折磨得几乎虚脱，他算是彻底被太后收服了，这个女人让他刻骨铭心、终生难忘，至此方领教了杨皇后的厉害，他起身拉着杨谷、杨石的手，绝望地乞道：“快去告诉娘娘，弥远的命都在娘娘手里攥着哩！”

寅时，平旦。杨皇后在后宫坐等，她了解史弥远，也知道杨谷、杨石还

会再来，更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，若处理不好定会酿成大祸，届时将朝野震动，局面再无法挽回。正思虑间，近侍来报：“杨谷、杨石求见。”杨皇后道：“宣。”

杨谷、杨石见了皇后，都一起拜倒下去，泣道：“朝廷内外都已赞成，如果皇后坚决不同意，到时候必生祸变，亦恐波及杨家，怕是有灭门之灾啊！”

杨皇后沉吟再三，决定打破僵局，她慢悠悠道：“你们要立的那个人在哪里？”

“已在宫外候着。”杨谷、杨石据实相禀，原来史弥远早已悄悄把赵昀接来，在宫外候着，听闻消息，连忙让赵昀觐见杨皇后。赵昀伏身拜倒下去，杨皇后道：“起来我看看。”赵昀走上前去，杨皇后抚其背道：“你现在就是我的儿子了。”

这句话算是给赵昀吃了颗定心丸，皇后认了他这个儿子，自己继承皇位便合理合法，可堵住悠悠众口。

赵昀随后被人引到宁宗的灵柩前，以皇子身份举哀致奠，待吉时登基。殿上烛炬齐明，百官鱼贯而入，排班而列，传宣官宣即位诏，百官齐声拜贺，礼毕又有遗诏颁出，授皇子昀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封济阳郡王，判宁国府，尊杨后为皇太后，垂帘听政。

赵昀稳稳坐上江山，是为理宗，改第二年为宝庆元年。

皇太后心里明白，所谓的垂帘听政其实是理宗和大臣们对她的尊重和信任，看似“听政”，实则为新皇帝撑个场面，向大臣们摆明一个态度，有皇太后亲自坐镇，像史弥远这样的权臣就不得不在朝堂上有所收敛。自己已经是六十三岁的人了，不能违背太祖留下的“后宫不得干政”之遗训。

宝庆元年(1225)四月七日，太后手书“多病，自今免垂帘听政”，懿旨正式宣布撤帘，赢得朝野一片赞誉。

据《宋史·后妃传》记载：“宝庆二年(1226)十一月戊寅，加尊号‘寿明’。绍定元年(1228)正月丙子，又加上‘慈睿’二字，四年(1231)正月，太后过七十大寿，理宗率领百官到慈明殿朝贺，加尊号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。十二月辛巳，太后身体不适，理宗下诏祷祭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、宫观，大赦天下。五年(1232)十二月壬午，太后驾崩于慈明殿，享年七十一岁，谥号恭圣仁烈。”

理学名家钱时

他是淳安本土真正意义上的理学家。

他生活在一个理学家辈出的年代，是“心学”的嫡传正脉。《宋史》有其传，不载生卒年。《文学家大词典》有传曰：“生卒年均不详，约宋宁宗庆元末前后在世。”

他就是钱时。

传统儒学发展到宋代，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流派——理学。奠基者是号称“北宋五子”的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。在我看来，“北宋五子”的出现绝不是偶然。如黄宗羲在《宋儒学案》中所说：“孔子而后，汉儒只有传经之学，性道微言之绝久矣。”这种时候，需要有人站出来提振信心，重兴儒学。“北宋五子”的出现可谓是顺势而为。他们提出了如无极、太极、元气、阴阳、五行、象数、性命、善恶等一系列理学命题，试图重新审视和解读客观世界，拯救世道人心。

钱时出生于南宋时期，理学已在全国盛行。

钱时，字子是，号融堂，淳安蜀阜（今威坪镇）人。他幼年即奇伟不群，不同于世俗儒生之见，对于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感兴趣，只喜欢研究理学道义。单从举止看，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。

据说钱时豁然悟道后，如醉醒梦觉，心融神化。三年后，他出门求证，

拜谒慈湖杨简(陆九渊弟子,人称“甬上四先生”)。杨简与钱时的晤面,很是戏剧,打杨简第一眼望见钱时,便觉“目击而道存,一言与之契合”。这场面与禅宗的参悟很是相像,师徒之间不需要喋喋不休的交谈,机锋互参,一言便契合。杨简不禁大赞“严陵钱子是人品甚高”,遂书“融堂”二字相赠。

后来,钱时作为杨简的得意弟子,顺利在学界扬名立万。江东提刑袁甫,深知其人品才学,特设象山书院,邀钱时为主讲席。钱时一时声名大噪,从者如云,儒林推重,争相礼聘延请,莅讲于新安、绍兴等郡学,他成了学界红人。

袁甫何许人也?袁甫,嘉定甲戌(1214)科状元,绍定三年(1230)兼任江东提点刑狱,后移司鄱阳,讲学学宫,创建贵溪象山书院。象山书院与长沙岳麓书院、金华丽泽书院、庐山白鹿洞书院齐名,号称南宋四大书院。袁甫还有另外一重身份,他也是杨简的弟子。试想,如果不是真心服膺钱时,认可钱时的理学体系,他怎会邀请钱时当这个主讲人?

宋代书院林立,学派丛生,这样百花齐放的局面,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。皇帝对文人历来宽容优厚,文人著书立说、批评朝政、妄议国事,不会担心惹祸上身。宋太祖曾立下以文治国、不杀上书言事之人的誓约,等于给了文人一道免死金牌。文人因言获罪,最多就是贬官、撤职,有的等风头过去,又会官复原职。

钱时在象山书院首开讲坛,标新立异,其学说发明心性,议论宏伟精辟,听闻者耳目一新,大获裨益,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口碑。由于钱时的出色表现,右丞相乔行简把他推荐给理宗皇帝,称赞钱时:“夙负才识,尤通世务,田里之休戚利病,当世之是非得失,莫不详究而熟知之,不但通诗书,守陈言而已!”

嘉熙元年(1237),理宗召见布衣钱时,特赐进士出身,授馆阁秘书校勘。又召其为史馆检阅,修国史宏编。诏令严州守臣抄录钱时著作,奉上御

览，皇帝也被他的学术吸引。接着他出佐浙东仓幕，不久以国史宏编未毕求去，后被授江东帅属归里。

钱时其学发明心性，辨析义理，参错事物，如他著作所说“本心虚明，纯然无间者”（《融堂四书管见》卷三）。他还说：“圣人之心，澄然如太空，如止水，未尝纤毫微动。”（《融堂书解》卷十七）钱时学说直指本心，明心见性，闻者如醍醐灌顶，皆有所得，有如禅宗的顿悟。

钱时说的这个“本心”，就是“一”。他曾说：“何谓一？曰由乎心，不明乎心而欲逐项正救，难矣。”（《融堂四书管见》卷八）

本心乃初心，是指没有被外界蒙蔽、污染之心，它与天地万物共生，澄然虚明，洞照一切。所以他说：“天即吾心也，地即吾心也。”又说：“天地万物与我浑然一体，圣人身任化育之责，凡一草一木，一鸟一兽即我也，非外物也。”（《融堂四书管见》卷十一）

在钱时看来，万物皆一体，天人皆合一。这便是心学的高明之处，一事不向外求，专注关照本心。这与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大相径庭。朱熹在《朱子语类·卷十五》中说：“眼前凡所应接底都是物。事事都有个极致之理，便要知得到。若知不到，便都没分明。”朱熹认为事事都有理，事事都要去“格”，以此达到“致知”的目的。

在钱时看来这些都是枝枝叶叶的学问，不是根上的学问。万事万物如何能够穷究？“理”本来就在人的心中，何须外求？“心即理也。”万物之理“非智探力索可强也，一旦感悟，心通内明，乃自得耳。”（《融堂四书管见》卷五）

而欲达到“心通内明”和“自得耳”是有一定的途径的，这个途径便是“敬”与“诚”，这是钱时理学体系中的方法论。他认为内心持敬本心无弊，物我一体。又说：“习俗虽异，本心则同。忠信笃敬，感无不通。见其参前，见其倚衡，则是无时而非忠信笃敬也。举天地万物万变万化，皆我忠信笃敬

之妙也。”(《融堂四书管见》卷八)

内心持敬,才能够感通天地,与万物融为一体,举天地万物万变万化,纤毫毕现,奥秘尽窥,简直妙不可言。

诚则是不自欺。他在《融堂四书管见》卷十三中说:“诚者,己分当然之事,岂为人而诚哉?有一毫为人为之心,即非诚矣。故诚乃自成,而其道乃自道也,非有假于外也,我固有之也……仁者,不失其本心之谓。苟诚矣,则纯明融一,无所弊亏而已,成矣,故曰仁。成己固所以成物也。”由诚还可以唤醒本心之“仁”,从而达到无欲无求,“纯明融一”的境界。

明代学者程敏政在其《篁墩文集》中评论:“融堂钱氏,实得慈湖之传,上宗陆子,其言渊以恣,其行硕以颀,真可谓百世范矣。”黄宗羲也认为象山后学,“严陵一支,自钱融堂为盛”,并称钱时为“豪杰之士”。黄宗羲的评语不是随便下的,“豪杰之士”实指思想上的伟人、行动上的英雄。

除讲学外,钱时一生著述亦丰,有《周易释传》《尚书演义》《学诗管见》《春秋大旨》《四书管见》《两汉笔记》《蜀阜集》《冠昏记》《百行冠冕集》《融堂书解》等十余部著作传世。其文阐释经义,发明心性,在陆象山、张栻、杨简等理学名家学说上,每有己见,屡有心得。这些独特的理学阐述系统性地见于《融堂四书管见》《融堂书解》等著作中。

关于钱时的生卒年,1985年淳安县文管会在威坪镇蔗川村发现了钱时的墓记。

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先生既没七十有八年矣……至治元年,少府郑公来莅兹邑……邑命泛扫兆域,祭以牺牲,伐石髹级,树以双表……邑之学士大夫咸谓少府表彰先贤为盛事,请书于石而属噉记之……噉虽末学庸陋,亦尝读先生之书以自淑者,故不敢让而记之。”吴噉,蜀阜人,元泰定二年(1325)进士,写这篇墓记的时间是“至治二年壬戌(1322)拾月望也”。以上碑文,不仅反映了墓记立石的缘由和经过,更重要的是根据“先

生既没七十有八年矣”这句话，可以准确推算出钱时的卒年，即宋理宗淳祐四年（1244）。

我们随即查阅了《钱氏宗谱》，找到相关记载：钱时晚年归居家乡蜀阜，建有一楼，名“经史阁”，阁成不久即病故，寿七十岁。据此可推知钱时出生之年，乃宋孝宗淳熙元年（1174），弥补了史书中钱时传记之不足。

既然推知了钱时的生卒年为1174—1244年，接下来，就有必要对地方史志中长期存在的某些谬误和讹传加以澄清。钱时在蜀阜创办“融堂书院”的时间是宋理宗嘉熙年间（1237—1240），据《融堂先生行实》记载：“右丞相乔行简荐举理宗，嘉熙元年丁酉以布衣召见……帝大悦，特赐进士出身，授秘阁校勘，修国史宏编。后又辞求去，退居蜀阜玉屏街北山之岗，创融堂书院，日与群徒讲道，为世大儒。”乔行简（1156—1241），东阳人，是婺州学派创始人吕祖谦的弟子，他欣赏钱时的学识人品，不但向理宗荐举，还亲笔题写了“融堂书院”四字相赠。

我在查阅钱时资料时，有说他自从创办融堂书院之后，名震东南，四方贤士，辐辏而至，连朱文公（朱熹）都“屡挈诸徒，枉车访蜀阜，深合道契”，并留下“朱文公街”（见徐树林《威坪》一百一十六页）。朱熹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（1130），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（1200）。钱时创办“融堂书院”之际，朱熹已去世近四十年了，不可能“屡挈诸徒，枉车访蜀阜”。朱熹去世那一年，钱时二十六岁，之前他们有无交集，是否“深合道契”，现已不得而知，但以钱时“幼年即奇伟不群，年少好学”而论，他理学体系成型过程中，是有充分理由寻访当世高人契合的，朱熹无疑是最佳人选；况且乔行简的老师吕祖谦也是朱熹的好友。当然这种可能性需要史料的佐证。

钱时是一位学者，其理学思想属于陆象山心学一脉。象山传诸杨简，杨简再传诸钱时。钱时在《孝悌说》中曾说：“良知良能，我所自有，何待他人讲说。”他在《广塾规约序》中说：“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良

心，人皆同之。”与象山在《杂说》中所谓的“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，同此心，同此理也。”犹如一辙，承接了象山和慈湖的余脉。但他对于心体的“虚明澄然”，又用“空”来加以诠释：“空则心本洞然，万里昭徹，无纤毫凝滞也。方屡空所以庶几至于圣，则空空矣。命即此道也，逆此曰方命，复此曰即命，达此曰知命。有意理财务、植己私，安能受命乎？私意揣度，纵惑屡中，非明睿所照也，空则自明睿。”（《融堂书解》卷六）

在他看来，人之本性就是空，只有把自己完全置于空，达到澄然虚明、洞然无滞的状态，才能与天地万物契合。自然法则与道德原则一样，亦皆由我们的本心衍生而出，认识外界事物依靠本心，提高道德修养也依靠本心。

理学家从来都不是空谈心性义理的酸腐学究，他们要找回自己的本性，探求人之为人的终极意义，唤醒生命力量，启迪社会良知。钱时正是这样一位理学家，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。在其《蜀阜存稿》中就有多首哀叹民生之艰的诗篇。如《山翁岭》：

岁云暮色雪塞门，白发山翁病且贫。
鹑衣百结皮冻裂，旦暮拔雪寻草根。
催租暴卒打门户，妻子惊恐翁怖惧。
尽道长官如母慈，如何赤子投饥虎！

字字句句泣血带泪，贫病交加的老人，风雪中寻草根果腹，还遇上了凶残如虎的官差上门催租。钱时深切同情百姓的遭遇，替天下苍生鸣不平。

钱时出仕之初，恰逢浙东大饥，饿殍满壑，更有赴江自溺者。民之艰危如此。钱时直笔上疏：“陛下为民父母，推饥溺犹己之念，未闻何以处此；然陛下深居广内，日享八珍，民之利病，无由亲见，言者未敢以实，故犹未切

于圣虑也。”

作为一个理学家，不是高居于象牙塔内，而是心忧天下，呼吁皇上拯救大宋子民于水火之中，不该深居高堂大屋，每天享受山珍海味，无视百姓的疾苦。如此犯颜直谏，为民请命，担负起社会责任，真正体现了一个理学家知行合一、学用一致。

“石峡三贤”方逢辰

淳安历史上共有三位状元，南宋时期占了两位，他们分别是遂安瀛山书院的詹骥、淳安石峡书院的方逢辰。这与书院文化教育密不可分。书院的性质虽属私学，却为中国官场培养输送了一大批栋梁之材。书院看似管理松散，却有明确的学规，课程安排有序，松紧适度，与官学比，书院教学生态更具活力、更有弹性、更加灵活；学术氛围更独立、更自由。书院的“山长”具有绝对的权威。

我于去年出版的《是真名士自风流》一书中，写了十六位淳安历史名人，没有把方逢辰收录进去，这基于两方面原因：一是方逢辰一脉世系图谱传承有序，大体清晰，无需再去考证；二是有关他的介绍文章已经足够，无需再去赘述。若果如此，如何给方逢辰定位呢？

最佳点是从书院入手。

方逢辰重视教育，他曾说：“今天下人心陷溺甚矣，急起而救之，责在学校。”（《全宋文》）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

方逢辰（1221—1291），原名梦魁，逢辰二字是理宗皇帝钦点状元后赐的，于是他便以“君锡”为字。方逢辰与黄蛻、何梦桂三人肄业于石峡书院，南宋淳祐七年（1247），黄蛻廷试第二名，俗称榜眼；方逢辰跑去祝贺，留诗戏言道：“状元留后举，榜眼探先锋。”意思说你这榜眼先去探探路，状元还

是留待给我吧。虽然没有挑明了说，黄蛻还是听出了弦外之音，这才是方逢辰的性格。他打趣着回道：“欲将状元留地位，先将榜眼破天荒。”黄蛻心想书院创办七十余年，从未有进入一甲序列的考生，那就让我先来破了这天荒，才好把状元位置留出给你。

托黄蛻吉言，三年后(1250)方逢辰果然考中状元，这一年他恰好三十岁。严州知府赵汝历在府衙正街为方逢辰建造“状元坊”，牌坊背面题“甲第魁首”四字，荣耀尊显。事隔十五年(1265)后，何梦桂又中一甲第三名探花。一时间，石峡书院名声大噪。

方逢辰初入官场只补了一个无关紧要的“承事郎”，属正八品，后迁佾书平江军节度判官厅公事。平江军相当于今天的苏州市政府秘书长一类的职务。宝祐元年(1253)，召为秘书省正字，宝祐三年(1255)，方逢辰上疏理宗，指斥宦官与奸佞擅弄威福，言辞偏于激烈，理宗大为不悦，方逢辰只得告病求去。次年，程元凤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，他极力推荐方逢辰，遭到朝中大臣反对，理由是说他“交游学舍”。

“交游学舍”竟然成了一项罪名，这里的“学舍”应指书院一类的私学，方逢辰接受各地书院的邀请，去讲学授徒，传播理学思想，这是官方禁止的。

开庆元年(1259)，召为著作郎，次年为景定元年，兼权尚书左郎官，不久又因上书言事，得罪权相贾似道而罢官。方逢辰索性应聘婺州学堂，开坛授徒，盛况空前，从游者达数百人之多。景定二年(1261)，复出任婺州知府，不久又罢。再出任嘉兴知府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又到瑞州(今江西高安)任知府，不等届满又被罢官。景定总共不到五年，方逢辰在此期间起起复复折腾了三回。

咸淳元年(1265)，度宗即位，方逢辰被召为司封郎官兼直舍人院，实录院检讨官，寻迁秘书少监、起居舍人。其后历任秘阁修撰，咸淳三年

(1267), 出为江东提刑, 徙江西转运副使。咸淳五年(1269), 权兵部侍郎。咸淳七年(1271), 迁吏部侍郎……累官至户部尚书, 丁母忧去国, 从此绝意仕途, 归隐石峡书院著书讲学, 终老一生。

宋亡之时, 方逢辰五十九岁, 正是暮秋时节。元世祖忽必烈下旨征召他, 派出的使臣级别不低, 是御史中丞崔彧, 国家最高监察机构负责人。既然是皇帝征召, 直接拒绝驳回多有不便, 不妨委婉一点, 赋诗言志。于是他作了《被召不赴》:

万里皇华遣使辀, 姓名曾覆御前瓯。
燕台礼重金为屋, 严濑风高玉作钩。
丹凤喜从天上落, 白驹须向谷中求。
敲门不醒希夷睡, 休怪山云着意留。

万里之外皇帝派遣使者, 来征召于我。无奈我归意已决, 心如止水, 哪怕是用燕昭王招贤纳士所筑的黄金台, 以及黄金打造的屋子, 自己也丝毫不为所动, 愿学那东汉名士严子陵, 隐居垂钓于严陵濑, 云山苍苍, 江水泱泱, 先生之风, 山高水长。

白色的骏马本应有远大的志向, 不应该繫于空谷之中。这里的“丹凤”和“白驹”比喻贤者和隐士, 但因生不逢时, 迫于环境, 就连白驹也只能“向谷中求”。想当年隐士陈抟, 曾受周世宗召见, 高卧不醒, 坚不出仕, 怪只怪山林白云着意要挽留于他。

如今, 山林白云着意挽留于我, 这一留便是终身的约定。崔彧是文臣也是直言敢谏之人, 他对方逢辰心存敬意,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, 再劝已然多余。与白云有个约定够浪漫的, 崔彧不禁心生羡慕。

石峡书院无疑是最好的去处。

去年“5·18”国际博物馆日，淳安博物馆为胡建民的水下古城摄影，成功举办了一个展览，六十余幅照片的文字说明由我撰写，当我看到他传送过来石峡书院的照片时，不由得有些激动。其中竖式石匾“理学名家”四字，楷体阴刻，乃度宗皇帝御笔，尤其引人注目，匾额制作精良，四周云龙纹罩边，贵气雍容。由皇帝赐匾“理学名家”，想来方逢辰当年名头一定不小。

但据我看来，淳安历史上能称理学家的只有钱时一人。方逢辰的理学思想，承继的是朱熹学派，“以格物致知为本，以笃行为修己之要”，讲求“正心诚意”，推崇二程（程颢、程颐）、周子（周敦颐）与朱熹。从他目前遗存的著述看，他的理学并未形成体系，不足以开宗立派、以启山林，对后世学术产生深远影响，只零星见于其散论文中，如《赣州兴国先贤祠堂记》曰：

周子将教人以穷理之所自来，不得不探天地之根、极万物之源以为言，故名曰太极。又以其形形而实无形也，故曰无极而太极。二程子将教人以体理之所实在，则不得不就日月事物切近者为言，故曰道不离器，器不离道。

这是《易经·系辞》关于“道”与“器”关系的论述：“形而下者谓之器，形而上者谓之道。”器为道之体，道为器之用；体用同源，如影随形，所以说“道不离器，器不离道”。二程与朱熹用“体理”来表述，实质一也。

明清之际思想家、史学家黄宗羲，在《宋元学案》中认为方逢辰“盖淳安之学皆宗陆氏，而先生独为别派一也”。我们在方逢辰的文章中确实可以看出，讲究“理”与“气”结合，在官场中更是一身浩然正气，不与内竖、权相沆瀣一气，敢于直言时政，导致“七起七落”，但在理学上绝非“独为别派一也”。

其次，我也不认可黄宗羲所谓“盖淳安之学皆宗陆氏”的说法，窃以为，

淳安学者其实大多数是宗朱氏的“理学”，朱熹几次三番到瀛山书院讲学，私淑弟子云集，“理学”成为一门显学，起到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。陆九渊并没有来过淳安，南宋时期，“心学”传播还属于初始阶段，许多学者仍然将它归于“理学”的范畴。钱时作为淳安“心学”的代表人物，他只是陆氏的再传弟子，著书立说，开坛授徒，取得学界广泛的认可，也都需要一个过程。

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标题是“理学名家钱时”，有人微信上留言说，文章若叫“心学名家”更好。这个建议提得好，我先前就有过考虑，历史问题往往如此，同一现象站在不同时代、不同角度去看，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。当时的“心学”远未成气候，大众的认可度和辨识度不高，把“心学”（二陆）、“象数”（邵雍）、“元气”（张载）、“太极”（张栻）等其他学派皆归于“理学”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朝中大臣甚至有斥之异端邪说，指摘为“伪学”的，这些都不足为奇，新生思潮从来是伴随骂声而诞生的。

话说回来，如果“淳安之学皆宗陆氏”，那么，直到明代王阳明弟子王畿莅临瀛山书院，也大可不必借《重修瀛山书院记》一文，隐晦地表达“心学”意欲主讲瀛山书院，充分利用其弟子周恪（时任遂安县令）和其兄周怡（太常少卿）的便利条件，力促书院由朱熹的理学转向阳明心学，占领文化思想高地，尽可能地争取热衷者、信奉者和追随者，比如像方应时这样的，从瀛山书院走出来的高才生。

书院作为一个文化阵地和学者讲会的平台，历来成为各派学者眼里的重要资源，不辞辛劳、辗转游学，传播各自学术主张，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台。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：自我意识的觉醒，文化表达的张扬，炽热、活泼、宽松、自由。

先祖的遗风流韵悠悠绵长，始终在方逢辰的血液里徜徉。不成理学家，必为教育家。

方逢辰在《青溪县修学记》讲述了兴学的重要性。淳祐辛亥(1251),石孝闻为令尹,志于修建学校,立志“以礼义救人心之溺”,并带头捐赠俸禄,同乡也相于筹措,终于宝祐二年(1254)竣工。方逢辰称赞石孝闻此举“固足以见尹无仇民之政”,一改青溪县多年以来,官吏以赋税为功,“守迫之令,令迫之民”,以至于“弱者买吏为安,强者伍吏为市”的局面,鼓励官员积极兴学。

另在至元乙丑(1285),受邀作《常州路重修儒学记》一文,方逢辰在书中认为三代以来,“学校废,教法衰,人之道不立,天下遂为纷纷争战之场”,教育崩坏是导致国家体系、人伦纲常崩坏的主因,此后,之所以斯文未丧,皆因孔孟之教不废:“后之学孔、孟者,其以四书为根本,以六经为律令,格物致知以穷此理,诚意正心以体此理……庶不负天之未丧斯文之意。”在方逢辰看来,兴学办教育不但可以知礼义、守斯文,而且可以固人心、稳社稷。

“人生而群,不可无教”,这个理念来自父亲。

方逢辰父亲名叫方镛,字伯治。据嘉靖、光绪版《淳安县志·儒林》载:“少以辞章名两魁,郡试后,弃举业,尽心圣贤知行之学。日训诸子,所讲明必以穷理尽性为先,至于应事接物,则以持敬实践为功。后授宣教郎,秘书省检阅文字转奉直大夫,两淮制置司参谋官。”

方逢辰是家中老大,二弟方逢振,字君玉,景定三年(1262)进士,历国史实录院检阅文字,迁大府寺簿。宋亡退隐于家,讲学于石峡书院,人称山房先生。三弟叫方逢源。

方逢辰妻子名叫邵满,据方逢辰《恭人邵氏墓志铭》载:“方逢辰之妻,乃吾母夫人之姪也,名满,生于嘉定癸未十六年(1223)六月十日,以淳祐辛丑(1241)归于我……男三人:国孙、梦孙、翻孙;女三人:省女、福女、子女。”可惜邵满三十四岁就去世了;方逢辰在墓志铭中称赞妻子“秉心塞

渊”，说她持家用心，踏实深远。

另据《蛟峰先生阡表》载：“（方逢辰）再娶朱氏，子男三人，长梁太学生，次栋，次杰。女三人，长（德纯）适修职郎无为军无为县主簿徐敏中，次（德恭）适武学生项雄飞，次（德温）适邵元廷。”

朱氏所生长子名叫方梁，于至元戊寅（1338）出任石峡书院山长。据牟嘏《重修石峡书院记》载：“至元戊寅，浙西按察佥事夹谷之奇聿至严陵，以书院中更多故，渐至颓废，命公之子梁为山长，任其经理。”

儿子接替书院山长之位，乃是顺理成章。这样他就可以腾出更多时间著书立说。三元宰相商辂曾在《蛟峰方先生文集序》里说：“兹先生裔孙渊应贡来京，偕其姪兵科给事中辅，持先生遗文见示，俾为之序。噫！先生之文如秋霜烈日，类其为人，览者当有自得。奚俟予言，特以用世之志有禾尽遂，人固无能知者。”

商辂说的这个“裔孙”，是方逢辰五世孙方渊，搜集整理了方逢辰散失的文章，辑为《蛟峰方先生文集》八卷，亲自到京城请商辂写篇序言。商辂对此评价颇高，谓之“文如秋霜烈日”，跟他的为人一样，正气凛然，豪健奇挺。

商辂在其文集序言中指出：“其职业止于修撰而已，先生所著有《孝经章句》《易外传图说》《尚书、中庸、大学释传》《名物蒙求》诸书，是皆文集所未载者。”

归隐期间方逢辰也是以诗词寄怀，现存诗歌数量不多，总共四十二首，收录于《全宋诗》。

序言还提道：“（方逢辰）低回于群僚中位，不副其名，而才弗竟其施，遂使致君泽民之术，徒见于书疏文字之间。”好一个“致君泽民”，我们在他的诗文中确能真切感受得到。

宝祐三年（1255），方逢辰因直言上书得罪理宗挂冠回籍，是年冬十

月去访朋友卢珏。卢珏，字登父，号可庵，淳安人。曾中乡举第一，入元不仕。在家乡建有一楼，名“天边风露楼”，方逢辰有诗《题卢可庵天边风露楼》：

龙泉三尺倚天横，浊气滔滔我独清。
一柱高台仙掌起，愿推一滴活苍生。

诗中表达一种高蹈之情，与屈原放逐沅江时的心气是相通的：众人皆醉我独醒，不与流俗共沉浮。“愿推一滴活苍生”，此语与杨朱“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”恰恰相反。杨朱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，哪怕拔一根毫毛能利济苍生，他也不愿意去做。方逢辰“致君泽民”的初心不改，只要是对天下有利，哪怕有一滴仙露也愿意推济苍生。

方逢辰性格刚正劲节，不同流俗，上得罪皇帝，下得罪权相，我查阅《宋史》未见有其传记，正遗憾之间，偶然看到明代学者杨廉的《跋富山十景诗集后》，内中叹曰：“（杨）廉早岁得蛟峰集读之，如获海外奇宝，尝爱其燕台礼重为金屋，严瀨风高玉作钩之句，然亦未尝不慨叹《宋史》不为之立传也。”（《杨文恪公文集》）这样的遗憾看来不止少数。

《宋史》是官方的，自古以来，百姓心中有杆秤，不入官史无关紧要，就像方逢辰评价他妻子“秉心塞渊”，只要踏实深远就足够了，后人会铭记在心。据光绪版《淳安县志·方輿志》载：“至大二年（1309），达鲁花赤爱祖丁重修堂斋及祠，又别二祠，东祠以奉先生（方逢辰），以先生之弟山房先生（方逢振）配。西祠以奉黄警斋（黄蛻）、何潜斋（何梦桂）二先生。”

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”这是孟子所谓贤者的标准。“石峡三贤”自此以超逸的情怀传递着文化的信息。

师道尊严，香火奉祀，必要的仪式感不可或缺，三十年后，石峡书院又特为方逢辰建立塑像，元徐持敬《立蛟峰先生塑像记》载：“至顺三

年(1332)冬十月朔,故侍读尚书蛟峰先生方公塑像成,诸生徐持敬以下四十二人乃舍菜以告曰:‘先生以幅巾深衣像,待缘如爵。谕者每谓宋三百年,而此郡山川之灵,磅礴块圪,仅先生一人出状元高科者,盖天下无与为比。此足为先生荣。然未知先生刚直之气,不附时相。归荆书院,一以教学为事,直与白鹿洞同一气象。’”

由此可见,徐持敬也是石峡书院的弟子,他率领其弟子四十二人,行古代“释菜礼”,向先师(方逢辰)祭奠。徐持敬说他“刚直之气,不附时相”,我非常赞同。但说他“归荆书院”,回来创办书院,与事实并不相符。我个人倾向于书院创办于淳熙初年,方氏一族倾心教育不遗余力,捐田捐资确有据可考。

贤者,谓德行与才能兼备也,得志时能让天下人受益,哪怕不得志也要约束自己,加强道德修养。单是考中进士未必可以称贤,历史上的贪官污吏大多是进士出身,后世留有骂名的也不在少数。方逢辰贤从何来?

方逢辰之贤源于其文化品格,教化育人是立德,书院传承是立功,著书立说是立言,此谓之“三不朽”。方逢辰的“七起七落”与其文化品格息息相关。他是一位官员,更是一位学者,一位文化人。文化人的一个重要标签,就是不会被浮云遮眼、欲念加身,不会随波逐流、与世沉浮。这是一种态度、一种坚守、一种自信、一种精神、一种力量,更是一种融入骨子里的高贵。

遗民诗人何梦桂

对于何梦桂,对于文昌村,我并不陌生。2011年,该村的何氏宗祠是在我主持下进行全面维修的。

记得当时文昌村好几个老人,组团跑到我办公室来,要求对何氏宗祠进行修缮,说再不维修眼看要倒塌,可惜了祖宗留下的东西。其间提到了何梦桂,提到了祠堂里的匾额。一位老者一边说着,一边颤巍巍从口袋里掏出一页纸,上面写着六七块匾额的内容,我依稀记得有“世袭牧亭侯”“东晋世家”“状元及第”等字样。感觉何氏很有来历,答应老人尽早给领导汇报,尽早到现场勘察,尽早把项目定下来。

所幸何氏宗祠如愿完成了修缮,村里借机新修了宗谱,为崇德敬祖、敦睦宗谊,次年的圆谱活动就在祠堂里举行。他们还邀请了何氏一族在外地的代表,济济一堂。村里为表示对我工作的肯定,托人给我送了一套“何氏宗谱”。

近日闲情,站在书架前检阅,最醒目的是金黄色装帧的一套宗谱,取阅翻看,赫然是《文昌何氏宗谱》,黄锦盒套,卷分上、中、下三册。信手这么一翻,在旧序里竟发现了三元宰相商辂写的《何氏重新宗谱序》,不觉眼前一亮。此序作于明代景泰年间,估计是重修族谱之时,商辂受邀所作,内云:“……谱有可稽者,曰牧亭侯腾(公),再传之东晋,吏部侍郎文建公太

康中罢官，由(临安)于潜徙居今淳安之文昌，子孙遂定家焉。自唐而宋，代有闻人。咸淳中，潜斋先生以进士高第，显名当时，著书立言，光启后嗣。于是，文昌之何，闻望益著，有以哉！”落款：“景泰三年(1452)壬申夏六月朔。”

商辂说的潜斋先生，便是何梦桂。

追本溯源，按图索骥，我又找到了明版的《文昌何氏宗谱》，查阅了关于何梦桂的所有记载。

何梦桂(1229—1303)，字岩叟，号潜斋。初名应祈，字申甫。瓘长子。为人孝友，度量宽宏，天资颖悟，过目成诵。自幼从学于名师夏讷斋，深受教益。与同邑方蛟峰(逢辰)、黄警斋(蛻)两先生肄业于石峡书院，又与陈止斋、方可斋诸名儒往来讲论，造诣超出流辈。宋度宗咸淳乙丑(1265)，以易经廷试第三名探花，赐状元及第。与侄景文同榜，御赐彩联云：“一门登两第，百里足三元。”又云：“子拜丹墀亲未老，叔登金榜侄同年。”

短短一段话里包含了六层意思：一是梦桂为家中的长子；二是他拜师夏讷斋先生；三是与方逢辰、黄蛻一同求学于石峡书院；四是与陈止斋、方可斋诸名儒交往；五是以易经廷试中第三名探花；六是与侄儿何景文同榜中进士。

何梦桂父亲何瓘，字公器，自幼岐嶷，资性不凡，以明经举，拜官翰林检阅，职掌点校书籍。娶王氏为妻，卒后合葬于十三都天乐观前湖山。有三个儿子，长子梦桂，次子梦材(从小过继给伯父何凤)，三子应祖。

梦桂自幼师从于夏讷斋先生。从零碎的史料记载判断，夏先生应该是位隐士高人，他自称“本心翁”。何瓘请他作为儿子的塾师也在情理之中。夏先生还曾执掌石峡书院，像方逢辰、黄蛻等人也是夏先生的门人。

据夏先生另一个门人陈达叟描述，夏先生还是一个吃货，他不但精研《易经》，对美食也有自己的独创，生活非常有情趣，格调还很高雅：“本心

翁斋居宴坐，玩先天易，对博山炉，纸帐梅花，石鼎茶叶，自奉泊如也。客从方外来，竟日清言，各有饥色，呼山童供蔬饌。客尝之，谓无人间烟火气。问食谱，予口授二十品，每品赞十六字，与味道腴者共之。”（陈达叟编《本心斋蔬食谱》）

意思是本心翁这个老头淡泊名利、闲居在家，专心研习《易经》里的先天卦象，面对着博山香炉里的缕缕青烟，纸质屏风上绘着梅花图案，石鼎里还烹煮着香茶，优雅自在，淡泊安闲。有个出家人专程来拜访他，两人说经论禅，清淡了一整天，都觉得有些饿了。本心翁嘱咐家仆去烧几个家常蔬菜，用来招待出家人。客人吃了以后，赞不绝口，夸赞这些菜美味得仿佛不属于人间，并向本心翁请教做菜的秘诀。本心翁毫无保留，口授了二十道食谱，每道食谱还另加了十六个字的评语。

本心翁绝非浪得虚名，他精研《易经》，虽身处红尘，却心游物外，逸趣自生，不但懂得烹饪方法，还能优雅地将烧菜过程用文辞表达出来，可谓一菜一尘缘，一念一清净，精致而博学，果然活出了本心。

梦桂跟着这样一位老师，对他人生成长是大有裨益的。他与方逢辰、黄蛻一同求学于石峡书院，其间还在夏讷斋执掌书院教学。三人中黄蛻最先中举，于理宗淳祐七年（1247），丁未科廷试第二名，俗称榜眼。时方逢辰与何梦桂没有参加考试。方逢辰跑去祝贺黄蛻，说“状元留后举，榜眼探先锋”，黄蛻遂以“欲与状元留地位，先将榜眼破天荒”来巧妙应答。不想一语中的，三年后的庚戌科，方逢辰果然在廷试中钦点状元。

当然黄蛻和方逢辰都不曾想到，十五年后，石峡书院又走出了一名探花。

度宗咸淳元年（1265）乙丑科，何梦桂赴杭城参加省试，一举夺得魁首，同年秋试再传喜讯，度宗临轩策士，亲擢廷试第三名。正是：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遍杭城花。”

石峡书院从此名声大噪。

后人有诗描写石峡书院：“峡里泉声咽，跳珠溅客裳。徘徊先哲地，漱石有书香。”就连冲刷岩石的泉水都带有书香味，好不令人神往。

我的同学胡建明是潜水爱好者，曾协助中央电视台对水下古城进行探索直播，前两年他在龙山岛附近又找到了石峡书院遗址，并把照片从微信上发给了我。我凝视着由清末状元、近代实业家南通张謇题署的“石峡书院”四个字，恍若看到了张謇挥臂题榜的情状，闻到了他泼墨书写时透溢而出的墨香。

何梦桂中探花后，初为台州军判官，历官太常博士，咸淳十年（1274）任监察御史。曾任大理寺卿。引疾去，筑室富昌（后改名文昌）小酉源。

梦桂在朝为官时间不长，满打满算也不足十年。他找了一个身体有病的理由，回到了文昌老家。此时，南宋王朝气数将尽，距离赵家王朝谢幕的“崖山之战”不足五年。

元至元中，御史程文海推荐，授江西儒学提举，屡召不赴。著书自娱，终老家中。学者称之为潜斋先生。所著有《易衍》《中庸致用》诸书，其《潜斋文集》十一卷，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《四库总目》并传于世。

何梦桂现存诗词约有三百四十首，内容丰富，特色鲜明。作为宋末元初的文学家，他在遗民诗人中较有影响力。遗民是指改朝换代后不肯出仕为官的臣民。只有当“宗国沦亡”时，即汉族王权被外夷截断——如宋朝和明朝灭亡后的元初与清初——才真正有了“遗民”的概念，具体在诗词中，则呈现出苍凉悲壮的文化特征。

遗民诗人是一个群体，是一群“行洁”“志哀”“迹奇”，于风刀霜剑的险恶环境中栖身野草，以歌吟寄其幽隐郁结，枕戈泣血之志的悲怆诗人。

何梦桂与方逢辰、谢翱、林景熙等心志相通，他们交游密切，来往频繁，虽隐逸山林，却心系国民。悲苦之时，只能通过诗歌来表达忧时伤世

之感。

在宋亡后，元世祖曾诏御史中丞崔彧起用方逢辰，遭到逢辰拒绝。归隐期间也是以诗词寄怀。他现存诗歌数量不多，大概几十首，如前篇分享的《被召不赴》，还有如《题何潜斋安乐窝》一诗，方逢辰把何梦桂引为知音。

何梦桂也有《贺蛟峰先生入宅》诗：

富贵朱门盖里闾，先生斲石此山居。
一区自足子云宅，三径何妨靖节庐。
万壑风云生几席，四山花木入庭除。
乾淳岂少高官爵，自是寒泉要著书。

有钱的富贵人家在乡里盖起了高堂深屋，大门漆成朱红色，尽显富丽堂皇。而蛟峰先生却在山间挖石筑居，环顾陋室，“有宅一区”，房子虽小天地宽，“四书五经”往里装。蛟峰先生淡泊自足得很，把自己的陋室比作扬雄的子云宅，又似陶渊明的靖节庐，如《归去来辞》云：“三径就荒，松竹犹存。”靖节庐虽是个茅屋，却自有与别处不同的情趣，依然能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深山万壑，风云变幻，好像生于几案与枕席之间，四山八面的花草佳木，映入庭院阶石之间，仿佛为自己所植。伴着清冽的泉水，看书著述，何其快哉！

另有《贺蛟峰先生熟睡吟》等，说明两人无话不谈，关系亲密。

幕苍天，席大地，睡去不知人世事。觉来榻上总埃尘，口不能言睡中义。古今万事昼夜同，万八千年只一寐。荣辱事，真梦里，黄梁一枕邯郸市。

北窗谩说晋朝臣，周公不见吾衰矣。日高丈五闭柴门，不知身世华胥氏。不毡不被老希夷，山上白云霞流水。得失事，真梦里，鹿焦翻覆终成戏。

人言夜半息如雷，我纵行行还美睡。

梦桂与谢翱惺惺相惜，友谊深厚。谢翱（1249—1295），字皋羽，号晞发子。生逢宋元易代的乱世，虽一介布衣，但在国家兴亡之际，毅然投笔从戎，散尽家财，追随文天祥。他慕屈原，怀郢都，读《离骚》，与屈原品行相像，“其至洁，其行廉，有沉湘蹈海之风。”（储巖《晞发集引》）

谢诗效法屈骚，何梦桂对杜诗和屈骚多有继承，与谢翱诗词唱和多有勉励之意。他了解谢翱所思所想，故剖析了他的内心：“驾言发，将以浮游于世诟之外，濯之涓盘，晞之阳阿，适矣。抑知夫终朝采绿而余发之曲局否乎？‘首如飞蓬，高木谁容。’其与《卫》国风之诗固命之矣；知我谓我心忧，不知者谓被发行歌者同一调也……折琼枝，结佩攘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”（李修生《全元文》）

在诗学主张上，何梦桂倡导诗歌应有感而发，平淡自然，在创作方法上，推崇咏物抒怀，比兴寄托。而作为遗民诗人，精神的漂泊最是侵蚀人的意志，由孤独的个体生命发出的声音，唤醒了一群人隐秘内心的磁场共振，人生的疆场已不在官场，转而驻守于自己的内心，思考生命，领悟诗词，求索文学。作为遗民诗人的何梦桂，心里装有太多的疑惑，他不去问天，也不去问地，而是去问自己。面对着茫茫夜空、银汉迢迢，他既是询问者又是解答者，抒发忧愤，有沉郁悲凉之状。如《夜坐有感》：

银汉无声玉漏沉，楼高风露入衣襟。
洞龙睡熟云归岫，枝鹊啼干月满林。
瓮里故书前尘梦，匣中孤剑少年心。
征鸿目断阑干角，吹尽参差到夜深。

夜深人静之际，银河横空之时，玉漏报时会发出低沉的响声。我睡意全无，伫立于高楼之上，风露不知何时打湿了我的衣襟。山川破碎，大好江山早已换了主人，遗民失去了归属感，只得隐姓埋名，如同云归深山。我的泪水已然流尽，只能以干枯的双眼，空对那满林的月光。闭门读书的生涯变成了前世的尘梦，深锁匣中的孤剑正象征着我少年时的壮心。倚着栏杆的一角，遥望征鸿渐飞渐远，可心中的忧伤却找不到出口排解，且用这幽怨的箫声来打发这漫漫长夜吧。

低沉婉转是这首诗的基调，特别适合何梦桂深沉的山河之情，对故国的眷恋。诗中运用大量比兴的艺术手法，如写“龙睡熟”“云归岫”“枝鹊啼”“月满林”，以喻君亡臣隐、誓不仕于夷族之气节。写读书为学乃前身尘梦，写剑卧匣中但壮志未酬，借以抒发自己的愤激之情，但这一切都与夜色联系在一起。

作者独坐于茫茫长夜，浮想联翩，沉郁深远之感浑化于一片幽暗、孤寂的气氛之中，联系山河破碎、无奈归隐山林的情景，是不难理解的。诗风沉郁，颇得老杜横鹜逸出之神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。

何梦桂骨子里有一种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高蹈之情，《拟古》一诗可作为印证：

木落不离根，菊槁不离枝。
人怀父母心，岂愿生别离。
皇路窘幽蔽，民用婴百罹。
南枝栖越鸟，忍逐北风飞。
北风藐万里，分死无回期。
骨朽化为尘，魂魄将南归。

在这里他用“不离根”“不离枝”“越鸟”“南归”这些具体的意象，表明不忘本之意，哪怕是南来的越鸟都选择栖息在树的南面枝头上。表面上写思念故乡，其实是暗喻国运灰暗幽蔽之际，作为宋王朝的臣子怎么会在夷族的朝堂上奔走效忠呢？

何梦桂除了写诗，还填词。《全宋词》收有他的词作四十七首，其词也是一咏三叹，余韵悠长。如《摸鱼儿·记年时人人何处》：

记年时、人人何处，长亭曾共杯酒。酒阑归去行人远，折不尽长亭柳。渐白首。待把酒送君，恰又清明后。青条似旧，问江北江南，离愁如我，还更有人否。

留不住，强把蔬盘滌韭。行舟又报潮候。风急岸花飞尽也，一曲啼红满袖。春波皱。青草外、人间此恨年年有。留连握手。数人世相逢，百年欢笑，能得几回又。

忆别与怀人题材是诗词中最常见的，也是舒缓调理情绪的必要渠道。上篇着意写长亭送别。把酒送君，长亭折柳，离愁如我，更有何人！下篇写留君不住，舟行渐远。人世相逢，能有几度！通篇情辞凄婉，令人不胜感慨。

归隐家乡的他没有真正地闲着，除了精研易学之外，他还关心教育。大德三年（1299），魁星楼在县令钱荣的倡导下，竣工落成。何梦桂欣然为之记文，写下《淳安县学魁星楼记》：“魁星楼，盖取北斗第一星名也。魁居斗一为天枢。枢所以旋斗杓而行乎周天也。志天文者谓斗璇玑四星皆为魁，号不同，而其为魁首义一也。”可惜，魁星楼命运多舛，毁于战乱兵燹，“……魁星楼之不为徒名也。至元丙子（1276），寇毁官舍，民庐俱烬……而楼久化为荆榛瓦砾矣。大元以武功定天下，固未遑事科目……钱君荣来尹兹邑，实重学事……越两年，政明讼简，吏肃民恬，爰始规画，首辍已俸以

倡……经营于大德戊戌(1298)之某月,落成于己亥(1299)之某月……登斯楼也,举觞相庆,且幸斯文之有所托也。”何梦桂笔下这个线荣,字子华,大德二年(1298)任淳安县尹(县令),他尊学兴教,首捐俸禄重建魁星楼,无怪乎何梦桂叹之曰:“兹盖尹君作楼存名之微意也!”

落款“大德三年(1299)冬长至日(冬至日)记”。

魁星楼在此后的明、清两代都进行过数次维修,商辂、孟士模等人也都曾撰文纪述。

何梦桂的生卒年当无异议,生于理宗绍定二年(1229)己丑十月十二日,卒于元成宗大德七年(1303)癸卯三月初一日,享年七十五岁。葬柵源郎佩山(一说狼狽山)。娶太平方氏为妻,诰封恭人,又封匡国夫人。其妻生于理宗宝庆三年(1227)丁亥闰五月初三日,卒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(1292)壬辰七月二十三日,享年六十六岁。有两个儿子,长子熹之,次子焘之。

何梦桂不但配享朱文公祠,还崇祀乡贤祠,又奉祀石峡书院,可谓集一生荣耀于身后。

富山先生方一夔

“我自何方来，又往何处去？”

这不是天问，而是自问。几乎每个人都曾向自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，好奇自己的来历，热衷于寻根问祖，如同一棵大树，开枝散叶，无论枝叶如何茂盛，扎向大地的根，却始终只有一处。

早些年撰写《可爱的杭州·淳安卷》，我在书中遴选了十五位淳安历史人物。我查阅家乘谱牒，从一个个家族中找寻他们迁淳本源，梳理世系图谱。其中一节写到方一夔，小标题是《一生授徒讲学的方一夔》。如今通读了他的《富山遗稿》诗集，对方一夔又有了全新的认知。其中《杂兴》一首不失为自传体诗：

予家世居富山久矣，世有隐德。老坡所谓韦布三百年，惟有阴功不知数。盖类是也。因作此以记其实，且以勉族氏子弟云：

自有乾坤有此山，嘉名久矣落人间。
吐吞云雾景千变，森秀松楠翠四环。
肯并贵溪争显达，应同愚谷耐坚顽。
山人尽得清吟趣，芳杜香荪不厚颜。

我的家世代在富山，正如苏东坡《石芝》一诗所说：“我家韦布三百年，只有阴功不知数。”韦带布衣的寒素之士，却积攒了许多的阴德。故此，有了这样的神仙居地：自有乾坤，便有富山，如此嘉名，久在人间。吞吐云雾，景色万千，松楠佳木，环翠四周。对自己的家乡——富山，不吝溢美之词。

他的诗总萦绕于心，难以忘怀。

方一夔(1253—1314)，又名方夔，字时佐，淳安富山人，生卒年无异议。富山方姓自纣公二十九世孙静乐先生次子鄮，自上贵寺分迁于此。一夔祖父名燦，字日新。生于宋孝宗时，配鲁氏。有子二，长子应雷，次子应霆。

这里说的静乐先生，名叫方昊，唐末时避乱弃官，隐居青溪(今浙江淳安)常乐乡上贵里，因家居富山下，世称静乐公派。昊公长子名祁，徙邑治东郭之高坊，后分高坊、石峡、茶园之派；次子名鄮，择居富山，此富山方姓之由来。

据《方氏家乘》记载：“进士讳应霆，字茱甫，燦公次子，有行实。生宋宁宗时，元配卢氏，继配应氏，卒葬前岭弓箭形。子二，长一夔，次一鸷。”

宗谱关于方一夔记载：“生宋宝祐元年(1253)，卒葬本都八保马鸣弯。配葛氏，卒而祔之。子四，长二十，次廿五，三廿七，四三十。”

看到这里，我不禁心生疑虑，长子叫二十，四子叫三十，为什么次子和三子偏偏要叫廿五、廿七呢？会不会是“廿五、廿七”之误呢？“廿五、廿七”不是更符合常理吗？是笔误还是校对遗漏呢？

为弄清事实真相，我想到了宗谱的主编方才先生，手头这套《方氏家乘》也是他送给我的。我随即拨通了老方的电话，向他提出了心中的疑问。老方在电话里听完我的叙述，当即回复说是叫“廿五、廿七”哩，宗谱上“廿五、廿七”应是排版有误，或是校对不严谨造成的。

我心想这便对了。

放下电话,我心里暗自佩服老方的记忆力,心道这“老秀才”都快奔八十了,记忆力一点没减退,写过的东西都在心里装着呢。

相比而言,这方面恰是我的短板。自己写的历史人物,对于他们的生平与生卒年,虽经反复考证而成,若干年后当有人询问我时,往往还是记不太清楚。生活中也碰到过这样的尴尬事,有时晚上一起吃饭的新朋友,还频频碰过杯的,第二天路上迎面碰到,竟然想不起名字,搜肠刮肚也续不上片。

好在我自诩也有一点长处。虽然记忆力不佳,但却能从纷纭繁杂的事物中抓住症结所在,揪出端倪,理出头绪,整合思路,形诸文字。对于历史人物,我会把他们放到时代背景中去考量,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,追踪蛛丝马迹,比对同侪时贤,找寻性格成因,于混沌中窥探有序。此亦可谓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吧。

从宗谱世上推,方一夔是状元方逢辰之侄,逢辰是理宗淳祐十年(1250)的状元,属于石峡一派,与方一夔富山派,同宗不同支。

方一夔著述传世不多,只有《富山遗稿》十卷,入《四库全书》。原县政协文史委主任余利归,花大量心血整理成册,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,我深知查阅古籍之艰辛,故借此机会向他表达谢忱。

明朝三元宰相商辂曾为《富山遗稿》写了序言,序曰:

《富山遗稿》,淳安方先生一夔公所著诗也。先生生宋元间,天资颖悟,志学恳笃,尝从游潜斋何先生,究心义理之学。仕既勿显,因退而筑室富山之麓,授徒讲学,学者称之为富山先生。今所遗诗多五七言古体,纤徐浑厚,弗事雕琢。要其学有源委,然亦足以观先生冲雅之操矣。昔欧阳文忠公谓诗人多穷,非诗能穷人,殆穷而后工。世以为名言。先生惟弗大用,故事业无所见,有蕴于中皆于诗发之,岂非穷而后工者耶?先生五世孙文杰,彙辑

将铍梓以传，属予一言，未及答，适文杰之子中，领乡荐来京，复介宗人兵科给事中廷臣促予言，敬为书。此先生诗，予友周弘璧言之备矣，览者当有得也。

《富山遗稿》收录方一夔诗歌四百八十六首。内容主要有“咏史”“咏物”“感兴”“杂兴”等，不外乎托古咏今，托物寄怀之作。

从方一夔简短的行状来看，他经历过较大的心路起伏，从屡试不第，到退隐富山，不能简单说他是科考失去了信心，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是多少读书人的梦想。无奈山河改变了颜色，蒙古人坐了江山。天风激荡，城池废弛，满目疮痍，现世的寥落赶不上内心的痛楚，方一夔四肢似被抽去了筋骨，空荡荡不能自己，不知何往。他茫然四顾，五内俱焚，只能面对着静寂的山谷仰天长啸。这一脚刹车踩得有点急，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，过起隐居的生活，不应该是自觉自愿，而应该是被迫选择。

再者说，元代的科举考试时断时续，每科录取人数又少，最少时只有五十人，相比宋代少了许多。且元代科举考试中汉人备受歧视，分“右榜”和“左榜”。蒙古人、色目人合为右榜，汉人和南人（南方的汉人）合为左榜。考试内容上，左榜比右榜难许多，考试程式上，左榜比右榜多考一场。如果蒙古人、色目人愿试左榜科目，授官又要比汉人、南人高上一等。读书人与其自取其辱，不如干脆放弃科举之路。

有时候，放下不失为是另一种选择。

方一夔从此开启了授徒讲学之路，山间的课堂、书院的讲坛，时常可见一个年轻的身影，清癯而睿智，精炼而老成，人称富山先生。

一个文化人处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嬗变时期，也只有两种选择，要么出仕为官，谋个一官半职，要么讲学著述，终老林泉一生，除此，没有第三种选择。他与洪震老、吴墩、夏溥、徐夔叟、翁民瞻、余炎叟六先生友善，编他

们七个人的倡和诗为《七子韵语集》。胡长孺曾给诗集很高的评价：

山里曳裾丝履盛，里门会弁碧毡寒。

曹刘千古风流在，未必淳安劣建安。

胡长孺乃婺州永康人氏，咸淳中，铨试第一名。授迪功郎，监重庆府酒务，拜福宁州倅。宋亡，退栖永康山中。至元二十五年（1288），下诏求贤，有司强之，拜集贤修撰。与宰相议不合，改扬州教授。延祐元年（1314），转两浙都转运盐使司，长山场盐司丞。以病辞，后不复仕。隐杭州虎林山以终。门人私谥纯节先生。所著有《瓦缶编》《南昌集》《宁海漫抄》《颜乐斋稿》并行于世。

鲁山赵与东（宝祐进士）亦有诗赞《七子韵语集》：

潇洒千峰郡，清新七子诗。

方一夔的诗词不事雕琢，清新自然，无怪乎商辂说：“足以观先生冲雅之操矣。”这种“冲雅之操”，并非贵胄子弟故作，而是投身自然，摒弃奇丽，回归个体，隐忍抑锐。一夔自号知非子，由此可见他对唐代诗人司空图的追慕。

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《富山遗稿》的部分诗作，以此走近方一夔，走进他的内心世界……

《古意四首·其四》：

予读书之室，先从兄时南尝扁以“绿猗”，今二十余年矣。感叹存歿，遂成长篇。

峨峨高山东，迢迢青溪曲。采蘅擷薜荔，结构蜗牛屋。
中有读书堂，堂外万修竹。错出泉石间，翛然隔尘俗。
劲刚逢干节，空洞夷齐腹。长钓横江鲸，翠立摩天鹄。
借问主人谁，彼美清如玉。瓶罌空四壁，简册富万轴。
小篆揭新扁，高步踵前躅。箬龙忽变化，遗歌焉忍续。
岁晚坐相向，此君幸予辱。荣悴纷变态，风雨寒暄燠。
春来枝叶蕃，苍璆森在目。势且干青云，肯顾凡草木。
伶渠痛洒扫，日哦三四幅。吾诗试评品，千古配淇澳。

诗题有点长，说的是：已去世的堂兄在的时候，我曾在书室的南面挂着一块匾额，题为“绿猗”，时间过去二十余年了，如今感叹生死，就写了这篇诗作。

方一夔引用屈原的“采薜荔兮水中，搴芙蓉兮木末”，说自己采摘薜荔和杜蘅，用来建造蜗牛一般的小屋，房子虽小却很高雅，堂外遍植修篁，赏心悦目。身处泉石之间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，好不惬意。作者写这些景致的意蕴并不在于对象本身，而是在于所唤醒的某种心情。托物言志，情景交融，可以起到拨动人们心弦的作用。

接下来用了两个典故，关龙逢、比干犯颜直谏，被夏桀和商纣处死，以及伯夷、叔齐不食周黍，双双饿死在首阳山。作者引喻设譬，申发了特定场景中的领悟和感受，以此启发读者的联想，表明主人的高尚品德。

“长钓横江鲸，翠立摩天鹄。”前一句出自苏轼《留别蹇道士拱辰》：“愿持空手去，独控横江鲸。”后一句出自王燦《从军》诗：“寒蝉在树鸣，鸛鹄摩天游。”问问看这个主人是谁，竟如此洁清如玉，虽家徒四壁，但却有藏书万卷。

“吾诗试评品，千古配淇澳。”画龙点睛之笔埋在最后，这是全诗的魂

魄所寄，语出《诗经·卫风》：“瞻彼淇澳，菉竹猗猗。”用绿竹暗喻书屋主人德操高尚。恰如王国维所说：“昔人论诗词，有景语、情语之别。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。”方一夔写景也是为了抒发情感所需。

再如他的《夜作评史·史记》：

迁史驰驱纵复横，不烦绳削自天成。

后来纵欲修良史，法度森严敢变更。

方一夔想用一首七言绝句来评品《史记》，可谓难之又难。《史记》首创自传体编史，被称为“二十四史”之首，司马迁用他那如椽巨笔，纵横捭阖驾驭自如，仿佛中国的历史都装在他的心中。

他也有关于友情的诗作，如《别洪复翁》：

十载与君友，何曾异悲欢。忧寒夜同袍，念饥日同餐。

晚节各大缪，浊世多波澜。我争东山墩，君赴金沙滩。

云萍不相接，我穷君长叹。出门重入门，转觉营生难。

故人赠尺书，招我来东安。水云三百里，飞鸿集江盘。

君如跨海鹏，发轫骞修翰。咫尺视万里，归泝天池湍。

梅花点飞雪，相将理征鞍。新诗月几首，愿寄青琅玕。

诗中可见他与洪复翁深厚的友情，“十载与君友，何曾异悲欢。忧寒夜同袍，念饥日同餐”。方一夔与洪复翁志趣相投，同悲苦共欢乐，一晃十年过去了，在寒冷的夜晚，因担忧对方，恨不得与之同袍而睡；白天又担忧对方饥饿，恨不得与之同餐而食。友情深挚，甚于兄弟情谊。

洪复翁何许人也？洪复翁，名洪震老，字复翁，淳安光昌（今左口）塘边

村人。私淑杨简之学。延祐年间荐入上都，因上丞相书，陈时事，耿直不讳。寻弃去，隐居不仕，讲道授徒，人称石峰先生。长于诗，有《观光集》。《寰宇通志》记载了延祐二年(1315)进士三十三名，其中严州府只有洪震老一人中进士。

《富山遗稿》中方一夔与洪复翁诗词唱和较多，除《别洪复翁》，还有《寄洪复翁》《大水寄洪复翁》《次韵洪复翁辞沃氏招馆》《次韵洪复翁食蕨》《岩峰寄洪复翁》《题洪复翁诗卷后二首》《有怀洪复翁入郡城纳金课》等诗。与方一夔交往的六个人里面，至少有三位是淳安人，分别是洪震老、吴暉和夏溥。

吴暉，淳安蜀阜(今威坪)人，字朝阳。八岁能诗文，留心性理之学。元泰定二年(1325)进士。初官番阳，升镇平尹，兼知军事，后转峡州路经历，不久，解印绶去，授徒讲学以终。吴暉为官清正，所到之地皆有政绩。在为学上，他与宋梦鼎、鲁渊、张复并称“春秋四家”，弟子中著名的有郑玉(号师山)、方道叟等；他还曾为理学家钱时撰写《融堂先生钱公墓记》，另有《吴修撰集》传世。

夏溥，字大之(一作大志)，淳安人。精于《易》《春秋》之学，为文雄深简古，其诗自成一家，时称“夏体”。郑玉曾经自言得夏溥启发之功。至治三年(1323)领乡荐，授安定书院山长。

宗谱记载方一夔“壮与何梦桂诸老游”，此言不虚，我们在诗集中找到了他写给何梦桂的诗，《寄呈何潜斋小有洞天》：

小有古洞天，仙峰戴灵鳌。
何人失守卫，飞去随波涛。
謁来文昌宫，还作贵人牢。
贵人旧散仙，稍厌官府劳。

怅然念人世，谪居领岩壑。
饥食柏树子，渴饮松枝醪。
涕唾视勋业，习气余诗骚。
我亦慕仙者，何时脱羈绦。
终携绿玉杖，东去访卢敖。

何梦桂比方一夔大了二十四岁，此时的他早已退隐文昌小酉源，犹如洞天仙府，不食人间烟火。“东去访卢敖”句，用卢敖来映衬何梦桂。卢敖曾为秦始皇寻求古仙人羡门、高誓及芝奇长生仙药。后见秦始皇专横失道，遂隐遁故山（今诸城市区），故山后改名卢山。

在方一夔眼里，何梦桂就像卢敖一样的散仙，不事权贵，遁迹修仙，啸傲山林，徜徉丘壑。自己也追慕这样的生活，“饥食柏树子，渴饮松枝醪”，超凡入圣，飘逸绝尘。有如芝兰生幽谷，无人而自芳。

方一夔隐而不仕，并没有一味地去吟咏清风明月，他依然关心国事，现存他的诗篇里，时常可见慷慨激昂、热血衷肠之作。如《闵忠·吊文天祥》：

弱冠知名动紫宸，两朝际遇荷恩深。
身先赴义人争死，天不成功泪满襟。
自郑有谋归华氏，舍湘无地托王琳。
鞠躬待死无余事，不负朝廷不负心。

文天祥是南宋名臣、抗元名将，与陆秀夫、张世杰并称“宋末三杰”。被俘后严词拒降，赋《正气歌》。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，并许愿中书宰相之职。文天祥宁死不屈，不为官职所动。至元二十年（1283）在大都柴市被害，

年仅四十八岁。方一夔在诗中对文天祥作了热情的讴歌，怀吊英雄，感慨深沉。而他在《诛奸·刺贾似道》一诗中，则对权相贾似道作了无情的鞭挞：

握兵结眷冕旒前，牢落英雄二十年。
虎殿寿觞人痛哭，鹞堂私语众喧传。
尔身不恤无埋地，此耻奚容共戴天。
不有四明倡清议，至今蛟龙卧山渊。

贾似道为贾贵妃的弟弟，嘉熙二年（1238）登进士，他得到理宗的重用是自然的，且彼此以师臣相称。后度宗即位，升任太师，平章军国重事。从“鄂州之战”（1258—1259），可以看出贾似道是颇有军事才能的。忽必烈率十万精锐的蒙古兵，花了数月时间，始终攻不下鄂州（今湖北武昌），而守将正是贾似道。

在宋朝灭亡后，忽必烈曾问宋朝的降将：“尔等何降之易耶？”那些降将回答说：“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，每优礼文士，而独轻武官。臣等积久不平，心离体解，所以望风送款也！”元世祖说：“正如所言，则似道轻汝也固宜！”这些武将的托词和理由在元世祖看来显得很可笑。

同样一个历史人物，在后人的笔下，往往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，有时候着实让人无从研判与定论。我想借用《论语·泰伯》里的一句话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而反之亦然，“若谋其政，必担其责！”大宋王朝的覆灭，虽然不是贾似道可以挽回的，但身为丞相他确实难辞其咎。

咸淳九年（1273），襄阳沦陷。德祐元年（1275），贾似道率兵十三万出战元军于丁家州，大败而走，逃奔扬州。群臣请诛，为平息众怒，遂贬为高州团练副使，循州安置。贾似道行至漳州木棉庵，被监押使臣会稽县尉郑虎臣所杀。

方一夔从一个文人的角度,表明了自己的立场。作为遗民诗人,家国情怀终究挥之不去,一辈子魂牵梦绕。屈指算来,他二十七岁那年,国家就陷于夷族的统治,汉人连“三等公民”都算不上。蒙古人崇尚强大,马背上的民族靠的是征战杀伐,果敢勇猛,尚武之风,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内心。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汉人需要宣泄,而贾似道,一个典型的蒙古将军,作为历史进程中实际的负责人,自然难逃在文学上被讥讽的命运。

方一夔自视甚高,他吟诗作赋,寄情山水。至元十五年(1278),浙西廉访金事夹谷之奇听闻方一夔清名,亲自到富山登门拜访。方一夔避而不见,“逾垣避之”,翻墙逃走了。由此可见他不愿羁束、超尘脱俗的一颗坚心,也是“洗耳怀高洁”的志向所致。

喜欢他的那首《咏芭蕉》诗:

剥尽皮毛见本真,此中无古亦无今。

等闲窗外东风软,露出先天一片心。

比起方象瑛的《健松斋集》、方葵如的《集虚斋集》《富山遗稿》,方一夔的诗显得自然活泼、童趣浪漫。如果说方象瑛的诗文艰涩孤雅,方葵如的复古深奥,那么方一夔呢?活脱脱一个不羁之人,一任天真,一洒笔花,明心见性。有人说,“所谓天真,不过是越过成熟,选择真心”。其实不然,天真不是选择来的,而是他自然流露出的童心、真心、初心。读他的诗,容易让人勾想起邵雍的《山村咏怀》:“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。”就像老百姓唠家常,直白易懂,朗朗上口,与冷僻孤傲毫不沾边,与佞屈犟牙分道扬镳。

我阅读有个习惯,坐定之前先点燃一支沉香,待香味弥漫,再翻阅所读之书。一路浏览案头上的《富山遗稿》,恍若跟着方一夔一起走进了富山,

徜徉于林谷，藤萝薜荔，绿罩满山，涧石流泉，叮咚在耳。口鼻间呼吸的都是新鲜的山野空气，醒脑醉人，生活里那些牵肠琐碎，释然一空，顿时让人见出一个真实的富山先生，脑海中瞬时浮现出一幅实时画面，好似在村前屋后的树头枝底看到的桃李，清新拂面。

这便是咏物抒怀之真章，又恰好“露出先天一片心”。

“白衣太史”徐尊生

太史，一般是指史官，纂修国史之人。白衣太史，是说一个既无功名也无官职的人从事这一职业，在我看来，绝对属于“高大上”的工作。

对于一个新的王朝来说，要想长治久安、国运昌盛，就要以人为鉴、以史为鉴，不能重蹈前朝的覆辙，更不能让前朝的历史从自己手中断裂，史官将暗昧的史前传说，考订敲实，成为敞敞亮亮的信史，成为照耀中华文明时空的灯塔。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徐尊生便是这样一位“白衣太史”。

对于一介文人来说，能够参与国史的纂修，无疑是件值得庆幸之事。朱元璋建国之初，百废待兴，所以不拘一格降人才，只要有真才实学，不论在朝在野，不论有无功名，皆可荐举录用。徐尊生在五十岁那年被歙县友人鲍尚綱举荐，开始被征召入京，纂修元史。

历史上，但凡圣贤高士、才子佳人的出生，都会披上一层神秘的光环。据《尊生公本始传》记载：“公母初梦金星坠地，变成老人，衣冠异常，谓曰：‘我少微主人也，帝命我带金玉到母家。’忽见金光闪烁射人，母惊醒而娠生公于厚屏村。”徐尊生天资聪明，他十岁经子悉通，十五岁穷究诸史，为文不尚浮躁，务谈道学、敷经济。可谓少年老成。

为了追寻他的家族源流，我查阅了《厚屏福派徐氏宗谱》，内有“徐徵君大年先生传”，据载“徐尊生，字大年，号赘民，老曰赘叟。生于延祐六年

(1319)七月六日。幼极颖悟，长而淹博，善著述，时誉藉藉”。往上追溯，徐尊生“曾祖应庚，字梦白，祖父梅叟，号春亭，父亲直之，字仲儒，数世皆耆儒，而厄于宋元之际。不乐仕进，号其所居之地曰考槃(今威坪镇厚屏村)”。考槃村群山拱秀，诸水澄清。这里蓄盘谷之高风，蕴辋川之雅致，更有考槃八景为证：屏山松翠、凤岗晚照、长潭秋月、虎石生威、墅坂春耕、笔架三峰、鸡石献奇、神山效灵。

徐尊生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家学渊源，不需要为柴米油盐操心。祖父是国子监太学生，父亲为郡庠生，曾参与纂修《青溪志》，所以称之为“数世皆耆儒”。

与他一同纂修国史的一共有十六个人，我查了一下，他们分别是汪克宽、胡翰、宋僖、陶凯、陈基、赵坝、曾鲁、赵沔、张文海、徐尊生、黄箴、傅恕、王铨、傅著、谢徽、高启。其中除了汪克宽、宋僖、陶凯、赵坝曾在元朝参加乡试中过举之外，其他的都是隐逸之士，没有功名在身。

从掌握资料来看，徐尊生至少是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的。在《尊生公本始传》里，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公之高叔祖镛公，从学钱融堂，祖梅叟公，又从学融堂之子诚甫，皆得融堂家藏著述之遗书。公取以印证所学，先后同揆，心精孚会，益以自淑，而渊源有自。方二十七岁时，与钱敬之游严陵，登钓台观子陵遗迹，喟然叹曰：‘此千古高人也。’乃与钱子归，俱以高尚为事，不复应试。”

徐尊生祖上是理学名家钱融堂的学生，世代交游，情谊深厚。徐尊生二十七岁那年，与钱敬之同游严陵，观钓台严子陵遗迹，触发人生之感悟：既然富贵功名皆有命数，何必区区仆仆，不如效仿严子陵，泛舟桐江钓烟雨，林泉高致秋水长。从此，他决计不再参加科举考试。

这次严陵之行，钓台遗迹给他震撼不小。徐尊生开始隐逸山林，读书交游。足迹遍布歙、婺、严州等地，才华与名声随之播散于高蹈隐逸之林。

这样优游闲适的日子，戛然而止于洪武二年(1369)的正月。太祖下诏开设史局，广罗天下人才编修《元史》。徐尊生名声在外，被歙县友人时任翰林修撰鲍尚綱举荐，徐尊生虽然一百个不情愿，但皇上派出的使者已然来到县上，诏书也宣读过了，此刻身不由己，况且“郡县敦迫，辞避不可”。徐尊生只得打点行装赴京上任。

三月到京，即授翰林应奉。我们从他写的诗词里面，丝毫感受不到兴奋与激动，甚至不乏怨言与消极的情绪在里面。如《授翰林应奉》一诗：

布衣昨日孤寒士，翰苑今朝已授官。
幼有文章淹滞久，老无筋力进趋难。
追班香案晨簪笔，列坐宫门午赐餐。
早晚归休宜引分，免教白发玷金銮。

私下发发牢骚也就罢了，工作还是不能耽误的。纂修的国史有十六人。宋濂给大家作了分工，同时传达了皇上的旨意：“文辞勿致于艰深，事迹务令于明白。”意思就是说，文字要浅显易懂，叙事要通俗明白。

编撰过程中，大家难免有因意见相左而激烈争吵、互不相让的时候。最活跃的莫过于江西新淦人曾鲁，他博闻强记，凡数百年国体、人才、制度和沿革，皆了然于心。徐尊生并没有心情参与这些争论，他自称“白衣太史”，专心审阅元十三朝实录，甄别归纳，草创体例，只愿早日完结手头工作，好归去山林，继续过他闲云野鹤般的生活。

一日，徐尊生理首案头，笔走龙蛇，曾鲁忽然过来问道：“依大年兄之见，蒙古人与汉人相比，民族之优劣如何呢？”

徐尊生略作沉思，不紧不慢道：“民族无所谓优劣，文化只有启蒙先后。蒙古民族若不优秀，怎么会征战天下无敌手、统治中原近百年？”曾鲁不曾

想徐尊生会向他抛出这个问题，一时间愣住，急忙道：“该是我问你才对呀？”

徐尊生状若未闻，更像是自言自语：“打天下易，治天下难。打天下靠拳头，治天下靠人心。蒙古人崇尚“丛林法则”，恃强欺弱，霸凌天下，他们的行为准则与思维方式就是铁蹄扫踏、强权统治。汉人推崇儒家学说，讲究温良恭俭让，以强扶弱，和谐共存，以仁爱之心治理天下，以德化人，四海宾服。可见人心之向背，高下立判。”说到这里，他两眼紧盯着曾鲁，道出了重点：“汉人的文化既有根也有脉。俗话说‘草蛇灰线，伏脉千里’。写文章需要这样，文心文脉亦然，文化启蒙的群体性也就彰显出来了。”

“佩服、佩服。”曾鲁拱手而起，连声赞道，“仁兄果然高见……”

这一年的七月六日，客居京城的徐尊生迎来了他五十岁的生日。为此，他写下了《七月六日生日有感》：

客中生日近七夕，老子行年当五旬。
梦寐不忘林壑趣，形模难作市朝身。
已甘素发欺凌我，只怕淄尘染污人。
归去秫田秋正熟，新醪烂醉瓮头春。

诗中把自己在京城纂修国史，说是客中过生日，行年正当五十岁。做梦都不忘隐居林壑之乐趣，我的形状和样子（志向性格），很难适应集市与朝廷生活。如今白发虽已欺上我的头，怕只怕世俗之垢染污人身。此时归乡种植稻粟粮田，还可以赶上收获季节，家家新酿的“瓮头春”美酒，恰好喝醉不愁。

纂修《元史》的工作，至八月癸酉（十一日）终于结束，历时一百八十八天，完成本纪三十七卷，志五十三卷，表六卷，传六十三卷，合计一百五十九

卷。卷帙如此浩繁，用时如此短暂，堪称神速。

《元史》编成，呈览皇上，得太祖上谕：“其壮而可仕者授之以官，老疾者许其归。”徐尊生时年五十，自然属于可仕之年，其才学为多官推荐欲留任。徐尊生决意以老衰力辞，上允其归，赐银带等物丰厚。由于元朝最后一位皇帝顺帝的资料缺乏，他在位的三十六年史实空缺，未免留有遗憾，需要遣使搜访，总裁官宋濂奏请留之。

眼看到年底，又不能按期回家，沮丧的心情无以言说，只得寄托笔墨，赋诗一首《冬至感怀》：

正月辞乡赴帝畿，蹉跎岁晏只堪悲。
阳春自是有回日，飘泊何因无返期。
暗推造化循环理，遥忆家人镜听词。
旦暮不忘林壑念，寸心惟仗老天知。

家乡的风俗“镜听词”，家乡的林壑之美，无时无刻不在萦绕思恋，这样的心境恐怕只有老天爷知道吧。然，徒唤奈何？

徐尊生无奈只得留下，这边史馆因搜访顺帝史料耗时费劲；那边洪武三年（1364）正月，礼部奉命编修《礼书》。礼部官员早闻徐尊生大名，遂与史馆抢夺人才，徐尊生只愿早日回家，看史馆那边搜求艰难，于是被迫加入礼局，完成了一系列的《礼书》编撰工作。

夏七月书成，他等不到进呈，便又奏请回乡，真可谓是归心似箭。朝廷见他归意已决，准允所奏。

国史馆同事，老大哥贝琼，与徐尊生是浙江老乡，平日相交甚深，贝琼多次听徐尊生谈起严子陵，谈起钓台，谈起家乡，所以在送别时，他专门作了《钓台歌送大年著作》一诗相赠：

子陵台下江千尺，山削芙蓉江半出。
子陵已去白云孤，潇洒尚爱如方壶。
山风山月只依旧，何人更钓桐江鲈。
先生读书万山里，前年暂入金陵市。
青溪看月忽思乡，逢人苦说桐江美。
酌我手中酒，浣君身上衣。
桐江秋来鱼正肥，子陵台前君早归。

徐尊生如倦鸟归林，如鱼得水。恢复自由的途中，他一口气写下《归舟杂咏二十首》，其一云：

两年留滞帝王州，长恐归心不自由。
今日始知身属我，秦淮河上发轻舟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轻舟飘荡过横塘。自由身，心情爽，身体轻松，船也轻快，眨眼之间秦淮河已被抛在身后，向着桐江，向着新安江归来，这一回自己不是在做梦，而是真正身心俱归了。

归家后的徐尊生怡然自得，著书立说，有《制诰》二卷、《怀归稿》二十卷、《春秋公羊经传》十四卷、《春秋论》一卷等。光绪《淳安县志》中，也收录他部分诗词和记文，我觉得《龙眼山记》，不失为一篇优秀的散文，文辞优美，叙事生动，兹录于后：

淳安之西梓桐之源，有山曰龙眼，支脉自黄山来，蜿蜒夭矫数百里，至此则却顾蟠伏，若龙之俯首，下饮于溪者。溪水潴而为潭，潭上有石穴二，穴中有石膛，努圆而小，黝碧光莹，撼之微动，水冷从中出，是为龙眼。盖穴

者睚而动者其睛云。天将雨，云气滃然，上薄林木，翕然变化，不可端倪，殆造物故示神功如此。夫山静物也，然其蒸而出云，则有时而动。龙动物也，然其潜而勿用，则有时而静。山静而能动，又肖其形于龙。龙动而能静，又托其似于山，以理以象，所谓动静互根者，非耶？君子之处斯世，亦犹是矣。

梓桐之源龙眼山，说的是明代四朝元老、太子少傅，官至一品的胡拱辰家乡。徐尊生写这篇文章时，距离胡拱辰出生尚有四十来年时间，但他把龙眼山的神奇、造物主的神功，通过神来之笔描述，使我们如临神奇之境，感受到龙的动与静、山川云气的变化，以及君子的处世之道。

徐尊生归家十年左右，又被皇帝召入宫中。据《尊生公本始传》载：“帝思其贤，复召入京，不强以职事，但侍讲论而已。大得上意，左右有不悦者，数譖之，公知其不可久留，又固辞还乡。拂上意，故出为陕西教授。未之任，而卒于道。”我在家谱中，没有查到他的墓志铭，传记中说他“卒于道”，也没有提到具体时间，只说他死在赴任途中，死后归葬于徐氏家庙后。

徐尊生还有一个弟弟，名叫同生。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，授广西桂林府同知。他还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叫昌胤，次子叫昌雄。

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，徐尊生入乡贤祠。乡贤祠在县治文公祠左，成化十二年（1476）重修，至康熙二年（1664），县令赵之鼎、教谕谢鼎元又修之，祀乡贤四十二人，“白衣太史”徐尊生依然在奉祀之列。

徐嘏的戏剧人生

徐嘏写戏文本是出于无奈，不愿仕进的他眼看着功名无望，又不想碌碌无为，只能混迹于勾栏瓦舍之间，没承想却一炮走红，成为圈内明星。此刻，他正坐于剧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单待着南戏新剧《杀狗记》的首场演出。

他不想引人注目，心里也未免有些忐忑，剧本好坏是一回事，演出效果又是一回事。他逡速扫视了四周一眼，见座无虚席，观众或嗑瓜子品香茶，或引颈张望，或低声交谈，似乎都在等那一声开场的鼓板。

大幕启开，鼓板声促。

演员(末)上场，调寄《鸳鸯阵》，开嗓唱道：

孙华家富贵，东京住，结义两乔人。诳语谗言，从中搬斗，将孙荣赶逐，投奔无门。风雪里救兄一命，将恩作怨，妻谏反生嗔。施奇计，买王婆黄犬，杀取扮人身。夫回蓦地惊魂，去求免龙卿、子传，托病不应承。再往窑中，试寻兄弟，移尸慨任，方辨疏亲。清官处乔人妄告，贤妻出首，发狗见虚真。重和睦，封章褒美，兄弟感皇恩。

这正是：

两乔人全无仁义，蠢员外不辨亲疏。

孙二郎破窑风雪，杨月真杀狗功夫。

这是南戏《杀狗记》的第一出。先将故事梗概交代观众，接下来，再依序搬演剧情。

剧中讲述了富家子弟孙华，交友不慎，与市井无赖柳龙卿、胡子传结为好友，在他俩的唆使下将胞弟孙荣赶出家门，寄身破窑。孙华妻子杨月真贤淑有德，为了劝夫悔改，买了王婆家一条黄狗杀之，扮作人尸置于门外，孙华酒醉醺醺夜归来，误以为祸事临门，恐惹人命官司，连忙去央求酒肉朋友柳、胡二人替他消灾，没想到平日称兄道弟的二人，此刻非但不帮忙，还去官府告发他。关键时候胞弟孙荣为他“埋尸”避祸。妻子杨月真出面说出原委，澄清真相，兄弟摒弃前嫌，重归于好。

看戏的人没多少文化不打紧，写戏的人虽无功名，但有才情有文化。新版《淳安县志》有载：“徐岷(1330—1398)，字仲由，号巢松病叟，淳安徐村人。洪武十四年(1381)秀才，以文章著名于世……又工于戏曲。”

秀才一般是指经过本省各级考试，录取在府、州、县学中的生员，在民间以“秀才”一词通称读书人。按照年龄推算，徐岷五十来岁才考取了秀才。

儒家学派讲究“气节”，从苏武牧羊到民族英雄文天祥，都是读书人心目中的典范，参不参加科考，进不进入仕途，成为衡量士子有无“气节”的标准。那种内心煎熬痛楚难当，局外人难解个中三昧。

读书人不去参加科考，总得找点事情干吧？那时候元杂剧兴盛，出现了像关汉卿、马致远、王实甫、郑光祖、白朴、乔吉等元杂剧大家。这些人中，除了郑光祖在杭州做过小吏，其余人皆未仕进。瓦肆勾栏成为他们发挥才情的最佳去处，戏曲需要这些不愿仕进，却愿意为艺术献身的知识分子。

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，徐岷继踵前辈士人足迹，投身于戏剧艺术，

创作南戏作品《杀狗记》。

南戏作者又称“才人”，由于他们本身生活在瓦舍勾栏之中，长期与演员磨合，与观众交流，他们熟悉舞台，精通曲律。

此刻，戏近收尾，鼓板声歇，大幕徐徐合拢。

演出很成功，观众意犹未尽，久久不愿散场。徐岷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产生了一种成就感。伦理道德、忠孝节义、亲睦为本……有故事有情节，配之南方方音演唱，方音就是地方流行音乐，流行曲调，观众喜欢，耳熟能详，唱词也糅合本地俚语方言，老百姓听着亲切。

《杀狗记》是不是原创不好说，有人说徐岷《杀狗记》改编自萧德祥的《贤达妇杀狗劝夫》，要我说，改编成功也并不容易。想要博取眼球，赢得喝彩，首先要懂观众心理学，或曰“接受美学”。观众看戏之前早就有了预置结构，这种预置结构是由或明或暗的记忆，以及情感积聚而成的，最终去与作品发生碰撞，决定是否接受或接受的程度。

江南的杭州、温州、永嘉等地，富庶繁荣，文化昌盛。勾栏瓦舍遍布市井，流行着一种叫“南戏”的剧种，很受大众喜爱。南戏的角色分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、外、贴七色，前五个角色较为常见，“外”和“贴”不太常见，“外”是指扮演老年人的角色，“贴”则指贴身的丫鬟，相当于“旦”的副角。

南戏以曲牌连缀为代言，以说唱文学来叙事。与元杂剧不同，南戏任何角色都能唱，既可以独唱、对唱，又可以接唱、合唱，甚至后台用于渲染、烘托气氛的帮腔合唱，形式多样，灵活多变。

《杀狗记》中，狗成为剧中的“戏眼”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买狗、杀狗、冠狗、埋狗，渐次把剧情推向高潮。作为民俗民风之一，“磔狗于门”是防避灾祸、禳御邪气的有效方法，自古有之。面对家门不幸，兄弟反目成仇，妻子杨月真百般规劝，万般无奈，不得已想出这一狠招，且要给狗穿衣戴冠，扮作人形，以此警醒梦中人。

徐岨是个读书人，对于志怪小说并不陌生。《搜神记》中关于给狗穿戴衣冠的记载，兴许给了他创作灵感：“……昭帝时昌邑王贺见大白狗，冠‘方山冠’而无尾。至熹平中，省内冠狗带绶以为笑乐，有一狗突出，走入司空府门，或见之者，莫不惊怪。”

意思说，汉昭帝时，昌邑王刘贺看见一条大白狗，戴着“方山冠”而没有尾巴。到了汉灵帝熹平年间，宫内之人给狗戴上帽子，系上印绶带，用来开玩笑取乐。其中有一条狗突然跑出朝门，进到司空府里去了。

《杀狗记》第二十五出“月真买狗”戏文中，他巧妙地借杨月真之手，设计了一出“杀狗劝夫”的好戏。

(旦)：“若买得来时，就央他杀了，把衣服巾帽将狗穿戴了，扮作人形，放在后门首……员外(孙华)酒后醉回……看见死狗，只道是人，必然去央浼两乔人移尸，他每断不肯来。那时再教他去央浼小叔，他一定肯来，那时辨个亲疏。此计如何？”

(旦)：“因风吹火，用力不多。谢得王婆替我把狗杀了，不免将衣帽将他(狗)穿戴则个。”

(贴上)：“欲转官人意，多劳主母心。院君，衣帽在此。”

(旦)：“就是你与他(狗)穿了”(贴穿介)

……

(旦唱)《锦缠道》：“计谋成，杀一狗撒在后门，扮妆似人形。试看来鲜血遍污衣中，我儿夫必道是人，猛然间魄散魂惊，叫他自猛心省……”

(贴)：“我官人，近日来不知怎生，偏向外人亲，每日里同饮同坐同行，把兄弟逐出受贫。娘行劝抵死不听……”

果然不出妻子所料，孙华夜半回家见门口“尸体”，惊恐无措，急匆匆

去央求那两个“义赛关张”的柳、胡兄弟，岂知两人听罢，一个借口心疼病发作，一个谎称腰痛去不了，推三阻四，没有一个愿意出头帮忙。

杨月真见丈夫六神无主，劝他去找弟弟孙荣：“叔叔读书人，是亲无怨心，必定肯来。”经过一番曲曲折折的经历，孙荣不计较哥哥薄情寡义，帮孙华处理了尸体，还在柳龙卿、胡子传两个无赖到官府告发的情况下，主动替孙华承担了罪名。直到杨月真上堂说明真相，将柳、胡这两个反复小人，诬告人命，着枷号市曹三个月，满日各杖一百，发边远充军。

这是一出家庭伦理剧。

传统儒学关于文学的四种功能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，戏剧同样适合。“兴”是审美愉悦功能，作为舞台艺术，戏剧综合了文学、音乐、舞蹈等多种元素，寓教于乐；“观”是社会功能，即通过作品了解社会、他人等各种情况；“群”是教育功能，可以聚拢人心，教化团结人；“怨”则是宣泄功能，可以表达不满，批评社会现象。

家和万事兴，妻贤夫祸少。从后面的结局来看，堪称完美。此事经府尹奏报，惊动了皇上，特颁下圣旨：

王化以亲睦为本，维风以孝友为先……孙华遥授中年县尹，以彰其妻功夫之美。杨氏月真金冠霞帔，封贤德夫人。孙荣被逐不怨，见义勇为，克尽事兄之道，特授陈留县尹。

剧中称府、县的长官为“府尹”“县尹”，可知事件发生在元朝。徐岷生活在元末明初，虽然距离我们六百余年，但《杀狗劝夫》讲述的故事，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：兄弟反目，家庭不睦；交友不慎，误入歧途；酒肉朋友，忘恩负义。一幅幅、一帧帧世态人生图，极具现实意义。

有人说，当你身处高位，看到的往往都是浮华春梦，只有当你身处卑

微，才有机缘看到世俗的百态真相。我在想，假如徐崑科考入仕，官运亨通，那么中国戏剧史上定然少了一位剧作家，六百多年的南戏舞台还能传唱《杀狗劝夫》这出好戏么？

戏台小天地，天地大戏台。

徐树林先生曾于2008年12月出版了《威坪》一书，当时他送了我一本，扉页上有他的题赠，落款日期是2009年1月10日。我翻阅之际，尚带着油墨的芳香。可惜徐先生作古多年，然《威坪》一书尚在我案头陈放，如今取阅在手，物是人非，感慨不已。书中有一个章节是“戏曲艺文兴”，徐先生提到了家乡蜀阜的戏台，说“童年时经常在戏台上疯玩”，记得“两边台柱上的楹联是：‘一台戏演出炎凉世态，千秋曲唱尽古今人情。’”

品咂再三，暗自赞许。我猜想撰写对联的作者，不一定是个饱学之士，但一定是个饱经沧桑之人。阅尽世相，通透人生，一联便道出真谛：戏如人生，反复无常；人生如戏，轮回搬演。

《杀狗劝夫》一剧，有无在家乡威坪搬演，我不得而知，不过里面确有许多杭州的方言俚语。

如第六出(净白)：“杭州老信说的，还有一丢儿。”“呸，破蒸笼不盛气。他是孙大哥家里使唤的，我每吃酒，他来伏侍的。”再如购买中药说是“赎药”。服药嫌苦“放些甜的在里头过药”等，均带有明显的杭州方言特点。

对于戏曲中使用方言俚语，文人雅士一般持反对意见，认为“鄙俚粗俗”。明代后期文学家、戏曲家徐渭、王骥德、凌濛初等，都主张戏剧词曲“本色”化，反对“以时文为南曲”的流弊。这样的雕章琢句，连案头阅读都让人费解，何况场上搬演。

王骥德在《曲律·杂论》中说：“剧戏之行与不行，良有其故。庸下优人，遇文人之作，不惟不晓，亦不易入口。村俗戏本，正与其见识不相上下，又鄙猥之曲，可令不识字人口授而得，故争相演习，以适从其便。”

何谓“本色”？王骥德解释说：“白乐天作诗，必令老姬听之，问曰：‘解否？’曰‘解’则录之，‘不解’则易。作剧戏，亦须令老姬解得，方入众耳，此即本色之说也。”

徐渭认为“本色”就是事物的本质、真性和本来面目，他提倡戏剧创作应该“句句是本色语，无今人时文气”（《南词叙录》）。

徐崑不只会作俚语白话，他还会作典雅的诗词。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里，录有徐崑所作《满庭芳》一词：

乌沙裹头，清霜篱落，红叶林邱。渊明彭泽辞官后，不事王侯。爱的是青山旧友，善的是绿酒新刍。相迤逗，金尊在手，烂醉菊花秋。

清新典雅，口舌生香。徐崑自己曾说：“吾诗文未足品藻，唯传奇词曲，不多让古人。”这话虽带有自谦的成分，但可以看出他对词曲还是有相当自信的。朱彝尊则云：“诗虽非所长，然也不俗。”

徐崑《杀狗记》与《荆钗记》《白兔记》《拜月亭》并称元明间南戏四大传奇。

徐崑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无意功名，混迹勾栏，游走书会，热衷戏剧，结缘舞台，一不留神写篇戏文，成了元明间四大传奇之一，流传至今。我在想，徐崑身在元朝不参加科考，不入仕为官，尚可以理解，当他入明以后，“征召不赴”就有点让人费解了。唯一的解释是他浸淫已久，真正热爱上戏曲这一职业，迷恋上戏曲，离不开戏曲了。

“看戏无非做戏人”，那么写戏的又是什么人呢？噫！自己的人生竟如此充满戏剧性。

另据抄本《传奇汇考标目》载，徐崑尚有《鲛直张志诚》《王文举月夜追倩魂》《杵蓝田裴航遇仙》《柳文直元旦贺升平》等，可惜均已失传。

失传的何止徐睨的这些传奇作品。时至今日，戏曲的受众也正在流失。

我曾经就地方剧种列入“非遗”保护项目这个话题，与“非遗”中心负责人闲聊过。我总觉得现在某某“非遗”传承人，靠政府每年几千块钱的补助扶持，实乃不得已之举。

任何事物有生必有灭，这是自然规律。适者生存，不适者淘汰消亡。恰如剧中杨月真所说：“因风吹火，用力不多。”适应趋势方能发展迅猛，否则，如逆水行舟，费力耗时。

戏曲走向衰微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农耕时代，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所限，只能遵循并适应自然，自身的发展也基本稳定而缓慢，戏曲土壤的社会根基稳固。自从跨入工业文明之后，随着生产力的持续提升，人类的创造力得到空前提高，出现了新的思想、文化和价值体系。对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文​​化造成极大冲击。

究其因大略有这样三方面：一是内容与时代脱节，无法唤醒现代人的情感共鸣，那些才子佳人、帝王将相、科考做官、光宗耀祖的题材，恍如隔世，毫无代入感，社会基因不存。二是虚拟的场景和动作无法满足现代人审美需求。舞台的时空限制促使戏曲走向写意化程式，如“水上行船，有桨无船；陆上骑马，有鞭无马”。而影视艺术则把生活的真实发挥到极致，观众身临其境，更具观赏体验感，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。三是戏剧唱腔慢悠，节奏拖沓，无法适应高效率、快节奏的现代生活。一旦心理厌倦，观众势必没有耐心观看下去。

面对这些戏曲审美落差，面对自媒体和信息化时代，将何去何从？确是戏曲工作者所面临的挑战。

承上启下余思宽

四月中旬一天上午，县文旅局公共文化科小杨给我打电话，说汾口宋京村有村民找到局里，想了解宋京村的相关历史，让我接待一下。我说好的，你让他们过来吧。不一会儿，局里一个实习的小姑娘，带着两个人来我办公室。

来人自我介绍姓余，说在杭州开文化传媒公司，想给家乡宋京村做事情，不知道如何入手。一个私企老板关注家乡的文化建设，对此，我饶有兴趣，且为之点赞：热爱家乡、建设家乡，就应该落实于行动。我们就此话题开启了各式闲聊。我说，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，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人是文化的主体，离开人一切无从谈起，看人可观其言行，《论语》所谓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是也，看知行是否合一。

我告诉他一个最佳的切入点，从历史人物着手。拿宋京村来说，始迁祖为余鸿翔（冲霄），此后，宋元有余梦魁、明代有余思宽、余汝楠等历史名人。村里的祠堂、庙宇、牌坊、墓葬等建筑，都是因人而建的，里面有故事、有来历、有传承，关乎家族的记忆，关乎文化的脉络，关乎历史的承载。保护这些历史建筑，其实就是保护我们的家族记忆，保护我们的文化之脉，保护我们的历史根系。

十年前，该村的“大夫家庙（小金銮殿）”“松林庙”就是由我主持修缮

的，因为牵涉太多的精力，耗费许多的心血，所以至今记忆犹新。如今祠堂内搞起了村史展示，这种方式就很有意义。不像有些地方的祠堂，修缮好之后关上门一锁了之。每次验收交付使用时，我都会跟村干部说，祠堂修缮好后可以作为文化礼堂、村民活动场所或民俗展示馆、农家书屋，总之一要合理利用起来；你人不去占领利用，老鼠、蝙蝠、虫子就去占领，这样一来，既辜负了政府出资修缮的初衷，浪费了国家资源，又不利于凝聚民心，构建和谐社会。

这一聊不知不觉近两小时，看着他们似有所获，笑意盈盈告谢离去，我亦觉欣然；转而将目光投向宋京村，聚焦到余思宽身上。我自忖，余氏一族，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。

余思宽(1389—1433)，字仲容，别号闲斋。惟宾公次子，他有一个哥哥叫思恭。查《松林余氏宗谱》，“宪副闲斋公原传”记载：

(公)性英敏正直，博洽多闻，诗文笔札极其精妙。年二十以春秋中永乐戊子亚魁，明年游太学，具疏白父之枉，惟宾公卒于旅邸，与村南还，居丧读礼，造詣益至。乙未春登陈循榜进士，观户部政，是年授河南道试监察御史，次年实授。初巡历凤阳、涿易等郡，三载考绩，蒙恩进阶文林郎。赠父如其官，母汪氏封太孺人，配毛氏封孺人。两巡按江西时，宁藩初之国，恣耽刚愎，公直疏其跋扈之势以闻，下廷议得实风裁，凜然所至，禁奸剔蠹，僉称名御史。宣德三年，以九载秩满，课治行第一，超拜广东按察副使。己酉秋，为监试总裁官，所举得人。明年九月，巡行潮州，乃膺疾卒于长乐之官舍。风猷德泽，至今犹脍炙人口，惜天啬其年，位不满德，奈之何哉？葬开化独山。

传记中大略包涵十一层余思宽的信息；一是性格英敏正直；二是考

取永乐戊子(1408)乡试亚魁；三是游太学，替父辩冤；四是父丧扶柩，南归安葬；五是乙未(1415)春中进士；六是授官监察御史；七是巡按江西，上疏宁王事；八是拜官广东按察副使；九是己酉(1429)秋，出任监试总裁官；十是巡行潮州，卒于任上；十一是葬于开化独山。

余思宽二十岁那年，即永乐戊子年，参加乡试得中“亚魁”，次年赴京会试未中，故“游太学”，索性进入国子监学习，期间替父亲辩冤。父亲名叫余利用，字惟宾，生于元至正丁未(1367)，卒于明永乐壬辰(1412)五月十八日，享年四十六岁。父亲四十多岁遭小人谗言，余思宽替父辩冤，最终“幸获免”。父亲因病卒于旅邸(南京崇礼街)，余思宽扶柩南归，于是年冬十二月，归葬岩下始祖十三公墓右。

丧期期间，余思宽发奋读书，造诣愈深，三年后，登乙未科进士，那年他二十七岁。我查了永乐乙未科进士榜单，余思宽位列三甲第二名，这科三甲共录取二百五十三人，可见名次相当靠前。

当年录取，当年授“试监察御史”，“试御史”乃是见习御史的意思。第二年，取消见习授实职，巡按安徽凤阳、河北涿易等郡。三年考满，政绩优异，进阶文林郎。父母、妻子也各有封赠。

下面这句话很关键：“宁藩初之国，恣耽刚愎。”“宁藩”是指宁献王朱权，朱权是朱元璋第十七子，于洪武二十四年(1391)封宁王，就藩大宁(内蒙古宁城县)。朱元璋为防外族势力，将许多皇子封在关外，给予重兵。永乐皇帝取得帝位后，为削弱藩王的势力，将许多关外的亲王移藩关内。宁王也于永乐元年(1403)，被改封到江西南昌，在其封地“恣耽刚愎”，说他沉溺放纵，刚愎自用。余思宽作为监察御史，巡按江西，就把访察的实情上奏朝廷。

我常常感叹淳安籍官员那股子“傻劲儿”，余思宽不可能不熟悉《皇明祖训》和《大明律》，里面均明确规定亲王违法，由“嗣君自决”。而且措辞相

当严厉：“凡风宪官以王小过奏闻，离间亲亲者，斩。风闻王有大过，而无实迹可验，辄以上闻者，其罪亦同。”风宪官就是监察执行法纪的官员，一般指监察御史，不得随便上奏诸王的过失，否则视为离间，有杀头的风险。

据翰林侍读罗万化《明故广东按察司副使闲斋余公墓表》中云：“（宁王）阴怀异志，其强梁刚愎，诚一方民命所不能堪，宦斯土者，孰不深以为虑，公揽辔江右，独慷慨奋激，抗疏以闻。言其礼乐之僭妄，群小之肆毒，坏法乱纪，其渐为篡。是举世所不敢言，而公独言之。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余思宽作为监察御史，充其量乃七品官，看到宁王朱权“恣耽刚愎”，欺压百姓，他顾不得身家安危，毅然上疏奏报朝廷。大家都替他捏一把汗，静观事态的发展。无怪乎罗万化感叹说：“非忠义之性本于天植，孰能为国家消乱于未形，弥变于未然者乎？”

余思宽可能不会想到，七十余年后，宁王朱权第四代继承人朱宸濠，于弘治十年（1497）袭封宁王，仍然“恣耽刚愎”，甚至变本加厉，蓄养亡命之徒，密谋起兵造反。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，朱宸濠杀死江西巡抚孙燧、江西按察副使许逵，指斥朝廷，发檄各地，指挥叛军十万，攻略九江，袭取南康。最终被赣南巡抚王阳明俘获，论罪伏诛，封国废除。

余思宽可谓一战成名，这一道奏疏，震动朝野，官声远播，人称“名御史”。宣德三年（1428），以九年任期届满，考绩第一，越级擢升为广东按察副使，官至正四品大员。

之所以说余思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，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家族的世德传承、家国情怀的绵延。

往前推一百年，宋京村，宋元之际有余梦魁，字梧叔，贡生。宋亡，不愿接受异族统治，组织民间力量抗元，兵败后隐居宋京璉坞山中，元初，官府屡次召荐他出仕，均被拒绝，告诫子孙说：“我乃宋朝臣子，死后，只需在我墓碑上刻‘宋林处士’四字足矣。”可见他是个有气节的人。

往后再推一百年，明代嘉靖乙卯(1555)，族人余汝楠因排行老八，故称“八大王”。时倭寇大举入犯，浙江总督胡宗宪闻余汝楠勇武过人，檄文到县，聘取汝楠为千总官，授之千兵，宠之冠服，官至正六品武将。余汝楠不负众望，夙夜效力，屡屡杀败倭寇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得到皇帝褒奖，特许恩荣，敕建“小金銮殿”。

思宽有四子：文聰、文瑁、文京、文广。

其中文广这一支，迁十四都象山(汾口赤川口)，枝繁叶茂，家族繁盛。该村现有三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“余氏家厅”“余四山墓”和“龙门塔”，无论祠堂、墓葬、塔的主人，都指向一个人，此人名字叫余乾贞(字秉智，号四山)，是余思宽的玄孙，正好是第四代人，明隆庆二年(1568)进士，巧得很，文广排行老四，余乾贞排行也是老四，而且也官至监察御史，巡按河南。

回头来看，余氏先祖选择在松林定居，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优美的地理环境，对家族繁衍传承是有助力的。据翰林侍读曾荣(永乐二年状元)的《松林八景诗序》云：“始祖(余鸿翔)爱松林山水之胜，因徙居焉。暇则徜徉烟霞泉石之间，既有以识其雅趣，因摭其最秀者凡八。一曰石间垂象；二曰炉岫遗踪；三曰两涧流清；四曰七峰耸翠；五曰石牛卧渚；六曰地豹环毬；七曰琤坞观梧；八曰棠峰揽秀。”

我前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，标题是《“詹氏墨宝”故事多》。我在披阅“詹氏墨宝”过程中，无意间发现了余思宽的题跋，从中捕捉到许多重要的信息，兹录于后，再行解读：

天地之间有君子之宝，庸人之宝。昆玉、南金、珍珠、锦绣，庸人所宝也。文章、翰墨、道劲、英华，君子之宝也。若夫发身科第，捷占邓林，又遭夫明良之盛，而光沐徽音妙墨，褒宠优异，且能传之子孙，世济厥美，不谓宝之宝可乎？宝之若阿威士瑛暨乡贡进士曰士诚，复表著以彰大之，缙绅文士

见者多为诗文以扬其芳。予与詹有姻娅之好，一日，登其堂，迺属予言。予尝病世人终日孜孜惟利诱之图，抑孰知转瞬之顷，业田之变，犹齐景公之驷马，石崇、王恺之华丽平泉金谷，果安在哉？龙图公不宝其他，而独以此传之子孙；为子孙者，皆效维海父子，什袭珍传，与乾坤相悠久；清声伟绩，千古高风。而宋孝宗皇帝之笔法珠玑，拔出群类，人人耳其诗，目其笔，皆将欣跃叹美之，抑亦庶使贪黷珍宝者或有省焉。顾不韪欤？予深有志推慕此者，特才行拂逮耳。故不辞，述此赞于卷末云。

时宣德元年季冬月上澣之吉，赐进士文林郎河南道监察御史，同邑松林余思宽书。

余思宽认为，天地之间的宝物，分为君子之宝和庸人之宝这两种。所谓庸人之宝，就是昆玉、南金、珍珠、锦绮这类物质的东西；而君子之宝，非文章、翰墨、遒劲、英华这类精神产品莫属。至于（詹驥）出身于科举，状元及第，从此进入官场，遇到了明君盛世，能够聆听皇上的德音，接受恩赐的墨宝，受到皇帝的褒赏荣宠，又能传给子孙后代，使子孙能传承祖先的美德，不亦可称为宝中之宝吗？我亲家侄儿辈士瑛和士诚视之若宝，又撰述使之显扬昭著。缙绅文士看见了无不吟诗作文来赞颂它（墨宝）。

我与詹家有姻亲关系，有一天，我到詹家登门拜访，（亲家）乃嘱咐我写点什么。我曾诟病世人整天忙忙碌碌，只是贪图利益，经不起诱惑，哪知转瞬之间，祸福相生，人生无常，好比齐景公有高车大马无数，死了以后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称颂的。石崇和王恺争豪斗富，如今平谷金泉恰好似浮云一般，又在哪里呢？

状元詹驥不以别物为宝，单单以皇上赐诗和这些文士题跋传给子孙。作为子孙，也都效仿祖先，小心珍重加以收藏，与天地一样久长，清声伟绩，千古高风。孝宗皇帝的御笔，字字珠玑，出类拔萃，人们争相吟诵其诗，观

赏其书，一边欣然欢跃，一边感叹羡慕，或许可使那些贪玩珍宝的人有所省悟，这难道有什么不对的吗？

我很有志向来推慕这件墨宝，只怕我才情学力不足罢了。故遵嘱，在墨宝卷尾写下这段话。

余思宽题跋中所说的“宝之若阿咸士瑛暨乡贡进士曰士诚”，据查《东源詹氏宗谱》，得知士瑛、士诚乃堂兄弟均属詹仪之这一支脉。祖父辈分别是詹原良、詹原善、詹原佑。原良有子允津，原善有子允庆、允贤，原佑有子允能、允福。士瑛名詹资壮，乃詹允福之子；士诚叫詹资信，乃詹允贤之子。此两人属余思宽亲家的侄儿辈，故称“阿咸”。

“詹氏墨宝”中，宋孝宗封赠詹仪之故父詹械的《詹械赠朝议大夫、夫人赠安人告身》，后面附有宣德甲寅（1434），詹仪之九世孙詹资信过录张栻的《詹至墓志铭》。

詹资信，字士诚，自号梅坡。永乐十五年（1417）举人，生于洪武庚午（1390）三月十二日，卒于正统元年（1436）四月四日。官承德郎、直隶镇江府通判，娶妻周氏，生一子曰文珊，二女，长适纯峰张行，次适儒洪监察御史濯公之子余昨。

翰林侍读罗万化与余乾贞是同科进士，他还是此榜的状元，受其所托，撰写了《明故广东按察司副使闲斋余公墓表》，内云：“（公）卒于宣德癸丑（1433）九月十六日，享年四十五，葬开化独山。”余思宽葬于开化独山，可能与他母亲有关，其母汪氏，乃开化包山人，宣德三年诰封太孺人。

我在《东源詹氏宗谱》中，还看到余思宽的一篇《梅坡记》，乃受詹资信托付所写，内云：

友人詹士诚家世宦族，襟怀磊落，倜傥不羁。总角时负笈游学，惟以读书吟诗尚人，予甚敬之，尝目其为名家千里驹也。性嗜梅，家之阳有胜地焉，

培立土壤，不杂以凡花卉，独树于其傍，构书堂为养贞之所，视之迥出尘俗，因号曰梅坡。以书来征予为之记。予方玩索间，客有过而问曰：“人禀天地之气以为生，所以具四端，备万善者，知觉虚灵，物无与比，今士诚以梅为之号，子欲记也云何？”予笑曰：“草木之生于天地间，殊未有不自春夏生长，秋冬凋零者；惟梅也，其乾坤闭塞，冰雪凝沍，凡草木将根枝僵结之不暇，乃独以雪骨冰魂之姿，预泄东君之信，贞坚特出，不斫繁华，其品类虽与草木同，其禀赋则与草木异。”故古人谓：“未论金鼎调羹事，且作百花头上魁。”则梅之异于凡卉也尚矣。士诚读书谈道，居余子之中，已抱鸿鹄之志，白眼看人刚态毅状，洁烈特出，乃卜筑托梅以自兴，岂不以梅为百花之魁？而士诚操节隐然，躡乎余子乎？若四端万善，则性分所固有者，梅其能增损也。夫士诚今日之志如此，会见青台之路黼黻。皇猷所谓“若作和羹，尔惟盐梅”。则今日之百花魁，其效验所著为何如哉？然则士诚以梅自号，其志深且远矣。客退遂书为记以复之。

永乐十二年甲午春月元日

大意说，朋友詹士诚乃官宦世家，胸怀坦荡，不拘小节，平时喜欢读书吟诗，我很敬重他，把他视为名门中的千里马。性格嗜好梅花，园子里别的花不种，只培植梅花，构建书屋于梅树旁，超尘脱俗，自号梅坡。他来信让我给写篇记文，我思虑之间，正好有客人过访看见，问我说：“人禀天地之气而生，之所以具备仁、义、礼、智四种德行，以及其他各种善行，因为他们能够知觉万物，感应虚灵，这是物所无法比拟的。现在士诚以梅自号，这篇记文如何表达呢？”

我笑说道：“草木生于天地之间，没有什么不是春夏生长，秋冬而凋零的，大概只有梅花是例外吧。天地闭塞成冬，冰雪覆盖大地，一切草木根枝冻结，自顾不暇，此时，唯有梅花傲雪绽放，独显冰魂之美姿，预报春天的

讯息，坚贞特出，不追求繁华，它的种类虽然与草木相同，但其禀赋与草木迥异。”

古人所谓：“调和五味承金鼎，百花未开我先开。”可见，梅花的品格远高于一般的花卉。士诚读书论道，在我们朋友中间，怀抱鸿鹄之志，冷眼看世事，刚态毅状，洁烈独立，选择与梅为邻，托物自兴，不就是视梅花为百花之魁吗？况且士诚的操守与气节，低调隐匿，完全碾压我们这些人吗？

如果仁、义、礼、智这些善行，乃人心所同然，吾性所固有的，以梅（坡）的能力则只会增加罢了。士诚今日能有如此志向，可以预见日后定然平步青云，高官显爵。帝王的谋略与教化所说的：“若要调和百味，盐咸、梅酸均是上佳的调品；以国而论亦然，同样需要贤才来治理。”那么，今天的百花之魁、日后的效验又会如何呢？既然士诚以梅自号，可见他的志向深远着哩。客人走后，于是书此记文回复士诚。

永乐十二年（1414），余思宽还没有参加会试，未中进士。我估计此时余家还未与詹家联姻，所以，他在记文中称詹士诚为“友人”，且赞赏有加，这是可以解释得通的。

余思宽到广东任职以后，由于疾病死于巡行潮州任上，可谓英年早逝。从始祖冲霄公迁居宋林，至余思宽已逾三百余年，文广传诸余镜，再传仕洪，续至余乾贞（四山），德业家风代不乏人，所谓国法家规、族有宗约，崇本敬祖，教化育人。窃以为，余思宽功莫大焉。

据民国《遂安县志》记载：“豸绣流光坊，旧儒学西，为副使余思宽、知县余乾亨、御史余乾贞建。”“龙章褒显坊，旧儒学东，为恩封御史余惟宾、余仕洪建。”前几年，央视直播水下古城狮城，潜水员探摸中发现了这两座牌坊，上面依稀可见“明隆庆二年（1568），遂安知县周恪建”的字样。历时已逾四百五十多年，至今依然保存完好。

从儒学西到儒学东，距离不算太远；从余惟宾到余乾贞，却跨越了祖

孙五代人。所谓“豸绣”，乃古代监察、执法官的补服，因上面绣有獬豸图案而得名。豸绣流光，龙章褒显，祖孙均得到朝廷的奖崇，立牌坊以示表彰，显亲扬名，流芳百世。这正是：

始迁宋林冲霄公，承上启下余思宽。

“诤者”徐鉴

淳安桑梓地，蜀阜人文藪。

若论淳安之文藪，我认为蜀阜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话题。蜀阜别称锦沙村，一个引人遐思、充满诗情画意的村子。走进村庄，顾望四周，单是看那些亭台楼阁的名字，你就能感觉出内敛而不失雅致的风格：观澜楼、胜概楼、望虹楼、三峡楼、万花草堂、东麓草堂、新安书屋、梓溪精舍、碧桃轩、竹月馆……

不唯如此，它还是徐震、徐贯、徐鉴、徐楚、徐应簧、徐廷杰、徐宪、徐汝圭、徐鹏程的家乡，这个村落单是朝廷敕立的牌坊就达十余座之多，有“青官少保坊”（徐震），有“勋阶极品坊”（徐贯），有“都宪坊”（徐贯），有“达尊坊”（徐楚），有“进士坊”（徐鉴），有“三代联芳坊”（徐楚、子徐应簧、孙徐鹏程），有“乔子联芳坊”（徐宪、徐汝圭），有“龙门坊”（徐淑）等。

这个美丽的村庄如今已沦为泽国，成为一段封藏的印记，我们也只能从《蜀阜文集》《蜀阜小志》等古籍中去钩沉发幽，追迹探源。

我徒慕其地，不可得而游。

聊以画笔开瀛洲，而今一识韩荆州。

这是明代画家沈石田应工部尚书徐贯所托，为《蜀阜十景歌》所作的配画诗。沈周虽然没有亲临蜀阜，但他对徐贯的家乡满怀向往，犹如笔下的瀛洲，亦诗亦画，亦隐亦真。诗中沈周把徐贯比为韩荆州，这是从李白诗中衍化而来的：“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”沈周遇到徐贯，好比李白遇到韩荆州。可见他们志趣相投，心气相通，他们纯属精神的契合，灵魂的交流。沈石田未必知道，在蜀阜像这样有趣的灵魂还有许多。

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叫徐鉴，字克明，号钝斋（新版《淳安县志》误为“纯斋”），淳安蜀阜人（今威坪）。他也是徐贯的从兄。徐鉴父亲叫徐礼，字士恭，号敬斋。生于洪武己巳年（1389）七月十三日，卒于正统丙寅（1446）十月一日，享年五十八岁。徐礼是家中的长子，有个弟弟叫徐震，也就是徐贯的父亲。

母亲王氏，马山王经仲之孙女。据徐鉴《先妣敕封太孺人墓志事实》云：“（母）自幼有淑德，善女红，最为父母钟爱，及笄归先君。”女子十五周岁称“及笄”，说王氏及笄那年嫁到徐家，擅长纺织、刺绣、缝纫等针线活，操持家务。

徐鉴的求学之路较为平坦，他的小学老师名叫方宗尚，多年后病逝，其子方敦找到徐鉴，让他给父母写篇墓志铭。徐鉴不能拒绝，就有了这篇《方处士宗尚翁偕孺人钱氏墓志》，徐鉴称方宗尚为处士，可见是一位有德才的隐士，不愿出仕为官。内中说：“垂髫时学于方氏之塾，则公之仪度器识，与夫行事知之颇详，义不容拂。”

长大后又拜师桐江姚先生。我们从他另一篇祭文：《祭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谥文敏姚先生文》，提到了自己另一段求学经历。他说：“自正统丁卯（1447）冬，拜先生于馆下受春秋业，循循善诱，纳于绳墨。”

姚先生是指姚夔，桐庐人，正统七年（1442）进士，与商辂是好友，历经英宗、代宗、宪宗三朝，官至一品，谥号“文敏”。徐鉴说“自正统丁卯冬，拜

先生于馆下受春秋业”。据我的推算，姚夔这期间应该是回桐庐老家省亲或是丁忧。

当我看到姚夔这个名字时，心生一种亲切感，二十年前我写《商辂传》时就查阅过他的资料，与商辂同朝为官，同为股肱之臣，更是意气相投的挚友。

姚夔不但学问醇厚而精深，为人也正直。商辂曾经评价说他：“器识宏伟，言论侃侃，立朝三十多年，忧国之心，老而弥坚，每当廷议，正色昌言，人皆敬服说。”徐鉴拜他为师算是找对了人，起点就高于旁人。难怪三年后的庚午一科（1450），“乡闈克捷”，中了举人。天顺四年（1460），会试再中进士，列二甲第二十八名。

次年，朝廷授徐鉴为南京户科给事中一职。威坪人的性格历来爽直，可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做官但求无愧于心。履职初期就开展调研工作，在此基础上，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，曰《计开》。

他在《计开》奏议中直陈六条：一曰崇圣德，要求皇帝“必先于垂戒，修德于己。君心之正，而天地心亦正，君之气顺，而天地之气亦顺……”并指出“圣明之君莫不有学，学无不至，德无不修”。可谓一腔正气，浑身是胆。二曰重守备，指名道姓抨击“守备太监王敏等严加修省，以谨天戒……”三曰诱直言，条陈广开言路之重要，若是“言辞过激，触犯天威，也宽厚待之”，堵塞言路，会导致“奸臣恣肆，生民休戚……前有谗言而不别，后有奸贼而不识”。其赤胆忠心，苍天可鉴！四曰饬群臣，要皇帝知人善任，列举了老衰和残疾之人，并一一指名道姓，说他们不堪任事，徒费朝廷重禄。五曰抚军士，“防奸御侮在于军”，一针见血指出“军风不正，克扣军饷，打虐欺辱士兵，使军心不稳。六曰“恤穷民”，“图治之道在乎安民”，他恳切提出：“连遭水旱，免缴赋税，伏愿皇上轸念黎民之苦……以苏民困……”

徐鉴无私无畏，摧枯拉朽，震人耳目。他不去顾及官场潜规则，不去顾

及开罪同事臣僚，不去顾及人情世故，不去顾及别人异样的眼神。凡有利于国家社稷，有话尽管直说无妨。

奏疏言辞恳切，一如徐鉴之为人。英宗皇帝是经历过磨难的人，身上颇有故事。“土木堡之变”做了瓦剌的俘虏，回国后又长期居于冷宫，再用武力夺取皇位，改年号为天顺。经事多了，洞悉人性，对人对事自然变得更宽容，能听进不同意见。英宗没有责备徐鉴，反将本下发内阁会议，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。这无疑是对徐鉴的鼓励。

天顺八年正月十六日（1464年2月23日），英宗驾崩，长子朱见深继位，是为宪宗，时年十八岁，改明年为成化元年。

据徐鉴《祭敕封太孺人先妣王氏哀辞》云：

成化改元，朝廷推恩封为太孺人。鉴继擢江右（江西），得便归省者三……去冬，母染微疾，鉴侍汤药。顾谓之曰：“此乃老年常事，幸亦安可，汝慎勿忧，汝为国家臣子，当任国家政事。勿以私恩而久稽公义，汝可行。”强之不已，竟承命而往。逾两月而讣音至矣。呜呼哀哉！享寿八十，子男五，孙十有二。

徐鉴母亲王氏，享寿八十岁。有五个儿子，孙子十二个。

从上述文字可推知，徐鉴由户科给事中一职擢升为江西左参议的时间，是在成化初年。

我们在《徐钝斋文集》中，找到了他在江西任上的一些诗词，其中有《赣州驻马》：

一到双溪道路清，解鞍似觉马蹄轻。

试将休戚频频问，尽道讴歌诵圣明。

徐鉴说来到江西双溪这个地方，觉得道路整洁，解鞍下马后觉得人很轻松，马蹄声似乎也轻快许多。我试着询问当地老百姓有啥欢乐和忧愁，都说当今天子圣明。

还有如《庐陵思亲》《泰和江上》等诗。

庐陵是如今的吉安，也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家乡。

一路浏览翻阅文集，我被其中《经惶恐滩有感》一诗吸引，徐鉴巧借眼前之景，直抒胸臆：

路经惶恐忆忠臣，堪叹南朝事变更。

惫矣巨奸输拙计，挺然一介奋忠贞。

乾坤万古凝精爽，滩水终年作泣声。

遥想从容歌正气，稜稜节概尚如生。

徐鉴这首诗是他经过惶恐滩所写，惶恐滩是赣江十八滩之一，十八滩可谓滩滩都是鬼门关，号称“十船经过九船翻，一船虽过吓破胆”。十八滩最为险要的，就数惶恐滩。它与黄河三门峡、长江三峡，并称中国三大险滩。

提到“惶恐滩”，我们自然想起文天祥的那首《过零丁洋》：“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意思说惶恐滩的惨败让我至今依然惶恐，可叹我零丁洋里身陷元虏，自此孤苦无依。自古以来，人终不免一死，倘若能为国尽忠，死后仍可光照千秋，青史留名。

徐鉴是明天顺四年（1460）进士，早在四年前的景泰七年（1456）九月，文天祥被代宗追封谥号为“忠烈”。虽然距离文天祥去世已有一百七十余年，但他的民族气节得到广泛的认同，仍然光照千秋。徐鉴这次经过惶恐

滩也不由追忆文天祥这样的忠臣，遥想他在狱中从容所作的正气歌，更是感慨万千，那种稜稜气节如在眼前一般。

徐鉴在江西时间不久，“寻任广东左参议”。

明代布政使下设左、右参议，分守各道，主要分管粮储、屯田、清军、驿传、水利等事。

当时的广东并非经济发达、文化繁荣、令人羡慕的地方，由于天高皇帝远，统治的触角难以抵达，加之海岸线漫长，这里是倭寇海盗盛行的地方。

徐鉴到任后虽在语言、气候、饮食各方面都有些不习惯，但仍坚持走基层，这一点与他兄弟徐贯倒有几分相像。徐鉴刚一上任，便跑了十一府几十个州县，掌握了当地的第一手动态信息。

成化五年（1469）三月，他来到潮汕的南澳岛、长沙尾、牛田洋等地，乔装易服，甚至与海盗有了近距离的接触。

俗话说：“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”沿海百姓视海为田，以舶为家，生活都与海事有关，据明代章潢《图书编·广东图叙》记载：“广东古百粤之地，盖五岭之外，号为乐土，由雄、连可以向荆、吴，由惠、潮可以制闽越，由高、廉可以控交桂，而形胜亦寓焉。滨海一带，岛夷之国虽时时出没，其志在贸易非盗边也。然诸郡之民，恃山海之利，四体不勤，惟务剽掠，有力则私通番舶，无事则挺身为盗。”百姓把海盗当成了一种职业。

明朝政府实施海禁，对于民间贸易、走私等，处罚力度很大，章潢《图书编》曰：“为倭向导者，官府击其家属，不敢生还，岁岁入寇。是外寇之来皆由内寇纠引之也。”

拿南澳岛来说，宋代以来就是海盗聚众泊船之据点。明朝初年，民间贸易被一刀切掉，引起老百姓不满。南澳岛属于“三不管”地界，且孤悬大海之中，官府担心岛民作乱，将原住民迁往大陆，“遂虚其地，粮因空悬。”

结果南澳岛反而成为海盗的一个巢穴。

徐鉴在一次与渔民的交谈中，大受启发。他自称是收购珍珠的江浙商人，担忧走海路遇到海盗，叹气道：“官府怎么就不派兵围剿呢？”渔民笑道：“谈何容易。官府在明处，海盗在暗处，官兵一动他便知晓，怕连海盗的影子都见不到，如何剿灭他？”

徐鉴被问一时答不上话。渔民复道：“海盗脸上没有刻字，出海劫掠才是盗，回港渔业又是民。你看我是盗是民？”徐鉴听罢一惊，不动声色道：“听说海盗头目姓袁？”渔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徐鉴，道：“是叫袁天鼠，你还懂得不少哩。”徐鉴道：“怕不是真名吧？”渔民诡异一笑，道：“人又不傻，为躲避官府追捕，大小头目都有外号，也是惯常的做法。”

擒贼先擒王。徐鉴内心顿时有了主意，他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些年袁天鼠手上一定有不少的浮财，如若我出银子将其买下，他派人护送我的商船顺利返乡，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停罢，摇摇头道：“我一个外乡人，哪里寻得袁天鼠去？”渔民将信将疑，问道：“客官果有此意，我倒乐意成全。只是……”徐鉴会意，袖出一锭纹银，递给渔民手中，拱一拱手，语颇诚恳道：“不叫你白辛苦，我暂住祥云客栈，届时可领袁天鼠上那里寻我商议。”

两人约好见面时间，各自散归。

徐鉴来的时候只带了几名探子，专为摸清海盗门路而来，此番诱捕袁天鼠完全是临时起意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诱惑足够大，身为海盗的袁天鼠自然无法抗拒。徐鉴赌得就是这份胜算。他遣一亲随作速报于潮州知府，调集府衙捕快，埋伏于客栈外围，以防袁天鼠走脱。

一晃到了约定的日期，徐鉴让客栈整备酒席，专待客人上门。

且说那渔民本身也是海盗成员，与袁天鼠还是同村人，岂有不熟的道理。徐鉴前脚刚走，他后脚就乘一小舟，直奔大海深处一艘大船而去，这是袁天鼠的老巢，平日他不在渔村落脚，吃睡通在大船上，官军若来，他说

走就走。官军拿他毫无办法。

待渔民上船见了袁天鼠，告知其原委。袁天鼠喜不自胜，大笑道：“正愁着满船的东西如何变现，他倒送上门来了。护他江浙商船返乡，这有何难？”转而狐疑道：“不会是官府暗探吧？”渔民拍着胸脯道：“外乡人，满口江浙口音，出手好叻大方，住在祥云客栈。”袁天鼠不再有疑，决定赴约面谈。

客栈伙计引着袁天鼠一行入内，徐鉴迎上前去延席入座，添酒加菜，推杯换盏起来。袁天鼠起初还有些戒备之心，看徐鉴边饮酒边交谈，神态自若，暗道自己多心。他自恃文韬武略不输于人，席间借助酒兴与徐鉴天文地理，说古论今，想在徐鉴面前卖弄一番。没想到徐鉴有问必答，事事精妙，如数家珍，说得兴起反而诘难于他，一时间大为佩服，连呼“可惜”。

徐鉴问他“可惜什么？”袁天鼠晃着脑袋说：“你有这等才学，不去科考做官可惜了！”徐鉴立身而起，冷笑道：“可惜的是你，与官府作对，劫掠为盗，误入歧途不自知。”言毕，一掷酒杯，喝道：“来人啊，给我拿下。”袁天鼠尚无反应过来，捕快一拥而入，将一干人等尽数绑了送官。

徐鉴兵不血刃，杯酒之间擒获海盗头目，真正大快人心。袁天鼠按律伏诛，其余部众遣散不提。

身为朝廷命官，忠孝自古不能两全。徐鉴的苦衷只有他自己知道。父亲去世二十多年，尸骨一直没有入土，成为他的一块心病。据徐鉴《祭敕赠户科给事中先考宁五府君哀辞》中云：

呜呼，父之存日，诸孤煦煦，今焉孙枝繁秀，兄之一子一孙，孤之四男一女，弟钰之子三，璠之子二，钊之子一。况我母亲康强，兄弟俱力同心……自吾父背弃，历今二十五载，而弗克葬者，惑于风水之故，乃诸孤之不孝，实吾父平昔之所虑也。滔天之咎，安可逃（逃）乎？藉我叔父，念此手

足，卜地横村，可以安厝。我之兄弟，涓此良辰，启请灵车，执紼介行。孤靡仕途，弗克扶柩，远在千里，含哀莫诉。呜呼痛哉，孤之于父，生不能养，死不得见，葬弗克送。乌用子为哉，不孝之罪安可逃耶？呜呼痛哉！

这篇悼文写于他父亲去世二十五年后，也是他智擒海盗头目袁天鼠的第二年，即成化庚寅年(1470)。

徐鉴泣说：“不孝之罪安可逃耶？”我们仿佛听到他那一声撕心裂肺的抢呼：“呜呼痛哉！”

为国尽忠却不能为家尽孝。

关于“孝”的话题，历来是儒家人伦观的核心。

孟子认为，世俗所谓的不孝有五种情况：“惰其四支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一不孝也。”说儿女四体不勤，性情懒惰，不去赡养父母，这是第一种不孝。“博弈好饮酒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二不孝也。”儿女酗酒聚赌，不去赡养父母，这是第二种不孝。“好货财，私妻子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三不孝也。”儿女贪吝钱财，只顾老婆孩子，不去赡养父母，这是第三种不孝。“从耳目之欲，以为父母戮，四不孝也。”放纵声色享受，使父母感到羞辱，这是第四种不孝。“好勇斗狠，以危父母，五不孝也。”逞勇好斗，连累父母，这是第五种不孝。

是人皆有父母，父母也都会老去，子女如何对待父母，今古同理，无可回避，但具体考量的标准却有宽严的区分。现今生活流行所谓“论心”“论迹”之说：“百善孝为先，论心不论迹，论迹寒门无孝子。”

徐鉴耿耿于怀的是：“生不能养，死不得见，葬弗克送。”父亲死得早，“丙寅之岁(1446)，旅邸倾逝”。因为猝死在钱塘(杭州)，当时没有来得及见上一面，如今间隔二十五年下葬之时，自己又远在广东，不能为父亲送葬，他不能原谅自己，悲痛欲绝。加上他在广东这几年，水土不服，积劳成疾，病体日沉。次年，他致仕归乡，回到了人文渊藪的蜀阜，声名却留在那

八荒之外的广东。不久卒于家。

据光绪版《淳安县志》载：“广东参议徐鉴墓在县西七十里赤石岭南石坞。”

“良御史”应颢

淳安应氏之寥落，是新安江水库筑坝蓄水，大移民之后才开始的。

翻开《淳安姓氏》一书，一千人以上的大姓有四十九个，应氏不在其中。我只在书的末尾“姓氏人口统计表”中，找到“应氏”一栏，排名六十八位，人口仅五百余人。

这样的落差未免太大。

当年的应氏曾经是那么发达辉煌，老城贺城有所谓“应半城”的说法，佐证了“应氏”为贺城大姓。古代贺城以县前街为中心，分为城东和城西两部分。城西一半多为应姓居住地，这里不乏簪缨世家，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应颢，便出生在城西“官贤里”的应家大院。

“应氏宗祠”就位于应家堪下，是城内数一数二的大祠堂。每年族中举行祭祖典仪，祠堂是最热闹的地方。父亲应惟善，领着应颢给祖宗祭拜上香，完了就会指着先祖的牌位，告诉他这是任职淳安知县的应氏始祖，名叫应与权，因为孝敬双亲，不愿意入仕；于是，宁宗皇帝特授他为淳安县令，方便他给双亲尽孝。

应惟善不无期许地看着儿子，深情嘱咐：“先祖是位好官，勤廉恕，修学校，课农桑，老百姓皆敬之爱之。”应颢似懂非懂地听着，门外小伙伴正招呼他去玩哩。

偌大的祠堂庭院中，小伙伴围绕着旗杆石追逐玩耍，应颢和大家一起，一边嬉闹，一边唱念道：“你拍一我拍一，旗杆一立喜报来；你拍二我拍二，来年二试耀门楣；你拍三我拍三……”这便是他儿时关于祭祖与中举的全部记忆。

父亲对儿子督责甚严，绝不容他在功课上偷懒耍滑。在诗书熏染之下，应颢文气充盈，加之年少气盛，步幅大开，老街的青石板路，在他脚下已显得逼仄，他时欲出城，来到新安江畔，想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极目远眺，群山绵延，唯见山峦深处有一排大雁，渐飞渐远，终隐于天际……

时间来到大明正统十年(1445)，英宗皇帝开科取士。淳安县与应颢同时进京赶考的，还有商家源的商辂，即后来的三元宰相。

我查了乙丑科进士榜单，应颢位列二甲第四十四名，这一科共录取进士一百五十人。此榜的状元便是商辂。

应颢的名次相当出色，合该是应了那句话：“我本够优秀，奈何更有优秀人”，他被商辂的状元声誉，隐没在世俗的风评中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。

跻身士大夫行列，初授监察御史。弹劾建言，分道负责，对各省(道)官员进行巡视监督，类似现在中纪委下派地方的纪检官员。发现问题直接向皇帝反映，建言献策。

他监临的第一站是巡按福建，时正统十四年(1449)四月。巡按任期为一年，需要巡遍所有的府县。应颢选择先到福建东北部的宁德县(现在的周宁县)，原因是这里多年不太平。

福建地区是全国重要的产银区，境内分布大大小小银矿几十座。早在宋代就有关于银矿开采和冶炼的记载，宁德县境内的宝丰银场和蕉城区的黄柏银场，被称为“明代六大官办银场之一”。据《明实录》所载，浙、闽两省岁课银两总额，至正统九年(1444)，已超全国的百分之九十。

近年来，银场更是爆发了多起矿工起义，波及浙、闽、赣三省，震动朝野。

巡按御史俗称“按院”，是代天子巡狩的钦差大臣，手中直接握有地方官的官帽。大事需要奏报朝廷，小事立马可以裁决。别说县令、知府，就算巡抚大人照样可以与之分庭抗礼。

接待他们的是县里的主簿，应颢从四抬轿子上刚落脚，他的随从倒先开了腔，面对主簿，不无讥讽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你们县太爷怎么自己不来接驾？”

主簿向应颢拱一拱手，回道：“稟按院大人，本县县尊、县丞到山里剿匪去了。”略顿一顿，有些郁闷道：“这两年叶宗留、邓茂七一干贼匪带头作乱，四处劫掠，为害一方；搞得境无宁日，还望大人海涵。”

应颢摆摆手，道：“公务要紧。你且带我到银场看看。”主簿连连摇头，忙不迭回道：“银场地僻路峭，恐生事变。按院大人暂回公馆歇息，待县尊回来好给大人接风。”

应颢执意欲往银场，主簿只能备马，陪同前往。

一路走走停停，应颢对银场情况也知晓七七八八。

主簿嘴里说的“叶宗留、邓茂七一干贼匪”，就是宝丰银场带领矿工起义者。叶宗留是浙江庆元人，曾因私自盗矿被罚充处州（丽水）府皂隶，此人长期习武，凡事爱打抱不平，对自己的境遇早已不满。闲时与处州人叶希八、陈善恭等人密谋，欲图大事。正统九年他纠结数百人，流窜到福建宁德、福安一带银场，伺机行事。

宁德、福安与浙江处州相邻，这里早期留有许多银坑，明代初期，尚允许民间私自开采银矿，只要课税就行。到宣德年间开始，自朝廷设立官局，便严禁老百姓私采，甚至派兵封禁，有了“私煎银矿罪”。特别是浙、闽、赣三省军民，私煎银矿会被处以极刑，全家发配充军，处罚力度十分严苛。

叶宗留早年有开采银矿的经验，知道矿工的需求，也知道他们遭受工头、太监盘剥的苦楚，他组织当地矿工上千人，仗着人多势众，公然喊出了

“听我采取，不听杀人”的口号，不把官军放在眼里。地方官府据实奏报朝廷，明廷派浙、闽两省官军大力搜捕。叶宗留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私自铸造武器，据守险要山川，与官军对抗。叶宗留懂得不少的兵法，时不时与官军捉起迷藏，如若官军人多，打不过时，官军“东剿则西走，南搜则北移”。地形有利就主动出击，不利则设伏杀伤官军。兜兜转转三四年间，因剿匪不利而丢官丧命的朝廷官员就有好几个。

到了正统十三年(1448)二月间，这边叶宗留矿工起义没有平息下去，那边邓茂七在沙县陈山寨又领导佃户起义响应。杀县官、劫富户，自称“铲平王”，意欲铲除天下之不平。一时间，尤溪蒋福成带领万余炉丁(打铁工人)和农民声援。形成了一股洪流，在浙、闽大地奔腾咆哮。

正统十四年(1449)二月，明英宗闻报震怒，不禁大动干戈，诏命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，保定伯梁瑶、平江伯陈豫为副将军，都督同知范雄、都督签事董兴为左右参将，刑部尚书金濂参赞军务，太监曹吉祥、王瑾、陈梧监军，统率京营和江浙兵四万余人，配备神机铳、炮火器等，入闽征剿。至五月间，明军基本将叶、邓起义平息。叶宗留、邓茂七皆战死，邓茂七压寨夫人廖氏去向不明。余部则由叶希八等人率领，辗转于浙、闽山区，时而剽掠，时而隐遁。

应颢在主簿陪同下，巡视了几处银场，果然山势峻嵬，道险而狭，有时还得下马步行。一行人回到县衙，裴县令早已恭候多时。彼此行礼问安过后，县令道：“这次进山让林开三这贼脱逃了，只逮住几个喽啰。”一副沮丧的表情。在裴县令看来，这次本是一个绝佳的机会，抓住林贼可以在按院大人面前邀功，待奏到皇上跟前，指不定官升一级哩。

应颢巡按福建，恰好在平乱之际。原来主簿说县尊、县丞进山剿匪，其实剿的不是叶宗留、邓茂七之匪，而是追剿乘乱盗窃银矿的林开三之盗匪。

县令姓裴，正统丁卯年(1447)任宁德知县，也是想要有所作为，自然

无可非议。

应颢问道：“这林开三毕竟什么来路？”

裴县令回道：“林开三乃本县黄埔村人，长期在外流窜作案，此番纠集处州巨盗，对宁德银场进行了一场洗劫，幸亏监军发现及时，银场损失不大，只被他遁走山林。”

应颢听罢，沉吟再三，寻思道，我观宁德银场纠纷盘互，不逞之徒，若居洞穴之间，内可以聚糗粮，下可以设弓弩，官军难扑灭，地方不敢问。这裴知县看来是个实诚的人，倒可以帮他一帮。遂说道：“前日林贼未得如愿，终不会甘心。他一个惯犯胆大妄为，绝不会就此罢手。你放出风去，就说明日亲送巡按出境，届时，我调官军预伏，张网以待。”

裴县令拱手相谢道：“多谢按院大人援手，裴某遵嘱，这便布置下去。”

次日一早，县公馆门口巡按、县令依次上了绿呢大轿，仪仗摆开，宁德县衙役在前面开道，手擎虎头牌，上书“回避”两字，后面跟着一班随从护卫。只见飘飘扬扬的几面旗帜上书“福建巡按”“钦差出巡”“宁德县衙”等字样，一路鸣锣开道，招摇过市，出城而去。

且说林开三遣去的探子来报，说县老爷恭送钦差大人已出了城门，今夜是回不到署衙了。林开三果然纠集残余部众，乘着夜色袭取银场，杀了一个回马枪。

此番入我彀中，料你插翅难逃。

但闻一声铙响，四周火把齐明，应颢调集的官军一齐杀出，将一伙盗贼围在银场谷中，弓弩刀剑，一通厮杀下来，检点人数，尚有数十人被擒获。盗贼头目林开三身中乱箭受伤，终未能逃脱。遂用枷锁了，押往县衙大牢候审。

宁德县去除了这块毒瘤，裴知县大为宽心，特设庆功宴诚邀应巡按赏脸，一起商议会审林开三的具体事由。应颢将话题岔开，举杯笑道：“来，来，

来，今日只管痛饮，酒桌上不议公事。”

“对。”裴知县起身端起酒杯，附和道，“莫谈公事，莫谈公事。不要让那林贼搅了雅兴。”

席散回到公馆歇息。次日一早，应颢开具巡按牌票，用了关防，调阅宁德县卷宗，履行他巡按的职责，开始复核过往案卷的判决，查看是否存在冤屈枉纵现象。应颢有意回避林开三盗案会审，是欲将这场功劳记在裴知县名下。

裴知县经对林开三的审理，意外查获叶希八残部，以及邓茂七那位压寨夫人廖氏的踪迹，与沙县官军联手，一举荡平了陈山寨，廖氏伏诛。

应颢巡按福建，不辱使命，为此“朝廷赐彩段宝钞，进秩从六品”。景泰四年（1453），他又应诏巡按苏松，恰逢水患，应颢组织当地官员士绅，赈济饥民，救活甚众。次年八月，擢升南京大理寺丞。

我在《商文毅公文集》中，看到商辂写的一篇《赠大理丞应文明序》，这篇文章是在应颢巡按福建、苏松之后，朝廷任命他为南京大理寺丞，商辂为他送行时所写，内云：

淳安应氏为邑著姓，文明，予同年进士中翹然者，其为御史按闽中，闽中人无老稚贵贱，皆啧啧称道，曰：“良御史，良御史。”至于今犹不释口。盖其心术纯正，外无欲而中有主，弗为赫赫之威而吏无不惧，弗要煦煦之誉而民无不服，其见称于人以此。继复按东吴，吴俗尚势利，多诉讼，文明裁断如流，人咸称快。未几，强者慑，弱者立，方翕然顺令，而文明以功拜南京大理丞，受代日，民遮道欲留，弗可，皆唏嘘而去。其敬慕于人，盖随所至皆然。

应颢字文明。商辂说他是同年进士里面的翹然者，非常出色，令人追慕。作为御史他巡按福建，八闽中人无论老少贵贱，都交口称赞他为好御

史。至今谈起他来，仍然如此。大概是因为他心术纯正，外表看去无私无欲，内心却很有主见，虽无那种赫赫的官威，但地方官吏见了能感受那种威严，尽管不去标榜仁爱春风，老百姓无不衷心服膺。知与行合一，人与名相称。后巡按东吴（苏松），吴地民风势利，爱打官司，应颢得心应手，裁决如流，老百姓很满意。去不久，强悍的人懂得敬畏，柔弱的人找到自信。地方安宁和顺、政令畅通。应颢因为政绩突出，官拜南京大理寺丞，告别之日，苏松百姓皆拦阻应颢，不让他离开，一个个掩面哭泣，唏嘘再三。他每到一地，都这样受人尊敬仰慕。

这是商辂对应颢的评价，也是老百姓真实情感的流露。

监察御史虽说权力很大，但官阶不高，是正七品官，大理寺丞则属正六品。朝廷应该是看到了应颢的能力和功绩。

新版《淳安县志》关于应颢的条目，也就三百余字，说他“成化二年（1466），荐升湖广按察司僉事。总兵李雪、巡抚罗篿知颢之才，命治平溪清浪卫。应颢即选调官军，征勦靖州黄强苗寇。事竣，都御史项忠复遣应颢去平荆襄流民之乱，颢恩威并施，功劳尤著，又升福建按察司副使，巡视海道。时漳州贼林辉英乘机聚众下海为乱，颢遣官军赉榜晓谕，林之部众擒辉英以献。既而，龙溪贼钱有定五十余人劫掠蒜岭驿官，应颢又命巡海官军督悉就擒。应颢戎马倥偬，屡建功勋，升布政使司左参政。后以疾归，卒于家”。

从上述履历来看，应颢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参与擒贼、平乱，不是在福建就是在湖广。从他首站巡按福建宁德开始，就展露了卓越的军事才能。也难怪我没有找到其相关著述，就连诗词也极为罕见。一生戎马倥偬，南征北伐，根本无暇静心著述吧。

明代官员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那就是文官带兵打仗，而且极为普遍。拿淳安籍官员来说，有明一朝如周瑄、徐鉴、项文曜、应颢、方汉、宋旻、吴倬、徐贯、胡拱辰、吴钦、徐楚、吴一栻、方学龙、汪乔年、章可试、吴希哲等。

他们或参与擒贼、捕盗、剿匪等保境安民的武将职能，或参与平乱、抗倭、御外等残酷血腥的战争，但他们的身份始终是一介文官，他们是如何做到“文以经邦，武以定乱”的呢？

我想，战争不但是体力的比拼，更是一场智力的较量。如果自己不亲历战阵，靠误打误撞取得胜利，是绝无可能的。

明代科举制度已经有了预设，朱元璋自己打天下，知道武学的重要性。洪武二年（1369）十月二十五日，左丞相宣国公钦奉圣旨：“今后立学设科，分教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恁每定拟来该学校合行的勾当，教秀才每用心讲究着行。钦此。”于是，各学官都把这道圣旨刻在石碑上，遵照执行。

各省生员在乡试时，还可以要求加试射箭，若成绩优秀则单独造册，作为加分项。府州县学也在课程设置中，注重学生射艺的培养，即德智体全面发展。以王阳明为例，他从小熟读兵书，更勤练射艺。只是他为人低调，从不张扬，外人不知道而已。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后，遭到京军武将的公然挑衅，要与他比试射箭，想让他当众出丑。王阳明胸有成竹，更不多语，只见他弯弓搭箭，三发连射，皆中靶心，一时间四众惊服，赢得满场喝彩。

淳安的汪乔年也是这样。他每每于衙门退归之时，去野外骑马奔跑，练习弓箭和击刺，并常常在风露藁木中夜宿，刻意进行野外生存训练，用以锻炼自己的意志，随时准备报效国家。直到他出任三边总督，带领千军万马之时，平日那些习练且都有了用武之处。

应颢与他们还有些不同，从他宦宦生涯监察御史开始，就参与擒贼捕盗，除了在南京任大理寺丞几年外，一直到他致仕归家，始终没有离开过战场，不是去擒贼就是在去平乱的路上，净干些职业武将的活，可谓戎马倥偬一文官。

应颢生卒年不详，我多方搜求《应氏宗谱》不得，只能暂且存疑。

贺城百姓为纪念他，将其列入乡贤祠，朝廷还在贺城应氏居住地“官贤里”，下旨建造“簪缨奕世坊”“世英坊”“联芳坊”以示表彰。应颢之父惟善封御史，从父惟贤封光禄署丞，其从弟应瑛、应颢均为朝廷命官。

应颢回乡后，在县南南山下，创建南山书院，回馈家乡。

“三元宰相”商辂

明成化二年(1466)十二月的一天,淳安里商的深洞岭畔,彤云密布,天空纷纷扬扬正下着一场瑞雪。从岭上望去,云气低迷,四野难分,山石树木都不见了痕迹,一片白茫茫的世界。

一位刚过天命之年的老者,葛巾布袍,此刻正端坐在岭畔的“仙居书院”讲经衡文。岭下一声马嘶打破了这里的宁静,随后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踏雪而来,直奔书院门前,只见从马背上飞跃而下一位官差,高声宣示道:“致仕臣商辂听旨。”

老者听宣,赶紧吩咐弟子排设香案,即于坐间跪伏接旨。传宣官抖开黄包袱,执旨在手,高声宣读道:

致仕臣商辂,性资刚直,操履端方。天顺间为奸党所构,罹毁去职,韬光赋闲。先帝已知其枉,朕亦感其忠荃之心,四海仰其文学,内阁资以经纶。旨下之日,着即来京,诏复旧职,辅君行道,谋猷入告。钦此。

老者谢了圣恩,立身起来,当即步出庭院。天空中飞飞扬扬仍飘着雪花,北风吹撩着他的布袍,他浑然未觉,两眼看定庭院中那株红梅,在寒风中正傲雪怒放,显得分外的清艳。他只觉心潮起伏,胸中一段豪气涌将上

来,当即口占一绝:

玉骨冰肌不染尘,雪霜深处倍精神。

莫言岁晚无生意,南北枝头总是春。

借眼前怒放的寒梅,寄寓自己的一腔傲岸骨气,诗人对复出山林,充满了信心。这位老者便是历任英宗、代宗、宪宗的三朝重臣——商辂。

商辂(1414—1486),字弘载,号素庵,淳安里商人。他在科举会考中,连中“三元”(解元、会元、状元),成为明朝历史上唯一连中“三元”者。金榜题名,这对古代士子来说,好比成仙登天,梦寐以求。商辂三十二岁便一步登天,四年后又跨入了最高权力机关——内阁,掌控着全国的军政要务。

明朝有五位祸国的大太监,他们是王振、曹吉祥、汪直、刘瑾和魏忠贤,与商辂同朝的便有王振、曹吉祥和汪直。

商辂在英宗、代宗、宪宗三朝与这三个大太监同朝共事,历经三大事变,即土木堡之变、夺门之变、鼓妖之变。他每天立于危墙之下,肩负着无比沉重的社会责任,却用自己人格的魅力和感召力,影响着事件的走向,恪守忠君爱民的人生信条。

若是选择一个字来概括,我觉得商辂是“恕”。“恕”是以仁爱之心去待人,不计较别人的过失,能宽恕体恤别人。处世风格如春风拂面,润物无声,即如老百姓口中所说:“宰相肚里能撑船。”

土木堡之变

任何历史事件,在看似偶然的背后,都是一种必然。

回顾历史,我们称之为“北方蛮族”的,有匈奴、突厥、契丹、乌桓、鲜卑、

女真、瓦剌、蒙古等游牧民族。因为气候变迁、生产力低下、资源匮乏、尚武好斗等因素，他们始终觊觎着中原。自汉武帝大帝征匈奴开始，到明英宗土木堡之战，一千三百多年来，他们侵扰和劫掠中原从未间断过，据《中国王朝战争年表》统计，这种侵袭与劫掠，平均每十年有二点五次。

土木堡之变看似偶然，因为王振削减马价，赏赐物品价值远超贡品价值，致使以往“薄来厚往”政策没有兑现。也先以此为借口，挑起了战争。国与国之间，没有所谓的长治久安，只有实力的此消彼长。其时正逢也先势头渐旺，野心勃发。在他父亲脱欢统一了蒙古东部地区后，也先于英宗正统四年（1439），成为瓦剌首领，继而又征服了女真，势力延及朝鲜北境。瓦剌的综合国力处在鼎盛时期。

正统十四年（1449）七月十五日。也先兵分四路，一路由兀良哈部袭取辽东，一路派别将进攻甘州，一路由阿剌知院直趋宣府，围赤城。也先亲率一部，旄纛高张，杀奔大同而来。行至猫儿庄，参将吴浩率兵阻挡，战死阵前。西宁侯宋瑛、武进侯朱冕率兵来援，皆力竭而亡。也先势如破竹，兵锋所至，困杨洪于花马池，逼朱谦于瓦子关，败顾兴祖于独石，追石亨于雁门关。短短时间，大同、宣府诸城纷纷失陷。西北边境，烽烟顿起。

英宗时年二十三岁，未经战阵，他问计于王振。王振撻掇英宗道：“我国朝天下，自马上得之，太祖太宗均亲征百战，而今陛下春秋鼎盛，何不上法祖宗，御驾亲征，慑服化外，使天威远扬呢？”

王振比英宗大三十多岁，英宗从小就称他为“先生”，愿意听信于他，也有点依赖于他，可以说王振对英宗具有个人支配能力。

英宗被王振说动了，自言道：“朕自登基十余载，尚无战阵之功，此番抚军北地，倘若一举荡平寇贼，上可告列祖列宗之先灵，下可垂万古英名于青史。”于是天颜一振，即谕令百官，下诏亲征。

商辂在翰林院，闻旨亲征，惊骇不已，连忙赶到午门执章候谏。不一

时，满朝文武三三两两皆聚集午门，谏阻圣驾亲征。商辂忧心忡忡对众官道：“皇上亲征，非比寻常。我等臣子不足惜虑，圣上身系天下安危，乘舆若有不测，则伤及社稷。”

商辂的话音未落，忽闻“嗥嗥”一阵马蹄声疾速而来，众人寻声望去，不是别人，却是王太监。

王振勒着马头，高声问道：“各位官员，你们齐聚午门，意欲何为？”

商辂朗声应道：“我等一意同心，为社稷皇上计虑，谏止圣驾，万不可仓促亲征。”

王振听言颇有冲撞之意，放眼望去，欲待发威，认得是状元郎商辂，便责问道：“亲征之事，自古皆有。商学士岂不闻澶渊之战，真宗亲征契丹的故事？”

商辂当即回驳道：“王公公可知势异时移、古今有别的道理？澶渊之战怎可与眼下相提并论？真宗亲征乃情势所迫，不得已之举，正所谓‘抗兵相加，哀者必胜’。且契丹主将萧挾览甫至澶州，即中宋军伏弩身亡，挫他锐力之气。然真宗城下乞和，岁输币帛数以万计以求和宁，春秋耻之。我朝安可效法？而今贼势嚣张，皇上亲征，三营俱行，六师皆动，京师不免空虚，倘有急变，如何抵御？”

王振无语可回，怒羞道：“此乃皇上旨意，谁敢忤逆圣旨，抗命不从！”声色俱厉，说完拨转马头回宫。

不久从宫中传出旨意，晓谕百官：“朕意已决，不得再谏，众官请回。”

七月十七日，英宗统领三营六师五十万人，仓促出征。大军一路西行，出居庸关，次宣府、次鸡鸣山、次阳和，沿途风雨交加，前方败报频传，六军丧气，情绪低落。一路走走停停，至八月十三日驻蹕雷家站。瓦剌军偷袭明军断后部队，恭顺侯吴克忠、都督吴克勤率兵回击，陷阵战死。成国公朱勇领兵五万驰援，追击五十多里，到一个名叫鹞儿岭的地方中了也先的埋伏，

全军覆没。

消息传来，三营俱惊。兵部尚书邝野、学士曹鼐闻此凶讯，急忙到行殿面奏英宗，恳请圣驾入关，不可躁进。王振得知，把他两人传到跟前，叱道：“尔等腐儒但知守常，安可妄言兵事。”喝令左右，将两人推入草莽之中，罚跪一日。

王振欲偕英宗起驾，门人忽报郭敬在帐外候见。郭敬乃大同镇守太监，是王振的亲信。郭敬在战事之前，就有通敌嫌疑，他岁造箭镞数十瓮，以王振命遣送瓦剌，换取财物。王振将他迎入帐中，待听了郭敬密报，始信也先悍鸷无比，不免心惊胆战。仓促之间决定退兵。

时值八月中旬，暑热未消，士卒匆促拔营，连日行军，汗尘蒙甲冑，饥渴添疲乏。日色将晡时分，车驾行至土木堡。

王振检点自己随带辎重，尚有千余辆未至，这些财物是他搜刮来打算送去家乡蔚州的，他不顾几十万大军安危，竟下令宿营等候。

也先乘着夜色迅速包围了土木堡。次日，英宗要出行为时已晚。土木堡地势较高，最要命的是没有水源，士卒挖坑掘井，滴水未见，一个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备受煎熬。

也先探知土木堡南面有一条河流，事先在那里设了伏兵，在围困了两天之后，佯装撤退，让出一条通道。王振信以为真，传令移营就水。明军一哄而乱，争相取水。也先看看时机已到，指挥伏兵出击，明军顿时溃败，五十万大军全军覆灭。

英宗被瓦剌军一拥而去，史称“土木堡之变”。

英宗被瓦剌族所俘，京城顿时乱成一锅粥。后宫自不待说，孙太后、钱皇后及妃子贵人，得此噩讯，都哭作一团，惶恐无措，一筹莫展。情急之下，不知是谁提议，可以用金玉珠宝赎回英宗。于是，孙太后、钱皇后及那些妃子贵人，拿出宫中所有，满载了整整八车珍宝细软，送到也先营中。看官，

也先挟持着明朝的皇帝，以为奇货可居，岂是轻易放还的？

孙太后哭也哭过，赎金也送过，毫无用处，静下心来忽想起一个人，皇上从前曾多次提到他沉稳历练，能办大事。何不召来问策？乃降下懿旨，宣商辂入宫，垂帘问政。

商辂面奏太后道：“今皇上北狩，朝野不安。臣以为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太后当以社稷为重，速降懿旨，嗣立皇子为太子，如今太子幼冲，年甫二龄，未能遽理万机，可令郕王辅国，安稳社稷，以慰士庶，则天下幸甚！”

商辂其时已然判明了形势，也先大有“挟天子以令朝廷”的意图，每次叩关攻城，都把英宗拥在前头，守城军士投鼠忌器，不敢十分用强，也不敢施放铙炮。欲想绝了也先的念头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另立新君，让他无“奇货可居”。这样英宗反倒是安全的。

太后听了商辂这番话，自觉有理，依言降下懿旨：令皇子见深为太子，仍令郕王翼辅，代总国政。即令商辂草诏。诏告天下曰：

迺者寇贼肆虐，生灵涂炭。皇帝惧忧宗社，不遑宁处，躬率六师问罪。师徒不戒，被留虏廷，神器不可一日无主，今特授以册宝，立见深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，仍令郕王为辅，代总国政，抚安群黎，布告天下，咸使闻之。

郕王登了大位，乃遥尊英宗为太上皇，尊孙太后为上圣皇太后，改明年为景泰元年，史称代宗（景帝）。

景帝坐朝，顾视群臣道：“朕实无一德，谨遵太后之命，奉祀宗社。日后备战御侮，保卫邦家，全仗卿等辅佐。”

商辂率先启奏道：“臣闻‘苟欲弭兵，莫如备兵’。当前急务，宜速遣得力官员招募兵勇，充备军力。至于攻战器具，还宜紧督内外局厂，昼夜营造，以供需求。且三军之势，莫重于将。迺者兵部尚书邝野随征忠歿，其职久缺。

臣闻将者，心也；士者，四体百骸也。臣乞选贤能，以当大任。”

景帝对商辂所奏一一嘉纳。只是这兵部尚书一职，一时难有合适人选。因道：“邠野既殁，方今之势，不知何人堪担其大任？”

商辂复禀道：“此人乃巡抚河南、山西二省的于谦，于侍郎，智能兼备，大有将帅之才。前时上皇有旨，令他回京听用，想必此刻该到京城了。”

景帝见商辂谋划周备，临危不乱，心中大安。接连颁下两道圣旨，令商辂入内阁参与机务；令于谦为兵部尚书，缮修兵甲，固守京城。

当时内阁有两位阁臣。商辂居朝安内，于谦定边攘外，两人尽心辅国，甚相默契。期间强敌压境，侍讲徐理倡议“放弃京城，迁都南京”被他两人一齐怒怼了回去。

人说“危难之际见忠臣”，此话一点不假，平素巧言令色者易收服人心，博取赞誉。一旦国难来临，关乎身家性命时，则唯恐避之不及。

商辂和于谦救国难，拯民危，危难之时显身手，一切以社稷大业为重。经过近一年的“京师保卫战”，终将也先赶出了关外。

夺门之变

京师保卫战打出了明朝的军威，也先感觉明朝中有“硬茬子”，不好对付，遂引兵退去。瓦剌可汗想与明朝议和，作为和谈的筹码，打算将英宗送回来。

次年八月十五日，英宗被瓦剌族送归回朝，距离他亲征整整一年时间。消息到京，景帝是有顾虑的。商辂主动要求到居庸关迎驾，景帝降旨：令内阁学士商辂、太常少卿许彬、侍郎商穀、御史王文一同前往。

君臣相见，百感交集。英宗亲自扶起商辂，想要张口，但话还未出口，眼眶先一热，垂泪不止，唯有执手叹息。

车驾驶人安定门，景帝出宫迎请。两人在东安门相遇，恍若隔世，一起滚落数行泪珠，景帝先开口道：“兄风霜劳顿，这些日子在荒漠塞外备尝艰辛，今幸得无恙归来，弟愿辞位以避……”

英宗摆手阻止道：“我弟在患难之中承继帝统，也可谓应天顺人，不要再说推辞的话。”沉默片刻，感慨道，“朕经土木堡一难，对于朝政早已心灰意懒，况朕在北地有言在先，归国后不再正位，若得安居闲地，消遣余生，朕也就心满意足矣。”

为表示尊重上皇意愿，景帝送英宗到“南官”居住。

“南官”又叫“黑瓦殿”，位于紫禁城东华门外，原先是建文帝的行宫，因长久无人居住，闲庭草长，别院萤飞，显得异常冷清。景帝名义上为尊崇上皇，派原兵部侍郎王骥，担任南官守备。其实是让他监视上皇的举动，隔三岔五向他汇报。

这样凄凉没有自由的日子，一待便是七年。英宗的失落感可想而知，这一切统被太监曹吉祥看在眼里，他在等待时机，谋取一场富贵。

景泰八年（1457）元旦过后，景帝举行郊礼，筑坛祭祀天地。回宫后自觉龙体发沉，不思饮食。太医诊了脉，但觉脉息微弱，不觉锁紧了眉头。

此刻，上至三宫六院，下至三公九卿，人人心慌不安，怕龙驭难留，太子尚未敲定。而在外廷有一个人，听说皇上病体沉重，不能理朝，反倒窃喜，心中也在盘算着一场宫廷大变。此人便是武清侯石亨。

却说正月十四，石亨行踪神秘，坐一乘暖轿，径直往曹吉祥宅第而来。也不用门子通报，穿过仪门，直入曹宅内室。曹吉祥忙欲下座来迎，石亨用手按着他，定定看着曹吉祥道：“眼下有一场富贵在即，曹公公可不许错过喽。”

曹吉祥会心一笑，以手沾唇，“嘘”了一声。转对石亨道：“石公莫急，你就把它写在手心里，看想的一样不？”

两人摊开手掌，都用墨笔写了“南官”二字。

曹吉祥喜道：“不谋而合。”石亨点点头，道：“立太子何如请上皇爷复位，事成之后，定是不世大功。”

曹吉祥强按住躁动的心，不无疑虑道：“此事就你我二人，恐不济吧？”石亨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等去找徐有贞商议。”当晚，石亨和曹吉祥又约了都督张軫，一同来到有贞宅中。

徐有贞见了他们三人，也不寒暄，劈面问道：“尔等是来求富贵的吧？”

三人你看我，我望你，面面相觑，一时竟答不上话。有贞更不多言，领着他们来到后院露台，仰观天象，嘴上自言自语道：“三垣晦暗，此事八九成也。”回头见他三人一脸茫然，遂解说道：“三垣便是紫薇、太微、天市三垣。紫薇垣俗称天子之宫；太微垣乃君令之所在；天市垣是主权衡积聚之所。三星清明，国家自然平安，若三星暗昧不明，则国家少不得有一场变乱。”

众人按其所指，果真看到那颗帝星正忽明忽暗的，像是在眨着眼睛。

“那帝星忽明忽暗，主何凶吉？”张軫依然仰头观天。

“明暗不定，自然是凶兆。就像那风前的灯烛，摇晃不已，遇有大风，定然熄灭！”徐有贞语气十分肯定。

三人听罢像打了鸡血一般，兴奋不已。有贞道：“天象已变，事宜速为。皇上十六日设朝之时，便是我等举事之日！”

“好！”众人一起答应，把盏共诀，“事成之后，拜爵封侯，富贵同享。若是事败，祸必杀身，做鬼再见！”

立完誓，三人正欲离去。

“慢。”徐有贞忽想起一事，“上皇那里还得有人预先联络。”沉吟片刻，道：“以愚之见，就以守备王骥为内线。”众人频频点头，都认为徐有贞考虑周详。

次日，恰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。紫禁城各宫院，俱搭起一座座鳌山，灯彩高悬，火树银花，满目锦簇交辉，好一派歌舞升平气象。

却说英宗在南宫，已与外界断绝交通，今晚听到外面的喧闹声，方知是元宵节了。他信步闲庭，但见天空一片清辉，蟾光如练，映得南宫屋宇像磷火一样，在黑夜里闪烁着点点寒光。

“上皇爷。”值夜的太监正低声唤他。英宗闻声回头，“禀皇爷，守备王骥求见。”

这一夜，王骥求见英宗具体谈了什么，史书并无记载，我们也无从猜测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王骥把拥戴他复位的事告诉了英宗，并得到了他的默许。

第二天，景帝临朝，大臣们早早聚集午门等候。许久，但见内侍传宣：“圣躬不豫，今日免朝。”大臣各自散罢不提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石亨、张軏见时机成熟，乘夜深之际，领兵杀入禁宫，石亨、张軏都是战武出身，见有禁军阻挡，即于甬道上厮杀起来。

另一路徐有贞领着一伙死党，正往南宫而来。见宫门紧闭，有贞取过一把铁锤，把宫门擂得山响，始终没见人来开门。徐有贞情急之下，找来一根巨木，悬上绳子，数十人一齐举木撞门，震得天崩地塌一般，竟把宫门右侧一堵墙垣，轰然震坍。众人从那缺口，一拥而入，直奔英宗寝宫。

直到此时，王骥才出现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龙袍，给英宗披上，蜂拥着向奉天殿进发。

一路上倒也顺利，不见有谁阻挡。但见甬道上横七竖八躺着数十具禁军、侍卫的尸首。到了乾清宫，早有曹吉祥内应，大开宫门，乘舆一拥而入，直奔奉天殿上，坐登了龙位。

时景泰八年(1457)正月十七日凌晨。

“当当当……”景阳钟声响彻紫禁城，宣召百官上朝，群臣还以为景

帝病愈，已然设朝，陆续会集朝房，排班入贺，山呼拜舞：“皇上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抬头一看龙庭已换了新主。

英宗叙功论赏，进封石亨为忠国公，食禄一千五百石；张軹为文安侯，食禄一千二百石；进封徐有贞为武功伯，食禄一千二百石，入内阁办事，并封其三代如爵；曹吉祥世袭锦衣卫，升司礼监太监，总督京城三大营。

接着又连颁三道谕旨，其一是“废景帝为郕王，削皇后杭氏封号”；其二是“革除景泰年号，改为天顺元年”。史称“夺门之变”。

夺门之变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。

第三道旨意让人寒心，着少保于谦、大学士商辂、都御史萧铉等入狱。一时间，京城愁云惨雾，凄风苦雨，弄得朝中人人自危。

徐有贞、石亨自拥戴上皇复辟，常以功臣自居，眼里一点也容不下与他作对的人。二人心里一合计，首先该除掉的便是商辂和于谦。

当年在朝堂上徐有贞（徐理）因提议“放弃京城，迁都南京”被商辂痛斥，于谦则建议景帝：“提议南迁者当斩！”徐理此后久久不得升迁，景帝听到他的名字，就感到厌恶。徐理便改名徐有贞，别字元玉。果然一路升迁至右副都御史，为正三品要员。

徐有贞如今得了势，便找到都御史萧维桢，让他出头弹劾商辂和于谦。说于谦迎立襄王，别有异图；参商辂“当郕王监国挟私，欲行易储之际，不行谏阻，扰乱纲常”。说在景帝监国期间，借机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，替换掉英宗的儿子，商辂没有阻止这件事。

英宗览了萧维桢的劾本，有些犹豫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商辂是朕取的连捷状元，为人宽厚，恪尽职守。于谦虽曰老臣，亦有功于社稷，似应在赦免之列……”

徐有贞急了，忙向侍应在侧的石亨使个眼色，石亨会意，上前奏道：“臣等肝脑涂地，九死一生，迎陛下复立大位，今日若不治于谦、商辂之

罪，非但臣等心有不甘，则陛下之事亦难有个说法。”

英宗正感念他二人，不好拂其意，选择了妥协，即批旨拿问。

且说商辂、于谦等被寄了监。

次日，徐有贞亲自上堂问审，提来商辂，诘问道：“郕王监国挟私，你妄言易储，投其所好，扰乱朝纲，结党乱政，如今尚有何说？”

商辂斥责道：“尔等贪图富贵，夺门复位，陷主上于不仁不义之地，方为扰乱朝纲；公堂上布满私人，枉害忠良，方为结党乱政。”

“胡说！”徐有贞暴跳如雷，一拍公案，道：“我们为社稷大业之计，拥戴陛下复位，实乃不世之功，何以说贪图富贵？真正可笑之极。”

商辂正色道：“天位乃陛下所固有，假若景泰不起，群臣表请复位，岂不是名正言顺？何至于夺门为功？‘夺’之一字，又何以示后？”

一番话说得徐有贞哑口无言，良久方道：“好。今日嘴硬，看你会有好果子吃。且带去收监。”

徐有贞看着商辂的背影，眉头一皱，想出了一个治他的狠招。俗话说：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”徐有贞不信，商辂做了七八年的内阁大臣，就算你不索贿，别人托你办事，谋个职务升迁，总有些人情往来吧，一旦把柄在手，再查处他不迟！下令锦衣卫查抄商辂府第。

锦衣官校得令，个个摩拳擦掌，围了商宅大院，翻一个底朝天，却并未查到什么值钱东西。来到正屋，商夫人卢氏、儿子良臣和太夫人解氏都在，见有一门封锁紧闭，那班校尉大喜，以为得赃，令卢氏启门搜查。卢氏凛然道：

“内中皆是御赐之物，岂是可轻易查验的？”

官校厉声道：“我等皆是奉旨而来，查验好去复命！”

不由分说，官校一脚踹开大门，一齐傻了眼，内中果系御赐之物，无非玉带，官服之类，另有黄金五十两，白银百两，也是皇帝为了易储，笼络人

心，钦赐给阁臣的，并不曾动用一文。至此，官校不得不暗自叹服。

且说商辂在狱中，不像别的囚犯悲悲戚戚，有时敲瓦片做棋子与自己对弈；有时又吟诗作赋，得一佳句，每每忘情叹赏。牢头摇头不解，自语道：“这位爷好大度，命悬朝夕，尚吟诗弈棋，未见有这样坐监的。”心有不忍，看看四周无人，低声告诉商辂道：“隔壁一位于爷，明日绑赴西市临刑，大人千万保重。”

商辂听罢，悲从中来，只觉喉头一涌，喷出一口鲜血，大吼一声：“天乎昭鉴！天乎昭鉴！”想土木堡之变，于谦舍身忘家，奋勇破贼，挫敌于德胜门，趋虜于倒马关，而今却遭一帮佞臣所陷，将要弃尸西市，天理何在？他心中如焚，即以指当笔，沾着口中鲜血，于狱壁上题诗一首：

一身慷慨正气宽，志士身死魂未亡。
相逢九泉还应笑，好将忠荃诉先皇。

商辂此刻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

于谦血溅春秋，西市斩首后，英宗渐渐有些醒悟过来，暗召阁臣高谷来议。高谷见势不可回，乃婉转奏道：“商辂实难得之才，他的为人，陛下素知。其余臣不敢多言。”

“嗯。”英宗点点头，“朕明白了，商辂无罪，宜从宽典。卿暂且退下。”其实英宗并不糊涂，只是受挟于石亨、徐有贞、曹吉祥，不能启用商辂，只得降下一道谕旨，将商辂、萧铉削职为民，着即原籍还家。

商辂致仕归田，淡出官场十年之久，也淡出人们的视线焦点。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的儒学思想规范着商辂的行为方式，回乡后他创办“仙居书院”，教书育人。宪宗即位，一边启用老臣，召回商辂，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。一边又听信太监汪直，设置特务机关——“西厂”。

鼓妖之变

“西厂”的设置,说起来有点奇葩,源于宫廷的一场“鼓妖之变”。

宪宗成化十二年(1476),一个寒冷而不寻常的冬夜。是夜,宪宗在昭德宫拥着万贵妃共枕而卧。

这时候,宫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只见一个宫娥来禀道:“娘娘,外间厂卫差人说有急事禀报皇上。”

万贵妃不耐烦道:“皇上已歇息了,有什么事明日上朝再奏吧。”宫娥正欲退下,宪宗已爬了起来,吩咐宫娥:“更衣。”径自去了。

原来,锦衣卫校尉在入更巡夜时,抓到一个太监装扮的妖人,还以为是个刺客,被校尉合力拿住勘问。此人名叫李子龙,擅长左道秘术,迷惑结识了许多太监,就连管事太监韦舍也是他的忠实信徒,这一次本想去北郭御苑的万岁山游历一番,没承想事发被拿。锦衣校尉深感事态严重,故连夜报知,但凭皇上亲裁。

宪宗惊讶万分,呆了半晌,叫先囚着人犯,来日再审。回到昭德宫,一时睡意全无。想到缉防之事不可等闲视之,以今夜之事看来,厂卫缉事是该加强才是。

“皇上英明。”万贵妃也鼓动道,“皇上何不于锦衣卫、东厂外再置一个西厂?前时,妾向皇上保举的汪太监,虽说年少,但他忠心且伶俐,由他掌管西厂,再多与他一些人,何愁大小事情不报于皇上?这妖人闯宫之事从此要杜绝才好!”

“好!便是这样。”宪宗当即定下来,吩咐道,“先让汪太监筹办起来,明年正月由他总督厂事,官校人员任他选拔。”

成化十三年(1477)正月,西厂正式成立。

却说商辂被诏复入阁,第一桩事便是向宪宗条陈时政八事。首起为勤

圣政，依次又为纳谏言、储将才、饬边备、汰冗滥、广积蓄、崇圣道、谨士习诸条。他对于时政鞭辟入里，在荆襄盗贼、湘粤苗瑶之乱、平凉判酋等大事上，调兵遣将，运筹区划。宪宗复得一良臣，甚觉宽慰。

反观那些用利益绑架在一起的关系，终以利益的冲突而解体。

先是徐有贞受英宗重用，当了内阁首辅，曹吉祥派小太监去偷听英宗与徐有贞的私密谈话，第二天曹吉祥故意泄露给英宗，说是徐有贞告诉他的，以致英宗有意疏远徐有贞。接着石亨借御史张鹏弹劾自己，做一个局，反告徐有贞“图擅威权，排斥勋旧”。英宗将徐有贞下了诏狱。

徐有贞倒台，曹吉祥、石亨更是权势倾天，人称“曹石”。曹吉祥几个侄子都在锦衣卫担任要职，门客冒功当官的多达成百上千，两人一会儿相互撕咬对方，当被官员弹劾时，又抱成一团，打击异己。石亨从子石彪图谋镇守大同，以便与石亨里外掌握兵权。石亨私底下还绣织龙袍、雕制龙床，事发被执，以谋反罪伏诛。

石亨的死对曹吉祥本是个预警信号，谁承想曹吉祥同样有一个“坑爹”的干儿子曹钦，竟在家中蓄养兵士，伺机叛乱。一日，他问门客冯益：“历史上有没有宦官子弟做天子的？”冯益说：“有啊，你本家魏武帝曹操不就是嘛。”此话更坚定其谋反之心。

天顺五年（1461）七月，甘州、凉州告急，英宗令怀宁侯孙镗西征。曹吉祥借机发动叛乱，由曹钦拥兵攻入内宫，曹吉祥率禁军接应。事发后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。

且说汪直自从当上西厂的厂公，便放手大干起来。四散派遣官校外出侦缉查访，不论王府边镇、南北河道俱布下耳目，京城九门及大街小巷的酒肆茶楼也都有巡视。据说汪直还懂易容术，很有些手段；他亲自带着校尉以布衣粗衫、瓜皮小帽装扮成京郊百姓模样，胯下骑一头跛足驴子，往来穿梭于京畿各地，潜行暗访，见了民间斗鸡骂狗的琐事，都要罗织索引，

制造冤狱，弄得各地人心惶惶，朝臣多有非议。汪直正思考着如何堵大臣们的嘴。

一日，官校报上来一件事，说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，利用进京返程之机，动用数十艘官船，贩运私盐谋取暴利。到了武城小县，公然射杀了一个盘查船队的典史。

汪直听着，竟“嘿嘿”乐笑了。顾对左右说：“咱家就靠他做个清官！”于是坐厂行牌，传令下去，提究南京镇监覃力朋到案。官校不敢怠慢，速拿了覃力朋到京，投入狱中，剥了衣裳，用铐子扭住，揪着一顿乱打。

覃力朋何敢抵赖，当堂画了押。汪直道：“你自作自受，到了黄泉路上，须怪不得我。”喝令两旁官校，“押入死囚牢里。”随后将审结详情奏报上去。

宪宗批下旨来：“南京镇监覃力朋怙势作威，滥杀朝廷官员，藐法乱政。旨下依议，着即处决，以正法度。”

自此，宪宗常说汪直办事公正忠心，对他深信不疑。汪直权势威焰日盛一日。锦衣百户韦瑛，投其门下，一口一个“干爹”，自愿做儿孙使唤。一时间势利之辈，群起效仿。

一日，韦瑛来见汪直，跪禀道：“兵部尚书项忠，今日出头上了一本，弹劾爹爹……”

“起来吧。”汪直问道，“他都参咱什么？快让人将本按住，留中不发，不与皇上见面。”

“迟了。”韦瑛回道，“项忠的本已到御前，说爹爹矫旨枉法，揽权专政，坏祖宗体制，难听的话还有许多。”

汪直道：“项忠这厮竟敢欺到咱的头上，今日若不将他扳倒，反显得咱没能耐！”韦瑛附和道：“这厮胆儿忒肥，孩儿也让人参他一本，早晚叫他挂冠回籍，留他不得。”

“嗯。便是这样。”汪直道，“你将参本做好我看。”

韦瑛领命，速找了一个科道官，代做一本，弹劾兵部尚书项忠，说他“寻端沽誉，凭臆妄谈，语多谤讪，欲使君臣违和，又使圣上耳目闭塞，形势孤立”。云云。

汪直看了参本，即提笔批道：“项忠狂悖无理，恣意诬枉，着即拿问！”

项忠被拿，举朝上下敢怒不敢言，这个消息传到商辂耳里，不禁拍案大怒道：“乱臣贼子，怙势作威，竟敢如此放肆！身为朝廷辅臣，岂能坐视逆阉专权乱政，扰乱朝纲！”

这一夜，商辂失眠了。

西厂设立是因为鼓妖之变，皇上的初衷是为了宫禁安全，因此给了西厂更大的权限，无论人数、装备还是司法权，都远超东厂和锦衣卫。但权力一旦不受制约，就只会用来陷害异己、残害忠良。皇上被汪直的小忠小信所蒙蔽，放任他的所作所为，弄得今日局面难以收拾。

汪直的西厂设置短短几个月，搞得乌烟瘴气，三品以上京官，汪直说杀便杀，平和圆融的商辂此刻也奋激了，他提笔疾书，毅然上了著名的《罢革西厂疏》，具数汪直罪责：

近日伺察太繁，法令太急，刑网太密，人情疑畏，汹汹不安。内外文武重臣，托之为股肱之膺者也，举皆不安于位；百司庶府之官，资之以建政之事也，举皆不安于职；商贾不安于市，行旅不安于途，士卒不安于伍，庶民不安于业。承平之世，岂宜有此？究其所以，盖缘陛下委听断于汪直之一人，而汪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韦瑛辈。皆自言承密旨，得颛刑杀，擅作威福，贼虐善良……其奸谋足以颠倒是非，其巧佞足以蛊惑人心……望陛下革去西厂，罢汪直以全其身，诛韦瑛以正其罪！

再说宪宗接到商辂的疏本，尚未阅毕，早已怒形于色，嘴里自言自语

道：“危言耸听，危言耸听。”但见他将本抛掷于地，厉声道：“用一个内监，怎么竟致危害天下！”

谕令近侍传旨诘责，宣商辂入宫。

商辂接到近侍传宣，并未感到惊讶，只感觉一种潜伏的危机。这种危机有来自汪直的，也有来自朝中明哲保身的大臣们的，他论劾汪直的疏章并未出现应有的响应。他走在甬道上，步履变得愈发沉重起来，此刻，他仿佛置身在一叶扁舟之上，四周则是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水，自己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，这种危机比起汪直弄权，更让他寒心。

“商阁老请在殿中候见。”近侍将商辂引入殿内。

宪宗坐在龙椅上，一开言便有责备之意：“朕今日召先生来，想先生也明白。当初立西厂用汪太监，皆是朕的意思。汪太监纵有小过，也不当罢黜吧？又何至于危害天下！”

“汪直岂止是小过？”商辂见皇上有意回护汪直，凛然回道：“汪直毒捕滥刑，威加缙绅，生杀予夺尽出其手，朝臣无论大小，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，前时兵部尚书项忠上本论劾，即下在狱中。南京乃是祖宗根本重地，留守大臣，汪直动辄收捕。即便宫中近侍，汪直也敢随意换置。陛下试想，长此以往，不黜汪直，国家安能不危！”

宪宗见商辂毫无松让之意，颇有些不悦，碍于他是先朝老臣，顾及脸面，乃勉强道：“先生暂且退下，容朕细思。”说毕，宪宗从龙椅上立身而起，抛下商辂，竟自入内去了。

空荡荡的大殿，只留下商辂孤单单一个人，他望着皇上的背影，胸中涌上一股难言的苦涩和悲怆。他已经过了耳顺之年，本也可以像别的大臣一样，对这件棘手的事保持缄默，依旧做他的三朝元老，届时衣锦还乡，享受荣华富贵。但朝廷的命运、社稷的兴衰、辅臣的职责以及忠谏之道，无时不牵挂心头。他迈出殿外的脚步，沉重而艰难，一步一步……

宪宗被商辂顶撞后，心里顿觉不爽，随后步出内宫，沿着宫苑长廊漫步，两个小太监紧随在后。其时正当春夏之交，天气暖热，长廊尽头有几个太监正偷闲聚在一处，相互打骂嬉闹，全然不知皇上正朝他们走来。宪宗此刻正心烦，见这般嘈杂，不禁皱紧眉头。有个机敏的太监见皇上过来了，赶忙低声招呼同伴：

“圣上来了，圣上来了。”

其中有个叫阿丑的太监，似若未闻，依然自顾叫骂耍闹。宪宗正欲发作，却听先前那个太监又改口提醒道：

“汪太监来了。”

说也奇怪，那个叫阿丑的太监，一听说是汪太监来了，吓得扭头就跑，一溜烟没影了。

宪宗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看着那几个太监跑远了，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，他若有所思道：“商辂虽说倔了点，所奏之事看来不无道理呀……”

次日，宪宗颁下一道谕令：“革去西厂，着汪直回御马监，释兵部尚书项忠出狱，官复原职。”

从煊赫的西厂总管，乍回到冷冷清清的御马监，汪直如何甘心？他已习惯了一呼百诺、威风八面的场面，失去权势的滋味，让他几乎抑郁。他叫人找到一个叫戴缙的御史，为他上本颂德。戴缙为了升迁，竟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具本上奏，说汪直所行，不独可为今日法，且可为万世法。又说罢西厂不当，宜速恢复。云云。

而宪宗自罢西厂后，耳目像被闭塞一样，宫外的事情一概不知，顿觉兴味索然，常有思念汪直之意。原先罢西厂，一为势所迫；二也是杀一杀汪直的气焰。如今有人倡言恢复西厂，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。宪宗顺水推舟，准戴缙所奏，下诏重开西厂，仍命汪直总管，距离罢革尚不到一个月。

商辂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向他袭来，尽管不久前，皇上还加升他

为太子少保兼谨身殿大学士，赐给冠带金织麒麟服，位极人臣，官至一品，但他并未觉得有太多的荣耀，相反，倒是从中品出了一丝无奈的滋味，眼看着自己斗阉党、建功业、济生民的政治主张，都将付之东流。

他想起了屈原，想起了“我既不难夫离别兮，伤灵修之数化”的感慨，与他眼前的境遇何其相似。皇上如今热衷于西厂，自己不再被皇上信用，他也尽到了臣子应尽的职责，还是古哲先贤说得好：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”他如今达不能兼济天下，又不愿同流合污，余下的只能是独善其身。昨天的历史似乎又来了一个轮回，自己仿佛正走在古哲先贤的那条老路上……

六月的京师，闷热难当。夜已深，人未眠。商府书房的灯依旧亮着，灯烛下，商辂短袖内衫，在案桌边凝神静思。

“老爷该歇息了。”家人安儿进来轻声唤道。

“研墨。”商辂边吩咐安儿，边摊开稿纸，他搦管吮毫，书写他生平最后一道奏疏——乞致仕疏。

未几，商辂的乞休疏被允准了。临行之际，在朝文武官僚前往都门饯别，兵部尚书项忠、阁臣刘吉上前拉着商辂的手，泣道：“愿大人留言以教。”

商辂仰视都门，感慨良久，缓缓道：“商某别无所能，凡可以安国家，利社稷，身之利害有所不计罢了。诸位立朝，当言则言，当行则行，笔下不可枉杀一人。”

刘吉、项忠深深一拜，齐赞道：“大人真乃一代人豪也。”

商辂上车与众官挥手告别，马车驮载着他那简单的行囊，缓缓驶离都门，向着京郊，渐渐消失在远山峻岭间……

“忍者”胡拱辰

绿树阴阴九里湾，水光山色出尘寰。
黄鹂谷口声偏好，百鸟沙头意自闲。

这是古人描写梓桐慈溪九里潭的诗，水光山色绝美，百鸟闲适悠然。新安江九曲十八弯，蜿蜒百里，峰回路转，到了九里潭，逶迤折出，一东一西流经上源和下源，再汇入新安江。如果从高处俯瞰，淳安境内的江流，恰似一条游龙，至九里潭犹如游龙腾跃时的弓背，张弛有度，静则内敛，水映山月；动则湍激，悬崖喷流。

九里潭有两位性格和结局截然不同的历史人物。

陈硕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(653)，在梓桐慈溪田庄里举兵起义，如悬崖喷流，怒水四溅。虽为女流，但她自称“文佳皇帝”，意欲夺取大唐江山。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称之为“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”。

胡拱辰(1416—1508)，字共之，号敬所，别号亦拙斋。若追溯起来，拱辰的祖先在宋朝就是官宦之家，到了元代，胡氏一族隐名于乡间，躬耕于南亩，很少抛头露面。一则朝廷录取名额极少；二则士子放弃科考的也不在少数。直至明代正统三年(1438)，胡拱辰乡试中举，次年(1439)，他起程赴京参加会试，这一科录取人数只有九十九人，胡拱辰三场文试下来，名

列三甲第二名，即第四十名，此时他才二十四岁，妥妥的学霸。

放眼明代一朝，淳安有三位官员位尊一品。胡拱辰是其中之一，另外两位分别是商辂、徐贯。算起来胡拱辰是最早进入仕途的，做官时间最久，历任英宗、代宗、宪宗、孝宗四朝，寿限也是最长的。

胡拱辰进仕的时候，三元宰相商辂因会试落榜，又逢父亲仲瑄公病逝，正居家守丧。直到六年后的正统十年（1445），他才取得联捷状元，步入朝堂，逐渐跻身决策层。徐贯则于十八年后的天顺元年（1457），考中进士。

胡拱辰仕途的第一站是黟县令。黟县属徽州六县之一，现在的黟县是网红打卡点，被称为“中国明清古民居博物馆”“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”，还拥有西递、宏村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，田园牧歌一般，世人做梦都想去看看。不过当时的黟县还只是穷山恶水，胡拱辰走马上任黟县令的时间是正统六年（1441）。

上任之初，同榜进士倪谦对他有点不舍与怜惜，题诗相赠，《送胡进士拱辰宰黟邑》：

鳧鳥翩翩下九重，青年膺詔宰花封。
满城桑柘春风暖，百里弦歌化雨浓。
枳棘暂看鸾翔翥，梧桐终听凤雍雍。
宦游况是头俱黑，好掬清泉淬剑锋。

倪谦位列一甲第三名，俗称“探花”。他这首七律的首联说，胡拱辰脚登仙履，翩然从九天而下凡尘，年纪轻轻就奉诏主宰黟县。县域内从事农桑者有如春风送暖，因为胡拱辰去了之后，施德政重教化，百姓觉春风化雨一般。

颈联表达的感情较为复杂，枳棘终非鸾凤所栖之地，鸾翔枳棘，也暗

喻宦海沉浮，道阻且险。凤栖梧桐，只有梧桐树上才能听到凤凰的和鸣声。诗中既有一种担忧，也有一种大材小用之叹息，他觉得胡拱辰出任黟县令有点屈才，但终究还是会像凤凰一样栖身梧桐枝头的。

尾联透露出积极乐观的情绪，说他第一次宦游在外，作为满头黑发的青壮年，正可以借此机会磨炼心性，捧一汪清泉好淬炼自己的剑锋。对胡拱辰的未来寄予了殷切希望。

我查阅了《黟县志·名宦》，胡拱辰条目云：“胡拱辰，字共之，浙江淳安人，登进士第。正统六年知黟县事，廉明仁恕，讼简赋平，常买民地以广学宫，文学政事称重一时。吏畏其威，民怀其德。任三年，升监察御史。邑人立生祠祀之，后升南京工部尚书，清白之操，始终一致。”

如倪谦诗中冀望的一样，胡拱辰终究是凤栖梧桐了。

在写这篇文章之前，我始终找不到切入的点，所以迟迟没有动笔。直到读罢倪谦这首诗，我仿佛明白了胡拱辰为官为人之道，从“鸾翔枳棘”到“凤栖梧桐”，其实就一个“忍”字。如果我们耐心追踪他仕途的脚步，就可以找到无数个与之相关的印证，来为这个“忍”字作注脚。

他在黟县多有政绩，到任后胡拱辰首先想着修建儒学，教化育人。孔庙同文门两侧的东西斋，是祭祀时主祭人斋戒、沐浴的地方。祭祀需要仪式感。胡拱辰去时，看到西斋墙倾屋圯，破败不堪。于是他买下周围老百姓的部分田地，用于修建扩充西斋。又于学前山麓穿井以供祀事，作神主、绘神像，改泮池、作石桥、筑甬道于棂星门之内，剡石于明伦堂，为科贡题名。

“胡公井”在儒学前，作为一县之长，胡拱辰主持祭祀需用洁水，他借相学山南麓的一泓泉眼，开凿了此井。“胡公井”留存至今，清甜甘冽，可供饮用。

方象瑛在《健松斋集》中收录了他《明史分稿残编》的内容，其中有《南京工部尚书赠太子少傅溢庄懿胡拱辰》传记，原文近五百字，像一篇流水

账，兹不赘录，我们择其重点叙述。

据方象瑛传记可知，因胡拱辰在黟县三年任期内，政绩突出，正统十年（1445）三月，擢升为福建道御史。他上疏条陈八件政事，皆切中时弊。戊辰（1448）三月，父亲病逝，按例回家丁忧。次年，英宗亲征被瓦剌所俘，史称“土木堡之变”，国势危疑。英宗弟弟郕王即位，是为景帝。

景帝派出特使蒋文，来做拱辰的工作，非常时期，让他舍孝尽忠，回京复职。夺情起复这种情况，在文官里面极其罕见，除非是阁老、尚书、侍郎一类大臣，朝廷依赖他们把控大局、辅佐新君，否则，这是有违人伦纲常之举。由此可见，胡拱辰在皇上心目中的位置之重。

胡拱辰面露难色，表示要守丧期满才同意复职。一个是皇帝的特使，反反复复做工作；一个是父亲的孝子，悲悲切切在推辞。如此“起复凡四”，才起程来京，在两难之中他还是选择了尽忠。

敌寇当前，对待瓦剌的态度上，拱辰力主一战，他认为消弭战争最好的办法，就是以战止战。故此，他上章请复土木堡之大仇，内则安定宗社、选将保邦、修德弭灾诸务。景帝知拱辰乃实心办事，对其所奏一一嘉纳，并擢升他为贵州左参政。

明代布政使下设左、右参政、参议，分守各道，主要分管粮储、屯田、清军、驿传、水利等事，官至四品。

于是胡拱辰来到贵州。这地方确实考验人，地理环境恶劣不说，打交道的尽是苗、瑶、侗、仡佬族等，语言、习俗、行为方式与汉人多有区别，山高皇帝远，当地人历来不喜欢受约束。时任贵州巡抚王恂，对新来的僚属表现出极大的热情，设家宴款待拱辰。王恂举杯说道：“百蛮之地，少有海鲜，但野味山珍管够。以后大家都是同僚，客套话就不多说，胡大人今日是主角，可要尽兴喝好。”一桌人齐声附和着，推杯换盏起来。

席间胡拱辰最为年轻，三十四五岁，可贵的是他语不轻狂，礼数周全。

王恂暗自赞许。他见大家都已尽兴，便唤人撤了酒肴，摆上茶水瓜果，又是一通海聊，直至夜半方各自散去。

老仆待客人走后，收拾桌子，但见胡拱辰坐的椅子前面被果壳瓜皮勾勒出一对清晰的脚印。老仆是从京城跟主人来贵州的，平时阅人无数，寻思此人不简单。次日，老仆对王恂说了此事，王恂便觉胡拱辰志向远大，自制力超强，隐忍而有定力。

他委任胡拱辰分守威清至永宁二十九卫所。

胡拱辰交割完毕遂沿线考察。一路走来，高山大盘坡百盘，三步回头五步愁，辛苦自不必细说。贵州大小卫所的分布、屯田的状况、兵士的面貌等皆了然于胸。他暗自钦佩太祖的眼光和韬略，这些卫所沿驿道而分布是有道理的，大约每隔六十里为一驿，战时为了军事情报的传递、兵员的运送、物质的调配转运等，可提供有力的保障。

卫所呈线状分布，也是有讲究的。胡拱辰对此有一个直观的感受，他发现这些卫所连接的驿道，无一例外都通往云南方向，湖广通云南，四川通云南，贵州通云南。其中滇黔驿道由“上六卫”把守；湘黔驿道则由“下六卫”守护；川滇驿道则是由“西四卫”守卫；偏桥、镇远、清浪、平溪四卫，主要是保证湖广到贵州的驿道畅通。

他明白了太祖的良苦用心，云南作为西部边境，安定与否牵动着京城，也关乎贵州的安宁。贵阳的威清门是通往威清卫的城门，负责把守贵阳的西大门，领五千户所。而永宁卫远在今天四川的叙永县，这里曾设置军粮厅，保留地方军区性质的永宁卫，虽然在四川，但它隶属于贵州都司管辖。从全国来看，贵州的卫所分布稠密，数量也是最多的，只能说明这里不太平。

一日，他行进在安庄卫通往白水堡的山路上，这里山弯沟险，林深树茂。早就听说伧佬头目沈时保，时常据险作乱，劫掠为患。官军来剿则诈降，

官军撤走不悔改。

胡拱辰此番要去会一会他。

沈时保接报省里的守道大人到访，虽说有点意外，却也不显惊慌。他招一招手，领着土司大小头目出寨迎接。见胡大人轻车简从，只带了几个贴身随从，大为宽心。沈时保小跑几步上前拉着胡大人的手，满脸堆笑道：“胡大人屈尊驾临，白水堡山开颜水欢唱，龙家山民乐陶陶。”

“龙家？”胡拱辰听罢，心里咯噔一下。龙家的势力他有所耳闻，沈时保说的龙家是指安顺府四周的龙家，一般包括苗族、彝族、仡佬族、布依族和汉族，是一个古老的传说，是老辈人传下来的习惯性称谓。细分起来大致有大头龙家、小头龙家（狗耳龙家）、曾竹龙家、马蹬龙家和白龙家等。

这话分明是在暗示胡拱辰， he 现在是龙家的地盘和势力范围，匪不是孤立存在的，一旦有事，这十里八乡、一堡一寨，可以一呼百应、八方来援。

胡拱辰不动声色，他不习惯被人这样拽着手，遂抽出手来，顺问道：“州府卫所的官员不常来吗？”沈时保回道：“坡盘路险，他们不常来。”

转眼间到了寨子里，沈时保吩咐安排酒宴。仡佬族有一个待客之道，就是把客人灌醉，表示主人热情好客。先是有人双手捧着个大牛角，里面斟满酒水，请尊贵客人喝下去，方始入席，分宾主落座。

好家伙，这牛角里面的酒少说有八两，酒量浅的怕是没开席便会先醉倒了。沈时保虽曰土司，却也是朝廷任命的官员。主人豪爽待客，客人怎好拂其美意。酒过三巡，胡拱辰初来乍到，不得不打起精神。正事还没办呢，他欲留一分清醒，遂正襟危坐，不再端杯。俗话说酒桌上面无大小，那些大小头目不由分说，硬拿牛角杯来灌胡大人。拱辰也不生气，端然而坐，任由他们掀开衣领，把酒倾入衣脖。随从看不过去，欲加阻止，拱辰神色自若，用目光示意他们镇定。

乱哄哄闹过一通，沈时保早有醉态，拱辰见时机成熟，遂开言道：“沈

时保,听说你们龙家势大,但大得过滇之梁王否?太祖皇帝南征北战,戎马一生,不也平定了云南全境?”沈时保耷拉着脑袋,怔怔地盯着胡拱辰,不明白他想说什么。

“说你目光短浅不为过吧?”拱辰续道,“你劫掠一时,作乱一时,但能劫掠一世,作乱一世吗?当今皇上仁慈,不忍生灵涂炭,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,若一味执迷不悟,以为官军拿你们没办法,拿着鸡蛋碰石头,岂不是笑话?”沈时保与那些头目,酒顿时惊醒了一半。

“本官执掌贵州二十九个卫所,一卫五千六百人,你们算算有多少人?”胡拱辰给他们时间去思考,“官军若发兵剿你,凭你们区区两三千人,手里那些弓箭土铳,能抵抗数万官军的枪炮吗?”胡拱辰摇摇头笑道:“说实话,真不够本官喝一壶的!”

这番话一出,包括沈时保在内的那些头目,算是被折服了。胡拱辰见收心的效果差不多,适时追问一句:“到时候你们一个个真做了冤魂,哪里买后悔药去?”

沈时保至此方诚惶诚恐,匍匐在地,史载:“(沈)时保股栗口噤,不敢仰视。”

胡拱辰兵不血刃,收服白水堡沈时保,消除境内一大隐患。他上前扶起沈时保,大声吩咐道:“来人,斟满三杯酒,本官回敬诸位土官。”言毕,手擎牛角杯,一气饮下。随后反拉起沈时保的手,一边拍着他手背,一边寓意深长道:“就此别后,望自珍重。”

一旁的随从竟看呆了,他们不知道胡大人有如此海量,平时不见他怎么喝酒,原来是深藏不露呀,连连咋舌。这正是:

饱看黔地多高山,搜尽岩壑见奇峰。

这一下胡拱辰上了当地的热搜，不久整个贵州都知道了他的传奇故事。胡拱辰心如止水，该干吗干吗。通过这次考察，他对卫所编制和屯田等情况基本摸清。卫所作为军队的基本编制，太平时候参加农事耕作，既能解决驻守士兵的吃饭问题，又能发展社会生产。这是明太祖从实战中得出“寓军于民”的经验，定国后在边疆地区都派上了用场。

屯军和农民一样，要缴纳贡赋。“屯田除了以‘正粮’作为屯军的口食外，还要缴纳‘屯粮’（即屯田种子），军余所种田土每亩起科，称为‘科粮’，此外，还有‘子粮’，三项合称为‘屯科粮’，其中纳科粮的数量是以该卫所的‘样田’为准。”

再好的政策也会存在漏洞，据《明史·食货志》载：“自正统后，屯政稍弛，而屯粮犹存三分之二。其所屯田多为内监、军官占夺，法尽坏。”内监、军官占夺，导致军士不堪盘剥，只得逃亡，军官不但不制止，还趁机吃起逃亡士兵的空额。胡拱辰一经查实，绝不姑息，予以严惩，起到杀一儆百的示范效应。

成化元年（1465），胡拱辰升广西右布政使。此前的天顺元年（1457），他曾丁母忧回籍三年。

广西右布政使，相当于现在的一省之长，官至从二品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。这时候任命他为广西省长，确实值得玩味。

因为朝廷将对广西有大动作——平定大藤峡。

大藤峡这个地名我们并不陌生。成化年间大太监汪直就是大藤峡瑶民的后代，在这次战争中被俘，以幼童身份进宫当了太监，后来执掌西厂，祸害忠良。多年后王阳明平定大藤峡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这里。

大藤峡民虽处深山却不甘寂寞，常年闹腾。自洪武、永乐、宣德、正统年间，大藤峡周边叛乱不断，不是瑶族闹腾，就是僮族、壮族武装起义，地方屡平不息。大藤峡位于广西中部的桂平之西，这里“大山夹江，绵延数百

里，山势险峻，中多瑶人”（《明一统志·浔州府》）。黔江两岸悬崖陡壁，滩多浪急，因有大藤如虹，横亘交错于山崖之间，故名大藤峡。

据《明宪宗实录》载：“成化元年冬十月，广西大藤峡蛮贼夜入藤县城官库劫县印。”瑶民叛乱，侵袭沿江的武仙、浔州、藤县、梧州诸城，朝廷不堪其扰，决心发兵征伐。宪宗任命右佥都御史韩雍赞理军务，可节制全部在外部队，前往广西讨平大藤峡起义。

韩雍到了广西境内，少不了要与地方领导商议军务，筹集粮饷。胡拱辰作为一省之长责无旁贷，应分应当，他鼎力支持平乱。顾谓韩雍道：“将军此来，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，这些年，官府悬赏、招抚，该想的办法都想了，成效甚微。蛮贼仗着藤峡天险，屡与官军周旋，官军进剿则遁走，官军退去则劫掠。大藤峡绵延六百余里，合围则战线太长，兵员不足；追击则劳师动众，难觅踪迹。”说到这里忽然顿住，他想看看韩雍有啥表情。

韩雍不解，问道：“那依藩台大人的意思？”

“虚张声势。”胡拱辰吐出四个字。

韩雍追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你想，”拱辰继道，“蛮贼惯常与官军打交道，你在明面，他在暗处。将军此番不得造点声势出来？显见得好交差复命。蛮贼一旦麻痹，正可以计策图之。”

韩雍大笑道：“没想到藩台大人还懂兵法，韩某佩服，佩服。”随后拱手相谢。

胡拱辰摆摆手，道：“蛮贼世居林壑，野外生存能力极强，他们凭险结寨，攀木缘崖，饥餐野果，渴饮露浆。况箭矢淬毒，中者毙命……”

韩雍是个急脾气，不待拱辰说完，一拍桌子，吼道：“大军压境，不去征剿灭贼，那要我等到何时？”

拱辰听了并未答话，起身给他的茶壶续水，端着茶盅，走到韩雍跟前，

问道：“将军可知这茶的来历？”韩雍被问，一时摸不着头脑，不知藩台大人这是要提哪壶？

拱辰不紧不慢道：“这茶产自大藤峡一带，名曰‘六堡茶’，汤色红浓，香气醇厚，平气清心。将军不妨尝尝？”

韩雍接过喝了一口，初觉味苦，继而甘醇，果然可口。拱辰见韩雍已然品出味道，转而宽慰道：“蛮贼闹腾了几十年，也不在乎忍他这一时。他见将军偃旗息鼓，必然怠弛。届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拔他山寨、断他藤峡！”

挨过月余，头目侯大苟由疑惧转为松懈，防备形同虚设。机会来了。韩雍率大军进剿，攀崖攻寨，一鼓荡之。那些瑶兵、苗兵以为天兵降临，溃败而散。此举攻占巢穴三百余座，斩首三千二百余级，俘获蛮贼头目侯大苟。韩雍巡视战场，果然见黔江之上有一大藤如梁，遂下令兵士截断大藤，改名“断藤峡”。

韩雍平定大藤峡有功，反遭到镇守广西少监黄沁的弹劾，罪名是“贪欲纵酒，目中无人”。后来被勒令致仕。黄沁本想找胡拱辰一道参，却怎么也罗织不了罪名，因为拱辰低调内敛，从不居功自傲。

史载：“（胡拱辰）成化六年（1470）四月，升四川左布政使，有平寇功。”成化八年（1472）五月，胡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管南京院事。一般人认为，到了陪都南京挂职不升反降，大约是胡拱辰在此期间，被人弹劾。但胡拱辰懂得隐忍，遂无大碍。成化九年（1473）三月，敕提督操江，兼督巡江事。直到成化二十年（1484）四月，擢升南京工部尚书，达到其官宦生涯的巅峰。

“成化二十二年（1486）三月，南京工部尚书胡拱辰年七十，奏乞致仕。事下吏部覆奏，得旨拱辰历官清慎，不允休致，令悉心治事。”

七十岁还不被允许退休，足见胡拱辰深受倚重。

胡拱辰可不想这么高光，也不想给年轻人挡道，老而致仕，天经地义。

终于在次年，孝宗即位的前几个月，光荣退休。

退休后的拱辰回到家乡淳安，依然清慎自律。这是儒家所说的“慎独”，胡拱辰将它贯穿于日常生活。不以位尊而骄奢，不以显赫而霸凌，不以致仕而懈怠，不以俭朴而清苦。

弘治五年(1492)六月，孝宗颁下诰命，胡拱辰进阶资政大夫。弘治十四年(1501)十二月，孝宗得知胡拱辰晚年操持清苦，老状如一，敕令有司每月给米二石，岁拨夫役四名应用。弘治十八年(1505)，诏进光禄大夫，且进彩币羊酒问劳。

方象瑛传记载：“正德元年(1506)，拱辰寿九十，遣行人王奎存问。三年(1508)，卒，贫不能殓，贖助皆出有司。知府孟春以告巡按御史史鉴。鉴闻于朝，赠太子少傅，谥庄懿。”可谓恩荣加身。

胡拱辰退休以后，孝宗、武宗两任皇帝对他的清慎自律高度认可。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周围没有其他人，即便如此也能严格要求自己，遵守道德准则，不做有违道德之事，这叫“慎独”，慎独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的试金石，慎独既是慎始，又是慎终，是慎始如终的追求，是知行合一的魅力。

据光绪《淳安县志》载：“工部尚书谥庄懿胡拱辰墓，在县西普慈坊。朝廷赐祭葬。”

纵观淳安历史人物，胡拱辰、商辂和徐贯三人官至一品，特点鲜明，若每个人用一个字来概括，我觉得胡拱辰为“忍”，商辂为“恕”，徐贯则为“狠”。

隐忍通常符合老庄哲学，表现为克制力强大，而欲望退舍；隐忍者不刻意为之，却往往能踏罡步斗，暗合天意。其为人处世态度谦和、举止文雅，是典型的“温良恭俭让”。

“恕”是以仁爱之心去待人，不计较别人的过失，能宽恕体恤别人。处

世风格如春风拂面，润物无声。

“狠”则容易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，矛盾焦点，压力山大，动力也更大。行事风格干脆利落，快刀斩乱麻，一点不留余地，不拖泥带水。

胡拱辰无论在朝为官，还是退居乡间，慎始如终，他不愠不火，不急不躁，不卑不亢，不隐不显。一个“忍”字，是破译他一生的密码。

“狠人”徐贯

五百六十三年前，大明王朝的英宗用武力夺取了弟弟景帝的皇位，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(1457)，史称“夺门之变”。时值正月新春。

商辂走了。他遭人陷害，挂冠回籍，离开京城回到淳安。紫禁城寒气逼人，商辂的心也寒透了，尽管他只有四十四岁，正是施展政治抱负的好春光。

徐贯来了。景泰四年(1453)乡试中举后，丁丑年殿试，再传捷报，位列三甲第五十二名。商辂和徐贯冥冥中完成了使命的交接，像是彼此间的默契，又似上天刻意的安排。

徐贯才二十五岁，寒窗苦读，走出大山，一步跨入紫禁城。他身着鹭鸶褂子的绯袍，行走在京师朝堂之上。行走带风，带着蜀阜人(今威坪镇)的爽直粗犷。他祖上打铁出身，人称“打铁徐”。徐贯够硬，但他硬中带柔，粗中有细。从他任兵部主事时就有所体现。

据翰林院编修，邑人方象瑛《太子太傅工部尚书赠太保谥康懿徐贯传》记载：“徐贯，字原一，淳安人。幼明敏，从姚夔受春秋，登天顺元年进士，授兵部职方司主事。”

兵部有四司：武选司、职方司、车驾司和武库司。核心部门是职方司，负责管理国家的疆域和版图。职权范围从兵员到驻守，从训练到给养，从

军情到后勤,从监管到勘正,可以说既高端庞大,又繁杂琐细。大到军事决策参谋、各地卫所巡防检视;小到收捕逃兵、清退老疾,查办冒名顶替者,存恤屯田、安顿新士等。

成化二年(1466)秋,徐贯按例巡察京畿卫所,访得苗千户诸多不法事,他一旦查实便不会放任不管,这乃其骨子里性格使然。碍于千户官阶五品,比自己还大一级,不便明里搜查。侦缉到苗千户别处还置办有一处宅院,豢养一青楼女子,雇佣婢女、管家伺候着,十分宠幸。管家姓侯,平日仗着千户威福,鱼肉欺压百姓,甚至插手兵役,行冒名顶替之事,地方睁只眼闭只眼不愿惹事。徐贯瞅准个机会,借着缉拿侯管家由头,搜查苗千户别院,并无发现赃物。这事算是捅了马蜂窝,都不知该如何收场。

随行人员垂头丧气,只带回几本书簿,翻看之下像是与人往来的账目,列入某月某日收黄米若干石,某月某日收白米若干石。

徐贯丢下账簿,不免有些失望。随从报说,苗千户已让人参了他一本,说徐贯“借巡察之名,行邀誉之实,纵容部属侵人民宅,捕风捉影,罗织罪名,惊扰卫所。”云云。徐贯听罢,原本有些忐忑的心反倒平静了下来,苗千户这么急于跳出来攻讦自己,分明是想要转移视线隐藏什么,正说明此刻他心虚着哩。

徐贯边思虑边拿起账簿,嘴里自言自语道:“他家几口人,吃得下这许多黄米白米?”随从答说:“便合一处也不过二十余口人,哪吃得了几十万石的黄米白米?”末了又咕哝道:“奇怪,里外搜遍恁是未发现存粮的所在。”

徐贯忽觉眼前一亮,“这事有些蹊跷”。当即喝令:“带侯管家!”

侯管家被带上堂来,想着徐贯手里没啥证物,自己又有千户撑腰,于是装傻充愣,一问三不知。徐贯呵斥一声:“大胆奴才,你难道就不怕王法吗?”侯管家暗吃一惊,又见两边把刑具往公堂上一摆,憋着一口大气再不

敢出一口。

徐贯不怒自威，语气放平缓道：“你一个奴才，无非仗势欺人，作恶地方，按大明律法罪不至死，但这几十万石的黄米白米却非同小可，你不说本官也知道，是黄金白银吧？你又何必替人顶缸呢？试问你有几颗脑袋？”

徐贯轻语重锤，绵里蕴刚的一连三问，于侯管家不啻当头一棒，顿时分开八片顶阳骨，魂飞出窍。原来这主啥都知道。他双腿一软，磕头如捣蒜一般，嘴里只呼饶命。防线崩塌，存何侥幸之心？一五一十把藏匿所在以及千户所为，原原本本作了交代。徐贯一边命人起赃，一边亲草奏章，弹劾苗千户种种不法罪行，依律予以严惩。

徐贯扳倒了官大一级的京畿卫千户，可谓一战成名。

“狠人”徐贯一路升迁，由兵部主事升兵部郎中，期间“丁内艰服阙”，说他母亲去世，按例回籍服丧，三年期满，补了兵部武库司郎中，尚书白圭欣赏徐贯的才能，又将他调任职方司郎中。成化十一年（1475）擢福建右参议。兵部郎中属五品官阶，福建右参议隶属布政使，官职四品。徐贯分守延平、建宁、汀州、邵武四府，忽已过了两年多。

话说这一日，徐贯刚在署衙坐定，部属匆匆来报，说建宁卫指挥杨晔被锦衣卫下了诏狱，汪公公正欲兴师动众，弄不好会株连大批无辜者。

本来杨晔的案子只是一个刑事案，他位高权重打死了人，被人告发到福建按察副使冯俊，冯俊正欲捉拿他。杨晔逃进京城姐夫董琦家避风头。按说杨晔是四朝老臣杨荣的曾孙，自己又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，姐夫董琦官至“中书”，想摆平这事似乎不难，董琦找到锦衣百户韦瑛，托他高抬贵手，不要难为他大舅哥。韦瑛满口应承，说让他放宽心候着。

韦瑛收了银两，也答应替人办事，来到厂狱看情况。狱卒说杨晔受不了“琵琶刑”之苦，招供有许多银两寄放在他叔父杨士伟家里。

韦瑛前脚从厂狱回到宅中，后脚便被干爹汪直唤了去。进入汪宅瞥见

干爹气咻恼怒的样子，连忙上前请安。汪直一甩手中的奏本道：“瞧瞧！瞧瞧！商阁老这回都劾到咱头上来了，不扳倒他，咱还有什么颜面？”

汪直口中所说的“商阁老”是指商辂。原来英宗复辟，听信谗言，把他削职为民，赋闲十年。宪宗即位，于成化三年（1467）以原职诏复，商辂再入内阁。七年（1471）加太子少保，任吏部尚书，十三年（1477）进升谨身殿大学士。身为内阁首辅，商辂没有明哲保身，面对皇帝信任的西厂头目汪直，毅然上疏抗争。

韦瑛躬身捡起一看，明白干爹如此气恼的缘由。商辂向皇上奏了他们一本，是曰《罢革西厂疏》，里面具数了他们十一大罪状，末了说什么“革去西厂，罢汪直以全其身，诛韦瑛以正其罪”。

韦瑛一激灵，向汪直献计道：“孩儿刚从厂狱回来，正有桩现成的案子推在商辂身上。”于是，附在汪直耳细说原委。汪直喜道：“好主意，你作速去办。”

韦瑛一石二鸟，用心险恶，他知道杨士伟乃兵部主事，是兵部尚书项忠的人，与商辂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。如若让杨士伟出首，把这些钱推在商辂身上，便是他受贿的一个明证，何愁扳不倒他？于是来到杨府，拿话暗示杨士伟道：“杨晔供说有些银两暂存贵府，是用于贿赂商阁老的，其实与杨大人并无干系，到时只需杨大人做个证见……”

杨士伟气得一拍案桌：“岂有此理！这种丧天理的勾当，杨某实在做不出来。”韦瑛碰这一鼻子灰，大怒道：“给你体面不要，咱倒要看看谁的势大。”转身喝道，“来人呀，将案犯给我拿下！”

一班校尉不由分说，上前锁了杨士伟，径押到厂狱，任意拷打。比及天明，连说话的气都没了。韦瑛犹不解气，他抱着汪公公这样的大腿，撒手成网，屡兴大狱。京城天空终日灰蒙蒙的，压得人喘不上气。

徐贯隐隐觉得压力山大，汪直的势焰他是知道的，建宁卫指挥杨晔官

至三品，说拿下就拿下，且“鬻刑”加身；杨士伟也是六品京官，说没气就没气，还搭上一家老小披枷戴锁，届时都将人头落地。

“快去。”徐贯果断吩咐部属，“将杨晔一门户籍尽数焚毁，族人能遭则遭，所属田产悉数充作官田，以作赋税。”部属欲言又止，脚下迟疑不动。徐贯道：“你放心，有什么干系都由徐某担着。徐某始终记得恩公商大人教导：‘做官但求不欺心、不欺世，笔下不可枉杀一人。’”部属感念，得令离去，妥善处置徐贯交代的事情。

此后，徐贯“外艰归，复除福建参政”。说他父亲去世，归家守丧，三年期满，回到福建担任参政一职，官阶从三品，属副省级干部。

成化十八年(1482)，闽地大饥，饿殍枕藉。徐贯分管的“建、延、汀、邵”四府属于“八闽”中的上四府，因之背靠武夷山脉，故山厚泉足，与“福、兴、漳、泉”下四府相比，土地膏腴，粮食要宽裕许多。纵是如此也抵不过灾年，况限于闽地环境，历来山多田少，若按每户拥有田数统计，福建大约只有全国平均田数的三分之一(《中国历代户口、田地、田赋统计》)，自古就有“水无涓滴不为用，山到崔嵬尽力耕”之说。人均土地不足，本来粮食供应就紧张，遇到灾害更是糟糕。

作为分管粮储、水利、军务的地方官，徐贯颇有先见之明，他明白饥荒的救济若等到饥荒发生后是万万不行的。所谓未雨绸缪，要靠平时粮仓的积贮，积贮之法也有讲究，以官储预备仓为主导，其他如社仓、义仓等作为备荒的补充，这些措施落实到位，全靠地方官员的重视和防患意识。

身为地方参政的徐贯，深知粮食储备“陈陈新新”的重要性。头年入仓谓之陈，当年藏者谓之新，把陈米先予支出，而新米入仓，如此流转是为防止粮食发霉变质。丰年谷贱，徐贯加价买入百姓手中余粮，灾年谷贵，又减价卖给老百姓，不至于闹饥荒饿肚子，这是往年的情形。今年灾情特别严重，辖区内出现了不少流民，多有来自外省外府的，身无分文，集聚成群，

搞不好酿出变故。

徐贯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的焦躁和暴戾之气，社仓、义仓早已空空如也，只有官仓里还有余粮，饥饿的流民越聚越多，无声且暗潮涌动。徐贯隐约有些不安，他登高望去，远处依然有人流在朝这边滚动，这种感觉越发强烈，他果断向仓储官下令：“开仓放粮！”

仓储官惊呆半晌，嗫嚅道：“下官不敢，尚未接到藩台大人的公文。”话虽委婉，却是太极云手，意思明白不过：省长大人没有行文下令，他小小一个仓管官员不敢擅自作主。

徐贯狠劲上来，明显不耐烦了，他厉声道：“今日若不开仓放粮，本官先斩你首级以谢灾民，怕是等不到明日藩司的革职公文！”仓储官看徐大人神情果决，绝非戏言，慌忙回应道：“放。放。下官这便放粮。”

徐贯处变不乱，该做主时就做主，若心存私情，畏首畏尾，待上司公文颁到，流民早已变乱失控，不是饿死也必遭哄抢挤压、推搡踩踏而亡。开仓放粮，活命者不计其数，四府民众皆感其德。

弘治元年(1488)二月，有旨下：擢徐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巡抚辽东。

“狠人”徐贯来到九边之首的辽东。辽东不设府、州、县，代替以都司、卫、所，侧重于军事防御，兼理民政。巡抚均兼右副都御史，官职从二品，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。

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徐贯为了熟悉边务，东起宽甸的鸭绿江畔，西至山海关之无名口，策马行程近千公里，对长城要塞、军民屯田、关隘国防、虏贼犯境、敌我虚实等摸一个门清。边地无小事，巡察问访的弊端都亟待解决，诸如坍塌长城的修葺、屯田数目的清查、私役兵丁为奴等，或多或少隐隐约约指向一个人——参将佟昱。

徐贯首先要拿佟昱开刀，杀一儆百，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。出手之前他去找总兵官李杲谈谈，算是投石问路。边塞不比别处，弄不好会引起

军士哗变，若有最高军事长官李杲的支持，局面就容易控制。

这一日，徐贯登门造访将军府。李杲闻报慌忙出迎，双手抱拳，嘴上一喋连声道：“怎敢劳动徐大人亲临敝府。”边说边延请入座。

两人虽说官阶相当，但徐贯乃朝廷下派，又推行以文制武、以内制外的政策，兼着“钦差”的身份，握有先斩后奏的权限，风头自然盖过总兵官。

徐贯也不与之客气，直截了当道明来意：“连月来徐某踏遍边关要塞，查访参将佟昱多有不法事，不知将军可有风闻？”

李杲略显尴尬，回道：“徐大人有所不知，佟姓系辽东大姓，其祖先为女真人，后来汉化，在当地根深叶茂。佟姓世代从军，军伍中各级军职都有他们的人，盘根错节，势力庞大，极不好对付。”稍顿又道，“前任巡抚刘潺刘大人，就是被参将佟昱挤兑走的。”

徐贯道：“边境一日不宁，则朝廷一日不安。若任佟昱恣意为所欲为，将军如何面对皇上的谕令？”

面对徐贯不留情面的一问，李杲一时语塞，皇帝的敕令历历在目：“今命尔挂征虏前将军印，充总兵官镇守辽东地方，固守城池，操练军马，遇有贼寇相机剿杀，其副总兵、参将各照地方分守，所统官军悉听节制。”参将违法不就是他这个总兵官失职吗？李杲想到这里不禁冒出一头冷汗。他急切询问道：“徐大人有何差遣尽管吩咐，本官愿闻其详。”

徐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

且说参将佟昱，是日接到总兵官传宣，召集部众到辽阳议事。佟昱一丝不疑，只带了一小队亲兵护从，鞭马赴会。到了驻地，佟昱只身一人由将军府卫兵引入，其余随从暂去别院歇息。

佟昱大摇大摆入得堂内，但见总兵官李杲和一个文官模样的人坐于堂上，脸色冷峻，不怒自威。佟昱看架势，正有些疑惧，见那文官先开口道：“我乃辽东巡抚徐贯，今巡察访得参将佟昱种种不法勾当。某月某日，

查得佟昱分守防区，虏寇千余人入境劫掠，剽掠人畜，射伤我官军九人，战马六匹。参将佟昱接警，畏缩不前，拥兵不进。某月某日，又查访佟昱利用威逼抵换、侵渔兼并等手段私占屯田。某月某日，查有私役兵丁作为家奴……”徐贯有理有据，有时间地点，有人证物证。随后喝道：“佟昱，这些可都属实？你可知罪！”

佟昱见他桩桩件件证物齐全，原原本本如同亲历，一时间竟无话可驳。他不愿束手待毙，可眼下之境，只能徒作困兽斗。带来的亲随护从，已被缴械软禁，佟昱分守的防区徐贯早已派人安抚。佟昱自知碰到硬茬，遂低头认罪。徐贯这边飞章奏报不提。

参将之职仅次于总兵、副总兵，负责各区分守，相当于军区司令员。徐贯上任伊始，就把一个官至三品的参将拿下，一时震动九边。自此，但凡听闻徐贯出巡，各防区长官均敬畏有加，无不尽心尽责，贪墨心虚者皆瑟瑟发抖。

方象瑛在徐贯的传记中说：“七年（1491），召工部左侍郎，苏松洊遭水患，命往治。”

不得不说，弘治皇帝看人准、用人狠。他看上的正是徐贯身上那股子狠劲儿，他既能把边境治理得这么好，水灾自然也能治理得当。苏松地区一次又一次遭遇水患，这成了弘治皇帝的心头大患。苏松历来是大明王朝的粮仓，苏松在版图上看上去不大，却承担了全国百分之十以上的赋税，单苏州一府的税粮列全国布政司第一。无论是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的品种和产量，都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，故民谚有曰：“苏湖熟，天下足。”苏松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比寻常。

五十九岁的徐贯乍从塞外边地来到繁华的苏、松二府，还真有些不太适应。但他有自己办事的宗旨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这不，刚到署衙就挥毫题下一匾“百闻不如一见”，让人挂上，时刻警醒自己。

水情犹如军情。弘治七年三月，徐贯带着北方的风尘，沿江考察起灾情。徐贯打小在新安江畔长大，对水的脾性并不陌生。他时而官服官船，与地方官僚、乡绅一同巡视；时而又布衣粗服搭乘商船、民船，一路走走停停，与河工老伯问询交流。虽然都是亲历亲见，但结论却大相径庭。

徐贯沿途所见触目惊心，苏松一带地势平广，水高一丈，坍塌房屋城垣无数，甚至有溺亡尸首从船身漂浮而过。徐贯来之前曾有过预判，但实际灾情还是远远超出他的预想。他越看心情越沉重。

他一边察看河道水情，一边调查访问。凡能想得到、用得上的招他皆梳理过去，甚至连中医诊疗四法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都派上用场。治水如治病，人体筋脉堵塞则有胀痛感，水系不通则筑堰，两者何其相似乃尔。经过连日巡察走访，基本上把准了苏松水患之脉，整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。这场水灾既是天灾亦是人祸造成的。

所谓“天灾”是自然环境。江南地区东临大海，西抱太湖，东北依靠长江，地势平衍低洼，流沙淤泥抬高河床，其中又以“苏松最为低下”，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；加上连日降水，雍堵成灾。“人祸”就是人为因素，他想到自己在巡河期间，曾与一位老伯的一段对话。

老伯告诉徐贯：“你看这河岸两边的庄田，豪强霸占滩涂，修坝建圩，垦为良田，只将十之一二报官起科，每亩亦只三升、五升，征之官者不多，长此以往，水道日隘，遇到连日降水或是雨季，岂能不泛滥？”

徐贯追问道：“他田数报官起科，难道官府就不派人核实？”

老伯摇摇头，叹一声道：“官府里有他的人，下面经办者心知肚明，反正吃亏的是官家，经办人少不了得他好处，哪个愿意去作难人？”

徐贯明白了其中的猫腻，想到了一个狠招，他让人张榜公布，贴出告示：“本官连日巡河，查访私筑塍围良田，与各家报官起科数目不符，自今日起，限令三天之内，报官核查，补征三年税粮，逾期一律按无主田产处

置。”布告一连贴了三日，过后竟无一家前来认领核实，无论是豪强之户，还是官府那些暗线俱吃了一个哑巴亏，自认倒霉。

既然无人认领，那就一律充公。

人祸解决了天灾更好办。当前急务先解决清淤疏浚工作，加大加快积水的流量、流速，减缓城内居民生活压力。为此，徐贯日夜督战在河堤，数十万河工连续作业，俟年底基本完工告竣。

百姓生活、生产秩序基本恢复正常，按理说徐贯该走了。但他不这样想。要做就做到最好，从根上解决苏松水患。徐贯有个大胆的设想，与其挖掘淤泥，不如开挖运河，将苏松河与周围纵横交错的水系连接起来，彻底畅通水道，做到百病不侵、百年无患。

规划设想固然美好，可是如此浩繁的工程量，钱从哪里来呢？徐贯想到上下一齐抓，上面争取中央财政支持，下面力促地方财政配套，再则，鼓励乡绅捐赠及河工义工。他把治理苏松河的方略上奏皇帝。弘治皇帝嘉赏不已，允准实施。

徐贯历时三年，“役夫二十五万”，开挖数条运河，打通了苏松水系，彻底消除水患，同时，还为太湖等河道分流泄洪起到决定性作用。在此基础上，徐贯充分利用苏松肥沃的土地，在高阜之地开河蓄水，在低洼之地开辟圩田，加之原先豪强弃认的大片庄田，一并租于农户耕种，官府收取税粮。一时间，苏松地区鱼米之乡盛景再现，迎来了“弘治中兴”的巅峰时代，朝廷税赋比成化间增加了一百多万石，人口也增加一千多万。

“狠人”徐贯出色完成了治水任务，在中国水利史上书写了一段奇迹，留下了宝贵的经验，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因此受益。弘治九年（1496），“迁本部尚书”，因他政绩卓著，出任工部尚书，加太子少保。十三年（1500），上疏乞致仕，他主动要求退休养老，加赠太子太傅。驰驿归。十五年（1502）卒，享年七十岁。赠太保，谥康懿。

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介绍,徐贯有《余力稿》十二卷行于世。内容丰富,有辞、赋、歌、赞、传、跋、书简、祭文和四言古诗、五言古诗、七言古诗、五言绝句、五言律诗、七言绝句、七言律诗等。

“达尊者”徐楚

我研究淳安历史人物时，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那便是世德家风的影响力，绝不允小觑。比如遂安郭村的詹家、泮塘的毛家世代为宦，子孙多有建树，涓滴细流，绵长不绝，传承达千年之久。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”淳安蜀阜（今威坪）的徐氏、钱氏也不甘为后，单是南宋至明代，就有进士十三人之多。我们今天的主角名叫徐楚。

徐楚（1499—1589），字世望，号吾溪，淳安蜀阜人。明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进士，这一年徐楚四十岁。我查阅了嘉靖十七年戊戌科殿试榜单，徐楚名列二甲第六十六名，名次相当可观。不经意浏览间，我还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胡宗宪，就是后来成为浙江总督平息倭患的胡宗宪，他也是这科进士，只是排名比较靠后，位列三甲一百九十名开外。

徐楚初授工部主事，继升工部郎中，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），出任辰州知府。为了解徐楚在辰州的情况，我电话联系了湖南沅陵博物馆的代老师，从他那里收集到很多珍贵资料。

据乾隆《辰州府志》卷二十一“郡守下表·知府”栏“嘉靖”段记载可知，徐楚任职辰州的具体时间是嘉靖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（1549—1553），共计五年。

另据同治十二年重修的《沅陵县志》记载：“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），陶

钦夔为分守道，驻辰州，兼摄兵备事。时黔苗变，陷石阡郡，人闻风震恐，钦夔既经昼沅州，即倍道驰之郡，偕知府徐楚，督士卒修筑城池……”

这场“苗变”先从贵州石阡郡而起。石阡属于现在贵州铜仁地区，地处湘西丘陵向云贵高原过渡的梯级大斜坡地带，境内山峦起伏，沟谷纵横，紧邻湖南辰州地界，主要居住着苗族、侗族和土家族等少数民族。

“苗变”在明代是常态，时不时会来上几次，只不过这次闹腾动静有点大，让徐楚给赶上了。很快波及到湘西，土司之间有秘密联络通道，领头的是一个叫龙许保的人，副将叫吴黑苗，也是一个狠角色。苗军一路攻城拔地，冲击州县官衙，俘官夺印，毁狱纵囚，无人能挡。

作为辰州知府，徐楚第一要务是修筑城池，保境安民。当然，他也不忘走访当地官吏和乡绅，了解苗民习俗与动态，熟悉地形、地势、地貌、交通与环境，他深入到最基层，考察了战略要冲辰溪的船溪驿站。我们从他《宿船溪驿和壁间韵》一诗中，大略可知一二：

轻车迢递入沅山，夜色微茫草树间。
二水遥分铜柱界，千峰如渡玉门关。
邮亭蝶梦惊笳鼓，画角鸡声想珮环。
闻说中原多虎豹，群狸安问五溪蛮。

在夜色微茫，草树迷离之间，我轻车简从来到沅山的船溪驿站。“铜柱界”用了一个典故。说的是一千多年前，后晋楚王马希范在酉水河畔与溪州彭士愁的一场战争，彭士愁败北归降。他们在溪州会溪坪竖立铜柱，立下盟誓。马希范向彭士愁设立的底线是：“无扰耕桑，无焚庐舍，无害樵牧，无阻川涂，勿矜激濑飞湍，勿恃悬崖绝壁。”假如彭氏不守底线，则莫怪大军诛伐。既然是盟誓，就不只是单方面的要求，彭士愁也向对方提出诉求：

不许外人乱入诸州四界，劫掠诱骗盗窃。凡是王庭差纲，收买溪货，采伐土产，不准隐瞒占有。凡五姓首领、州县职掌有罪，均由本都申报依法惩罚，不要派遣官军攻伐。

颈联、尾联意思说：我夜宿船溪驿站本想在梦中超然于物外，哪知时常被笳鼓惊醒，在画角鸡声中不禁遥想起故乡的家室。我听说西北的戎狄和东南的倭寇，如虎豹一般觊觎中原，如今五溪苗蛮借机闹腾，我怎么会在这群偷鸡的狐狸呢？

徐楚说的不在意仅仅是要在气势上藐视敌人，战术上他还是要重视敌人的，如果真不在意五溪蛮，他怎么会夜宿船溪驿站，对兵家必争之地进行实地考察呢？他一边担忧边关的安危，一边思念故乡，家国情怀一肩挑，同时对于平定这场“苗变”充满信心。

诗中徐楚还向我们抛出了一个历史疑问：“二水遥分铜柱界”，既然已经有铜柱为证，汉苗就不应该再起争端，如果双方都能守住各自的底线，自然相安无事。可历史似乎又在轮回，铜柱盟誓，只是权力的交割、利益的均衡，而这双方的平衡一旦被打破，盟誓与合约瞬间会变成一纸空文。

历史有其必然的成因，现实更具利害之因果。

明代中叶，外省特别是江西一带有二十余万人，多是“屯垦”“从征”“宦游”以及从事商贾者，大批移居湘西，特别是沅江“五溪”地区，占当地人口半数之多。人口增加导致土地分配紧张，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加剧，迁入者多为汉人，势必侵占土著苗民原有的土地。官商勾结，开始以贸易利其财，继而因账债占其地，重利盘剥，巧取豪夺。“客民之侵占日见其多，则苗疆田地日见其少”，造成湘西苗众的强烈不满。如此一来，苗民失业，贫难困顿者日益增多。

此外，明代在湘西苗族地区设立卫、所制度，分设巡检司。如辰州府有大喇（保靖司地）、明溪（沅陵县西）、会溪、河溪等巡检司。为加强对“苗蛮”

少数民族的统治和控制，明王朝在湘西、湘南一带，还大肆分封藩王，据统计，有明一代共封藩王十五人之多，掠取财物，挤压了地方土司的生存空间，“侵占田亩，恣意欺凌”等事更是屡有发生。

徐楚鄙视贪官，痛恨欺凌行径，但对朝廷政策不敢妄议，每天面对着生灵涂炭，其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。他心里清楚，做官如果不投入自己的情感，没有爱民之心，没有切肤之亲，没有体恤之悯，没有灵魂追问，则无疑是官场上的傀儡、公堂上的摆设。他不愿成为这样的傀儡和摆设，他要就做做一个有血有肉、有喜怒哀乐、有情感诉求、有正义彰显、有担当作为的好官。

一般人骤逢乱局心里往往有些不落底，但徐楚在兵部任职达十年之久，对调兵遣将，固险拒守显得从容不迫。守是被迫的不是目的，守只是避其锋芒，是为主动进攻作准备的。在拒守期间他还做了一件事，那便是惩治豪强，严惩欺凌作恶者，并出榜晓谕，对苗民参与叛乱者，分别以善、恶、顺、逆区分对待，以此收服民心。

嘉靖三十一年(1552)三月，徐楚得到密报，苗军首领龙许保、吴黑苗被总兵官沈希仪、参将石邦宪追击，已领兵窜入辰州地界。徐楚预感机会到了，如果此时预先设计伏兵，在叛军所经之处迎头痛击，则胜算颇大。龙酋势必陷入后有追兵，前有埋伏的境地。他立马召集部属商议，兵分两路主动出击，力争一举将龙许保、吴黑苗擒获或者击毙。

平叛的过程是艰巨而惨烈的，辰州地势险要、鸟飞不渡，苗民常年生活在山中，习惯于兽迹鸟道、手攀脚援，官军都是汉人，伏击追踪凶险无比，人人奋勇当先。这个号称“西坡王”的龙许保，终于在沅陵徐楚布下的伏击中身亡，结束了其长达十余年的作乱。

我们在徐楚的《吾溪诗集》中看到了他的那首《征苗奏续》，读罢荡气回肠：

诸将提兵入五溪，军门遥镇楚天西。
关严虎豹旌旗闪，阵掣风云纪律齐。
鸟道凿开天驷下，鸟巢落尽暝猿啼。
捷书飞报承明殿，麟阁勋名取次题。

徐楚一介文人，诗中尽显豪迈之气，军威森列，纪律严明，有如神兵天马，把鸟道凿开，一举荡平匪巢，犹如拨开乌云见天日，诗中洋溢着激励、喜悦、自豪和欣慰。徐楚在辰州知府任期内，政绩卓著，捷报频传，期满后他会去往哪里呢？

我在查阅《蜀阜文集》时，看到一篇徐楚撰写的《徐氏祠堂碑记》，从中捕捉到许多有用的信息，兹录于后：

康懿公尝与兄少参公志营祠事而卒未就。嘉靖癸丑(1553)，楚以辰州守考满过家，众谓旧寝甚隘，先志莫承，乃谋拓地宅，偏之茶山，后镇东山，前对桃屏，左右数墩，环奇列秀，地灵祖荫。夫固有所待也。祠之建，经始于是岁孟冬之吉，落成于甲寅季秋之朔。楚适奉命兵备广西，复得便道归，与合族奉先代神主而享祀焉。

康懿公即徐贯，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，官至一品，明弘治十三年(1500)，致仕回到蜀阜，与徐楚应是同宗同族。他曾与徐楚的哥哥“少参公”商议重修徐氏宗祠，可惜居家不到两年病逝，修建祠堂的事就此耽搁了。文章开头还说“蜀阜徐氏，三衢沙溪之派，东海偃王之后也……谱始成于七世祖文一府君，太保康懿公续修焉。”可见，徐贯还参与宗谱的修纂，不是同宗作何解释？

嘉靖三十二年(1553)，徐楚辰州知府任期考满回到蜀阜家中暂住。这

年孟冬(农历十月)开始建造徐氏宗祠,次年甲寅(1554)季秋(农历九月),祠堂修建完工。徐楚恰好“奉命兵备广西”,说他调任广西按察司副使兼兵备道道官,顺道又回了一趟家,并与族人一起上祠堂祭祀祖先。

兵备道并不是常设机构,主管兵备、水利、屯田等事宜,大多临时因事而设。徐楚的本职是按察司副使,属正四品官职,或许这样的任命是吏部官员看到徐楚有这方面的才能。

广西杂居着众多的少数民族,地理环境与辰州也十分相像,徐楚对此并不陌生,处理公务均得心应手。他不孚众望,三年任期考满,复转调山东兵备道。

山东大片土地濒临渤海、黄海,“濒海之地,潮水往来,淤泥常积,碱草丛生”。面对大片抛荒的盐碱地,徐楚深入基层,走访了沿线百姓,询问记录历史上可资借鉴的经验。为此,徐楚耗尽心血绘写了《塞垣图》及《备边六策》,提出了辟荒芜、治碱卤、促农耕、正疆界、兴水利等治理方略。

所谓辟荒芜、治碱卤,具体就是“挑沟筑岸,以抵潮汛”。沟有大、中、小之分。小沟十数丈,中沟百数丈,大沟千数丈,三沟配套,或积注雨潦或引淡水灌溉,洗土去盐,使地表盐分溶入水中下渗或排出,斥卤既尽,渐可种稻。每块地大约2亩,以小沟相间,外围为大沟,改造后的土地连片可达万亩之多。此种方法因挖沟掘土台地,故有个名称,谓之“台田法”,由于效果显著,渐由沿海地区推广到河北、河南等中原一带。真正做到了利国利民,使“碱卤之地,尽成膏腴”。

蜀阜这一脉的《徐氏世谱》共八卷,是由徐楚修纂的,可惜毁于“文革”。前四卷收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,后四卷珍藏在安徽图书馆,无缘得见,难免遗憾。《淳安县志》里有对徐楚简短的介绍,说他在山东任职期间,“朝中大臣竞相推荐,称他‘有文武材,宜节钺重镇’。徐楚秉性刚直,与当时宰相抗礼,仅补云南屯田副使……后调任四川参政。在任上,革除贿赂等陋习,

得罪达官显贵，终被免职回家”。

当时的宰相应是严嵩。嘉靖二十一年(1542)，严嵩进入内阁，直到嘉靖四十一年(1562)，勒令致仕，把持朝政二十年之久，权倾天下，党羽遍布。徐楚抗礼严嵩，无疑是鸡蛋碰石头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实乃威坪人骨子里性格使然。

我在写淳安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，常常感慨他们的命运跌宕起伏，如同过山车一般。细思之下，其实与他们的性格息息相关。性格决定命运不是戏言。淳安乡村有句俗语很是形象，叫“腌定的酱，生定的相”。如若改变何其难哉！

话说回来，与其偷奸耍滑，不如率性而为、坦坦荡荡，活出一个真我！前文提到与徐楚同榜的胡宗宪，因依附宰相严嵩，官至一品，权倾朝野，但最终结局并不圆满，因受严嵩案牵累自杀身亡，年仅五十三岁。让人唏嘘叹息！

徐楚罢官回家的时间应在嘉靖四十三年(1564)。

徐楚有一篇《吾溪书院楼阁池亭记》，文中已明确告诉了我们：“予归林之七年，是为隆庆庚午(1570)，始于云松房隙地架楼，楼间读书其中，且课诸子讲习。堂曰‘怡恩’，志赐归田之乐也。楼曰‘明月’，仿庾公南楼意也。楼之外有门，则以别号‘吾溪’为书院名。”

隆庆庚午(1570)往前推算，恰在嘉靖四十三年。徐楚归林之后没有闲着，而是在蜀阜创办“吾溪书院”，课宗族子弟读书，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。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，流传至今的有《吾溪诗集》上、下卷。

蜀阜有蜀溪，蜀溪襟三水。三水者横塘源、始新源、德教源之谓也。三水交汇奔流而下，其势湍急有类峡水，注入新安江。

归家之后的徐楚，眼里的景物皆入诗词，蜀溪襟三水，在诗人眼里又会是怎样一幅画面呢？我们来看他的《峡川映月》：

三峡流来汇一川，月光浮动两婵娟。
亭栖玉宇无尘地，人在冰壶不夜天。
对饮何须更秉烛，凌虚直欲扶飞仙，
徘徊不尽南楼兴，独踞胡床咏未眠。

三水汇归于蜀溪，婵娟映照其中，清辉浮动，水榭亭阁犹如坐落在天际，不染纤尘；人坐其间，皎洁无瑕，仿佛身处不夜天。乘兴对饮无须张灯秉烛，凌空登高好似仙人飞天；南楼玩月徘徊不尽，我浅斟低吟睡意全无。

再如《桃屏晚翠》：

溪上孤峰对草亭，松阴展处翠为屏。
云浮绝壁随舒卷，鹤宿高松几梦醒。
箕踞谁能双眼白，盘桓应共四时青。
掀髯一笑归来晚，风弄笙簧隔水听。

桃屏乃蜀阜十景之一，全称“桃屏爽气”。徐贯曾作文描述：“（蜀）溪之旁有山如桃状，秀丽特出，每日色初霁，烟消雾散，爽气逼人，曰桃屏爽气。”我记得西湖十景有一景叫“南屏晚钟”，是说每到傍晚时分，西湖边上净慈寺的钟声敲响，清越悠扬，在湖畔回荡，从而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而“桃屏爽气”则是靠气取胜，我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，如此全方位调动人体感官，将自然之“声”“气”等实境捕捉入画、入景、入文。

这首诗定然是徐楚归家后所写，此时，他的心态已经非常平和，淡然自若，宠辱不惊，闲适悠容。也难怪徐楚能够高寿。

徐楚九十岁那年，朝廷下旨为他建造一座“达尊坊”。“达尊”二字典出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，是孟子与景子的一段对话。孟子说：“天下有达尊三：爵

一、齿一、德一，天下通尊。”意思是说，天下公认最尊贵的东西有三样，一个是高爵，一个是高龄，一个是高德。徐楚的爵位与同榜同朝的胡宗宪、同族同村的徐贯相比，虽不能算高，但高龄和高德确实名实相符。

提刑官徐廷绶

人生天地间，追本溯清源。

借问经年事，河溪话吏廉。

看过电视剧《大宋提刑官》的人，怕是对提刑官的职责有点误判，他们好像整天都在勘伤验尸，净干些法医的活，其实不然。我们今天的主角徐廷绶，官至万历朝陕西按察使。明代省一级地方官员分为三司，即布政使司、按察使司、都指挥使司。布政使管民政，相当于现代的省长；按察使管刑名，相当于现代的省公安厅长、省法院院长兼省检察院检察长；都指挥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。徐廷绶集公、检、法于一身，是名副其实的提刑官。

淳安徐氏一族，有湖溪、蜀阜、河溪、剑溪、凤坡之分。除剑溪、凤坡一脉来自安徽歙县，其余三支均来自三衢。

徐廷绶属于河溪这一支。宋初有先祖在睦州做官，于是选择定居于此。一世祖五府君开始从睦州(建德)迁徙到了淳邑西郭铁井岭。宋钦宗时，六世祖陟公，作《五经解》训诫子孙，人称五经先生。宋末元初，天下纷争，九世祖仁荣公，从西郭迁至六都河溪(河村)。

徐廷绶，字受之，号锦泉。出生于明正德乙亥年(1515)，可惜《河溪徐氏宗谱》毁于“文革”，我只从几年前新编的族谱里查到“晔公季子”四个字。

粗略推知他是晔公的第三个儿子。

明嘉靖壬戌(1562)一科,徐廷绶进京参加会试,考中进士。我查了殿试金榜排名,这一科共录取二百九十九人。甚至徐廷绶位于二甲第八十一名。这一年,他四十八岁。

朝廷并未在当年授予他官职,徐廷绶归乡省亲,徐家自然早已接到快马的喜报,不仅传遍河村,甚至整个都邑都在争传。一时间,徐家门槛被踏破了,道贺的、讨赏的、看望新科进士的,前脚送走一拨,后脚又来一拨,人挨人档期满满。

这一日,徐廷绶刚送走了一拨客人,见门口一个官差持了拜帖求见,徐廷绶延请入屋叙话。官差道:“海知县有请进士爷到衙门,有话交代。”徐廷绶素闻知县海瑞的清名,海瑞对徐廷绶也不陌生,他刚到淳安任职的时候,县学教谕赵公辅就多次在他面前提及这个名字,夸他有胸襟,见识不凡,将来必有成就。

徐廷绶记得,前几年海大人亲力亲为,来到河村丈量土地,还是家父做帮手审田形,核粮数,协助丈明归册,海大人一点没有官架子,干起农活驾轻就熟,晚上还在他家借宿。想起这些,徐廷绶不禁对海知县肃然起敬。

廷绶随官差到了淳安县衙,见过海大人。海瑞开门见山道:“恭喜的话就不说了,你是正途出身,将来肯定是要补缺入仕的。我马上就要离开淳安了,海某身无长物,就送你两句话:‘尔俸尔禄,民脂民膏。良民易虐,上苍难欺。’权当是临别赠言吧。”

徐廷绶听罢,感慨良久。他见海瑞一袭公服陈旧不堪,已打过多处补丁。论年庚他只比自己大两岁,消瘦的脸庞布满了皱纹,须发已然半白,看去有些苍老,但神情却异常刚毅。海公为什么深受百姓爱戴?那是他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,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,是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的人。想到这里,徐廷绶对眼前这位海大人充满了敬慕之情。

徐廷绶听说海瑞考绩已满，本当升迁嘉兴府通判，不料鄢懋卿从中作梗，指使巡盐御史袁淳弹劾海瑞“倨傲弗恭，不安分守”，使海瑞罢官离开了淳安。

事情的起因是，嘉靖三十九年(1560)，鄢懋卿以左副都御史一职总理两浙、两淮盐政，相当于以最高检副检察长身份出京，这在当时确属少见。他一路上敲诈勒索，大肆敛财，所到地方，不堪其扰。可他偏偏以“素性简朴，不喜承迎”标榜自己。有一次途经淳安，海瑞巧妙地用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”法，也写一封信说：“仰知台下为国为民，言出由中，非虚设也……”把鄢懋卿一顿冷嘲热讽，挖苦一番。气得鄢懋卿绕道淳安而去，从此记恨海瑞。

海瑞离任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不胫而走，山乡旮旯人尽皆知。时值十二月冬季，淳安的父母乡亲扶老挈幼，有的甚至赶了几十里山路，顶着寒风纷纷前来送行。

徐廷绶目睹了这个壮观的场面，眼泪怎么也收不住。乡亲们淳厚朴实，他们沐海大人之恩，念海大人之德，但凡父母官的一言一行，他们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常言道：百姓易感难欺，天道自在人心。做官就应该像海知县这样……

“你是新科进士，不如就代表大家，为海大人写一篇去思碑记吧？这样我们心里也好受些。”人群中有人提议。徐廷绶望去，黑压压一片人头，众人齐声附和：“嗯呐！代表淳安百姓写吧。”

徐廷绶分明感觉到道义在肩，沉甸甸的嘱托，重于高山。

“好，徐某答应你们，一定把百姓的心里话写进去！”

就在海瑞临行前，徐廷绶代表淳安数十万百姓，提笔写下了《海刚峰先生去思碑记》。这篇碑文洋洋洒洒一千余字，如今安放在龙山岛海瑞祠正厅，记文称：

乡士大夫暨耆老辈，属余记之。余雅辱侯教泽，又淳民中被德尤深者，曷敢以不文辞。

……今郡邑以去思碑者林立，求无愧于碑文所载者几何人？若我海侯，殆古之遗爱欤。其永孚民心，去思有以也……侯之政在吾淳者，百代而为范；侯之泽在吾民者，百年而未艾；侯之心在民所未尽谅，众所不及知者，足以表天日、质鬼神而无愧。是故有孚惠德，有孚惠心，不市名而名垂不朽，百姓永受其福，而绎思勿谖……

这通碑文，可以说是海瑞在淳安任上的真实写照。

停过一年，吏部有行文颁到，授徐廷绶为刑部主事。主事在刑部虽说是下级官员，却也官至六品，负责复核各地送部的刑名案件，审理监候的死刑案件和京畿地区待罪以上案件，件件都是人命关天，职责重大。

却说这一日，徐廷绶正在当值，几个同僚在低声议论，一人说：“好一个‘海笔架子’，刚给他升了官，就把万岁爷给骂了。什么难听拣什么骂，气得万岁爷大吼：‘快抓住海瑞，莫叫跑了。’”

另一人接口道：“跑什么跑？海笔架是抬着棺材去的，递奏章前，早遣散了家眷与仆人，期以必死哩。”

这人摇摇头道：“可惜，这回命是不保喽。他一个户部主事，偏要管万岁爷炼丹修仙的事，听说递上去的这道疏有三千余字，字字戳心，内有如‘嘉靖，嘉靖，是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’。”

徐廷绶吃这一惊，认为此事非同小可，急切问道：“海瑞如今人在何处？”

这人道：“这不大枷钉了，押在锦衣卫大牢里。”

徐廷绶道：“海公为人，徐某素知，苟可以正君道，安天下，身之利害有所不计。现如今有什么法子可以申救？”

这人再惊愕道：“你想申救？这时候人人避之犹恐不及，你出这个头就不怕受牵累？”

另一人从旁劝道：“海瑞是圣上点了名的，内阁那些大臣皆是在一处观望，没人敢出头申救，徐主事你有心也使不上劲儿哪。”

徐廷绶决然道：“不求事济，但求心安罢！”

入夜，徐廷绶做了一个决定，明日就去探监。他知道海瑞属于钦犯，弄不好会搭上自己的前程，甚至是生命，即便如此，他也必须去，因为这个决定既是为自己，也是替淳安百姓做出的，一个爱民的好官不能就这么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，自己不能眼睁睁看着，却没有一点作为，淳安人历来懂得知恩图报。

次日，徐廷绶准备了一些酒菜，分装了两个食盒，专程来到锦衣卫大狱。牢头禁子都是相熟的，上前问道：“徐主事今日提审何人？”

徐廷绶道：“徐某是来探望海瑞海主事的。”

牢头把徐廷绶拉过一边，提醒道：“这是万岁爷钦点的要犯，你何苦来着？不怕受累于你？”

徐廷绶拱一拱手道：“海公曾是家乡的父母官，是百姓认定的好官，徐某拜托各位，手下留情，费心照应。”说着，把其中一个食盒交予牢头，“这些酒食给兄弟们分了吧。”

牢头引着徐廷绶往牢房里走，边走边摇头道：“没见过这样蹈死不惧的人，昼夜用刑拷问，硬是不吭一声。”

徐廷绶点点头道：“不愧是海笔架。”

牢头好奇问道：“怎么叫这么奇怪一个名字？”

徐廷绶道：“这是海主事做官的原则，不谄媚上司，见上司不跪。你想，旁边两个人跪着，他一个人杵着，这场面，不就是个笔架子吗？”

牢头不解道：“这不犯痴吗？上司是好去得罪的吗？”

徐廷绶叹一声道：“这般犯痴的忠正谏臣怕是不多见了。”

说着到了牢房门口，落了锁，牢头交代几句退下。

徐廷绶见一个黑影躺着，想必是海公，往前欲扶起，全身血肉模糊，竟没有下手处。廷绶轻声唤道：“海公，海公……”

海瑞睁开眼，见到徐廷绶，挣扎着坐了起来。急切道：“你作速离开，锦衣卫正奉命搜捕海某的同党，你来看我岂不是自投罗网？”

徐廷绶见海公在廷杖之下，已是体无完肤，还念想别人的安危，真君子也。遂感慨道：“廷绶也是七尺身躯，同为朝廷命官，海公不畏死，廷绶独惧之？”

海瑞道：“嗯，我已将身后事托付同乡。舍生取义乃臣之职守。皇上无心朝政，日日炼服丹药，师事陶仲文，一味求长生，海某誓死上疏劝谏，唯愿皇上幡然醒悟，则天下何忧不治？万事何忧不理？”

徐廷绶不无忧色道：“海公这道《治安疏》振聋发聩，京城里都传遍了，海公说‘陛下之误多矣，其大端在于斋蘸’，又把陛下比作商纣王，皇上如何不气恼？”徐廷绶口中所说的《治安疏》，后来史家把它称为天下第一疏。

海瑞道：“皇上二十余年不理朝政，如此沉痾不用猛药咋行？海某没有顾及别的，愿皇上一振作间而已，一振作则百废俱兴，天下之治与不治，民物之安与不安，皆取决于此。”

徐廷绶望着海瑞专注的神情，话语里全然是朝廷兴衰、天下之治、百姓之安等，一句也没有提及明天自己是生还是死。他从食盒中取出酒菜，斟满一杯酒，双手递给海瑞，道：“海公保重，明日徐某再来问安。”

徐廷绶说到做到，不但连日探视，还带去了治疗棒伤的药，有内服和外敷之别，并置办了全新的内衣，帮海瑞换下血衣，敷上膏药。外面仍旧穿原来的脏衣服，以掩人耳目。经过两个多月悉心调理，海瑞已能下地行走。

转眼到了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十二月十四日，嘉靖皇帝在皇极殿驾

崩。张居正提议在乾清宫发表，以此弥补皇上二十多年不视朝的遗憾。裕王朱载堉即位，是谓穆宗，改元隆庆，下诏“释户部主事海瑞于狱中，复职如故”。

隆庆元年(1567)，太监冯保职掌司礼监，兼督东厂事务，气焰嚣张，权势逼人，为了结党营私，排除异己，冯保设计将内阁老臣、首辅高拱，削职为民，遣回原籍。一时宫中人人自危，畏惧冯保。

徐廷绶依然当他的刑部主事，依然性格耿直、依法办事，他看不惯太监弄权，枉害忠良，不买冯保的账。一次，冯保以盗贼名诬陷无辜者十余人，发下刑部复审，本以为象征性过一个场，待刑部拟个罪名，好将一千人等斩决了事。

经过一番细审，徐廷绶发现卷宗内夹杂很多无辜者，依律把他们都释放了，不予治罪。同僚惧怕冯保气焰，劝徐廷绶按冯保旨意行事，徐廷绶凛然正色道：“祖宗法在，不可挠也。杀人以媚人，如天理何？！”他作为刑官无畏无私、不惧权势的一腔正气，颇有当年海笔架的风范。

隆庆四年(1570)，徐廷绶出任辰州知府。辰州最早是獠人、濮人居住地，为湘西少数民族居住区。辰州所在地是沅陵，战国时为夜郎都城，梁天监十年(511)，“辟沅陵县置夜郎县”(《沅陵县志》)。我们读李白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》诗：“杨花落尽子规啼，闻道龙标过五溪。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。”这里的夜郎就是指辰州，现在的沅陵一带。

徐廷绶到任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将王阳明讲学的虎溪精舍，改为虎溪书院，增建讲堂当仁堂6楹，翼以号舍，“教诸士以同仁之学”(《辰州府志》)。

在湖南辰溪县辰阳镇铜湾溪的沅水河岸丹山的崖壁上，有一片丹山摩崖石刻群，其中“碧水丹山”四字的摩崖石刻，就是由徐廷绶题词、何仕遭书写的。石刻高零点七五米，宽二点三米，距离河面十点五米。有“万历元年秋吉，淳安徐廷绶题”。落款为“铜仁何仕遭书”。

我在《辰州府志·卷八》找到徐廷绶写的一首五言律诗,《宿舡溪拟游偏崖不果》:

古驿船溪上,停鞅正夕阳。
觅幽怜洞远,搜句引杯长。
窗月窥人瘦,盆兰入梦香。
角声催早发,草树共云黄。

从这首诗题看,是徐廷绶在辰州任上所写。他来到古驿站船溪,恰好是傍晚时分夕阳落山,本打算到对岸山崖一游,因为附近还有丹山、二西山等名胜,却没能成行,没办法只能暂且住下,夜宿驿站,当地有民谣曰:“走遍天下路,最难船溪渡。”滩险水急,摆渡不易,晚上舟行更不安全。这里的驿站还是太祖于壬戌年(1382)设置的,面对着驿馆、栓马场、下马石、风雨桥、茶楼等遗迹,“觅幽怜洞远”,此洞当指二西山藏书洞。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,文化遭遇空前浩劫,这时候,一个叫伏胜的博士官挺身而出,冒着灭族的风险,悄悄抢出二千余卷书简,分装了五车,偷偷运出咸阳城,一路往南奔走,陆车水舟,经洞庭,转沅水,逆酉水而送达“鸟飞不渡”的二西山山洞,将这些经典书籍藏匿洞中。此后,这个山洞成了中华文化薪火传承的圣地。

徐廷绶作为辰州最高长官,朝拜二西山藏书洞,不失为是对文化的一种尊崇。

另据清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藏书中,录有徐廷绶《锦泉集》与《何溪集》。有幸看到了他与朋友的唱和诗,《胡松麓自瑞州以书见寄》:

搔首西风里,怀君思惘然。

江湖千里隔，云树寸心悬。
客泪随猿落，乡书有雁传。
惟应今夜月，相对共遥天。

胡松麓何许人也？我们查阅了相关的资料，得知他名叫胡同文，字子尚，号松麓，建德寿昌人，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进士，历任刑部陕西清吏司主事，江西清吏司员外郎，授奉直大夫，官拜江西参政。

由此可见，胡松麓曾是徐廷绶在刑部的同事，后来外放到瑞州（今江西高安）做官，一个淳安人，一个建德人，走出省市进了京城，视彼此为老乡。两人情谊深厚，不时有书信往来，鸿雁传诗。这首诗应该写于秋冬季节，大意是：收看你的来信，我站在寒风中独自搔首，思念之情油然而生，胸中惘然若失，虽然我们远隔千山万水，但彼此牵挂之心未断；鸿雁带来了乡人的音讯，客居在外的我听到猿啼之声，忍不住伤情流泪，唯有今晚这一轮明月，让我们可以遥相寄思。

此类诗看似寻常，却皆是至性之语。

辰州任上，徐廷绶除了扩建学校，还治理水患，存问孤寡，赈济饥民，颇有政绩。离任辰州是在万历三年（1575），之后出任陕西按察使，掌一省之刑名，官至正三品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提刑官。

徐廷绶卒于万历戊寅（1578），享年六十四岁。他致仕的具体时间，以及归葬处尚不得而知，暂且存疑，留待日后考证。

倚剑长叹话詹理

记得是一年十月下旬，一年一度的农村历史建筑修缮项目申报工作结束，按惯例我们要到现场进行勘察。一天，我们来到汾口鲁村。祠堂修缮关乎世德家风、族脉族运、祖业祖产，更是积德行善之事，村民热衷支持，干部积极性高。车到村口，该村詹书记早已等候多时，热情陪同我们来到“一中堂”察看。

砖雕门坊，气派彰显。虽然青苔和杂草爬上了屋面和檐口，墙体开裂，粉层剥落，瓦垄倾圮，但遮掩不了它曾经的精致与讲究、繁富与尊荣。

“嘎吱”一声，詹书记落锁推开祠堂大门。眼前的景象出乎想象。说实话，我参与勘察的祠堂不下两百座，像“一中堂”这样如此凄凉、破败的，确不多见。当时我心中冒出了“环堵萧然，不蔽风雨”之感。

此刻，东厢廊墙角一块石质匾额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上有“世科甲第”四个楷体大字，这分明指向詹理。于是，我与詹书记聊起了詹理，聊起了三十年前发掘他墓葬的往事。詹书记告诉我，村老龄委还有一块石碑，上面文字也与詹理有关。我饶有兴趣，从祠堂出来，径直来看碑石。轻轻拂去碑上尘土，弯腰粗粗辨去，是詹理给祖母余安人（雍）写的墓志铭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不及细看，我们告谢离别鲁村，又马不停蹄奔赴接下来的站点浪川、姜家。

这年八月中旬，县文联原主席刘志华生病，从杭州转回淳安，我去县

中医院探望他。见他形销骨立，斜躺在床上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神情专注地看着，见我叫他，连忙坐起身来给我让座。我鼻子酸酸的，脸上依旧平静，一边坐下一边询问他的病情。他豁达地用几句话带过，话题转到淳安历史人物，告诉我在杭州看病期间，他专门跑到浙江图书馆查阅史料。谈到项文曜、方学龙、詹理……

我与刘主席隔着辈分，却是亦师亦友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，我比较犀利，他相对平和，但不妨碍我们达成共识。他对淳安文化事业认真而执着，且饱含一腔热情，几十年来始终如一，这是最让我敬重的地方。巧的是，在聊天过程中，我得知他请的一位护工，是汾口鲁村人，也姓詹，与詹理是同宗同族。

回去之后，我想把刘主席提到的这几个人物整理一下，不妨就从詹理开始吧。电话联系鲁村詹书记，说我至今还惦记着村老龄委那块石碑，希望能拍张照片发给我。詹书记让我找村文化员方碧娟。于是添加微信，接收她传送过来的碑石照片。借此机会向他们表达谢忱。

碑文五百余字，我们择要述之。

詹理祖母余雍，汾口云林人。生于景泰丙子(1456)七月初一日，卒于嘉靖庚寅(1530)八月十二日，享年七十五岁，葬于王村石突上。余雍十五岁嫁到詹家，平日乐善好施，“有贫无给，死无殓者，安人助之，不迕大父(祖父)。”余雍有四子一女。依次为文福、文禄、文禧、文禎。其中文福、文禎先卒；一个女儿叫福详，嫁给吾溪鲍琢。

詹理父亲名文禧，字得庆，号拙斋。据明代监察御史余乾贞所撰《文禧公行状》记载：“詹氏祖先乃南阳人(今河南)，五代时有讳至兰者刺睦州，其子承礼留居遂安西原，再传宗乔迁泉塘，又再传廷芝，改今古明家焉……性孝友，读书识大义。”文禧娶吾溪鲍氏为妻，生有五子，依序为珙、理、珪、玠、璜。

詹理在家中排行老二。字夔卿，号松屏，生于正德丙子年（1516）七月十七日。卒于万历壬辰（1592）六月初五日，享年七十七岁。他少而颖异，“未冠即能通五经，综百家”。三十五岁那年，考中嘉靖庚戌（1550）科进士。积官监察御史兼河西学政。

他在会试之前，曾经拜蜀阜的徐楚为师。他自号“松屏”，正是与这段求学经历有关。

徐楚有一篇文章，记述了詹理别号的由来：“昔之颂君子者，必比德于松……予友松屏柱史，盖尝从事于斯，与之论交者今四十年。忆昔登楼见予座右，有独对松屏之句，日三复之，每讲暇则指屏而言曰：‘某窃有志而未逮也，请服膺以自名可乎？’予曰：‘君子哉！’其为此名也，夫子所谓岁寒后凋者，其不在兹欤？别数载，柱史学益力、养力充，取科第如拾芥，蜚声四达。”

詹理拜徐楚为师，余乾贞在《文禧公行状》里，也专门提及：“（公）为人质直，淳笃仗义，疏财不惜小费，其治家一以勤俭为本。课诸子耕，独仲子理使习举子业。时淳安徐君楚，以春秋高第，丁内艰，遣之受学。”徐楚考中进士的时间是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，时年四十岁，他比詹理大十八岁。徐楚中进士后恰逢母亲去世，按例回家丁忧。文禧公就让二儿子詹理师从徐楚习《春秋》。

徐楚为官清廉，敢言直谏。詹理考中进士时，徐楚已出任辰州知府。后在四川参政任上，抗礼严嵩，得罪权贵，被免职归乡。詹理性格上与徐楚有相像之处，耿直不阿，刚毅廉明。他最终丢官的原因，与老师徐楚一样，竟也因为严嵩、严世蕃父子。

詹理升官的时间和路线，据他自己撰写的《詹夫人方氏圻志》里，明白白告诉了我们：“夫人讳珮金，同里方文恢公之女。归予有妇行。嘉靖庚戌（1550），予举进士，官中书。夫人从宦京师。癸丑（1553）转陕西道监察御

史。甲寅(1554)按甘肃,夫人从予便道归省,八月十六日午时卒于家,距生正德乙亥(1515)八月初四日戌时,年四十。子五,滢庠生,泮、沛、汴、淑。庚申(1560)十一月廿二日,卜葬于七都柘川里姜后山,龙形坤山艮向,虚其右二,为予并继室徐氏寿藏。”

由此,詹理的夫人名叫方珮金,是同乡方文恢的女儿。嫁给詹理以后颇守妇道。詹理于嘉靖二十九年举进士,官中书舍人,夫人便跟随至京城照顾。三年后,擢升陕西道监察御史。次年,巡按甘肃,詹理与夫人一起回家省亲,由于旅途劳累,加之本来身体有病,在京城时,方氏就劝丈夫纳了一个吴姓女子为妾,方氏怀小儿子詹淑时,吴氏也有孕在身,可惜哺乳期间就夭折了,吴氏也很贤淑,就用奶水喂养詹淑,日夜照看,视如己出。

方氏到家不久便病故了,葬于七都柘川里姜后山,并在方氏墓葬右边预留出两个墓室,百年之后,詹理和继室吴氏也归葬于此,这与我们三十年前发掘詹理墓葬的情况是一致的。

詹理赴甘肃上任前夕,好友太仆少卿刘学易有《送侍御松屏詹君分按甘肃》长诗相赠:

使君钟岳产非常,少年献赋拟长杨。
俊才壮节逢昌运,绣袍白简生辉光。
天语丁宁代巡狩,风裁卓越严冰霜。
先声陇右稜威动,月白中宵胡走藏。
澄清汉法霜台迥,大雅周官俎豆香。
豺虎尽除功独懋,芝兰多种名逾扬。
谟烈只应京世彦,凤麟不得归禎祥。
雄剑鸣空寒北斗,匡时吾道属当阳。
即今南北暗戎马,况兹水旱民皇皇。

寄命眼前生犹线，枵空无计逐逃亡。
丈夫目击婴怀抱，寸心激烈持刚肠。
向隅多少悲生事，普照尤宜先绝荒。
好将勋业酬君简，属耳关山奏太康。

这首诗是嘉靖三十三年(1554)五月，詹理巡按甘肃，出行之前，刘学易为他壮行赠别。诗中情感复杂，既有对詹理的肯定赞美，又有对他在险恶环境中的担忧，还有对詹理建功立业的信心与期盼。

尽管来到了穷荒之地甘肃，从詹理自作诗《西宁道中》，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境：

湟中四境接穷荒，揽辔西游肃命将。
赤日不磨山积雪，清秋先到草惊霜。
行从问俗方停盖，坐未移时又束装。
自愧菲樗空倚剑，升平何以答明王。

环境虽然险恶，意志不能消磨。不能只是空倚剑无作为，仍希望建立功业，报答圣明的君主。

可事与愿违。詹理巡按甘肃任上时间不长，仅两三年。

新版《淳安县志》，关于詹理的记载非常简单，只有三行文字。说他“会星变，忌者中之，遂落职归，筑‘怡老园’读书自适”。詹理为官时间头尾加起来不过六年。

关于詹理被罢官一事，历来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我查《古明詹氏宗谱》，内有詹理好友赵祖鹏所撰《明故詹母鲍氏墓表》一文，里面说得很清楚：

……予与詹君过从为密，每纵论天下事，君侃侃可敬。时奸臣世藩方窃国柄，蒙蔽操切，胡虏入郊甸，都城昼闭。詹君愤惋痛骂，闻者生气。……癸丑(1553)余再试登第，改庶吉士，业中秘书。詹君时已迁监察御史，巡鞏轂、巡甘肃，所在有声。世藩势益炽，时时搏诸不附己者。而御史君乃益侃侃持正。又明年下李太宰默诏狱，幽杀之，傍击敢言者。御史君用是免官，鹏力不能拯，以为恨。鹏，婺人，睦壤相接。君既家食，睦人来京师，余时时邀致，问君启居。知厥尊拙斋公(文禧)之贤，暨母夫人鲍懿行甚悉。岁戊午(1558)秋夕，鹏合乡同年宴于邸，酒酣话旧，共忆御史君，相顾叹息。给谏(谏言、监察官)吴君，时来在坐，犹切齿恨恨。明日疏列世藩之恶于朝，世藩乃杖窜给谏君，谋道杀之。将株连传相徐公阶。余从中绾解，阱竟虚设，乃大憾余。明年己未(1559)秋，御史君母夫人讣闻京师，诸乡同年率奠，嘱余文。而世藩憾余亟，文不及为。明年庚申冬，竟逐余俾奉敕诘戎于楚，未至，复移之蜀，未至，复以星变免余官。辛酉(1561)七月，归舟过睦，将邀君话旧钓台。时郡县多为世藩耳目者，故人韩叔阳方守睦，闭城拒余，冀以邀宠世藩。余为之大笑，遂弗邀君。明年，圣明察世藩奸状，比诸贪饕投畀远裔。于是，奸党稍解散，道路不梗。詹君始敢以书币托中表鲍生文直，持睦节推应龙状，为母夫人乞墓文于余。……余其曷敢辞，遂按状爰勒墓石文曰：夫人姓鲍，世吾溪……

原文有点拗口，允我稍作解读。

赵祖鹏乃金华东阳人，生于正德壬申年(1512)，己酉年(1549)乡试，与詹理同年中举，次年会试未考中进士。两人成为好朋友。他说自己与詹理来往密切，两人一起谈论天下事，詹理总是一腔正气，令人敬佩。当时，严世蕃掌握了国家大权，蒙蔽圣上，办事急躁。导致蒙古俺答汗入侵郊畿，弄得人心惶惶，连白天都紧闭城门。詹理愤惋之下痛骂不已。

嘉靖癸丑年(1553),我考中进士,改庶吉士,业中秘书。詹理擢升为监察御史,巡按京畿、巡按甘肃,皆有声名。严世蕃权势日炽,经常打击那些不依附自己的人,而詹理不理睬这些,仍然持正守节。嘉靖乙卯年(1555),严世蕃等人构陷罪名,下吏部尚书李默于诏狱,并暗下杀手,杖毙李默。以此敲打那些敢于直言的人。詹御史因此被免官,以我的力量根本无法施以援手,只能引为憾事。

我乃金华人,金华与睦州接壤。詹君闲居在家,睦州人(严州人)来京城,我常常邀请他们到家里招待,顺便打听詹理的起居生活。详细知悉了他父亲拙斋公之贤,以及母亲鲍氏的懿行,甚觉宽慰。

戊午(1558)秋末,我与在京的同乡同年聚集在官邸,饮酒话旧,谈到了詹御史,觉得他丢官冤屈,大家相顾叹息。谏官吴君当时也在座,尤其愤愤不平。第二天,他上疏一道,罗列了严世蕃恶行,奏于朝堂。严世蕃起了杀心,令人一通乱棍将吴谏官打出,还株连到阁老徐阶。我从中斡旋解绶,此陷阱深不可测,严世蕃因此对我失望至极。

明年己未(1559)秋,詹御史母亲讣闻传到京师,诸乡同年一起致奠,大家嘱咐我写篇墓表。而严世蕃恨我急迫,我来不及动笔。次年庚申(1560)冬,(世蕃)竟把我驱逐到楚地,不久,又徙之于蜀地,不久,又以“星变”的借口把我免官。辛酉(1561)七月,我回乡坐船路过睦州(严州),打算邀请詹君至钓台叙旧。当时郡县多有严世蕃的耳目,就连老朋友严州知府韩叔阳,也拒绝跟我见面。他希图这样能邀宠严世蕃。我大笑不已,遂放弃了邀请詹君的想法。

又过了一年,皇上察觉严世蕃等人的奸状,放逐了几个贪得无厌之人至边远地方,这些奸人才稍有收敛。詹君才敢带着稿酬托母亲家亲戚鲍文直,拿着严州节度推官应龙的书信,请我为母亲鲍夫人写篇墓表。我不敢推辞,于是按应龙提供的内容,勒墓石文曰:“夫人姓鲍,世吾溪……”

可见,这篇墓表来之不易,经历曲折。

詹理听说自己被罢官后,没有悲悲戚戚,他叹一声道:“人生贵适志耳,吾二亲在堂,承颜昕夕。古人不以三公易者,矧得遂棠棣之欢?续箕裘之业,吾复何求哉?”詹理认为人生贵在适志,自己双亲在堂,朝夕可以侍奉尊长左右,这样的事古人拿三公(太师、太傅、太保)都不换,况且可以得兄弟之欢,续祖宗基业,还有什么可求的呢?我想,这应该是宽慰自己的话,詹理的内心还是想要“报明主”的。

闲暇之时,读书以自娱,教书以育人。我在宗谱里还看到詹理写的一篇《神山塔记》:

塔建非古也。自佛入中国,释氏凭鬼神以昌异教,故人多冀乎其不可必,揣摩乎其不可知,而崇奉之广,梵宇严像绘,累木石为浮图,今皆布满宇内。儒者所不道云。至堪輿家以天地支离,五行八卦,候土验气,而行鬼阴之说,又与佛教相出入。今之儒者慕富贵利达,不异蚩蚩者之干福田利益也,往往信其指画,某山某水当罅湮处而补泄之。故塔之勦,不惟佛地为然,虽穷乡村落,亦在在有焉。予家古明里面阳背阴,群峰环峭,若戟若城,独东南水口一小阜曰神山者,下峻上夷,如覆釜状。堪輿何子石溪顾谓我曰:此胜地也,特水口巽位稍卑俯耳,更加一塔,昂霄科目,将种种也。诸昆弟入其说,力请于予曰:我先世分处两源,数有闻望,若龙图公大魁天下,尤表表者。今居古明,兄始旷世,克绍前修,顾厚积而薄发,非居使之然欤。遂与之俱蹶其巔而望之,果若臂而隙焉。比归,按輿图,得其麓之产,皆名塔下,乃抚掌大笑,曰:此令图也,天实赞之,是诚在我。即首捐百金为倡。吾族若长若幼,不私其有而响应焉。议谋金同,鳩工命曰,砖取诸陶,灰取诸石,力取诸傭,量所费而盈缩之,不敷,仍各捐值,而益计日而餉,揆方而涂墍,广三丈,崇七级,始于隆庆戊辰十一月丁未,万历甲戌腊日落焉。复

穴左土为龕六楹，居僧之守者以司钟鼓。工峻，谓予盍纪颠末。予惟山川毓秀，则贤哲挺生，理或然也。顾前此未有塔，予亦谬有今日。兹有塔矣，而人或不然，谓之何哉。人杰地灵，是在二三子而已矣。《书》曰：“佑启我后人，咸以正无缺。”

落款：万历丙子十月吉旦 松屏主人撰

这篇记文，详细叙述了他从质疑释氏“凭鬼神以昌异教”，到半信半疑，跟随风水先生何石溪，到实地勘察，再到“首捐百金为倡”，族中老幼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“广三丈，崇七级”的神山塔，从隆庆戊辰（1568）十一月开工，到万历甲戌（1574）腊日落成竣工。“腊日”即腊八节这天，农历十二月初八。建造神山塔，头尾六年整。

神山塔下，龙川溪畔，从此有了“鸿送秋声来此地，日移塔影过溪东”这一标志性景观。

另一个有标志意义的，是詹理在“詹氏墨宝”中的题跋。这彰显了他的官宦身份，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荣耀。撰写时间是神山塔落成的第二年。题跋如下：

有宋明元重股肱，制科抡选网罗弘。
自缘独步陈三策，深沐裁诗逾百朋。
御笔劲道阴鬼哭，奎章绚耀彩云蒸。
传家什袭能珍重，分付儿孙谨服膺。
三策曾缘达紫宸，奎章裁赐勒贞珉。
已知摹刻流千载，不负传臚第一人。
隐约若闻神鬼泣，摹摹犹认墨花新。
假饶当日荣金帛，纵善收藏岂足珍。

落款：时隆庆己巳（1569）三月甲子，赐进士前巡按陕西
兼提督河西学政、陕西道监察御史、西原后人詹理谨书

“詹氏墨宝”中，淳安籍官员留下墨宝的有：詹仪之、詹驎、詹资信、余思宽、毛一公、毛一瓚、詹理等人，窃以为，单就书法造诣而论，詹理之书，一如其人，筋强力健，敛骨入神，胜出其中多数读书人。

由詹理书法，联想到“一中堂”那块“世科甲第”匾额，朴茂端庄，骨力洞达，却没有留下作者的落款。前段时间，郭村“一本堂”的“王侯世胄”匾额，因为尾款有“苏轼题”三字，引来媒体反复炒作，其实是后仿或假托苏轼名头的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些匾额的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、艺术价值以及教化功能。

每一段历史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，培植了一代又一代人，这才是它无可替代的重要原因。

詹理致仕归家才四十岁，正是人生的黄金期，他有理想有抱负，想为国家做点事，尽一份臣子之职，却空有一腔报君心，倚剑长叹徒奈何！

阿寄的荣耀

阿寄死了，那年他八十岁整。

主母颜氏下令全家为阿寄披麻戴孝，开丧受吊，乃延僧众荐亡，诵经修福，勤做佛事。法事办了七七四十九天，只为阿寄亡灵能早日超升。“祭葬之礼，每事从厚。”这场丧事在村里办得很是风光，也很是铺张。

外人难免纳闷：这确是一个仆人的葬礼？

锦沙村（威坪蜀阜村的别称）村民对于阿寄的死莫不惋惜，“合村的人，将阿寄生平友谊，具呈府县，要求旌表，以劝后人。府县又查勘的实，申报上司，具疏奏闻。朝廷旌表其间……”这是冯梦龙小说《醒世恒言》第三十五卷：“徐老仆义愤成家”中，对徐家老仆阿寄死后的描述。

一个仆人死后何得如此荣耀？

阿寄的死牵动着众多人的神经，他的事迹在民间口耳传颂，甚至于《明史》《浙江通志》《严州府志》等正史均为其立传。冯梦龙更是将其改编为小说，收录在《醒世恒言》中，广为流传。

故事发生在淳安锦沙村，时间是明代嘉靖年间。主人公阿寄是徐家的一个仆人，年逾五旬。户主徐公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徐言，二儿子叫徐召，各生一子，三儿子叫徐哲，老婆颜氏，生有二男三女。徐家在锦沙村算是小康之家，置有几十亩地，外加一头牛、一匹马。

阿寄是本村长大的，只因父母丧了，又无力殡殓，故此卖身在徐家。阿寄时年五十多岁，夫妻两口，也生下一个儿子，有十来岁。他为人忠厚谨慎，朝起晏眠，勤劳耕作，徐家得他帮衬，日子本也过得平安和顺。

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徐公患病去世，老大徐言掌家。记得徐公临死之时，再三叮嘱兄弟三人，一定要守住这份家业，和和睦睦过日子，不要分家单过，以免生出是非。

这样相安无事过了几年，三兄弟倒也能遵守父亲的遗嘱，共同操持家务，打理生活。岂料祸不单行，福无双至。忽一日，老三徐哲患了伤寒症候，七日暴亡，撇下一个年轻的寡妇和五个未成年子女，撒手而去。

颜氏痛失夫君，伤心欲绝，儿女幼小失怙，无依无靠，一家人哭成一团。孤儿寡母哭归哭，日子还得过下去。这边颜氏心里还在暗自庆幸，尚有两个大伯一起过活，也能帮扶她照顾孩子；那边老大、老二已经开始嫌弃老三家孤儿寡母，必成家庭的拖油瓶，正在盘算着怎么分家哩。

果然，老三死后不出两月，老大、老二计议已定，到次日备些酒肴，请过几个亲邻，又请出颜氏，并两个侄儿。老大先开口说道：“列位高亲在上，徐言有一言相告。”接着是一通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说先父原没什么遗产，多亏我兄弟，挣得些小产业，本指望弟兄相守到老，不幸三弟过早离世，弟媳是个妇道人家，不知产业多少。万一消乏了，只道我们有什么私弊，欺负孤儿寡母，反伤了骨肉情义，平添些是非口舌。不如趁现在分开单过为好，家产分作三股，各自领去营运，省得后来争多竞少，特请列位高亲作个见证。

颜氏听说要分家，眼泪止不住簌簌流，口中央求道：“二位伯伯，我是个孤孀妇人，儿女又小，就是没脚蟹一般！如何撑持了门户？昔日公公吩咐莫要分开……”不待颜氏说完，老二徐召一旁帮腔道：“三娘子，天下无有不散的筵席。公公乃过世的人，说的话又不是圣旨，如何作得准？”他看了一眼颜氏，故作怜悯道：“昨日大伯欲把牛马分给你，我想侄儿又小，那个

去看养，不如把阿寄一家分与你，阿寄虽说年纪大了点，筋力还健，还能帮扶干点地里的活。”

寡妇见他们兄弟一唱一和，明知是算计好了的，料道拗他不过，一味啼哭道：“马和牛能耕田耙地，你们都分去了，剩下老头一家没人要，白给我增加几口人吃饭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！”亲邻见了分书，也知道不公平，又不肯做冤家，一齐着了花押，劝慰颜氏看开点。

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

颜氏只得另立门户，带着一群孩子和阿寄一家凄惶度日。

阿寄看不惯老大、老二的做派，也知道兄弟两人嫌他老了，借故把他推出的意思，心中虽不免失落，但他不至于失态，他偏要争这口气，挣出个事业起来，也不被人耻笑。

他一连考虑了几天，与其守着家里十几亩薄地，不如出门经商，为主母赚点钱回来，帮她持家立业。于是对寡妇说：“三娘，你急急收拾些本钱，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，一年几转，其利岂不胜似马牛数倍！”

颜氏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无奈无助之下，只得寄希望于阿寄，翻箱倒笼将簪钗衣饰拿出来，去典当了十二两银子，作为阿寄行商的本钱。

于阿寄是平生经商第一步，于颜氏则是身家性命的一搏。

不得不承认，阿寄极具商业头脑，经商有天赋。他路上听人说贩漆利钱大，“况又在近处”，就直奔产漆地庆云山中去了。这个“庆云山”，我推测应该就在威坪洞源村一带，威坪历史上就是“严漆”的产地之一。据《严州图经》载：“（严州）惟蚕桑是务，更烝茶割漆，以要商贾懋迁之利。”可见，茶和漆是淳安人对外贸易的主要特产。北宋末年方腊起义，也是在洞源村的漆园举行誓师大会。从锦沙村到洞源村不远，符合阿寄所说“况又在近处”。

阿寄凭着自己能说会道，灵活应变，在庆云山漆园牙行弄到一批好漆，然后运回锦沙村。锦沙村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历来有“襟三水而带新安江”

之称,距新安江口近在咫尺,仅三里路途,这里是重要的商埠口岸,上通徽州、下达苏杭。阿寄“教脚夫挑出新安江口”,考虑杭州离此不远,价格卖不上去,便雇船直奔苏州。一到苏州,货果然变得紧俏,阿寄的漆货,足足赚了一个对合有余。顺道回去再把苏州糙米贩到杭州去卖,又狠赚了一笔银子。

阿寄得心应手,生意越做越有经验,他懂得“货无大小,缺者便贵”的道理。日夜辛苦操劳,四处奔波经营,如此经营一年多,竟替主母赚了一千多两银子,寻思年终该回去置买些田产,做个根本。

颜氏见阿寄不但平安回来,还赚了许多的银子,自然感激不尽。阿寄与寡妇商议,又在村中富户手里,用半价买下一千亩良田和一座庄房,使寡妇有了安家立业的根基。过完年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,阿寄又出门经商去了。

《明史·阿寄传》载:“(阿寄)历二十年,积资巨万,为寡妇嫁三女,婚二子,资聘皆千金。又延师教二子,输粟为太学生。自是,寡妇财雄一邑。”

阿寄为主母挣下万贯家财,还帮着主母把三个女儿全部嫁了出去,又为主母的两个儿子聘请了最好的老师,教导他们读书,使他们都进学有了功名。寡妇从此成为当地首富,门庭若市,牛马成群,好不兴头。

临终之前,阿寄对寡妇说:“我已经尽全力报答了您的大恩,将来两个小主人也有了安身的根本,我死后就可以瞑目九泉了。”说完,从枕下拿出两份文书,交给寡妇道:“两位小主人长大成人,将来免不了分家过日子,为了避免日后相互争执,我已经将房屋田产分为两份,让人写在纸上,今天我把它都交给您,希望小主人能世代守住这份家业。”说完气绝而逝。

寡妇一家被阿寄行为所感动,号啕大哭了一场,全家披麻戴孝,厚葬阿寄。老大、老二至此还怂恿侄儿,以为阿寄藏了私房钱,进屋开箱倒笼,搜检一遍,只有几件旧衣服,哪有分文钱钞?

阿寄的故事讲完了，阿寄的孝义不胫而走，义仆之举感天动地，就连《明史》都为其树碑立传。

阿寄能得到社会广泛关注，其实是一个文化现象。

我发现明代社会很是有趣：奇葩而不违和，尴尬且在情理；无奈并非无望，失落不致失态。

明代初年官府颁布禁奴令，朱元璋反对庶民之家蓄奴，反对人身买卖，反对私债准折而压良为贱，不准存养奴婢，违令“存养奴婢者，杖一百，即放从良。”（《唐明律合编·卷十二》）

但这只是对平民百姓而言，对于功臣、勋戚、贵族和官僚蓄奴，有人数的规定与限制。三公家仆不得超二十人，一品官员不超过十二人；英宗时又有调整，规定四品以上十六人，五六品十二人，七品以下递减两人。

所谓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明代的禁奴令始终处在禁而不止的尴尬状态，早期执行相对严厉些，越到后期越宽松。我们平时看明代世情小说，那些大户人家几乎都有奴婢使唤，如《三言二拍》中，富户家奴婢数量超过官员家的不在少数，阿寄赚钱回来后，主母颜氏家雇工奴婢就达上百人之多。

阿寄为奴，“只因父母丧了，又无力殡殓，故此卖身在徐家”。阿寄所处的时代已经到了嘉靖年间，属于明代中后期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富户阶层的崛起与需求，法律与实际世情差别加大，奴仆身份界限逐渐模糊，士大夫阶层变得普遍认可，加上统治者的默认，士庶之家蓄奴已较为寻常。

《阿寄传》最早见于田汝成的《田叔禾小集》，该书刊刻于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，是“汝成晚年令其子所编”。田汝成在记述阿寄故事时，直言阿寄是“淳安徐氏仆也”，并没有采取隐晦的手法，阿寄临死之时对寡妇也说：“老奴马牛之报尽矣……”这就说明了庶民蓄奴，是得到社会主流意识认可，并不犯忌，无需避讳。

如何管理好家仆，主仆关系的处理才是一门学问。我在《蜀阜文集》中看到了“徐氏家规”，内中周备详细，列举了二十条：修世系、重祠宇、志茔墓、谨祭享、遵祖训、尽子道、励臣职、择交游、正名分、敬长上、睦宗族、训子孙、端闺范、务本业、尊美德、禁词讼、戒赌博、屏蠹行、恤仆御、广阴德。

其中“恤仆御”，就作为家规写入宗谱之中。主仆关系实则是一种伦理关系。上下尊卑关系不可紊乱，仆要孝忠于主人，主人则要懂得体恤仆人，仆人也是“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父母之所生，自天子至于庶人同类也，何忍相为凌侮如禽兽哉？”主张“御仆人之道，严其名分，而宽其衣食，警其惰游，而恤其劳苦。要以孝弟忠信为先”。对于关心爱护奴仆的主子，会得到社会的褒奖。

冯梦龙在“徐老仆义愤成家”篇首，先讲了一个萧颖士与杜亮的故事，看似毫不沾边，其实内蕴乾坤。萧颖士博学多才，笔落缤纷，十九岁便名倾朝野，从小有个贴身服侍的仆人，名叫杜亮，十分尽心。可这萧颖士百般俱好，就有两样毛病：一是恃才傲物；二是性子严急。奴仆稍有差误，便加捶挞。也不分轻重家伙，没头没脑乱打，有时候还要咬上几口方才解气。家中奴仆惧怕，皆四散逃去，最后只剩下杜亮一人，依然尽心服侍，没有怨言。

可这萧颖士是“天生的性儿，使惯的气儿，打溜的手儿”，没有丝毫更改，可怜仆人杜亮，今日一顿拳头，明日一顿棍棒，旧伤未愈又添新疤，不出几年，渐成伤痍症候，卧床不起，竟致呜呼哀哉。如此忠心尽职的一个仆人，得到这样一个下场，让人唏嘘不已。

冯梦龙用心良苦，他把杜亮的遭遇先讲述一遍，再把阿寄的孝义铺陈演义，作个比对，好让读者自己去判断，如何处置主仆关系。

从仆人的角度来说，桀骜不驯、不忠不孝是要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舆论谴责的。对主人效忠、孝义是他们的本分，但像杜亮这样的愚忠，则不值得效仿。

阿寄的所作所为,无疑是仆人中的道德楷模。明代中后期,社会上出现了奴仆欺主的现象,士大夫需要通过树立道德典范来维系奴仆忠于主人的关系。

时间是真相的朋友,奴仆与主子患难见真情。主母颜氏与仆人阿寄的关系,在寡妇另立门户之后的二十余年间,堪称明代社会主仆的典范。颜氏给了阿寄充分的信任,一方面因为颜氏是一个寡妇、女流之辈,缺乏主见,家里还有五个未成年子女需要照顾,不便抛头露面;另一方面,实在是出于无奈,颜氏别说经商的经验,怕连远门都没有迈出去过,她不信赖阿寄又能相信谁呢?

阿寄不负重托,全权打理生意,今天买这明天贩那都是自己拿主意,什么赚钱做什么,灵活得很,他只记得“物缺则贵”的道理,二十余年如一日,辛勤操持这份家业,富甲一方。尤其可贵的是,阿寄恪守主仆礼数,从不以功臣自居,生活上对己十分严苛,到年老衰迈之时,也不曾私吃一些好饮食,私自做件好衣服,赢得了族中老幼的一致敬重。他走到村中,村民见了必然站起,有乘马在途中遇到的,必然跳下来闪在路旁,让阿寄过去再行,就连颜氏母子,也如尊长一般对待他。

这是属于阿寄的荣耀。

阿寄的荣耀不仅仅属于他个人,属于嘉靖年代的锦沙村,属于徐家的寡妇颜氏,这份荣耀历经四百余年,跨山涉水,穿越古今,更属于忠孝、孝义的儒家道统,属于培植它的这片土地。

文化守护神方应时

万历十二年(1584)秋,福建漳州府长泰县正衙,天色未明,秋风萧瑟,阴雨迷蒙,四面八方的乡民纷纷聚拢在此,迎风冒雨,静伫而立。

他们是在等一个人。

只想见一见他并给他送行,表达内心的那份情感。人群越聚越多,远处依稀有人还在往县衙方向赶来。老百姓要送的这个人乃是淳安人氏(遂安十六都人),在长泰当了五年知县的方应时,天明即将离任。

据《长泰县志·长泰令方侯去思碑》记载:“(方应时)行之日,耄倪椎马首,遮留不使去,其缙绅先生士泣而祖于境上,归则相与谋肖侯像而祠之。”长泰县城里,老老少少都赶来挽留他们的父母官。在职或是离任的官吏和一些读书人,在方应时必经的道路旁,摆下酒宴替他饯行。回来后都商量着为方应时建生祠以供乡民祭拜。“祖于境上”可谓当时最隆重的饯行仪式。平心而论,这样受人爱戴的父母官不多见了。

今天,我们的主人公在长泰万民的护送下隆重登场了。

方应时,字以中,号养吾,晚更止庵。生于明嘉靖丁酉(1537)九月三十日,郭村银峰村人。其先祖安公于唐朝末年由桐江白云村迁遂之端坡(墩头),恩公择居银峰。

父亲方亨,字嘉会,别号敬斋。据邑人汪乔年写的《廷政公暨奉政大夫

敬斋公合传》云：“（敬斋）少有大志，因不偶，遂隐林泉，浑朴不烦，咸称长者。娶社墩余大鸿女讳银璧持家。生二子，长志善，次应时……”方应时父亲淹贯经史，孝友天植。万历中敕封文林郎，晋封奉政大夫。

邑人毛一瓚，神宗时官至吏部郎中，他给方应时写过《奉直大夫南京工部营缮清吏司员外郎止庵方公行状》，内云：“公生而警颖异凡，弱冠通经术，补郡诸生，累试辄异等。”方应时还曾游学瀛山书院，寻格致之原，求经世之术。每天与“天光云影”“源头活水”相伴，使他内心趋于平静，似有所归，觉得在这里找到了人之为人的根本。

明隆庆四年（1570），方应时三十三岁，庚午科乡试在杭州贡院开场。三场文字下来，方应时秋闱摘桂，中了举人。记载中没有方应时再接再厉，赴京参加会试，但明清时代他作为举人，可以直接进入仕途。

万历八年（1580），方应时被授福建漳州府长泰县知县，任期五年。为查找他在长泰的活动轨迹，我电话联系了长泰县文物博物馆，接电话的是位年轻姑娘，听了我的陈述随即告诉我他们馆郑老师的办公室电话，说他参与县志编写。郑老师说方应时是个好官，县志上有记载，拍好后用微信发给我。收到的十几张照片中，有方应时自己写的诗词，也有别人写他的，凡有关于他的记载都拍了来，那份热情令我感动。他告诉我说这是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。我在感谢之余忽然心生感慨，这其实是享了方应时的福泽，虽然过去了四百多年，但当地老百姓的感情仍是最朴实的，长泰人民至今还在念着他的好，记着他的恩，我则是沾了他的光。

作为父母官，惩恶扬善，体恤黎民，保一方平安，皆分内之事。除此之外，方应时还特别注重文化的培植和传承。他上任伊始便做了两件事情。一件是重建文昌阁；另一件是力保紫阳书院。

文昌阁位于长泰县城东南一公里处的石岗山上，又称文昌塔。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，方应时到长泰时，文昌阁已毁，仅存遗址。他顺应民

意,表示“政务之闲,特建崇阁于山椒,爰增峰峦之胜,祀文昌于阁中,假借象纬之精”。为此他捐出自己的俸禄,首倡在石岗山山顶建阁,历时一年有余,八卦形的文昌阁终于落成,恰逢长泰士子六人同科中举,时民众认为“文昌理文绪,进功贤,祷必应,学子也笃信至诚”。

此后,长泰文运昌盛,有了戴昀一家六代七个进士,戴耀祖孙三世尚书。长泰百姓认为文星君有灵应,“文星现,贤才生”,由此,文昌阁开始远近闻名。

《长泰县志》有载,方应时离任后,长泰百姓给他建了生祠,“方公祠在石岗山,为知县方应时建”。方应时捐资修建的文昌阁也在石岗山。长泰百姓有心了,方知县虽离任而去,但有他守护文星昌就不愁文运不盛,因为在长泰百姓心目中,方知县就是活着的文昌神。

方应时对当地书院的保护和发展也大有贡献。他初到长泰上任时,就碰到一件棘手的事情。内阁首辅张居正在神宗的支持下,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,推行“一条鞭法”。但在文化上却实行专制主义,甚至“毁书院,禁讲学”,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压制,以图统一社会价值观。

嘉靖、万历年间,王阳明的心学开始流播,读书人追求思想解放,全国各地建书院、兴学校已蔚然成风。士大夫进驻书院讲学,创立自己的学派,拥有大量的“粉丝”,对朝政进行品评清议。张居正对此深恶痛绝,他奏请神宗于万历七年(1579)下旨:全国各地巡按御史、提学官切实查访,将各省所有私建的书院,一律改为诸司衙门;书院所立粮田俱查归里甲;各地师徒不得聚集会议,扰害地方。

此令一颁,天下书院纷纷被毁,实乃读书人的一场浩劫。

方应时甫到长泰,屁股没有坐热,就面临着境内紫阳书院的生死宣判。身为七品芝麻官的方应时,此时此刻,面临着一场抉择,是力保紫阳书院还是令毁紫阳书院?如何才能保住紫阳书院?

夜已深，人未眠，油灯照孤影。

方应时独自在县衙陷入了苦思。

张阁老不喜欢阳明学说，他痛恨王学，遂迁怒于书院，欲把天下书院尽毁于一旦，正所谓爱屋及乌，恨屋亦及乌。长泰的紫阳书院乃朱夫子讲论格致之学的圣地，与王学所谓的心性、直觉顿悟观照法是有本质区别的。又念及千里之外的瀛山书院，也是朱熹的过化之地。如若不分青红皂白，尽数毁却，黜先生，逐弟子，非是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，乃是把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尽皆灭绝。

思虑及此，他找到了症结所在，便以此为楔入的一个点。于是他擱管挥毫，奋笔上疏。他要保住文化流播的圣地，保住薪火传续的道场，保住长泰县的文运文脉。这样的交锋与抗争并不对等，一个是身为内阁大学士的宰相，一个是以举人身份上任的七品芝麻官，官阶差异悬殊，外人看去方应时此举无疑是以卵击石。

但这位淳安籍官员，关键时刻从不认怂。面对着当朝宰相，方应时铁肩担道义，毫不退却。结局紫阳书院竟真的被保住了，躲过了这场劫难，没有遭到灭顶之灾。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遂安的瀛山书院也因为他的上疏抗争得以保全，幸免于劫难。

离任长泰知县的方应时去了广东，因为考绩异等，升为肇庆府同知。时万历十二年（1584）秋。

同知乃知府的副职，负责地方盐粮、捕盗、江防、海疆、水利、河工以及清理军籍、抚绥民夷等，是正五品的地方要员。

肇庆属粤西沿海地区，它与广州、高州、雷州、廉州并称粤西五府，海岸线漫长，岛屿和港口众多，也属于民族杂居区，很多边海、岛屿都处于政府监管的盲区。明中叶后，海盗活动伴随着走私浪潮不断冲击着粤海地区，国内外的海盗武装甚至频繁劫掠这片海域，给当地政府和民众带来严重

的困扰。

肇庆府不太平。因为从1564年开始，两广总督府移驻肇庆长达182年。近两百年中，肇庆实际上是两广军事指挥中心。

以李茂、陈德乐为首的海盗武装，盗采珠池，抢掠洋船，“旧态未忘，时为民害”。时人谓之澳党。据《琼州府志·艺文志》记载：“澳党一事，当李、陈二酋结伙铺前，阳听县官招抚，而阴怀异志，动联百艘，称戈吞噬，有司惶盼莫敢问，岌岌乎如痼毒旦夕且溃。”

方应时不信这个邪。当时的知府是王泮，绍兴人氏。他见方应时也是浙江同乡，甚是欣慰，给方应时接了风，便把近年来澳党之患据实告知。末了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吏部文书已到，迁我为按察司副使分巡岭西，听说明春新来的知府也是浙江人，叫郑一麟。以后你就要替肇庆百姓多担待一些了。”方应时拱一拱手，回说：“这是我职责所在，王大人不必客气。”

此后，方应时一刻也没闲着，捕盗、江防与海疆都是他同知的管辖范围。方应时岂不知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，多少年的匪患始终得不到根除，多少任的同知巴不得赶紧调离，他却经常微服出行，走访渔民珠池，了解盗匪踪迹，酝酿捕盗方略。

时间一晃到了万历十六年(1588)，方应时觉得时机已成熟，遂向知府郑一麟细说了他的捕盗方略：一为诱捕，如若诱捕不成，则发重兵围剿，务绝此患。郑一麟认为可行，但需征得两广总督刘继文的支持。两人遂到总督府陈明详细的方略。

总督刘继文颇为赞赏，但他有一个顾虑，就是怕那个洋僧人利玛窦与澳党首领李茂有瓜葛，走漏了军情。

利玛窦是意大利的传教士，1578年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，先到印度传教5年，再到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短暂停留，学习汉语。万历十二年(1584)，利玛窦获准进入广东肇庆。方应时也是这个时候到肇庆履职的，他们俩不

但熟悉,而且还算朋友。说起来,利玛窦离开肇庆也与方应时有关,两人缘分真是不浅哩。

利玛窦初到肇庆,生活的方方面面,包括衣食住行均需要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,所以他常往知府衙门走动,主动与地方官员打交道,套套近乎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,利玛窦对外自称是天竺僧,那时人们不知道什么叫天主教,认为利玛窦只是个洋和尚,所以总督大人误以为利玛窦与澳党有来往,是澳门葡人派来的间谍,要找个借口把利玛窦送往韶州,然后再采取军事行动。

方应时托人给李茂带去一封信,信中大意说,前几年你受琼州府招抚,在铺前做了一个良民,现在你故态复萌,又聚党盗珠,想必是为生计所迫。但你这样公然与朝廷为敌,我作为肇庆府官员,不擒拿你到案,便是我的失职。我想约你一谈,不知你意下如何?

李茂见信不以为然,以为方应时和其他官员一样,所谓见面就是一个借口,无非是为捞油水谈条件。他便爽快答应见面谈谈。

万历十七年(1589)正月,李茂带着陈德乐等一干人如约而至。方应时摆下酒宴招待李茂等人入席,座间,但见方应时拍案而起,历数李茂等人罪责,并且晓以大义,令其伏法。李茂心知中计,为时已晚,他冷汗透背,精神瞬间崩溃,在方应时面前,终于低头认罪。方应时欲借李茂的项上人头,震慑澳党,以儆效尤。

李茂暂且收监不提。

开春过后,方应时接连收到家中噩耗,父亲于万历己丑年(1589)四月一日去世,母亲于同年五月十二日去世。他飞章朝廷,回籍丁忧,守丧三年。

据毛一瓚《止庵方公行状》载:“(万历)丁酉(1597),擢南缮(工)部员外郎。”这个时间点与万历版《肇庆府志》上的记载基本一致,方应时于万历十七年丁父母忧回籍,二十年(1592)复任肇庆同知,二十四年(1596)

十一月升任南京工部员外郎。

方应时到南京任上后，“委榷龙江瓦屑关关主，告缙龙江，则竹木薪炭，襟会之市，积胥猾佞，或夤缘为奸窟，商贾废职。公至则首湔除之，条八议上之大司空；司空报可，宿弊为之一清……期年政成，且有显陟，然公业倦游，愿遂初服，遂以戊戌（1598）请急归，栖瀛山精舍，招同志讲学论文”。

这里所说的瓦屑关，位于南京狮子山附近。因为船只大批集中，官船、贡船、漕船、渡船、商船往来穿梭，形成各种市场，官府也设关收税，抽分、关、局一应俱全，十余里分司署绵延，工部管辖的抽分厂设瓦屑关、龙江二局，官吏专掌往来船只的税收。瓦屑关专收竹木柴炭税，供内府和各衙门支用。

瓦屑关一带繁华异常，茶楼酒店，客馆林立。有了商机难免鱼龙混杂，滋生了积胥猾佞，扰乱市场，浑水摸鱼，从中渔利。方应时上任后就涤除这些诟秽恶习，专门条陈八项建议给工部尚书，得到长官的支持，宿弊为之一清。

方应时到任一年便卓有成效，眼看着有擢升显要官职的机会，此时的他却萌生退意，仿佛有个声音在召唤着他：“活水潏洄半亩漾，文澜之泽瀛山秀。”培植文化、守护文化是他一生的夙愿。他明白是瀛山书院在召唤他，不能再等了，回吧，回吧。

终于回来了。眼前的景象让他不免有些失望，书院垣颓壁坏，一望草深。痛心之余，他没敢耽搁。瀛山书院是他心中的圣地，当年自己初到长泰，夤夜秉笔上疏，就是为了保住这块圣地，今日岂能让它再度荒废？

第二天他便联络詹氏一族，发出倡议，重整瀛山书院，带头捐田捐资，复使格致有堂，方塘有亭，岁虔祀事，规条以约。他则每天与几个同道者，讲学于瀛山书院，因自号曰止庵，乐其道而自得。

方应时是幸运的，退归瀛山书院的七八年，他既是为文化复兴而活，也是为自己而活。他找回了内心的那份真实，充满了一种喜悦之情，回应了生命中潜藏的那个音符，如空谷传声，幽深而旷远，直达人心扉。正如后人所说：“（先生）正而不阿，婉而不迫，能令党同者改容，执礼者动听，是先生大有功于名教也。”（《乡贤录序》）

万历乙巳（1605）三月二十九日，方应时卒，享年六十九岁。

妻子章氏，韶山（姜家章村）人，生于嘉靖戊戌（1538）十月十九日，卒于万历戊午（1618）四月十二日，享年八十一岁。敕封孺人，诰封宜人。有三子，依序是世教、世敏、世效。一个女儿嫁给芹川太学生王任儒。（《银峰方氏宗谱》民国三年版）

方应时去世后，由老二方世敏出任瀛山书院山长，天启间他考订《瀛山书院学规》刊行于世。学规分为格致、立志、慎修、戒傲、安贫、会文等十条，使书院教学更趋规范严谨。四百多年来学规条理清晰，传承有序，可谓方应时培植文化，守护文化的一种延续。

老大方世教出仕为官，由生员援例任云南布政司都事署禄劝州事。禄劝州是少数民族彝族居住地，山高林密，道途险隘，方世教带头捐资修建，彝民感其德，特立景行碑以记之。

老三世效由增生援例未仕。

先生之风山高水长，守护文化者人必守护之。直至一百多年后的清雍正七年（1729），邑令王锡年奉圣旨饬查方应时祠墓，勤加巡视防护。

雍正八年（1730），方应时被荐举入乡贤祠。据周辅（仁和教谕）《乡贤录序》记载：“为表彰潜德风励人伦，诏观风整俗使偕封疆大吏，搜罗幽隐事迹之未达于史馆者，列名以上，乃下部科集议，得二十有五人，准入乡贤祠崇祀。其驳回保举不实者七人。夫天下大矣，两浙人物亦不乏矣，乃合宇内仅二十五人，而浙江十一府七十五州县，崇祀者独遂安止庵方膳部一人。

盖崇祀固若是其郑重也。”

当时，全国各地推荐到礼部复议的名单，共有德高望重、学问精醇而低调内敛者二十五人，其中又有七人因与事迹不符被刷掉，放眼浙江全省十一府七十五州县，有资格配享乡贤祠者，只有方应时一个人。

瀛山书院的祭祀活动颇具仪式感。崇祀乡贤的目的是维护师道尊严，维护理学道统，使后学有奋进的动力、有前行的方向、有行为的准则。祭祀仪式中主要有祀位、祭期、陈设、仪注和祭文等，这些都构成了瀛山书院不可或缺的一种礼仪文化。

这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，瀛山书院朱文公祠正中，左庑崇祀方先生祠的来由。

瀛山的源头活水成就了一位乡贤——方应时，他有诗碑《得清亭歌》留存于得源亭内，其中有“天光云影留佳句，半亩方塘蓄真趣”句。此时此刻，心中忽然想起了郑阿忠老师发到我微信里的那些照片，其中有方应时在长泰县天柱山写的一首诗《次壁间韵》：

日午云横玉柱峰，寒崖瀑布泻长空。
重重屏嶂薜萝外，隐隐楼台烟雨中。
岩树不妨春草绿，山花疑带满霞红。
谩言仙窟无人到，还有纡回一线通。

这是描写天柱山一线泉的。一线通天，据说非常神奇，泉水从岩石间流出，一线透迤，终年不绝，万古不涸。

瀛山半亩方塘波澜不兴，却蓄真趣，一主静；天柱山一线泉则飞流直下，气势如虹，一主动。我想，但凡有了源头活水，不论是主静的瀛山半亩方塘，还是主动的天柱山寒崖泉水，都是不会干涸断流的。

从长泰百姓给方应时建立生祠,接受万民供奉,到瀛山书院入乡贤祠,享受天下学子崇祀,方应时已然由人蜕变为神,俨然成为一方文化的守护神。

“吾溪书院”山长徐应簧

男儿欲遂平生志，勤向窗前读六经。

不得不说，赵恒的劝学诗确实能打动人心，他洞察人性，句句敲击心坎，功名利禄谁不喜欢呢？简直太诱惑人了：“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。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”只要你勤奋读书，一旦考取功名，自然就出人头地，想要什么便有什么。读书人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，也就顺理成章，不觉得辛苦了。

徐应簧记不清自己熬过了多少个三更灯火、五更鸡叫的日子，父亲六十六岁致仕回家，致力于“吾溪书院”教育，自己是家中的老幺，上面还有五个哥哥，他特别钦服五兄应筹，小小年纪就是学霸一枚，成为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父亲对他自然寄予厚望，在京为官都带在身边，增见闻、广博识，以此历练人生。

应筹虽说才高八斗，但他志不在科考，放浪形骸，萧散简远。结交了号称“明代三才子”之一的徐渭，孤傲自赏，饮酒赋诗。父亲徐楚对此颇感失望，“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”。此等境况谁人知晓？遂转寄望于老幺应簧，算是徐家一脉最后的寄托。

明万历十七年(1589)正月，蜀阜村下了一场瑞雪，纷纷扬扬，飞花群

舞，山峦树木通披上一身银装。“香雪飞散梅坞芳，龙门列戟东山麓。”徐应簧早已接任“吾溪书院”山长，书院实行“山长负责制”，山长具有绝对的权威，他既是书院最高行政长官，也是首席教授和学术带头人；书院崇尚讲学自由，完全开放；教授有独立的学术品德，学生有独立的自学精神。徐应簧要把父亲创办的书院传承下去，不独如此，他还要以举人的身份，参加今春会试，自己已过不惑之年，加之徐氏一族众人期许的目光，让他感到无形的压力，仿佛肩上承载着徐氏家族兴盛的重任。

此刻，书院的学子们都回家过年了，只有呼啸的北风夹杂着雪花穿堂而过。徐应簧站在书院门口，映入眼帘的恰是“龙门列戟东山麓”的景致。“该是个好兆头”，他转身掩上门，抖擞精神一头扎进风雪中。

过了年，父亲徐楚年届九十一岁，他乐观豁达，让人把儿子唤至床前，嘱咐道：“己丑春闱在即，元宵过后你收拾书箱立刻进京，家中事务无需牵挂，青云有路开选场，你好自为之吧。”

徐应簧，字轩卿，号凤谷。《浙江通志》有其生平，记载简明扼要：“（徐应簧）登万历己丑（1589）进士，历升虞衡司郎中，督理三殿大工，裁减耗银八万余。升武昌郡守，时税珰暴虐，应簧执法不阿。甲辰宗孽杀赵中丞，全楚震骚。应簧经画防守，楚赖以宁。升本省驿传臬副，转粮储参政，剔蠹厘弊，清操劲节，齟者见忌，遂谢政归。”

短短百余字，包含了四层意思。一是他己丑年考中进士，在这科进士榜单里，我还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董其昌，明代著名的书画家，与徐应簧同榜。二是历升（工部）虞衡司郎中，督理三殿大工。三是升任武昌郡守期间，经历了两件大事，“税珰暴虐”和“宗孽杀赵中丞”。四是升湖广布政使参政，后辞官归田。

徐应簧考取进士是1589年，父亲也在这一年去世，按例服阙三年。“历升虞衡司郎中”之前，他是在大理寺任评事一职。大理评事主要负责断案，

属正七品官员。由于在大理寺工作出色，转升工部虞衡司郎中。工部是负责全国工程、国土资源和农林牧渔的中央机构，郎中是该司的长官，正五品官职，徐应簧具体负责“督理三殿大工”。

三殿是指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。万历二十五年(1597)，紫禁城一场大火，烧毁了三个大殿。“大工”即大木工程大修。徐应簧万历十七年(1589)中进士，守丧三年，初授大理评事，再升虞衡司郎中，这个时间点是吻合的，任郎中一职是在三大殿烧毁之后。

紫禁城建筑众多，人员庞杂，夜晚炊火、点蜡、取暖及节庆爆竹、花灯，当然还有雷电，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火灾。紫禁城几乎年年发生火灾，三大殿在四十年前就被大火烧过一次，如今又面临着重建。

据《明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三殿工兴，采楠、杉诸木于湖广、四川、贵州，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，征诸民间。”可见工程量巨大，不免劳民伤财、兴师动众。

徐应簧作为工程负责人，可谓绞尽脑汁，在保证质量前提下，能省则省，在他的精心督理之下，裁减工程耗银八万余两，这个数目，相当于七万多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。吏部考满，政绩突出，升任武昌郡守，官至四品。“税珙暴虐”和“宗孽杀赵中丞”正是发生于这期间。

“税珙暴虐”是说掌管税收的宦官，横征暴敛，引人不满；徐应簧公正执法，不因此偏袒宦官。关键是后面一句：“甲辰宗孽杀赵中丞，全楚震骚。”

简短一句话，揭示了大明王朝轰动朝野的一桩奇案。甲辰，即万历三十二年(1604)，时任湖广巡抚赵可怀，在公堂之上审理一名案犯，此案犯一言不合，不由分说，抡起枷锁击打赵可怀，致使赵中丞当场死亡。引发“全楚震骚”，说全省百姓因此惊乱生变。

事情的起因是一个世袭武将的子孙叫王守仁的，向万历皇帝上了一

道奏折，说先祖在世时曾把大量金银珠宝藏在楚王府中，希望能从楚王朱华奎手中追回那批财宝，哪怕献给国家也心甘情愿。皇上自然高兴，下旨湖广地方办理，清点楚王家产，寻找宝藏归库。楚王朱华奎是藩王的后代，不敢得罪皇上，表示愿意捐献两万两白银，万历见此也就允准了。

岂料楚王同宗的子侄兄弟得知事由，一万个不情愿，认为这钱出得太冤枉，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半道劫取官银，犯下惊天大案。

事发地虽不在武昌，但楚王封地在武昌，人犯等亦皆在武昌辖区，作为武昌最高长官，徐应簧不敢怠慢，有责任有义务将人犯缉拿到案，于是撒出捕快，四处张网，一举擒获了以朱蕴钤为首的劫银狂徒。巡抚赵可怀亲自坐堂审理，好上本呈奏给皇上，没想到审理过程中反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。

湖广巡抚乃是封疆大吏，国之重臣，湖广包括现在的湖北、湖南全境，管辖江汉平原和洞庭湖流域广袤的区域，官至从二品。一个囚犯吃了豹子胆不成，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？

赵中丞死于公堂之上，被枷锁砸得血肉模糊，令人触目惊心。徐应簧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，从死囚牢中提出犯人，厉声喝道：“大胆狂徒，半道劫取官银，公堂之上公然击杀朝廷命官，气焰嚣张，死有余辜，还不从实招来！”

朱蕴钤至此犹是骄横无比，口里骂骂咧咧道：“你是何方鸟人？大爷我姓朱，乃是太祖皇帝嫡系子孙，正宗的皇亲国戚，你一个小小郡守管得着大爷吗？”

徐应簧听罢，吃了一惊，若真是藩王子嗣怕是棘手，太祖《皇明祖训》里面写得明明白白：“皇亲国戚有犯，在嗣君自决，除谋逆不赦外，其余所犯，轻者与在京诸亲会议，重者与在外诸王及在京诸亲会议，皆取自上裁。”《大明律》也有相关规定，除非皇帝特许，普通司法部门无权过问藩王

违法事宜。

徐应簧神情自若，不卑不亢道：“本官秉公办案，你的身份是真是假，自会水落石出，容本官查实结案！”喝令衙役将人犯暂且寄监。

退归下来，徐应簧一面派人查明朱蕴铃宗室实情，一面将案由据实奏报皇上，末了特别加上一句：“宗室势大，流毒愈大，长此以往，恐养疴成疽，坏大明国体。”候旨再行发落。

且说万历皇帝披阅徐应簧奏疏，不禁震怒道：“逆宗反形大著，祖宗法度，治安国家，既系叛乱，何论宗人！”下令湖广地方严查，按谋反罪严惩。首犯朱蕴铃被处死，从犯及楚王本人皆有处置。地方人心得以安抚，境内局势绥靖。

前前后后，徐应簧在楚地七年，执法严正，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，擢升湖广布政使参政，分管粮储。期间，徐应簧写有一篇《梅花诗序》，里面信息量较大，我们摘录后再行解读：

吾五兄海屋公，讳应筹，字寿卿，本还淳蜀阜人也。公少负异质，日诵万言，目数行下。年八岁时，有同年伯国子博士，珠川吴公，悦其颖异，指门前两石鼓属对，曰：“石鼓两轮如日月”，即应曰：“铜钱一个像乾坤”。吴公讶然曰：“咄咄异物，逼人乃尔，真为神驹也！”十六岁饩禀，闻见博洽，名冠七学。缘先严参政讳楚公，不洽严太师嵩公意。逢御属太师赋梅花诗百首，太师伪是属参政公。公令吾兄替赋，不一时而诗成。太师呈览，御批曰：“清奇豪放，雄浑绮丽。”御命太师，面续赋十首。太师以实对，诏兄廷试十首。御悦，赐以进士。不受，愿以欵点辞。但好呼朋，嗜酒教荡，不修边幅。与山阴文长公徐渭结为旧雨交。平时挥金如土，酒间呕血数升，恬不知怪。先严尝戒曰：“博而寡要，劳而罔动，盖以是。”卜其大业弗竟云。噫！吾兄积书万卷有奇，手录所制，诗文暨经史甚富，肉未及寒，不胫而入他人之室，无只

字留者，惜哉！幸得梅花诗本，而略志吾兄之苦衷云。

皇明万历丙午(1606)夏五月 参政凤谷徐应簧识

这既是一篇序文，也是一篇悼文。

徐应簧称之五兄的这个人，名叫徐应筹。徐应簧说他这位五兄应筹，打小就是个神童，能一目十行，日诵万言。八岁那一年，就能与人对对子，应答如流。十六岁随父在京城求学，吃着皇粮，学识广博，名动京师学堂，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。

接下来这句话似一枚扣子，可以帮我们解开疑惑：“缘先严参政讳楚公，不洽严太师嵩公意。”这里称父亲为“参政”，徐楚任四川参政的时间，按照他宦游踪迹推算是在嘉靖四十年(1561)左右。五兄应筹此时十六七岁，那么他出生时间大致推断是在嘉靖二十四年(1545)左右。

宰相严嵩擅长诗词，特别是青词写得好，嘉靖皇帝此时恰好吩咐严嵩赋梅花诗一百首呈上御览，徐楚此时恰在京候旨，严嵩不喜欢他说话直接，面无表情，不会察言观色服帖人心，总之三观不合，五味不调，咋看咋别扭。遂假借皇上之意，想故意刁难一下徐楚，让他即刻献梅花诗御览。徐楚不明就里，情急之下想到儿子应筹的诗文足以应对，嘱他速速写来。应筹不一会儿就写好了。转由太师严嵩呈上皇帝。嘉靖帝阅后在诗稿上批了八个字：清奇豪放，雄浑绮丽。随后又命严嵩，当面再赋十首。严嵩无奈，只得告知实情。嘉靖帝谕令召应筹入宫，当廷面试十首梅花诗。应筹从容呈上御览，皇上吟罢大悦，遂赐应筹为进士。没想到应筹辞而不受。

应筹这个人喜欢呼朋唤友，放浪不羁，整天嗜酒，不修边幅。与绍兴的徐渭徐文长惺惺相惜，结为知交，平时挥金如土，酒后经常吐血数升，他淡然处之，一点也不为怪。

父亲曾劝诫他：“你学识丰富，但不得耍要；花了功夫但收效甚微。大

概就是这个状况。”这可能就是应筹不能成就大业的原因吧。哎！吾兄应筹藏书万卷有余，还亲手抄录了许多诗文经史，如今，骨肉未及寒，已经阴阳相隔，可惜，没有留下什么著述。幸好有这本梅花诗稿，可以略微记述吾兄内心的苦衷吧。

看到这里我也不免心生感慨，五兄应筹算是不折不扣的神童，但他的性格因子中有一种特质，放达任性，不愿被束缚、被羁绊，放着现成的进士而不受，他是被皇天所眷顾，还是被时代所捉弄呢？其实这个世界上哪里有绝对的自由呢？神童的结局大多不尽如人意，他们心智并不成熟，生活中无自律、无耐心、无恒心、无容忍、无毅力，他们的情商与智商并不匹配，最终像应筹一样大业无成，昙花一现。所以，大可不必去羡慕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反倒是像应簧这样的，咬定青山不放松，为心中目标持之以恒，方能善始善终。

光绪版《淳安县志》载有应簧的一首诗，曰：“数亩荒田勿疗饥，子孙清白纛前徽。黄金不是传家物，惟有腰间带一围。”在徐应簧眼里，子孙清白的品德重于荒田疗饥，黄金虽好不如科举入仕，腰间系带一围。明代官员是根据品级来系腰带的。

父亲徐楚恐怕没有想到，自己官至参政，儿子应簧同样是参政，不同的是一个是四川参政，一个是湖广参政，致仕归田也都是在参政任上，归家后的应簧“日以吟咏为事”，他还邀请了诗友董其昌到蜀阜会晤，董其昌应邀而来，留有《万花草堂》一诗：“路人江皋一径斜，绿杨深处有人家。洲前风渡千帆影，谷口春藏万树花。尘榻可能邀孺子，龙泉聊为报张华。游人兴归浓于酒，却负山阴雪夜槎。”

除了诗词唱和吟咏，他更关心“吾溪书院”的教育。他站在书院门口，想起当年的那场瑞雪，纷纷扬扬，飞花群舞，“香雪飞散梅坞芳，龙门列戟东山麓”。这景致仿佛就像昨天一样清晰，眼下已是仲春时节，其实梅坞并

无梅花，龙门却有飞瀑。龙门列戟，万象森然，飞空流瀑，陵谷为润。父亲选择在这里创办书院，是花了一番心思的，有寓意有寄托，希望族中子弟能有出息，希望徐氏家族长盛不衰，历久弥新。美好的环境对人是有助力的，正所谓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吧。作为“吾溪书院”现任山长，耳闻书院传出的琅琅书声，不由欣慰地笑了。

徐应簧一生著有《岝嵒山堂集》《游览吟编稿》《凤谷公诗集》（国家图书馆藏）等，活到了九十岁。

文韬武略方学龙

我在查阅原淳安、遂安书院资料时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。淳、遂两县共有书院三十多座，而能凭借个人影响力创办两座书院的只有两人。一个是明代万历九年(1581)任淳安知县的萧元冈，另一个是明代万历十七年(1589)进士方学龙。

据光绪《淳安县志》载：“琼林书院，在县东玉带山左，明进士方学龙建。龙山书院，在县东二里，进士方学龙建。”“进士坊，在县治东，为进士方学龙立。经魁坊，在县东隅，为方学龙立。”

两座书院，两座牌坊，都因方学龙而建。前者是他为淳安人开坛讲学、传道授业、培植文化的场所；后者是淳安人为他科甲中第，德业有成，光耀闾里的旌表。书院和牌坊，用途不同，动机却高度一致，书院是为文化续脉，传承薪火，牌坊是为文化人树碑立传，激励后学。

新版《淳安县志》对方学龙有简短的记载，便于叙述，我们不妨全文摘录：“方学龙(1640年前后在世)，字叔允，号望山，淳安人。少聪慧，熟读《春秋》，登明万历十七年(1589)进士。出仕广东顺德知县，兴学校，平赋简讼而严于防御。时海寇猖獗，学龙出奇计诱而歼其魁首，海氛克靖。擢南刑部郎中。时有狱囚计划十五日越狱，暗中勾结奸徒以十五个包子为约，适被

狱卒窃其二，越狱犯误为提前至十三夕发动，囚犯皆用利斧斩门大噪。时已下二更鼓，学龙急令巡兵持械挺之，越狱犯悉数被擒。后升守福州，移漳郡，尤多惠政。遂晋福建臬副，饬兵福宁。去后民立祠祀之。淳安在县治东为其建有进士坊、经魁坊，并入乡贤祠。”

最近，电视剧《猎罪图鉴》中的主角画像师很火，剧中他能根据目击者片言只语，或一鳞半爪，精准绘出陌生人的样貌。方学龙资料太少，脑海中方学龙的画像大概是个头中等，面容清癯，天庭前突，眉浓展蹙，眼窝微陷，眼睛深邃而刚毅，属于那种冷静而有主见的人。至于下庭部位嘛，应该是人中长、食禄宽、地阁方，承浆、讼堂无乱纹。

我查康熙《顺德县志》，说方学龙于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出任顺德县令。后升任南京刑部广东清吏司主事。我觉得这段记载是可信的。他在顺德县令任上共九年，对广东地界熟，由七品县令升为正六品的刑部主事，符合正常的升迁流程。而郎中属于正五品官阶，是司里的长官，再上去就是侍郎（副部级）、尚书（正部级）了。

方学龙走马上任顺德县令时，广东正是多事之秋。正月，潮州府程乡、平远两县发生地震。九月，广州府番禺连续地震三次，顺德与番禺邻近，震感明显，境内房屋受损不在少数。伴随地震的，便是连年的灾荒，老百姓靠乞讨度日，就连山中蕨根，也刨食过半。年荒谷贵，斗米价值一百六十钱，是平时的三倍之多。方学龙没有迟疑，一面开官仓放粮赈灾，一面采取救饥与兴役相结合的办法，以垦代赈，民得以活者数万计。

所谓“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”。这边安抚灾民，救济苍生，那边又报海盗犯境。说起顺德海盗，那是天下闻名，朝廷挂号。一百多年前的正统年间，顺德出了一个海盗大王，名叫黄萧养，人称“顺天王”。他是顺德县南八里地的鹤冲堡潘村人。势头旺时拥有战舰两千艘，部众十余万，公然作乱与朝廷对抗。弄得正统、景泰两朝伤透了脑筋。官军联合地方武

装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剿灭了此贼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想不到海盗又死灰复燃，卷土重来。

方学龙虽是一介书生，外表看似文弱，生命内层强健。面对僚属的通报，面对海盗的袭扰，他没有表现出丝毫惊慌。

这伙海盗为首者唤作“浪里飞”，乃顺德马岗村小湾堡人，从小任性而为，多有智谋。他在遭到官府水师围剿后，建立了自己的武装，这些年在与官军的周旋中，实力不断提升，武装船队走私贸易，纵横海上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人称“浪里飞”。

明代实行海禁，官府把海上贸易一律视为海盗行径。成书于嘉靖年间的《筹海图编·叙寇原》称：“海商原不为盗，而海盗从海商起。”“今之海寇，动计数万，皆托言倭奴，而其实出于日本不下数千，其余则皆中国赤子无赖之人而附之耳。”渔民以海为生，禁海绝其生路，故越禁越乱。由于海上走私利润实在诱人，以身犯险者不在少数，“浪里飞”这些年很是吃香，投奔他贩私集团的只多不少。时值春夏之交，眼下“浪里飞”正从安南（越南）等国运送了一船奇楠、麝香、鹿皮等货进港，准备进行走私贸易。

早有眼线报入知县衙门，方学龙却始终按兵不动。他是在等一个时机，一个海上起雾的日子，便于他预设伏兵，生擒“浪里飞”。

这场大雾还真让他等来了。方学龙一边安排官船水师到指定地点待命；一边放出风去，说杭州灵隐寺的监院亲带了贴库人等，来顺德采办奇楠，由宝林寺监院陪护，掌眼看货，因法事上供奉佛菩萨的敬仪，只收上等的好料，价格不论，多多益善。

真是想什么来什么。“浪里飞”正愁这一船货如何变现，特别是这些奇楠，价格金贵，按克论钱，普通百姓一辈子连见都没见过，更别说购买了。如今可好，灵隐寺的活菩萨救苦救难来了。转而又想，哪有这等巧事，莫非有诈？又怕自己多虑，不肯放过眼前财路。思前想后，派出探子扮作香客，

前往宝林寺察看虚实。

宝林寺位于顺德太平山西麓，始建于唐代，乃当地著名的宝刹。探子进了山门，果然看到香料铺的伙计在采办房门外恭候，老板在内里验货议价。打听到不是量太少，就是油脂含量太低，不是上等香品而遭拒收。乃悄然退归，据实面禀“浪里飞”。

“浪里飞”听罢，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。事不宜迟，他疾速派出黄二当家黄有仔，前往宝林寺与灵隐寺大和尚接洽。可人家大和尚不愿意出庙门，非要与大当家的面谈，好做长久的生意。

“浪里飞”海上闯荡多年，并非浪得虚名，他遇事谨慎不冒进。交代黄二当家道：“务必转告大和尚，奇楠均为上等，我可以让利三成，还请大和尚移尊潭奥码头，届时船上商谈。”

“浪里飞”寻思，只要不上岸，能奈我何？没想到大和尚竟答应了。双方按约来到潭奥码头，“浪里飞”藏身大雾，朦胧中见两个小沙弥，左右拥着一个大和尚上了船，遂乘一艘雕花小艇，飞也似的驶近。见了面拱手施礼，分宾主落座。

大和尚面目慈善，一口一个施主相称，弄得“浪里飞”竟有些不好意思，赶紧吩咐手下呈上样品，请大和尚过目。大和尚双手合掌，口诵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顺手接过递上的一段奇楠，用袍袖轻轻拂过，遂置于鼻尖处嗅了嗅，一股异香若有若无直冲脑门，颌首赞道：“棋韵足。果然是香中之王、木中舍利。”回顾“浪里飞”，意味深长道：“施主好福报。俗云‘三世因缘始修来，今生得闻棋楠味’，施主望自珍惜。”

“浪里飞”连连摆手道：“托大和尚福德，这批奇楠由大和尚点验过秤，咱们银货两清，可好？”

“好！”大和尚立身而起，一把抓住“浪里飞”的手腕，猛喝道：“来人呐！”话音未落，“浪里飞”手腕一翻，像条泥鳅一般滑了出去，从大船上一

跃而出，跳到雕花小艇上，“嗖”一声蹿出。大和尚紧随其后，还是晚了半步。眼看着他隐没在大雾之中。

正懊恼间，忽听前方传来一阵鼓噪之声，不一会儿，迎面驶来一艘战舰，众水师抬着一具渔网，“浪里飞”被整个罩在里面，犹自挣扎。大和尚脱下僧衣，随官军一起，押着“浪里飞”投入县衙死牢，只待秋后问斩。

原来，“大和尚”乃民团乡绅代表，能操一口南腔北调。方学龙物色很久才选定他，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，许诺万全之策，确保其人身安全。他吃下这颗定心丸，乃扮作灵隐寺大和尚，况且又懂香道，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。方学龙乍一见恁是没认出，大为满意。谁知后来，他立功心切，不等捕快登船，就想拿下这根头功，故有此失，险些让这“祸根”溜走。

幸亏方学龙考虑周详，一面派“大和尚”上船与“浪里飞”接洽，岸上设伏多名捕快；一面借助大雾的掩护，派遣通晓水性的精兵，乘战舰阻拦“浪里飞”的接应，在外围张网以待，正逡巡海面，见一艘小艇可疑，欲拦截盘诘，“浪里飞”见势不妙，急欲跳海逃遁，不料被一张渔网当头罩下，恰应了“法网恢恢、疏而不漏”这句老话。

方学龙生擒“浪里飞”，随后张榜晓喻：“首恶必惩，胁从不问”。海盗群龙无首，本就心如浮萍，见官府宽宥，遂作鸟兽散。方学龙一战成名，从此“海氛克靖”。

万历辛丑年(1601)，方学龙擢升南刑部主事，屁股还没坐热，任期内就发生了囚犯越狱这么一档子事。

明代南京的中央机构，都集中在皇城南面，也就是现在光华门内御道街两侧。唯独刑部和都察院设在都城之外。《南京刑部志》曰：“盖古者天子迩德而远刑，抑修刑北郊其制从久远矣。”因为效仿古代天子以德服人，尽可能不用刑。所以，就把公检法这些部门设置在城外，也算是一种“恻隐之心”吧。

刑部和都察院的具体位置,据《洪武京城图志》记载:“刑部、都察院在太平门外。”“太平堤,在太平门外,国朝新筑,以备玄武湖水,其下曰贯城,以刑部、都察院、五军,断事官在其西,皆执法之司,以天市垣有贯索星,故名焉。”

贯索星主牢狱之灾,名称都是有讲究的。

当时南京刑部大牢关押一批“斩监候”要犯。有人计划于十五日夜晚越狱,犯人在外面的同伙,买通了其中一个狱卒,让他送十五个包子进去,作为越狱的时间暗号。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,不知情的另一个狱卒,看包子不赖,顺手偷吃了两个,只剩下十三个包子,准备越狱的犯人误认为提前至十三日晚上行动,于是他们手持利斧,鼓噪着破门越狱。当时二更鼓已敲过,我估计正巧轮到方学龙值守,他连忙召集巡兵一起制止,越狱犯全部被擒,成功阻止了一场监狱暴动。

反狱和劫狱都属于暴力行为,按《大明律》惩处非常严厉,可以“就地正法”。

经过这次越狱事件,方学龙开始调阅卷宗,关注刑部、都察院以及各府州县的同类事件,不查不知道,一查吓一跳。各省皆有匪徒邪教,戕官劫狱,层见叠出。其中自有吏胥为害造成的因素,也有监狱条件恶劣,基址狭小,铁笼铁锁,囚犯身处其中,既不能直立,也不能平躺,犯人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。因此哪怕反狱劫狱是死罪,他们也毫不畏惧。

于是,他就司法改革和建设,向部里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,得到部长官的高度认可。任期未滿,“升守福州,移漳郡,尤多惠政。遂晋福建臬副,饬兵福宁”。他任漳州知府的时间,应在万历三十二年(1604),据《大明神宗实录》载:万历三十六年(1608),“升福建漳州府知府方学龙为本省副使分巡福宁兵备”。另据《漳州府志》记载:明万历戊申年,知府方学龙顺应民众请求,在桥西重建观音院,栋宇壮丽,金碧荧煌,此桥成为漳州名胜。这

是他离任前最后为漳州百姓做的一件事。次年，闵梦得接任漳州知府一职。

2019年9月，在千岛湖中心湖区一无名岛上，发现一处古墓葬，现场找到“寿藏记”碑石一通，可惜已断为三截。经过拼接，部分文字依稀可辨。落款为：“万历岁在丙辰十月望吉……赐进士第中宪大夫，福建按察司副使奉……方学龙撰”。这是他为一个叫王峰的人撰写的碑文。万历丙辰乃万历四十四年(1616)，意思是他除了福建按察司副使这个职务外，还兼任福宁兵备道道官分巡福州府事，属于四品官职。

方学龙生卒年不详待考。光绪《淳安县志》载：“福建副使方学龙墓，在县东三十里掌坪。”

虽然我们不知道方学龙具体的致仕的时间，但至少可以确认的是他从福建按察司副使和福宁兵备道道官任上。从顺德到漳州，再到福州、福宁，无不与大海有关，就连在刑部短短两年时间，也是任广东清吏司主事。宦海生涯，一路追逐海浪海潮，逸兴遄飞涌层涛。

方学龙的宦途虽说不上轰轰烈烈，但也绝不平庸，处理的事务都有点棘手，很体现他作为一个地方官的政治智慧。可谓是：

能力经事见分晓，文韬武略留口碑。

“清朝耳目”毛一鹭

“清朝耳目”——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，我不由得五味杂陈，百感交集。“清朝”不是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的清朝，而是指政治清明、朝野安定。既然朝野清明、安定，还需要“耳目”干什么呢？耳目说好听点，是把民情、民意上达天听，皇帝则顺应民意，出台相应的政策，颁行天下，更好地服务社会。说不好听点，就是监视老百姓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再打个小报告，说某官心怀不满，或图谋不轨，论罪下狱，以绝后患。

毛一鹭因为这项工作做得出色，得到皇帝表彰、树立牌坊，放眼全国也是屈指可数。

相比只颁发一个奖牌或者证书，立功德牌坊则气派多了；一般在州府或者县衙正街，用青石打造一座牌坊，总高八米有余，四柱三间，三重檐，柱下砬石互抱，时时可供邑人瞻仰。可名垂千古、彪炳千秋、功盖当代，甚至流芳百世。

清朝耳目坊，立在严州府前正街，修建于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，由当时严州知府黄卷、同知黄秉石、通州刘美倡议为督府苏松的毛一鹭而建造。牌坊精美无比，额枋、柱头雕刻龙凤、云浪、花卉、瑞兽等图案，明间柱下比别处多了一对石狮子，威武庄严，栩栩如生……

我对着电脑里的这张照片出神。

“清朝耳目”坊照片，拍摄于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正面额书“清朝耳目”，下题“癸卯举人甲辰进士广东道监察御史毛一鹭”。背面楷书“奕世恩纶”，下题“旌表孝子毛存元”。毛存元是毛一鹭祖父，事亲孝母，明史有载。一座牌坊两种用途，既表彰忠，也表彰孝，忠孝表里，家国天下，毛家三代，光耀州府。这座牌坊确属罕见。

我与这座牌坊的缘分，始于参加的一个会议。

一天，我在办公室接到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程中青的电话，让我参加10月23日在海外海酒店召开的新安文化学术研讨会。事不凑巧，省级文保单位余氏家厅竣工验收也定在这一天，省考古所一行专家要到现场察看，还要对门楼修缮提出具体整改意见。我在电话里向他说明情况，看能不能请假。程主任告诉我，这次研讨会阵容强大，县里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三十余人，另外从新安江流域整体性考虑，还邀请了建德、桐庐党史办，文保所的同志参与研讨，机会难得，希望我克服困难尽力出席。我被他的诚意打动，答应届时一定与会。

研讨会如期举行，县人大、县政协的领导都到会作了讲话，嘉宾也依序发言。其间我特别留意建德和桐庐两地代表的发言。建德严州文化研究会会长陈利群高度评价了此次研讨会，还介绍了他们严州古城的保护情况，说已在梅城投资几十亿元，用于修缮、恢复古城。我对此饶有兴趣，因会议有规定，每人发言限时十五分钟，陈会长并没有就古城保护展开来谈，我也只是听了一个大概。巧了，中午吃饭我与建德几个嘉宾恰好坐一桌，便忍不住打听起来。陈会长告诉我，最近在严州古城发掘出好几座牌坊，其中就有你们淳安人毛一鹭的“清朝耳目”坊。

文物发掘应该咨询建德文保所，尧志刚所长与我是二十多年的朋友，他因病没能来参加会议。写这篇文章时，我特意电话联系了尧所长，听明原委后他二话没说，马上把手头照片发我，又详细给我介绍了发现和发掘

这些牌坊的过程。此次为恢复古城，他们邀请了杭州市考古所的专家对填埋处进行集中清理和发掘，出土牌坊残件一千余件，清朝耳目坊正是其中之一，现在还在拼接复原过程中。

与毛一鹭结缘是在2011年一个星期六的早晨，中洲镇分管文化的副镇长方建给我打来电话，说徐家村山上有一座古墓被盗了，墓主人好像叫毛一鹭。我听后心里咯噔一下。毛一鹭这个名字不陌生，县志里有载，乃明万历年间进士，汾口毛家人。他的墓怎么会在中洲徐家呢？带着这样的疑问，我立马驱车赶赴中洲。

方镇长早已在徐家村村口等我，寒暄几句我就跟他上了山。方镇长先是一名文化员，担任乡镇领导职务后，对文化工作热衷不减，尤其对古物、古迹很是上心，所以，对于这方面信息他能够第一时间掌握。

上山道路崎岖难行，山路几不可辨，我们几乎在茅草和灌木丛中穿行着。我边喘气边跟方镇长玩笑说，毛一鹭认魏忠贤为干爹，还替魏忠贤在苏州虎丘立了生祠，他死后选择安葬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，能安心吗？是怕被人掘墓鞭尸吧？方镇长走在前面，他一边用手拨开茅草，用脚踩灌木，一边嘿嘿笑应，艰难行进着。

盗墓现场一片狼藉，盗洞横向掘进，现场碑石无存。凌乱的土堆中，没有发现任何陪葬的陶瓷残片，就连墓砖都没有，唯见几块新鲜的橘皮扔在地上；断定盗墓者离开时间应该不久。我感觉有点奇怪，询问方镇长，你怎么判断是毛一鹭的墓葬呢？他说是听村民讲的。

我很失望，现场遗留的信息量太少，无法做出任何判断，有一种挫败感。此后，毛一鹭三个字便牢牢刻在了脑子里。

回来查阅了资料，毛一鹭生卒年不详，县志里只说是“1630年前后在世”。

那历史上真实的毛一鹭是啥样的？我试图去还原他本来的面貌。

泮塘是毛家一个自然村，唐开元间，始祖罗公从江山棠峰迁遂之泮塘，村名沿袭千余年没有变更。毛一鹭出生在泮塘一个世家。祖父毛存元，字时春，事母至孝。《明史》列传第一百八十四《孝义》卷有载，明代启蒙教育家韩晟亦有“旌表孝子毛存元诗”传世。父亲毛志宸，岁进士，此乃岁贡生的雅称，不是殿试的进士。幼年的毛一鹭兼具家学与家教，与别家孩子比，算是赢在了起跑线上。

毛一鹭，字序卿，号孺初。明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进士，初授松江府推官，并代理华亭、青浦、上海三县诉讼事。司理松江府六年间，他忠于职守、廉洁奉公，理狱循法酌情、体恤民意。首创与热审并行的冷审制度，于寒冬季节宽释罪囚。他重视教育，培养士子，据称，天启二年（1622），松江府有十四人考中进士，无不得益于毛一鹭的教诲。他还著有《云间谏略》十卷，内容均为记录在松江所断案件判词，是他在松江审理疑案的成功案例，后人对此评价颇高。

毛一鹭在《明史》中无传，何三畏在其《云间志略》中有《郡司理孺初毛公传》，书中对其不吝褒誉之辞，大加赞叹曰：“尝读公所著《云间谏略》，似于金科玉律之文素所娴习，一人不轻纵，亦一人不枉，后先平反凡数百条，无不言爻像而事准绳也者。”何三畏曾为绍兴推官，一生断案无数，深知其中三昧。（《云间志略》明刊本原有十卷，现仅存八卷，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）

毛一鹭断案之神，在同事眼里简直是高不可及。

法制纪实月刊《蓝盾》2014年第11期刊发了《毛一鹭智破典妻争子案》。四百年后的今天重新来审视，仍然有启发和借鉴意义。此案一波三折，疑点重重，作为主审官的毛一鹭，通过微服私访弄清事件原委，判决时既不轻纵一人，也不冤枉一人。

因为毛一鹭政绩特异，擢为广东道监察御史。离任那一天，松江官民

操明香，注止水，轶车木雍道，且泣且号，以送公于前途。黄体仁（字长卿，号谷城，徐光启的老师）在《四然斋藏稿》中称其：“春风化雨，波及横舍青衿，士为之勒石颂德，以识不忘。”此时的毛一鹭官声清廉，判案如神，爱民如子，百姓拥戴。

什么时候开始，毛一鹭的心性蒙上了尘土？

人性之善变，在权势和利益面前便赤裸裸展示出来了。从万民争颂、执手相送的清官，到依附阉党、结党营私，充当魏忠贤爪牙，其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？为何蜕变得如此彻底？

此刻，毛一鹭站在苏州府衙内，想想自己这几年的升迁，不由得感慨万端。从副七品的松江推官，案牍劳形，连干六年，才转任广东道监察御史，不过是正七品。监察御史官不大，简而言之有两件事：弹劾与建言。任期内可以监察百官，可以巡视郡县，可以纠正刑狱，可以整肃朝仪；为皇帝耳目之司，权限不小，责任不轻。严州府前正街的那座清朝耳目坊，不正是皇上对自己任期内表现的最好嘉奖吗？标杆已立，他在众人瞩目中负重前行。

此后巡按贵州，巡按漕运，视学江南，向朝廷提出了一系列的合理化建议。巡按贵州，留给贵州的是百年之安；巡按漕运，疏议六事，皆关乎宫廷消费、百官俸禄、军饷支付、军器护防、民食调剂、河道疏浚；视学江南，选拔才俊，奖掖后进。他凡事必躬亲，日日皆劳心。

从天启年开始，毛一鹭不得不拜在干爹魏忠贤门下，否则不要说升迁，怕连性命都难以保全。当大官才可成大事立大业，这不，短短的五年时间，毛一鹭便从大理寺右寺丞、右少卿，再到右佥都御史，到如今巡抚应天府，驻节吴中（苏州），官至二品，前呼后拥，仪仗威严……

“大人。”僚属的一声轻唤，把毛一鹭的思绪带回现实中，“颜佩韦那五个东林余党，大人打算如何处置？”毛一鹭皱起了眉头，前些日子，刚逮了周顺昌。这个周顺昌放着好好的吏部员外郎不当，非得要纠结一帮东林党

人，弹劾干爹魏忠贤，不想押解途中，激起苏州民变，数万人围攻官船，要不是他派兵及时，怕周顺昌早已被劫走，现场抓了带头闹事者，羁押在狱，正等候判决。

自己本想保他们性命，怎奈干爹昨日已有八百里加急递入府中，谕令自己要不留后患。而今置身这个权势场中，许多事不像当初松江府推官任上，依照大明律法，丁是丁卯是卯，件件办成铁案，卷卷经得起推敲，桩桩为人所称道。眼前一切似乎都由不得自己。

他回过头来，看着僚属，吐出一个字：“斩！”语气中没有流露一丝的迟疑。随即吩咐：“研墨。”

毛一鹭在案头坐定，提笔在五人案卷上批朱：“斩！”

史载毛一鹭外貌恂恂，若书生处子，看上去温顺恭谨，像一个文弱书生，儒雅得很。“而综核详比，则卓然如老吏；凝重简要，则俨然如宗公巨卿。”所谓人不可貌相，毛一鹭在官场上却老成持重，办事简明扼要，决不拖泥带水，颇有大将风度。

从儒雅的文人，到阉党的帮凶。他宁可用苏州河水研墨判词，诛杀东林党人。此时此刻，他想到家乡的武强溪了吗？他为何不用武强溪水濯他的冠缨？他想到严州府前“清朝耳目”坊了吗？是流芳百世，还是遗臭万年？

归去来兮，胡以心为形役，抛尸骨于荒山？

如果，如果，没有如果，历史不由如果写就。看似偶发的事件，其中蕴藏着必然的规律，遗憾的是毛一鹭没能参透。

勾想起中州徐家荒山上那座孤冢，连墓碑都没有，无人祭奠，无人扫拜，也无颜提及，连家谱都在刻意回避，生怕辱没了家风，玷污祖宗的门庭，更无法给后人一个交代。阉党的走狗，魏党的帮凶，东林党人的仇敌，这个骂名，不应该成为毛家后人前行的羁绊。

魏忠贤从得势到覆亡，不过短短7年时间，其势焰熏天，可见于明朝诗

人陈棕的《天启宫词》一卷，杂咏天启轶事，凡一百首，其中一首描写当时二十四衙，争相给魏忠贤祝寿的场面：“奉觞春昼锦如云，白玉阑西曙色分。二十四衙齐跪拜，一声千岁满宫闻。”祝寿的官员绯袍玉带，侵晨就在魏府庭下排队候着，拜寿时高呼“老爷千岁千岁千千岁”，殷訇若雷，场面甚是壮观。

天启年间，魏忠贤一手遮天，官员的升迁调动，都是由这位封为“九千岁”的魏忠贤把持，放在当时的环境下，如此强大的结界，绝非一般人可以障破。像毛一鹭这样的读书人，但凡动了功名利禄之心，似乎也只有阿附魏忠贤一条道可走。

《孟子·告子上》曰：“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今夫水，搏而跃之，可使过颡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岂水之性哉？其势则然也。人之可使为不善，其性亦犹是也。”

孟子可谓一语中的：人性之向善，犹如水往低处流。人性没有不善良的，水没有不往下流的。如果水受拍打飞溅起来，能使它高过额头；加压迫使它逆行，也能使它流上山岗。这难道不正是水的本性吗？形势迫使它罢了。人是可以迫使自己干违心事的，本性的改变也是如此。至于说有些人不善良，那不能归罪于天生的本质。

我常常在想，我们品评、臧否、陟罚历史人物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正是为了正我们的心性，正我们的言行，正我们的观念吗？学人之长，补己之短。昨日已逝，无须过于纠结，人无完人，何必苛责鞭挞？于古于今皆无补益。

毛一鹭若早知这样的结局，是否会有别样的选择？大明王朝在此后十余年间轰然倾覆，逃不脱命数：个人命运或是王朝命运，概无例外。

天启七年（1627）七月，毛一鹭以疾请告，允之。八月，熹宗之弟朱由检继位，是谓崇祯。

就在本文定稿之际,意外得悉毛家朋友的一则信息,有清光绪十二年(1886)版《重修毛氏宗谱》。翻阅中查到一篇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),赐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壬戌会试同考试官方韩写的《琴十三孺初公墓志铭》。内有这样的记载:“丙寅(1626)冬朝廷擢公南京少司马,公连章乞身归,未数月,以天启丁卯(1627)十一月二十一日卒,年五十七。”以此推算,毛一鹭出生时间应是隆庆四年(1570),从而弥补了《淳安县志》关于毛一鹭生卒年不详的缺漏。

大明忠魂汪乔年

“请圣旨！”

上午九点零六分，随着主持人汪志忠一声大喝，仪仗排开，四人鸣锣开道，两位老者手捧圣旨，后面紧随着八名护卫，缓缓向祠堂里走去……

这颇具仪式感的一幕，是汪家桥村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的“晒圣旨”活动。圣旨保存是个秘密，一年中就这一天露个面，愈加显得神秘。我没有见过这道圣旨，听说政协工委主任余利归有完整的圣旨照片，于是给他打了电话，余主任在乡下，说下午回来发我。

粗略浏览，圣旨为丝绢织品，字体是手写的小楷，工整端庄，用笔略显凝滞。再细观文字内容，终现出一些端倪。
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……尔刑部山东清吏司郎中汪乔年，性资敏练，操检端勤；拔自轩庭，试于法署……朕志以悻，兹以覃恩，授尔阶奉政大夫，赐之诰命……使四罪服而群议消，三德成而五教弼，朕将以从欲之治，嘉尔钦哉。

初任刑部陕西司主事。

二任本部河南司署员外郎事主事。

三任本部山东司署郎中事主事。

四任实授今职。

圣旨的主人叫汪乔年，是汾口汪家桥村人，汪氏祠堂就是为纪念他而建造的。圣旨内容并不单一，接下来是敕给汪乔年妻子苏氏的。

制曰：国家重内教，必首壶范。故疏荣于臣，未有不贲及于妻者。矧其艰难早世者乎？尔刑部山东清吏司郎中汪乔年妻，赠安人。苏氏从夫圭窶，力任苦辛，昧爽执勤而无逾闕之动……兹以覃恩，加赠尔为宜人，赐命玄台，扬芬彤管。

可见圣旨颁发之前，苏氏已然去世，属于死后的恩荣，故称“赐命玄台”。汪乔年后又娶了姜氏为妻。

圣旨接着敕封继妻姜氏为安人。内容与诰封苏氏的大同小异，对姜氏支持夫君的工作进行了一番表彰：“兹以覃恩，加赠尔为宜人。”落款为“天启六年三月”。

天启是熹宗皇帝的年号，熹宗在位仅七年，是个短命皇帝。这似乎预示着大明王朝的气数已尽，不久也将谢幕历史舞台吧。我在阅读圣旨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在落款的后面有一行白丝编织的篆体文字“万历三十九年 月 日造”。在月和日字的前面分别空出一个字，这是方便颁旨之日临时填写的。

天启皇帝颁旨为什么要用前朝万历时期织就的圣旨呢？合理的解读就是国力衰落，财力不济。府库里能找到将就着用呗，颜面的事已经退居其次了。

古代等级制度森严，命妇之号不得僭越。安人是六品官员夫人的封号，宜人则是五品官员夫人的封号。从中看出汪乔年此时已是五品大员了。

我们把晒圣旨时间往前倒推一百三十年，回到光绪十五年(1889)，地点遂安县城狮城，又一场颇具仪式感的祭祀活动，在汪忠烈公祠进行着，主祭人是遂安知县唐济。

“忠烈”二字是乾隆二十一年(1756)皇帝赐给汪乔年的谥号。汪忠烈公祠是道光十五年(1835)知县洪锡光为汪乔年建造的，忠烈祠位于狮城北街章家弄旁，正中悬挂一匾额“天人钦感”。唐济专门给汪公写了一副长联，上联为“报国矢忠忱，综平生律已爱民，十数卷文行长存，共仰真儒品诣”；下联为“捐躯昭节烈，荷圣伐易名立传，三百载烝尝弗替，重瞻神宇尊严”。

祭祀活动庄严隆重，人员选派也是有讲究的，汪氏一族龙溪派、岐山派、岁星公本派各选二人主祭，副管也有六人。开祭之日，正副人等务须提前三日到祠，筹办祭事。一年安排春秋两祭，春祭定于三阳月既望后五日，秋祭定于小阳月(十月)既望后五日。春秋开祭之日，各派文武绅士，无论阴晴雨雪，务必逐一到祠堂助祭，不得托故推诿。另有助酒人等，每年分作两班，春祭五十余人办理，秋祭也是五十余人办理。

我们来看看光绪十五年(1889)的这场春祭，时间是三阳月既望后五日，既望是每月十五日，后五日即三月二十日，祭祀活动由遂安知县唐济主持。

唐济亲自宣读祭文，曰：

呜呼！我公降生岳岱，赋性端庄，幼时颖异，壮且刚毅，虞庠早贡，桂籍名扬，及登仕版，视民如伤。青州出守，政事平章，青州白水，盟心何妨，青州士女，谷我难忘；汪不解担，讴颂循良，政行卓异，大任克当；关中督学，有学莫忙；三边总制，有勇知方，帅旗一竖，箠食壶浆，米脂一檄，弓矢始张，誓师慷慨，卒伍启行，筹空帷幄，身殒沙疆，贺帅逗遛，贼转猖狂，有明不祀，国破家亡，愤同武穆，绩续龙骧，被执不屈，一片热肠，颜常山舌，剖以阴囊，

居然立信，不愧天祥，浩然正气，日月争光，荷蒙圣代赐谥，吾乡忠忱贯日，烈节凌霜，岿然祠宇，千载烝尝，凡我子姓，共荐馨香，凭依在德，电鉴于堂，绳其祖武，百世其昌，仰公志洁，慕公行芳，乃为之歌曰：“狮山苍苍，凤港汤匕，忠烈遗风，山高水长。”尚飨。

祭文不吝褒奖之辞，把汪公比作文天祥一样的人，了解他为人的，都会在心里为他点个赞：汪公忠心鉴日月，热血洒疆场。

“祭忠烈”与“晒圣旨”一样都颇具仪式感。汪乔年离我们远去已近三百八十年了，为什么人们至今依然还在纪念他？

汪乔年(1585—1642)，字岁星，汾口汪家桥村人。父亲汪时和，娶余氏为妻，万历十三年(1585)生汪乔年。汪氏始迁祖得谋公于唐朝末年由歙县迁徙遂安丫山(汪家桥)。得谋公有兄弟五人，依序为得均、得谋、得罗、得一、得象。得均公迁开化马金，得谋公迁遂安丫山，得罗公迁遂安岐山(郭村)，得一公迁遂安宏山(浪川)沙众，得象公迁安庆太湖。得字辈的共同祖先是越国公汪华的第七个儿子。可见汪乔年是汪华的后裔。

唐济的祭文说汪乔年“幼时颖异，壮且刚毅，虞庠早贡，桂籍名扬”。这与清康熙翰林院编修、邑人方象瑛《汪总督传》中，提到对汪乔年的印象基本一致：“总督与先大父，同庚同学，又同举进士。余儿时犹及见之，丰髯伟貌，有臂力。”方象瑛说的先大父就是他爷爷方逢年。他们于明天启二年(1622)壬戌科殿试同中进士，方逢年为二甲第四名，汪乔年是二甲第六名。

天启六年(1626)三月，熹宗皇帝在颁给汪乔年的圣旨中写得明明白白：“初任刑部陕西司主事。二任本部河南司署员外郎事主事。三任本部山东司署郎中事主事。四任实授今职。”今职就是奉政大夫，属正五品的文官，他的妻子苏氏和姜氏也相应地从安人晋升为宜人。

天启七年(1627)，以父丧回籍守孝。其间毛际可的父亲毛志履曾负笈

师从于汪乔年。

崇祯二年(1629)起复升任青州知府。他上任时只带了两个仆人,不像其他官员一样,把家属带在身边。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,甫一到任,他就把心系于百姓,不摆官架,不显官威,唯存官箴,搞了一个亲民举动,让人在官署的廊檐下砌了十多个锅灶,方便来打官司的人随到随饿随烧。知府衙门出现了一个奇特景象,这边厢百姓烧饭等候审理,那边厢汪知府断案判词两不误。

不像某些平庸的官员,没有理想抱负,整日无所事事,八卦嘴上谈,琐事心头绕。汪乔年没有一刻清闲,处理积案、疑案迅捷果决,他视民如伤,恻隐之心人皆有,百姓利益大如天,能够当天办理的绝不拖到次日,绝大多数案子当日便可审结,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政府提倡的“最多跑一次”。故青州百姓有《汪不解担》的民谣称颂他。

汪乔年似乎一直希望自己能走向战场,以身报效国家。他丰髯伟貌,臂力过人,自认为是个带兵之才。每每于休息之时骑马奔跑,习弓箭击刺,并常常在风露槁木中夜宿,用以锻炼自己的意志。

崇祯十四年(1641),因为得到方逢年的推荐,又兼历年朝廷考核,他举天下卓异、治行第一,从陕西右参政擢升陕西右佥都御史,巡抚陕西。从副省级干部一跃为正部级干部,官至正四品。

时天下大乱,李自成农民军横扫河南全境,正欲挥师进逼潼关,汪乔年闻讯鞭马赶赴商州、雒南视察,正巧与三边总督傅宗龙相遇,遂商讨抽拉丁兵、筹集粮饷等事宜。无奈关中丁兵和粮饷早就派完了,一时也想不出好法子,两人叹着气分了手。没过几天汪乔年得报,傅总督在项城败亡。这边还在伤感落泪,那边已经有圣旨颁到,擢升汪乔年为兵部右侍郎,接替傅宗龙,总督三边军务。兵部的檄文一道接一道传来,催他出关与李自成决战。

汪乔年岂能不知，此时出战无异于以卵击石，以肉饲虎。关中精锐已在项城耗尽，士卒疲乏不说，粮饷又接济不上，而贼势正旺，如之奈何？他召集部众说：“为了巩固中原地区民心，就是去喂虎，我也要出战一回！”紧急收召散亡士兵，调集边防部队，凑起骑、步兵两万余人，号称三万。

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正月，汪乔年冒着凛冽的寒风，率总兵贺人龙等人兵出潼关。

话说临颖早先被李自成军驻守，平贼将军左良玉攻进去后，把起义军抢劫的东西全部缴获而去，李自成闻讯大怒，放弃开封转而攻打左良玉。左良玉不得已退守郾城，李自成把郾城围得铁桶一般。汪乔年想到了“围魏救赵”之计，他召集部将说：“我们此时赴援郾城，凶多吉少，很难与之争锋，襄城是贼兵的老营，距离郾城百十余里，如果我们调集精锐去攻打襄城，贼兵一定回师来救，则郾城之危可解。郾城解围，我军打击贼兵前军，左将军袭击其背，则可溃敌。”

部将齐声说“好！”

汪乔年挑选精锐骑兵一万人，星夜兼程赶赴襄城，统兵攻入襄城。另派贺人龙、郑嘉栋、牛成虎兵分三路，驻扎在城东四十里地。起义军得报果然来救襄城。没承想李自成兵还未到跟前，三员大将各自都跑了，郾城解围后，左良玉也没赶来救援。

汪乔年仰天长叹道：“这里就是我的坟墓了。”

于是他带领一千多人把守城墙。起义军挖地道装填火药轰城，汪乔年亲率士兵用薪车堵住缺口，手拿长矛刺杀进城敌军，一时起义军竟不得而入。李自成恼羞成怒，下令架起大炮，瞄准汪乔年的帅旗轰击，硝烟过后掩体坍塌。部将护着汪公哀求他回避，汪乔年恼怒地说：“尔辈怕死，吾不怕死也！”他站在城墙上环顾四周，决然道：“头可断，身不可移，吾誓与此城终始矣。”以此提振将士们的信心。

如此攻守反复，坚持了七天七夜，战斗惨烈的时候他甚至一天都没吃上东西。二月十七日，终因寡不敌众，李自成攻入城内，汪乔年手提兵符驱兵开展巷战。

据当时的襄城县令余二闻《汪公忠烈祠碑记》记载，汪公此时“犹手刃二兵，杀三梟贼”，并疾声大呼曰：“臣力竭矣。不能杀贼，死固吾分也！北望稽首，拔刀自刎。”起义军一拥而上，俘获了汪乔年，把他押到李自成面前。左右喝令跪下。汪公破口大骂：“我乃朝廷大臣，奉命剿汝，恨不获生咬汝肉。吾死当为厉鬼杀汝，以遂我报国之愿。”

李自成下令挖出汪公膝盖骨，汪公犹不屈服，又令割去舌头，敲去牙齿，汪公犹以血喷李自成。李自成大怒，下令将汪公五牛分尸。

呜呼！汪乔年一介书生，却统兵平乱，血洒疆场。他手中有兵符，胸中有丘壑，眼里有韬略，决断有杀伐，但还是败了，败得如此彻底，没有一点转圜余地，甚至连一具全尸都没能留下。

欣慰的是汪乔年没有辱没英名，他不愧是越国公汪华的后裔，保境安民，使民乐居、免受荼毒本就是他的天职。他不但忠君忠社稷，他还忠于黎民百姓。无怪乎襄城百姓也自发募资，在南门外高阜处建祠以纪念他。

淳安人历来有这样一种担当，有这样一种气势，有这样一种傻劲儿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作为指挥官的汪乔年有这种挽狂澜于既倒、扶大厦之将倾的觉悟，但那时的士卒已斗志涣散，当时的情形往往是不从军便从贼，以求吃个饱饭。况且兵员严重不足，区区两万余人去对抗二十万之众的闯王，其结局是可以预见的。

大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国运，到了崇祯手里便戛然而止。崇祯继位之初，力争做一个中兴之主，铲除了魏忠贤为首的奸臣集团，甚至排斥东厂、锦衣卫等特务机构。面对着国力衰落，他提倡节俭，减膳、撤乐，下了《罪己诏》，不但身体力行，还让皇后也种菜织布，像一个农家妇女。然而就

是这般呕心沥血、苦心孤诣，终究没能挽救大明王朝走向覆亡的结局。

这不是崇祯的过错，换其他人当这个皇帝也是如此。个人不可与势相抗，大明王朝的气数已尽。没有李闯王，还有皇太极，就连老天也频频示警，北方旱南方涝，年年歉收，民不聊生，食不果腹，饿殍遍野，天逼民反。

邑人毛际可有《汪总制公逸事状》，里面提道：“公有女，余族祖母行也。以疏属，未尝见。顷同避地钱唐（塘），始详讯之，则亦不能具述……又闻奉旨获丧归葬，数遇寇掠。从吏谓曰：‘此死事廉吏汪公柩也，若辈欲尸祝之，则请留。不然，囊中无物可掠也。’寇愕然，罗拜去。”

据此可知，汪乔年有个女儿嫁给了毛际可的爷爷一辈。因为不是直系，平时不常走动，所以一直没有见面。那年为避匪寇一同来到杭州，才有机会见面叙谈。另一个信息是，汪公的尸首奉了圣旨归葬故里，路上多次遇到寇匪抢劫。负责护送灵柩的小吏告诉对方，这是为国捐躯的廉吏汪公的灵柩，你们是否要对汪公主持祭祀仪式？如果是这样就请留下来。寇匪惊愕不已，拜别而去。

毛际可与方象瑛都写过汪乔年行状，比较起来，方象瑛似乎更能看破时局，他在《汪总督传》的末尾曾这样点评：“……夫士有幸有不幸，使公生承平时，清操介节，何让海瑞、轩輗。及时事已坏，非人力所能支。出师未捷，身死疆场。悲夫！”

由汪乔年而想起了文天祥，他们的境遇竟如此相似。文天祥是南宋末年抗元的民族英雄，特别是那首《过零丁洋》几乎家喻户晓：“辛苦遭逢起一经，干戈寥落四周星。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

汪乔年和文天祥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：忠君爱国，与社稷苍生共存亡，宁愿站着死，不愿苟且活。

汪乔年是个读书人。把书中的理与日常的行相结合，把书读得通透。

真正的读书人会用生命去践行理，没有犹豫，没有彷徨，没有迟疑。因为他们得天地之正气，抒胸中之怀抱，了平生之夙愿，虽九死其犹未悔！

而现在，读书人似乎越来越多，可明事理的却越来越少；逐功利的越来越多，重道义的越来越少。我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，汪氏一族也有先见之明，他们在“晒圣旨”活动中加入了成人礼仪式，对族中晚辈进行传统教育，让他们了解祖先的功业、家族的训诫、做人的根本；教育他们忠于国家，热爱家乡，孝悌亲人，把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他们的血液，化作今后行动的力量。

套用一句现代流行语：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”当理想与现实发生激烈碰撞时，读书人应该怎么办？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已用自己的生命作了诠释：杀身成仁也好，舍生取义也罢，都是读书人最好的注脚、理想的归宿。汪乔年享年五十七岁。这正是：

一缕忠魂去报国，待留清气满乾坤。

“松凉夏健人”方象瑛

方象瑛这个名字《淳安县志》上有载，生卒年不详，生平有简述，约两百余字，形貌未免模糊，只得其大概。近读《健松斋集》，透过那些灵动跳跃的文字，阅过序跋、行述、诗赋、记文，这个人物渐渐清晰明了，鲜活地向我走了过来，仿佛就站在我面前，与我面对着面，甚或调皮地眨了眨眼，带着一丝苦涩与自嘲，但目光依然坦直与坚定。

明崇祯五年（1632），遂安狮城方家老宅内，一个婴儿呱呱落地了。按象字辈排序，取名方象瑛，字渭仁，号霞庄。方家在遂安城内地位显赫，家业有成，方家大院处在狮城的中心地带，大院周边的一些建筑，如豕宰坊、方家井、方家弄、方氏宗祠等，无不彰显着方家的特殊身份与地位。

方象瑛出生前五年，即崇祯元年（1628），知县陈大伦为方象瑛的爷爷方逢年建造了这座豕宰坊，以表彰这位东阁大学士的辅国功业。

方逢年是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的进士。天启二年（1622）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天启四年（1624），主持湖广乡试。当他主试湖广期间，魏忠贤方乱政。方逢年发策试诸生，有巨珣大蠹语，且云“宇内岂无人焉？”魏忠贤大怒，有旨降逢年三级外调。御史徐复阳借机弹劾阉党，魏忠贤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把方逢年削籍为民。

崇祯初年，思宗即位，诏复原官，累官礼部侍郎。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诏

廷臣举边才，方逢年举贤不避亲故，把本县的汪乔年荐了上去。未几，擢礼部尚书，入阁辅政。

方象瑛的爷爷去世那年是清顺治三年(1646)，方象瑛才十四岁。他不明白什么叫“反清复明”。爷爷算是一个有气节的人，清兵入关，他一个前朝旧臣，拥戴台州的鲁王朱以海监国，试图与清王朝分庭抗礼。一时间控制了绍兴、宁波、温州、台州等地，意欲攻打杭州，最终朱以海败走舟山出海。方逢年与总兵方国安等为权宜之计，乞降于清。途中跟随清军由浙入闽，方逢年暗中“以蜡丸书通闽，事泄，被诛”。

方逢年的书信内容我们不得而知，但从被杀的结局来看，一定是犯了谋反之罪。想要通谋闽地的抗清人士，光复大明王朝。

方象瑛体质瘦弱，但天资聪颖，九岁能文，十二岁学诗歌，后作《远山净赋》，老师教的一学便会，一点便透，是家族未来的希望。

方象瑛母亲吴氏，淳安云村人，是刑部福建司主事吴觐光的长女，十九岁嫁入方家。在方象瑛的记忆中，母亲性情严肃，亲督耕织，身自操作，勤俭持家。当然，对他这个独子的功课也是督责最严的。

不幸的是，母亲于癸巳(1653)冬病故，年仅四十三岁。

方象瑛记得母亲临终前的话：“吾生平无所苦，独恨未睹汝成名，及见孙耳。”母亲的愿望，一是盼着儿子早日考取功名，二是盼着孙子出生。

方象瑛抹去泪水，暗立誓言：决不负母夙愿。

康熙六年(1667)，京师大比，放榜之日，国子监人头攒动，车马云集。进士榜单上，方象瑛三字赫然在目，引得周围无数艳羡的目光。

方象瑛一举成名，从此迈入仕途，结交了一大批名儒贤达、文人名士，如毛先舒、毛奇龄、王丹麓、冯溥、施闰章、严沆、尤侗、沈珩、吴舒凫等人。

方象瑛在《祭余杭严先生文》里，提到了他首次与严沆相见时的情形，那是在康熙十六年(1677)，方象瑛在京师候补中书舍人，其间接到严沆的

邀请函，一时文人名士齐聚严府：“十月六日，先生集诸名士。舒崇先在坐，问慰曲至。象瑛入，先生降阶执手，且曰：‘频年闻君名，今乃得相识，然读君诗文盖已久矣。’当时座客无不惊叹，谓先生之遇两生如此之厚也。”

严沆何许人也？竟降阶执手对待一个后学？

严沆，字子餐，号颢亭，浙江余杭（今杭州）人，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进士，官至户部侍郎，仓场总督。诗文为“西泠十子”之一，著有《严少司农集》《古秋堂集》《皋园诗文集》等。

严沆在朝为官，朝野倚重如泰山北斗。他既有长者之风，又有仁者之爱，喜欢交游，看重仁义。退居以后，更是推心结纳，以弘奖人伦为己任，士苟擅一长，必折节下交，为之延誉。严沆能急人所急，或有死丧穷乏，必倾囊为赠，偶不给，即称贷济之。如此惜才爱才之人，必然受人爱戴。但凡从京师回到故乡的江南士人，谈论京师诸公卿名士，必交口称赞严沆“笃故旧，好奖掖后进，为士类表率”。

方象瑛与严沆虽未谋面，但心中仰慕已久，苦于伏处山陬，不得瞻望风采。此番受邀得到严沆如此礼遇，心存感激自在情理之中。次年，严沆还荐举方象瑛应博学鸿词科试。

整个清朝一共只进行过两次这样的考试。

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的正月，康熙帝称：“自古一代之兴，必有博学鸿儒，振起文运，阐发经史，润色词章，以备顾问著作之选。朕万几余暇，游心文翰，思得博学之士，用资典学……凡有学行兼优，文辞卓越之士，不论已仕未仕，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，在外督抚布按，各举所知，朕将亲试录用。”

严沆得知此讯，以手加额曰：“盛典也。吾虽病，敢无以应。”告诉身边的人说，我认识的人里面，才学没有超过方象瑛、叶舒崇两人的。他对方象瑛的人品和才学赞赏有加。其时，叶舒崇已经为政府诸公论荐，按例不得

重复荐举,于是他把方象瑛放在荐举名单的首位,其他像宁都的魏禧和秀水的朱彝尊排在其次。

方象瑛果然没有让严沆失望,在康熙十八年(1679)博学鸿词科试中,位列五十鸿儒之一,授翰林院编修,入史馆编修《明史》。

这篇祭文写得情真意切,在文末方象瑛可谓痛心疾首:“然则先生歿,而高山流水不忍复闻,私心诚不容已。先生没而怜才好士之诚不可复见于当世,其为天下恻可胜言哉。”

此外,冯溥也是方象瑛的恩师,帮助他拓宽仕途人脉,对方象瑛后来的诗文创作颇有影响。

冯溥,字易斋,顺治二年(1645)进士。历官编修、吏部侍郎、刑部尚书,拜文华殿大学士,加太子少傅。冯溥与严沆一样爱才惜才,经常在家中的万柳堂召集名士吟诗作赋。康熙十八年冬,冯溥招方象瑛等人于寓宅饮酒,方象瑛作《益都夫子招集酒半王仲昭、胡拙明复出畅饮》:“长安车马纷如簇,载酒呼朋遍鞶鞶……”

冯溥欣赏方象瑛的才学,既致政归,他请毛奇龄为之编写年谱,特囑方象瑛为年谱作序。这便是我们在《健松斋集》中看到的《冯易斋先生年谱序》:“先生贻书命象瑛为序,因拜手记于简末,不敢繁辞以失实,是亦先生之志也。”

冯溥也曾为方象瑛《秋琴阁诗》作序,内云:“余每读方子之诗,辄叹其渊雅秀润,谓为王摩诘一流……其诗怨而不怒,哀而不伤。”诚不失为对方象瑛诗词创作的高度评价。

其间,他还完成了母亲的第二个夙愿,接连生了三个儿子。长子方引祺,次子方引祀,最小的叫方引讳。可惜次子方引祀短命,年方十九岁就病故。

方象瑛在其《亡仲子行述》一文中写道:“余为求婚于同学毛子会侯。

毛子赏其文，曰神韵高秀如玉山上行快婿也。”方象瑛与毛际可既是同学又是好友，他比毛际可大一岁，两人同为进士。方象瑛是康熙六年（1667）进士，授内阁中书，在京任职，是个七品官。毛际可是顺治十五年（1658）进士，初在彰德府任推官，也是七品官阶。方象瑛知道毛际可有女儿叫毛孟，觉得两家门当户对，遂向毛际可提亲，但对儿子方引祀的身体状况有所隐瞒。

方引祀生于康熙元年（1662），从小体弱多病。毛际可对这个快婿的病情并不太知情，他当时在浚仪（开封）任上，女儿也跟随父亲身边。庚申（1680）四月，毛际可遣人来遂安迎接方引祀到浚仪成婚。时康熙十九年，方引祀十九岁，毛孟只有十七岁。

同年五月，方象瑛妻子吴氏病故，方象瑛忍着悲痛，修书一封于毛际可，让他不要把此噩耗告诉儿子。毛际可回复说：“婿病如此，使复闻母讣，是速之也。”方引祀因为羸弱多病，一直待在母亲身边，不像哥哥和弟弟一样，随着父亲到处游历，因此，他对母亲的感情特别深，也特别懂事孝顺。见有家书至，遂心生疑虑，以往，父亲来信都详述母亲病情，现在只说如前。“姑安我乎？”难道是故意要宽我的心吗？于是，每天号恸不食，病体日沉，挨至八月十九日卒。

方象瑛时年四十八岁，同一年里，他既丧妻又丧子，人生之悲苦境况可想而知。如他《行述》中云：“（儿）汴梁之行，意早竣婚事，佳儿佳妇，归慰病人耳。谁谓生离，遂成死别。既哭妇，复哭儿。天之降罚至此，极哉！”

在《告亡室吴孺人文》里，竟呼天抢地，令人潸然泪下：“呜呼！竟死矣。孤灯荧荧，不见汝形也。残更漠漠，不闻汝声也。汝夫号于庭，汝不知也。汝孙啼于侧，汝不闻也。”

方象瑛似乎一夜白了头，人到中年本是春风得意之时，而他则是既丧妻又丧子，悲苦之状可想而知。

亲人离世的打击从更早就开始了。方象瑛二十一岁那年已经失去了母亲，三十九岁又痛失父亲。据方象瑛《先府君行述》记载，父亲去世那晚，他在福建建宁的客舍，半夜里忽然跳起来狂呼乱叫，烦闷异常，痛不欲生。同舍者都惊醒过来，怔怔看着他不敢过问。方象瑛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这便是所谓的心灵感应吧。

第二天，方象瑛鞭马驰归，连续奔走七昼夜，行程一千两百余里到家。“呜呼！恸哉！”方象瑛一头拜倒在父亲的灵柩前，不能自己。

父亲方成郊，字稚官。事亲孝友，里中人求贷，无不曲应。辛卯（1651）壬辰（1652）间，岁大饥，方成郊贷粟为粥布施给饥民，使许多人赖以活命。其实方家此时已经开始中落，出入每苦不给。方成郊性情爽直，擅饮。庚戌（1670）六月十六日，从邻居家小酌归来，偶感风寒，越五日卒，享年五十九岁。

平时身体无恙的父亲，就这样毫无征兆地走了。

“呜呼！恸哉！”

连续遭受失去亲人的打击，最是消磨人的意志。上有父母高堂，下有儿孙满堂，是古人所谓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。方象瑛只有寄情于诗文，创作了《健松斋集》二十四卷，《健松斋续集》十卷。

方象瑛何以健松斋命名文集？据他本人在《重葺健松斋记》一文中所述，健松斋在遂安城内西偏。先君子所营读书处也。先君子仁孝，与物无忤。里中推为长者，性好蒔花木。崇禎中，构小园，名之曰勺圃，傍水关枕忠烈桥。中为斋，左为蕉，邻为香风亭，为菊畦达于桑芋圃，右为竹士轩，为秋琴阁，阁虚四窗，远山入座，历历然。斋前穿一池，不受水，益濬之……甲申之变（1644），土寇焚室庐殆尽……先君携家避杭婺。戊子（1648）始归，稍稍完葺。

方象瑛接着记述了父亲在顺治甲午（1654），游新安在许氏花圃得到

几棵栝子松，回来后种植到池子东面，刚开始不及屋檐，现在看看，已婆婆若车盖矣。它们劲如悬针，皮剥落如龙鳞，所以取唐诗“松凉夏健人”句，用来命名斋号。方象瑛常在其中读书，涛声谡谡，如同置身在深山万壑中一般。

这篇记文信息量较大，我们还得知了他之所以客居杭州的真实情况：“甲寅(1674)，闽变，盗起开化、常山，邑将吏弃城遁。余亦踉跄走钱塘。比归，则大兵驻牧三年矣。”

康熙十三年(1674)三月，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响应平西王吴三桂反清，浙闽一带持续三年大乱，百姓纷纷避走，即所谓的“闽变”。

方象瑛与毛际可避乱杭州，也算因祸得福，期间开始与毛先舒、王丹麓等人交往。毛先舒为“西泠十子”之首，他的书房名思古堂，他本人喜汲进后学，杭州的文人学子也以此为中心，经常举行沙龙聚会，评诗论文。

方象瑛有《思古堂雅集分韵》《遥和初秋集稚黄思古堂作》两首诗和一篇《思古堂雅集记》来纪念此事。方象瑛经常和毛际可一起到毛先舒的思古堂纵谈诗文，受益良多。作为前辈的毛先舒确实学识渊博，无论经史之源流，学术之同异，诗文之得失，还是四声六韵之通变，均能做到“原原本本，穷极指归”。

毛际可是最了解方象瑛的人，他比方象瑛小一岁，两人从小便是同学，且都是出自世宦之家又是仅间距几十米的邻居。顺治、康熙年间，遂安学子多次在语石山(遂安八景之一)雅集，较文制艺，论学交友，名噪两浙。方象瑛、毛际可是语石雅集的核心人物，友情发展到后来，还结为了儿女亲家，可谓门当户对。

客寓杭城后，毛际可明显感觉到方象瑛诗文风格变化了，他说“余读渭仁诗有三变”，即有三个明显的阶段。第一阶段，“弱龄定交语石，习为徐、庾之篇”，此时华丽有余而蕴藉不足；第二阶段，康熙时期避乱杭城，“得稚

黄诸子相与切劘，敛华就实，駉駉体格日上”；第三阶段是他入史馆修《明史》的时候，文风“扬厉敷陈”“博大雄奇”。可见，毛先舒以及“西泠十子”影响了方象瑛的诗文创作风格。

康熙二十二年(1683)，方象瑛奉命典试四川，沿途夜泊广元县，放舟嘉陵江，渡梓潼江，题驷马桥，眉州谒三苏先生祠，白帝城谒先主庙。正如朱彝尊在《锦官集·序》中所言：“凡山川之扼塞，风土之同异，友朋之离合，抚今吊古，悉见于诗。”他把途中所见所闻，搜集来创作《锦官集》诗二卷，共一百九十首，获得时流的一片赞誉。

方象瑛主持四川乡试期间，传承了严沆、冯溥爱才惜才的精神，尽心取士，“悉心搜录，得士四十二人”。得到了蜀中的广泛赞誉，当时蜀人称叹他：“有英才拔尽之论。”

康熙二十四年(1685)，方象瑛因病致仕归家，闭门著述。据查，他对詹仪之家藏的墨宝也有鉴赏有点评，其《詹氏家藏考亭南轩两先生真迹记》，就是在瀛山詹家观赏了朱熹、张栻与詹仪之往来的书信真迹后的感想：

……虚舟先生，讳体仁，讲学瀛山，与考亭、南轩两先生相友善。考亭（朱熹）贻书商订格物致知之旨，往复至再，今载朱子集中。南轩（张栻，字敬夫，号南轩）自蜀中寄书论理学宗旨甚悉。二书装潢成轴，子孙世守，封镌甚密。余尝就而观之。朱子书端劲古质，穆然不使人可喜。敬夫稍秀润，亦不甚作意。夫两先生未尝以书法名也。其深心静气，盎然睥然于楮墨之间，直与钟王颜柳并垂，正犹商周彝鼎，钦其宝不能名其器，非可以工拙论也。向使两先生而亦以书名，则笔墨所存，度不及钟王、颜、柳，何以数百年后睹其遗迹，想见其人，流连感慕而不能已哉。然则道之与义，孰轻孰重，要必有辨之者。

方象瑛距朱熹、张栻已有五百年之久，他凭什么判断朱熹、张栻书信的真伪？他说朱熹的字端然如君子，不容易让人亲近；张栻的字则秀润自然，不刻意追求新奇。他们虽然不像钟、王、颜、柳那样以书法名世，但数百年后人们看了他们的字，如同看到他们的人，心中感慕不已，原因就是道之所存也。

据我所知，詹氏墨宝不止朱熹《春雨帖》、张栻《新祺帖》两人的书信，还有孝宗皇帝赐詹骙诗，以及詹骙的谢表，接下来是元、明、清三朝名人题跋，依次为陈良、李逊、方瑛、王开、张政、孙继文、章信、陈昌、陈益、万钜夫、吴彦舒、徐臺、何省安、王汝舟、钱溥、冯瑀、郑伯举、吴政、王受、范霖、俞汝为、余可才、陆京、姜衡、鲁泉、詹理、林维翰、王业、朱长庚、毛一公、袁愈若、吕光品、林守典、陈学礼、翁元孙三十五人。可能方象瑛去时，这些墨宝尚未装裱成手卷形式，未得亲眼所见吧。以方象瑛的名望和地位完全有资格在上面题跋，但我们今天没有看到，不知何故。

新安江水库形成后，詹氏后裔移民到了江西崇仁。詹氏家藏墨宝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故宫博物院在一次拍卖会上，用高价拍得部分墨宝。单是朱熹的《春雨帖》就花费三百九十五万元。2002年，故宫博物院又在嘉德拍卖会拍回一批詹氏墨宝，总共花费一千余万元。如今这些墨宝珍藏在故宫博物院，属于国家珍贵文物。

郭村之行，方象瑛除了与詹家后人交往外，他还去拜谒了瀛山书院，为此写下了《谒瀛山书院》一诗：

半亩亭亭俯碧池，当年格致远相资。
座分鹿洞云来处，幽胜鹅湖月到时。
自有水能清客梦，谁言山不感人思？
大观亭下频瞻拜，松竹横窗绿满祠。

方象瑛诗词涉猎范围甚广，单写花的就涉及马兰花、千日红、西番菊、洛阳花、老少年、小青花、蝴蝶花、美人蕉等。此外，他虽善病，却游历甚广，有诗如《晓发桐江》《晚泊富春》《渡钱塘江》《渡黄河》《渡渭水》《晚泊天津》《夜过武城》《望庐山》《谒禹庙》《抵建州》《发叙州》……

毛先舒在《健松斋集》序言里说，方象瑛这个人，平时温然以严，不苟言笑；看他的文章“庄庄乎君子”。其鸿篇巨册，“详瞻典雅”，至于论时务，关心百姓疾苦，“大有救焚拯溺之思”。毛先舒品评方象瑛的诗，稍逊于文，然风格挺挺，佳句妙思时不时流露在笔墨之间，特别推崇他的小品，隽逸远神，“能沉练，不以靡词华色为好”。

《健松斋集》在当时颇为流行，民间争相传抄诵读，吴仪一在其序言里说到，追想丁巳（1677）冬，自己客居扬州，与邓孝威、程穆倩、宗鹤问、姜凝夫、西溟访魏凝叔寓斋，大家纵论当世古文家长短。“予独推遂安方子渭仁之文为至醇。”众人让他说说理由。他告诉大家：“为文家不可一日不学，不学则心放而言不能循乎理。甲寅（1674）乙卯（1675）间，方子避寇乔居杭城，予每过之，读书声闻户外。其好学甚而能养其心也。故其为文醇而无杂。”

吴仪一何许人也？钱塘人氏，字舒凫，清初著名戏曲理论家和戏曲活动家，他还是《长生殿》作者洪昇的挚友。吴仪一对《长生殿》有许多重要的点评，得到了洪昇的首肯与赞赏。他另著有《吴山草堂词》十七卷传世。

不独吴仪一推崇方象瑛的古文，同时期的学者沈珩与方象瑛一同应召博学鸿儒科试，授翰林院编修，他对方象瑛的文章也是大加赞赏：“渭仁之文，小大巨细，无所不备，吞吐蕴藉，无所不涵……夫解文章之味尤难言矣。解渭仁之味，简而义尽，洁而神腴，二则其至乎！简与洁，古今言文之至难。意尽而义不得尽，色腴而神不得腴，则又简与洁之至难。”（《健松斋集·序》）

好一个“简与洁之至难”。一方面，方象瑛勤读书、广交游，拓宽了他诗

文创作的题材；另一方面，由于家庭屡遭变故，命运多舛，他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体悟，于是变化了气质、剔除了繁缛，是洗尽铅华后的简洁。

从他给文集命名健松斋，取“松凉夏健人”之意，即可窥见其心迹。我非常赞同毛际可评方象瑛的一句话：“文章与境遇相关，境不变，则文不益进。”试想一下，方象瑛少年丧母，中年丧父、丧妻、丧子，又流离兵燹，他并未因此沉沦，而是积极进取，考中了进士，又得皇帝临轩亲试，拔居侍从，与修《明史》。后且典试三蜀，踏遍西南数千里，以皇华使节临之，广见闻，励心志。晚年辞官归家，著书立说，放心安心，不与世争。

当年父亲手植的五棵栝子松已然成林，夏日烦闷，案牍劳形，此时置身松荫之下，松风习习，凉爽宜人，松与人伴，人与松随，相看不厌，何其惬意！观庭院之松，松针向上，昂然其精神，皮若龙鳞，遒劲其枝干；送风凉于世间，听涛声于林壑。此亦方象瑛心迹之写照，乃深得诗之三昧，与司空图可谓知音。我想这何尝不是他前世的留痕与今生的品位？

康熙壬午年（1702），方象瑛自觉大限将至，来日无多，他给自己写了《七十自序》一文，回顾自己一生，谈到了家族长辈的寿限，只有“六世祖孝子公寿登七十有三”，其余都没有超过这个寿限。说到自己“生平淡素，无声色货利珍玩博弈之好。自论交四方，日以文章朋友为乐”。并作《七十初度示儿辈》，内有“三竿迟日容高卧，半榻闲身自息机。去住无心应有定，不须惆怅对斜晖”。是那种了悟生死后的从容与淡定。

他享年七十一岁。

“文中三豪”毛际可

在号称“江南毛氏发祥地”的江山，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天宝年间，一条古道上行进着一支队伍，领头人叫毛罗，出发的地方叫棠峰，目的地由南往北，到达遂安十一都的泮塘。

始祖毛罗为何从江山迁徙至泮塘，毛家后人无从得知，我们也无从考证。但从此以后，明、清两代的史志上，出现了毛存元、毛一公、毛一瓚、毛一鹭、毛升芳、毛际可、毛士仪、毛士储、毛览辉、毛绍睿、毛绍准这些响亮的名字，有了“六世同居坊”，有了“节孝流芳坊”（毛存元），有了“少司马坊”（毛一鹭），有了“世进士坊”（毛一公、毛一瓚、毛际可），有了“翰林坊”（毛升芳），有了“柱史坊”“会魁坊”（毛绍睿），有了“登云坊”（毛诚），有了“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大夫坊”，有了“义门泮塘”这样的名号……

不得不承认，一个家族力量如此强大。毛家人似乎把“忠”“孝”两字融入了家族的血液里，出仕则忠，不仕则孝，一代一代，无有例外。千余年来，放眼整个遂安，恐怕只有郭村的詹家可以与之比肩媲美。

郭村詹家有东风可以凭借，扶摇而上当在意料之中。詹安结识了北宋理学大儒谢良佐，其孙詹仪之又与南宋理学大家朱熹、张栻、吕祖谦、陆九渊等友善，如此条件自非等闲可比。

考之毛家一族，没有贵人相助，没有东风可借，凭的是毛家世德相传、

门庭清廉、家风浸染、子孙励志。世德家风，它们虽无形无质，却是家族不可或缺的一笔精神财富。毛氏一族，德藻与举业并重，为官与为人兼优。得邑人爱戴，乃顺理成章的事。

今天，我们的主人公毛际可，既是“世进士坊”（毛一公、毛一瓚、毛际可）中的曾孙辈，也是“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大夫坊”里面的曾祖父辈。

明崇祯六年（1633），也是毛际可堂曾祖父毛一鹭死后第六年，毛际可在狮城安序弄旁的毛氏祖屋安序堂降生了。安序弄位于狮城中心地带，在县委西面。这一带原本都是毛家的产业，新中国成立后，老屋被征用为县委办公场所。周边还有毛氏宗祠、仁贤祠、毛家弄、毛际可故居、毛宅等毛氏族生活的遗存遗迹。

毛志履给儿子取名际可，字会侯，号鹤舫。

毛志履（1597—1672），字尔旋，别号太素。他平日里乐善好施，孝悌谦恭，常急人所难，乡民借贷之券他不忍留存，私下焚毁；故每到岁末，常不能自给。史载毛志履“性嗜学，积书数千卷，一目能数行”。他曾负笈师从于汪乔年，乔年乃汾口汪家桥村人，历任刑部、工部郎中，青州知府，陕西按察使，这期间，以父丧居家守孝。汪公惊叹其才：“击节称叹，以励其群弟子。”但因为其文“奇肆自姿”，乡试主考官“谓其文有疗时之意，而以过奇置之额外。”毛志履从此绝意仕途。死后以子贵，被封文林郎城固县知县。

毛氏一族开始显赫，始于其曾祖父毛一瓚等人。一瓚字献卿，为明壬辰（1592）进士，出任进贤县令，减赋薄徭，与民休息，清廉之声名冠天下，人称“毛进贤”。有子三，毛国典、毛国章、毛国荣。毛志履是国章的儿子。

一瓚兄长毛一公，字震卿，幼年发奋苦读“登先月楼，去其梯，不窥园者三年，遂淹贯经史”。（毛际可《曾伯祖明斋公传》）万历己丑（1589）进士，文名籍甚，授湖广汉阳司理，断案明允。后擢工科给事中，受诏巡视皇城。后因抗疏请皇长子册立，神宗怒削其籍，天启帝即位后，陟南光禄寺少卿。

毛一鹭也是毛际可的堂曾祖父，官位更大，曾任兵部侍郎，因名附阉党，晚年有亏名节。算起来，毛氏一族中，毛一鹭是个例外，故毛际可没有为其写传。

相对于祖父和父亲，毛际可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，“九岁应童子试，邑人颇称之”。他十九岁赴省试，父亲毛志履叹曰：“孺子文他日必能荣世。”果不其言，毛际可二十四岁中举人，二十五岁成进士。初授河南彰德府（今河南安阳）推官，廉明不阿，政绩卓著。后调城固（陕西省）知县，毛志履随之就养城固，时常嘱咐毛际可：“吾祖作令进贤，不能名一钱，子孙未尝冻馁，汝无为后人计。”时涪河五门堰发洪水，毛际可昼夜筑堵，可使灌溉良田五万余亩。每每回到家中，毛志履依门安慰说：“此行良苦，为民牧者，慎无憚一身之劳而貽生民无穷之戚。”再调浚仪（河南开封）知县，益清贫廉洁。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被荐试博学鸿词科，因故未入京赴试。不久告老还乡，闭门著书。

毛际可的才能是多方面的，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，他被聘为《浙江通志》总裁，主持其事。这是我省史上第二部通志。它在原志基础上，更加删润，分类定名，厘然不紊，体制愈趋完备。又主纂《严州府志》。此外，他在诗词、书画方面，亦小有所成。

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幅毛际可的《松石图》，为此，我电话咨询了该馆书画部卢佳主任。卢主任很是热心，把藏品照片发给我，还把原始的普查登记表一并发给我。该画纵一百七十四厘米，横八十四厘米。搜集来源注明：“余绍宋旧藏。丙寅冬得于京师宝胡堂藏。”

余绍宋生于清光绪九年（1883），191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，民国元年（1912）任司法部参事。近代著名史学家、鉴赏家、书画家和收藏家。说来有缘，1943年5月，他应聘出任浙江通志馆馆长，重修毛际可编撰的《浙江通志》。由他鉴赏收藏《松石图》，也算意有所属、物有所归吧。

该画落款为“辛酉仲秋为龙章老长兄写”。辛酉年是康熙二十年(1681),毛际可时年四十九岁。《松石图》为纸本墨笔。画面上看似一棵连理松,中间抱夹着两块奇崛的山石。一松昂扬挺立,一松欹斜出画面,松枝虬曲回展在视线中间,松枝末梢处,呈现向上的姿态;松苍石劲,欹正相倚,笔酣墨畅,相得益彰。

毛际可不独通经史,擅书画,他还工诗词古文,与毛先舒、毛奇龄并称“浙中三毛,文中三豪”。这样的名号可不是凭空得来的,我们来看他的《峡源瀑布记》(《安序堂文钞》卷十五,《遂安县志》卷十也有收录),咏物写景,入微传神:

凡石之趾,多外拓,而兹石则崭然内敛,故水独能空悬数百尺,如泻檐溜于阶砌间,下复承之以巨石,跳沫溅珠,不可名状。予坐卧其下,见奔者如雷,坠者如石,翔者如鹤,立者如鹭,随风者如云散,如岚合,如炊烟之缕缕而上浮。若日光映射,则有素若练者,灿若锦者,五色陆离,若虹霓之饮于涧者。其灵奇浩瀚之致,顷刻万状,不暇应接。

读之如闻其声,如见其景,如临其境,如感其情。比之韩愈、柳宗元同类记游散文,亦毫不逊色。

毛际可还有词作《浣雪词钞》,题材丰富,既有怀古咏史词,也有纪游山水词,既有咏物写景词,又有闺情酬唱词,寄兴寓情,感时伤怀,有很高的艺术成就。如《蝶恋花·别王丹麓》:

马迹车尘何日了,不分啼鹃,只解催归好。杨柳条长飞絮少,离情一夕和春搅。

北墅高楼芳树杪,愁唱骊歌,酒罢天初晓。片霎征途烟渺渺,回头残月

如灯小。

毛际可友人王焯(字丹麓),入清不仕,志不可夺。一生以绘画、诗词、刻书为乐事。这是诗人作别友人的场景,“马迹车尘何日了”,开篇点明了诗人已厌倦羁旅漂泊的生活,杜鹃声声唤人归;“杨柳条长飞絮少”,已是暮春时节,离情渐浓,夜不能寐,搅了诗人睡意。下阕旅愁叠加离歌,为了消愁解忧,终夜饮酒到初晓,诗人整顿行装,踏上渺渺征途时,惊回首,残月如灯挂天际。此《蝶恋花》一词,写尽了惜别离愁之情,令人一咏三叹。

无怪乎毛先舒(字稚黄)曾在一次酒后评价毛际可“吾文不及若文,若诗不及吾诗,长短调则雅相颀颀”(《家稚黄五兄传》),洵为酒后真言。

王丹麓清高孤傲,自视极高,曾拒绝了纳兰性德的举荐。纳兰性德虽贵为宰相明珠的儿子,但心仪汉族文化,景慕江南俊颜,与江浙名士多有交往。对于落魄潦倒的遗民、隐士,或倾囊相助,或暗中提携,得到他帮助的人不在少数。

《毛先舒年谱》中,引吴舒凫《王丹麓传》载纳兰性德帮助毛先舒、王焯之事:“(纳兰性德)特致书顾太守岱,称毛稚黄、王丹麓两人文行为西陵第一。时开馆修郡志,毛令其子通谒,遂延入馆,王终不往。”毛先舒接受了纳兰性德的举荐,而王丹麓却拒绝了。

在王丹麓心目中,毛际可是值得信赖的朋友,他曾求毛际可为其父王湛(字澄之,号瑞虹)写传记。我们在《毛际可集》找到了《王瑞虹先生传》:“今年春,丹麓访予旅次,手一编见示,垂涕再拜,求为其尊祖瑞虹先生传……”

《毛际可集》作为“浙江文献集成大家系列”之一,是2006年习近平主席主政浙江时组织编纂的。序言中说:“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、智慧、信仰、情感和生活的载体、方式和方法,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

生活方式的整体。我们说，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、方式与环境，文化通过传承为生活进步发挥基础作用，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。文化的力量，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、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。”

从毛氏家族的延续中，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力量。上述“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大夫坊”，位于城西二十五里处，是为纪念进士诰封甘州同知毛际可、思南府知府毛士仪、冀州知州毛士储、河南都转盐运使司运同知毛览辉、江南道监察御史毛绍睿、裕州知州毛绍准而立的。

一座牌坊，表彰祖孙四代人：毛士仪、毛士储是毛际可的儿子，毛览辉是士仪的儿子、毛际可的孙子，毛绍睿和毛绍准是毛览辉的儿子、毛际可的曾孙。

家族成员个个优异、人人楷模。这便是文化的力量，是世德家风的传承，为官有政绩，为文有文采，为人有风骨。毛际可上承祖训，下传子孙，此“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大夫坊”，实至名归，放眼州府县邑，也是绝无仅有。

牌坊彰显事功德藻、忠孝仁义，给世人立一个做人的榜样、我行为规范的楷模，足可垂范后世。把文化的力量融入家族的血液之中。但对于贞节烈妇牌坊，我总觉得对女性不公，不够人道。

毛际可有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儿。士仪、士储皆有功名，与父亲儿孙共享一座牌坊。女儿也是有故事的人，名叫毛孟，嫁给康熙六年（1667）进士方象瑛之子方引祀。毛孟嫁过去才五天，丈夫暴病而亡，毛孟决定殉夫而去，决然跳楼，垂死复苏，侥幸捡回来一条性命。

众人以为这事就到此为止，楼也跳了，心志已明。谁承想，此女心里早为自己树立了一座牌坊。我们在毛际可为自己女儿写的《亡女吞金记》一文中已见端倪：“戊辰春（1688），余为钱塘戴烈妇作传，有‘吞金不死’语。亡女在旁读之，微哂曰：‘吞金岂能死人乎？’余时颇讶其言。”

毛孟求死之心从未断绝，两年后的庚午冬果有此举，吞食金耳环一对，金戒指两枚，效仿戴烈女死法，又没死成。于是绝食十九日而歿。

呜呼！毛际可有没有想到，他在《安序堂文钞》一书中，关于贞节烈妇的传记、墓志铭、墓表等不下十篇，完全是站在一个卫道者的立场，欣赏那些贞节烈妇，褒奖赞誉之辞充溢于笔端。却不知女儿站在边上，看在眼里，耳濡目染，早已是暗下发愿：“恪守妇道，从一而终。”做一个父亲笔下赞许的人物。

我不敢揣度毛际可写《亡女吞金记》时的心情，表面冷静，内心一定翻江倒海，肝肠寸断。因为他别无选择，这是作为一个卫道者的职责。女儿看似被强大的道德舆论所操控、绑架，父亲何尝不是被理学、道德绑架了呢？女儿是一个殉道者，父亲则是一个卫道者，父女俩没有谁是赢家。这里，唯有程朱理学赢了，制度礼教赢了，社会舆论赢了。

毛孟有无单独立一座节烈坊？我不忍心继续考证下去。一次，我来到图书馆三楼文献室查阅资料，不经意看到边上泛黄的一套《浙江通志》，乃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重刊，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影印本。字体太小，我只是随手翻阅，在严州府遂安县烈女一览，“方引祀妻毛氏”事迹的末尾，还是瞄到了这样一行字：“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）具题，奉旨建坊旌表。”

我心中不由一颤，合上书页，静默良久。

文献室空空荡荡，只有我一个人。窗外是一排高挺的银杏树，摇晃的叶片金黄灿灿，不时有黄叶随风飘零尘土。我心思恍惚，在古今之间来回穿梭，反复考量……

毛女吞金殉夫，虽不值得提倡，但她那一缕烈魂，是为追随信仰而飘逝的，也算做到了知行合一，用生命去践行她心目中的贞节。扼腕唏嘘，慨叹之余，我总觉得今天的我们与古人相比似乎缺少一点什么，待人接物也好，为人处世也罢，繁文缛节的揖拜少一些无妨，但真诚和执着却不能少，

世故和油滑则不能多。否则，心中无信仰，眼里无追求，行为无准则，得过且过着，是否更显可悲呢？

“三毛”中毛际可年龄最小，享年七十六岁，比大毛（先舒，杭州人）多活了八年。二毛（奇龄，萧山人）不仅学问大，还因人施教，能文的授文，能诗的授诗，能画的授画。“扬州八怪”的金农和陈撰，都是他的弟子。奇龄活了九十多岁，可谓长寿者。

毛际可一生著述繁多，但他始终认为修身、立德是为文的前提，夫世之真能为文者，必循乎道德之途，泽以诗书之气，其持心必静，其宅心必虚，其取益必广，未有如执事所云而可以称文人者。

毛际可文名盛于官名，盛于画名，为文之道他能解得其中三昧，故能称“文中三豪”。除《安序堂文钞》之外，他还有《会侯先生文钞》《松皋诗选》《浣雪词钞》《松皋文集》《鹤舫文钞》《春秋三传考异》《黔游日记》等传世。

“天下第一廉吏”徐士讷

孩儿立志出乡关，学不成名誓不还。
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无处不青山。

这是毛泽东1910年走出家乡韶山时，写给父亲的一首诗。诗很直白，说自己已经立下雄心壮志誓要走出家门，如果没有成就，发誓绝不提前回到家乡。死后何必要在故乡的土地上埋葬自己的尸骨，在大丈夫眼里，处处青山皆可视作埋骨之地。没有儿女情长，唯有英雄气概。

好一个“人生无处不青山”。正如我们的主人公徐士讷的人生。

我在写明代进士蜀阜人徐楚、徐应簧父子时，查阅民国版《蜀阜文献新集》，不经意间看到徐士讷的诗作，其中一首题为《放生池》：

江湖何浩荡，虽放亦无多。
以此蓄鳞甲，无重施网罗。
生生如不息，在在有天和。
叹息人间事，忘机更若何？

吟咏之间，似有同感，觉得这是一个有心之人，推己及人、及物，怀揣

悲天悯人之情。放生池一般在寺庙中可以看到，信徒把鱼、鳖等放入池中，就等于行了一次善。但在徐士讷看来，把捕捞到的生物放到人为的池水中，表面看似是善举，其实无异于是网罗禁锢它们，万物生生不息，与自然和谐共处，人们何必多此一举，如若忘记这些机巧之心不是更好吗？

能说出这番透彻的言语，想必徐士讷是个有境界的人。于是，我把视线从蜀阜转向了黄金里，开始关注徐士讷。

黄金里是威坪一个村，千岛湖形成后大部分沦为泽国。这里是徐士讷的出生地，虽不能与蜀阜并肩，却也“环奇列秀，地灵祖荫”，有丹青画不尽的自然山水。徐士讷后来以诗词的形式，赋得金里十景：湖溪烟树、云水晨钟、铜井回澜、徐坂春耕、金盘贮月、风岫凌云、肥潭钓石、寺坞樵歌、西山积雪、奎楼夜读。

其中《西山积雪》的颈联这样描述：“天际万山无鸟雀，溪头孤艇有渔竿。”西山积雪，山石树木都不见了踪迹，就连鸟雀也不知躲藏到何处去了，唯有溪头寒水边的孤舟和渔竿。这分明是一幅“独钓寒江图”。有如此雅兴的一定是参透世事，看破红尘的归隐者。

此时的徐士讷不是归隐，而是在西山“云水庵”苦读。

据光绪版《淳安县志》记载：“西山，在县西北六十里，远瞻崑崙，由湖头而上，鸟道险仄，及颠乃复迤平。晴霄烟霁，彻见百余里。山腰为云水庵，徐士讷读书其中。”

位于西山半山腰的“云水庵”，徐士讷在其中寒窗数载，饱读诗书，他如同羽翼长成的雏鹰，时刻准备翱翔于天际。“依稀刷羽入青云，展翅排空极目遥。”这不失为他内心的独白：雏鹰长大整刷羽毛，以便奋飞入青云，展翅高升在遥远的天际。长空傲然，气势如虹，符合他此刻的心境。

我查阅了《五经徐氏宗谱》《永丰徐氏宗谱》（敦仁堂本）、《塘坪徐氏支谱》（敦伦堂残本）、《厚屏福派徐氏宗谱》（凤仪堂本），均未见关于徐士讷

的记载。新版《淳安县志》有载：“徐士讷(1680年前后在世),字恂若,淳安威坪黄金里人。康熙十五年(1676)举进士,授河南嵩县知县……”

查丙辰科殿试榜单,徐士讷排在三甲第六十九名。

他上任河南嵩县知县的时间是康熙二十五年(1686),从考中进士到任职的十年是一段空白期,我们不得而知。

嵩县乃河南嵩山起脉处,是黄河、长江、淮河三大水系的分水岭,更是北宋理学名家二程(程颢、程颐)的故里。徐士讷身穿家乡七都的葛麻粗服,带着两个仆人走马上任。

离县城不远,天色已向晚。徐士讷一路走走停停,看看山川,访访农户,悠闲自在。仆人有些着急,催促道:“老爷,此地山更高林更密,与黄金里差不多,没啥看头,抓紧上路赶回县衙吧。”徐士讷手捋胡须,慢悠悠道:“不急,今晚在此暂借一宿,观民风可知教化也。”

仆人寻得一处农舍,叩开门扉道:“这是我家老爷,天黑误道,想借你家宝地暂住一晚。”老农望一望他们,爽快应道:“中。你们想住便住,也不用唬人。”引着徐士讷一行进入院内,自言自语道:“这黑黑瘦瘦的,眼瞅着不像老爷,倒像是老汉哩。”

徐士讷掏出烟袋,装上烟丝点着,递给老农,笑说道:“穿了官服是老爷,脱了官服是老汉。”就着石凳落座,顺便问道:“看你这院墙上挂着许多禽兽皮毛,应该是个猎户吧?”老农接过烟袋猛吸两口,道:“听口音,外乡人吧?”忽叹一声道:“嵩县杂税多如毛,像那啥火耗费、滴珠费、制扇伞费、修公署费、考试试纸费,还有那册费、解费,五花八门……”说着,把烟杆递回给徐士讷,反问道:“你听说过用虎、豹、鹿、狐皮来征税的吗?”

徐士讷边装烟丝边摇头,道:“闻所未闻。”

老农接口道:“是吧?县上年年索派这些皮子,交不上便足抵相等银两缴纳。俺家拿不出许多银子,只得遣小儿钻密林,跨险壑冒死猎取。造

孽啊。”

徐士讷听罢，呼地一下从石凳上立身而起，怒道：“这不是要老百姓的命吗？从今日起统统取消！”

徐士讷说到做到，上任伊始，首先拿这些无名杂税开刀，只要不合理的摊派一律革除。嵩县百姓都在争传，这新来的徐老爷定是上天派来的清官，是来救民于水火的。

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”这句话用在徐士讷身上恰如其分。察访民情，了解民生，解决疑难，化解纠纷，他心中始终装着百姓，故而赢得百姓拥戴。

据《嵩县县志》记载：“康熙二十七年，知县徐士讷，教谕李滋建两程子专祠三楹，规模草创。”嵩县是理学家程颢、程颐的故乡，徐士讷尊崇文化，仰慕两程兄弟，在原址基础上，修复程颢、程颐祠堂三间。顺带把邵康节（邵雍）祠也一并修复了。“邵子祠”在县北辛店，堂后为皇极书屋，左右为“天根”“月窟”二轩。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，钦颁御书“学达性天”匾额，苦于祠堂破败，一直无处悬挂，徐士讷增修周垣，卷棚和大门各三间，藻绘有加，弘丽一新，维护师道尊严。

文化无小事，教化有栋梁。徐士讷自幼熟读圣贤书，他深知文化的重要性，他心中始终有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情怀，做官就是为百姓谋福祉。为此，他构思了一个兴学的计划，利用两程的影响力，着手兴建伊川书院。

伊川书院位于嵩县鸣皋镇，它的前身就是“伊皋书院”，据今尚保存在河南嵩县程村的碑刻记载：元丰五年（1082），太尉文彦博鉴于程颐“著书立言，名重天下，从游之徒，归门甚众”，就在洛阳鸣皋镇的一个小村庄拨了一块土地，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“伊皋书院”，让他在此讲学近二十年。元延祐二年（1315），据《敕赐伊川书院碑》记，始改为伊川书院。

伊川书院历经一年修缮，建制如旧，中为先师殿，左为九贤祠，右为二

贤祠。前为戟门、棂星门，后为便厅、神厨、斋室，俱三间。院之东北隅，有楼曰“稽古阁”。

徐士讷舍得在文化保护上花钱，自己生活倒十分简朴，一日三餐粗茶淡饭。闲时自己开垦菜园子，种上时蔬瓜果，浇水、施肥、锄草、松土，活成了一个典型种地老汉。收获的季节，自己吃不完还赠送给僚属和邻居。写到这里，我不由想起《菜根谭》里那句话：“嚼得菜根香，则百事可做。”从徐士讷身上可以得到印证。他带头在书院讲学，以自己人格的魅力改变着嵩县官场和百姓的风气，所讲的道理和他的为人一样，知行合一，令人信服。

常人与圣贤其实只有一步之遥，那便是“持戒守敬”。也许有人会问，徐士讷是作秀还是犯傻？我说非也。徐士讷除了天生性格因素之外，还可能有点“道德洁癖”。

徐士讷在嵩县任职三年，乡党和而争讼息，政治清明，百姓安宁。有旨“擢知济宁州”，升他为山东济宁知州，临行之日，嵩县百姓千般不舍、万般挽留，沿途送别百里之遥，感人肺腑。百姓自发把他的事迹编成歌谣，刻在石碑上，立于道口，并建造生祠以示怀念。

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，徐士讷来到山东济宁府，甫一上任便遇到了黄河山东段水灾。济宁古称任城，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，长达两百余公里，济宁河道纵横交错，除了运河，尚有洸河、府河、越河、任城河等，南北通衢，檣桅林立，客商往来，百物聚集。

黄河本不流经济宁，但架不住曹县、单县堤溃引发，漫灌进入运河，加上这一年六月中旬，连次大雨，山水陡发，各河盈溢。济宁面临着严峻考验。徐士讷爱民如子，茶饭不思，日夜在各河道巡察指挥，抢险加固。他喉咙嘶哑，眼睛充血，仍然奔忙不歇。水灾伴着饥荒在全城蔓延，市民的恐慌情绪也开始蔓延。

济宁城没了生气，街面无行人，烟囱不冒烟，许多人家已经好几天揭不开锅，无力自救。空气中弥漫着窒息和绝望。徐士讷要给大家带去希望，他首先想到是亲捐俸禄以倡赈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那些家有余粮的高门大户也开始积极响应，纷纷解囊赈济饥民。此外，徐士讷还果断开官仓放粮，知府怕担干系，欲行阻止，徐士讷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，嘶哑着嗓音问道：“仓谷重乎？人命重乎？”

据《济宁府志》记载：“民得以活者十余万人。”

徐士讷此举，是从他写《放生池》一诗就可以预见到的，这样心怀悲天悯人之情，定是个有大爱之人。

黄灾不减，运灾继续。济宁之南有牛头河，纳南旺诸水，下经鱼台，注于八闸，康熙年间常有溃堤发生，诸闸淤塞为患，加之南乡是济宁低洼地，首当其冲。徐士讷经过一段时间调查摸排，决定亲自督理疏浚河道。

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徐士讷在现场日夜督工，河工还有轮换休息，他一个五品知州，吃喝拉撒睡都在工地，僚属见他倦容满面，浑身上下汗渍斑斑，都劝他回去好好梳洗休整一番。徐士讷望着疏通的河道，欣慰道：“再有月余河道全程告竣，到那时再歇不迟。”僚属心里嘀咕，老爷这是不要命的节奏啊。

就在“工程已达十之七”时，徐士讷倒在了疏浚河道的工地上，再也没有起来，他是过度劳累而猝死的。时间定格在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九月，距离他到济宁上任尚不满一年。

这个淳安籍官员，把自己的英年献给了齐鲁大地。济宁下辖曲阜，这里是至圣先师孔子的故乡，徐士讷用生命践行了圣人的教诲，无愧于读书人的称号。“读书人”三字与我们似乎睽违已久，但这三字在古代分量不轻，几乎是明事理的觉悟者、敢任事的先驱者之指代。济宁百姓听说他们的父母官死于任上，感念徐大人的功德，从四面八方自发赶来送行，这是孔子

所谓的“甘棠之爱”。

鲍楹有一首诗为《题徐敏庵嵩斋治略》，可谓对徐士讷在嵩县和济宁任上的真实写照：

公禀山川秀，卓牵为人杰。
文章撼江涛，经术亦敏决。
初秉伊川符，布衣跨寒劣。
辟土招流亡，功多劳亦竭。
气凌中岳高，名傍西台列。
任城一驱马，东路冰霜冽。
开河接禹艰，赈米效梁哲。
志广业未终，中道哀鸿咽。
皇皇楨干臣，春秋时祀设。

鲍楹，字觉庭，浙江余杭人。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）举人，曾任淳安县学训导，擅书法，尤精于诗。在任时曾专门采集淳安县之诗，计得作者三十九人，编为《清溪诗集》，他用自己的俸禄刊刻流传，得到朱彝尊高度赞扬。

鲍楹用诗的形式，对徐士讷在嵩县以及济宁的政绩，作了高度评价，“皇皇楨干臣，春秋时祀设”，像徐士讷这样的栋梁之臣，嵩县和济宁百姓，每年春秋两季会设坛祭祀他，传颂他的清廉之声。

工部尚书汤斌，乃河南人氏，操行高尚，得到康熙皇帝器重。康熙曾告诫他说：“为外官者以爱养百姓，惩贪奖廉为最重要，务使德胜于才，始可称贵。”上述三点，徐士讷都一一做到了。汤斌本人也从政廉洁，当他听说徐士讷的事迹后，不禁由衷赞他道：“冰清玉洁，实心爱民，第一廉吏也。”

徐士讷著有《亦种堂诗集》五卷。人称其诗“有笔力，不事摹拟”。诗集封面有“淳安徐敏庵著”的字样，“敏庵”或为徐士讷的号，其生年待考。

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无处不青山。

徐士讷终其一生，为这句诗作了完美的注脚。

“通经者”方燊如

话说康熙壬午(1702),杭城八月,秋试在即。但见九陌上轮蹄往来,六街内儒冠相瞩。

全省的儒林俊彦会聚杭城,共赴这三年一度的乡试大比。此时,紧临贡院的青云街上出现了一道奇景,一个考生模样的人,手提一盏灯笼,上书“新科解元方”的字样,大摇大摆从闹市走过,引得一众考生纷纷驻足,侧目而视。

消息很快传到主考官耳朵里,贡院里一时议论纷纷,都说这是一个淳安籍考生,名叫方燊如,料其必摘取今科解元,连灯笼都已预先定制好了。主考官一拍案桌,立身而起,沉声道:“真是岂有此理!尚未开考,连老夫也不知道今科解元是谁,竟有这般傲气的秀才,取他何用!”放榜之日,方燊如果然名落孙山。主考官有意要杀他狂妄之气,找一个借口不予录取,以示训诫。

方燊如,字若文,又字文辘,号朴山,人称朴山先生。淳安赋溪人。他自幼早慧,受业于萧山西河先生毛奇龄。

方姓乃淳安第一大姓,约占县城人口的十分之一。赋溪方氏来自沙堤。据方燊如自己所写的《先兄若远暨嫂吴氏墓志铭》里有这样的记述:“先兄讳燊如,若远其字。先恕斋府君之冢子也。系方氏得姓于雷,其望在河南,

西汉之季有纮者，始迁歙东乡，今淳安即析歙东乡置也。纮孙储，封黟县侯。侯之十二世孙隆，当宋元嘉时，实里今淳安沙堤，官至太守。由沙堤徙赋溪者林也，于隆为二十八世孙。历宋元明，其族更隐更显……封其父者讳尚恂府君，起家万历癸丑进士，累官至湖广按察使副使，吾曾祖也。”

父亲方士颖，字伯阳，号恕斋。顺治末诸生。工诗词，著有《恕斋偶存》。方士颖有四个儿子，依次为棻如、棠如、葵如、莱如。方葵如排行老三，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都先于他亡故。为此，葵如均为他们写了墓志铭，收录在《集虚斋学古文》一书中。

光阴易逝，有了三年前杭城贡院青云街的教训，方葵如的傲气有所收敛，但他角逐科场、赛试经纶的志向并无一丝懈怠。社会的主流意识依然是学而优则仕，读书人似乎别无选择，除了“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，努力推销自己，谋个一官半职，一旦平步青云，既可以济世经邦，实现理想抱负，又可以给家族增添无限荣耀，夫复何求？

康熙乙酉（1705）秋闱，方葵如苦等了三年，终于迎来了久违的乡试。乡试一共考三场，八月初九是第一场，十二日是第二场，十五日考第三场。按数额录取的为正榜，数额之外录取的为副榜，正榜第一名称解元，第二名称亚元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名称经魁。全省参加乡试的士子有万人之多，而录取的人数才八十人上下，可谓僧多粥少，激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。

方葵如定了定神走进贡院，先过天开文运牌坊，入正门，为仪门，为龙门。点名领卷入场，依例搜检衣服器具，以防夹带。待考生按号就位，随即关闭栅栏落锁。但听三声炮响过后，贡院大门、龙门同时由监临官加封上锁，考试才算正式开始。

三场文字考毕，方葵如信心满满步出贡院，站定，伸了伸腰，回头瞥了天开文运牌坊一眼，顿觉亲切。考试紧张是难免的，好在自己对“四书”“五经”及论、诏、诰、表、判已了然于胸。即便是时务策五道，也在心中推演过

无数回，上书的治政抚民方略、除弊兴革对策，并非空泛的论谈，是皆可推行实施的。

安心等放榜。他这样宽慰自己。

杭城的九月初五，恰是丹桂飘香的季节，贡院外早已人潮涌动，上万名考生挨挨挤挤，皆欲争睹此科龙虎榜单。“中了！中了！”人群中不时有人兴奋地高呼。落榜的考生迟迟不愿离去，生怕看花了眼，漏了自己的名姓。

“恭喜！恭喜！”方燊如人未到贡院，同学、同乡纷纷向他报喜来了。“走，看看去。”方燊如挤进人群，抬眼望去，果然高中浙江乡试龙虎榜第二名，人称亚魁。接下来便是“鹿鸣宴”。新科举人换上官府发放的顶戴衣帽，依序向主考官、同考官、监临、学政以及内外帘官行谢恩礼，跳“魁星舞”。人生得意，莫过如此。

康熙四十五年(1706)，会试在京如期举行，各省举人“公车北上”。大约有六千余人参加会试。方燊如顺利进入殿试，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。皇帝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，以定甲第。凡黄榜上有名者，一律称为进士，人称“天子门生”。

黄榜放出，方燊如考中进士，依例是要授官赴任的。但不知何故，直到康熙五十三年(1714)六月，才授其顺天丰润(今河北)知县。

丰润县名的由来，据说因为它北枕燕山，南为平川，傍泥河，环泃水(还乡河)，取润泽丰美之意。号称“幽燕之门户，辽海之襟喉，神京之肘腋”。方燊如在丰润当了三年的知县，最终却以“烧锅失察”而丢了官。

烧锅即酿酒。康熙初年，北方烧酒产量增加很快，烧锅遍及多省，史载“且通邑大都，车载烧酒贩卖者，正不可计数”。康熙帝为了节约粮食，培育国力，屡次下令严禁烧锅，目的就是控制烧酒的生产规模。

丰润自古就有酿酒的传统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此地就隶属于燕地，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，侠士不可无酒壮行。清代丰润县的“泃酒”闻名于

世。据《丰润县志》记载：“湏酒以还乡河水酿之，所以独异者……为燕酒第一。”也是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上面三令五申严禁烧锅，下面却屡禁屡犯。康熙帝为了以儆效尤，不得不对失察之地方官予以重处。

方燾如为之丢官回乡。

因“烧锅失察”丢官的地方官应不在少数。

纵观康熙一朝，严禁烧锅政策基本贯穿始终，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，颁布上谕：“近闻山海关外盛京等处，至今无雨，尚未播种，万一不收，转运维艰，朕心深为忧虑……闻彼处蒸造烧酒、偷采人参之人，将米粮靡费颇多，着遣部院堂官一员，往奉天，会同将军、副都统、侍郎等，将此等靡费米粮之处，严加禁止。”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一四一）随后，康熙三十年（1691）、三十二年（1693）又两次下令，严禁直隶顺、永、保、河四府烧锅酿酒。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），更于湖广、江西、陕西等九省颁布命令，禁止烧锅。

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，面对米价居高不下，康熙谕户部云：“今闻直隶各省雨泽以时，秋成大熟。当此丰收之时，正当以饥谨为念。诚恐岁稔谷贱，小民罔知爱惜，粒米狼戾，以致家无储蓄，一遇岁歉，遂至仳离。著该督抚严饬地方有司，劝谕民间撙节烦费，加意积贮，务使盖藏有余，闾阎充裕。”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二〇〇）

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）二月，康熙特召直隶巡抚赵弘燮，强调严禁烧锅。赵弘燮奉旨查禁，抓获违禁烧锅者十九人，予以重处。

方燾如丢官是在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的七月，虽说皇帝没有直接下红头文件，或是口头交代相关人员严禁烧锅，但作为地方官应该具备基本的敏感，吃透圣意。从方燾如留存的《丰润杂诗》来看，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：

风卷边沙十丈尘，但论食物也关人。

墙头一遇椒花雨，瓮底应空曲米春。
果榭苹婆分古寺，饭抄云子饷比邻。
新水早李原无欠，只是飘飘愧此身。

可见他对丰润、对漉酒是倾注了感情的。因此动了恻隐之心，担心老百姓瓮底空没有曲米春酒喝，结果丢了自己的饭碗和乌纱帽。

方燊如“烧锅失察”那年四十五岁。从此他开启了另一段人生，讲学论文，教书育人。足迹踏遍了敷文书院、蕺山书院、紫阳书院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官场上少了一个丰润知县，文学史上却多了一个古文学家。

莘莘学子，济济门下。他奖掖后进，必以端心术、植品行为本，故出其门者卒成伟器，不乏高徒，如杭世骏、梁文庄、孙虚船、陈兆仑等人。

敷文书院坐落在杭州凤凰山北万松岭上，明弘治年间称万松书院，至康熙皇帝亲题“浙水敷文”四字，遂改称敷文书院。方燊如曾在《贺严母朱太君五十生日序》里开头说：“往僦居会城（杭州），诸生时来说经，铿铿然。”弟子就《诗经》《易经》中不解之处，向老师提问。方燊如一一予以解疑释惑。杭世骏（大宗）、梁文庄（诗正）、陈兆仑（星斋）等皆为杭州人，是方燊如主讲敷文书院时的弟子，他们在课后还时常找先生讲经，后来一个个皆取得了功名，有的学识名望甚至超过方燊如。

蕺山书院在绍兴，方燊如在《张母李太君八秩序》一文的开头说：“吾来蕺山，为诸生商略文笔……”主讲蕺山书院时，也有一大批追随者。他潜心于濂（濂溪周敦颐）、洛（洛阳程颢、程颐）、关（关中张载）、闽（福建朱熹）之理学。凡有弟子提问，他口授指画，有问必答，兼之身躯伟岸，仪表堂堂，颇有大家风范。时人以为欧阳修再世，把他与桐城方舟、方苞并称“三方”。

方舟、方苞是亲兄弟，出生于江苏六合留稼村。

方舟大方苞四岁，字百川，兄弟二人都是早慧的才子。方舟喜欢结交

朋友,尤其是志同道合者,如桐城戴名世、宿松朱世文、怀宁刘捷等皆友善。可惜天妒英才,方舟三十七岁就谢世了,方苞通过哥哥的关系与这些好友交往,以此也结识了方燦如。

方苞,字凤九,一字灵皋,晚年号望溪。他与方燦如同为康熙丙戌(1706)科进士。在文学上主张“义法”说,即“道”“文”统一。他在《史记评语》里说:“义即《易》之所谓言有物也,法即《易》之所谓言有序也。以义为经,而法纬之,然后成体之文。”被称为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奠基人。

作为古文学家的方燦如,其文学主张又是如何的呢?他在《龚硕果文序》里是这样说的:“原经义之设,以通经有文采者为中格,不得如明经墨义,龠解章句而已。然范史谓:‘汉氏之东,章句渐疏,而多以浮华相尚,盖儒者之风衰焉。’”

方燦如对“通经者”的要求是:“观物必造其质,记事必提其要,表术里原,擘画终始。”这里的“质”和“要”应指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规律。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,就可以对事物的来龙去脉,表里之精粗做出翔实的判断与表述,而非“龠解章句而已”。

方燦如擅长古文,学问根底深厚,一次偶然机会他读到戴震的文章,连说几个“好”字,心中大为折服,叹说道:“老夫不如也。”弟子不解其意,问道:“老师何出此言?我看戴震文章尚有文辞不通处哩。”方燦如就弟子所指一一道明出处,某词某句出于某经某史,用于此处妙意何在。弟子深服老师的渊博,惊叹不已。论年龄方燦如大戴震五十多岁,可谓忘年之交,论学问两人惺惺相惜,恨不能促膝长谈。

乾隆丙辰(1736)有人荐举方燦如参加博学鸿词科试。从方燦如的书信中,我们可以看出推荐他的这个人是兵部王侍郎(士俊),在《奉王少司马》信中提到,端午前一日,某再拜奉启大人阁下。前闻荐牍,猥及枯椿,愧不敢当。肃笺展谢,粗道鄙趋。正在封缄,拟付儿子行笈,会有以邸钞寄者

已为部议摘斥，犹尚以前过也。立身一败，虽拔山力莫能助。这里所指的“前过”也就是“烧锅失察”，他在丰润知县任上没有将先帝圣意贯彻落实，遭到吏部的异议，不得参加博学鸿词科试。

方燊如的这个过失，在丰润百姓看来，却是一件善举，人们至今还在怀念着他。丰润学者刘天昌在其《丰润旧事》一书中，有一篇讲“方知县舍官保湔酒”的文章，他认为“酒是文人的兴奋剂，酒是文人的解忧散，酒是文人的忘情水，酒是文人的豪迈丸”。我觉得最后一句拟改为“酒是文人的豪迈曲”较妥，曲既可是词牌用于弹唱，酒曲亦是酿酒不可或缺的原料，更是燃烧激情的添加剂。丰润人对湔酒的感情尤其深厚，在那样一种高压环境下，其他州府县邑的酿酒烧锅，停的停，关的关，毁的毁，唯有丰润的湔酒烧锅，依然轻烟袅袅，酒曲飘香，因此保住了湔酒的千年传承。

次年，皇上下诏纂修“三礼”，急需这方面人才。好友方苞向朝廷推荐了方燊如。方燊如在给方苞的信中说：“檄取某赴京，充三礼经馆纂修者。持捧惭惶……”接着说“有不能应者二，有不敢应者二”。列举四条理由予以推辞。

乾隆丁丑(1757)，皇帝南巡江南，时方燊如年已八十六岁，受召于常州无锡县上，乾隆帝温语慰劳，并赐绉丝素里一袭，世皆荣之。

从常州归家时，已是戊寅(1758)之春，方燊如身体大渐，竟一病不起。他自觉时日不多了。弟子闻讯后纷纷到床前探视，看到先生昏昏沉沉，已是气息奄奄。弟子们无不黯然神伤。有两个弟子离床较远，正自嘀咕着，其中一个说道：“近来有人出了一个上联，我苦思几日，始终对不出下联。”另一个弟子问：“是什么句子？”

“你听好了。”弟子压低了声音说，“水如碧玉山如黛。”

正在弥留之际的方燊如，此刻猛然睁开了眼睛，弟子们赶紧围拢过来，想听听老师有何交代。只见先生艰难地张了张嘴巴，奋力说道：“云想衣裳

花想容。”言毕，气绝而逝。享年八十七岁。

好一个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，方燊如弥留之际，仅存的那一缕神志，他想的是学问，想的是弟子们的困惑，想的是绝句妙对，想的是给自己的生命，画上一个美丽的句号。

方燊如绝想不到，他去世前用尽气力吐出的这七个字，竟然馨香如芳，成了楹联妙对，两百多年后会出现在毛泽东的案头，并且亲笔作了圈点。

张贻玖先生的《毛泽东读诗》一书中，曾把这首楹联作为探妙来解析。张先生曾在中南海毛泽东图书管理小组工作，搜集整理了毛泽东读古典诗词的亲笔记录，他说：“毛泽东对这几则都加了圈点，还在天头上画着圈记。”楹联注释说：“方朴山，生平事迹不详。”

《淳安县志》有方燊如的条目，但没有具体的生卒年，只说：“方燊如（1740年前后在世）。”我们知道他的卒年和享年，就可以推断出他的生年，即生于康熙壬子年（1672），从而弥补了县志关于方燊如生卒年的缺漏。

方燊如有个儿子叫方超然，字苏台。雍正十三年乙卯（1735）拔贡，曾任两浙盐运司库大使。方燊如的大哥二十九岁那年就去世了，嫂子吴氏无儿无女，也一直没有改嫁，遂认超然为子。

另据方燊如《继室徐氏墓志铭》记载：“余既娶于吴而夭，继室以徐氏，年二十二归余，又三十五年而卒，雍正辛亥七月五日也。春秋盖五十六矣。”徐氏乃徐林鸿之女。徐林鸿字宝名，浙江海宁人，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举博学鸿儒科，工诗词、擅绘画、精鉴赏，博学多通，常与吴农详、王嗣槐、吴任臣、毛奇龄、陈维崧同聚于大学士冯溥家，时人称为“佳山堂六子”。著有《两闲草堂诗文集》四十卷。方燊如曾有《书外舅徐宝名先生诗后》记之。

方燊如仕途生涯短暂，长期的乡居生活，使他对民间的疾苦有了切肤的感受，在他现存的诗篇里也有所反映。如《卖炭谣》：

岁云暮，多朔风。愁杀人，卖炭翁。食粟数升，烧炭一斛。卖炭一斛，未饱实腹。亦知糊口四方难，差胜饥来束手看。炭值难增祝飞雪，雪深又若人踪灭。闭门谁问价高低，踏雪肩回徒泣血。翁泣血，儿号寒。语儿勿围炉，忍此衣裳单。雪消明日天逾冷，炭在行装好重整。

方燊如文章朴茂古奥，阐发性理，不够通俗，但这一首《卖炭谣》，却浅显易懂，字字句句，饱含恻隐之心。方燊如同情卖炭翁的贫困境遇，更了解他们内心的矛盾：“炭值难增祝飞雪，雪深又若人踪灭。”饥寒交迫之下，他却盼望天降大雪，好使自己的炭能卖个好价钱。读之令人潸然泪下。

光绪三年(1877)，中丞梅公奏请方燊如入乡贤祠。其名字收录进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。著作有《周易通义》十四卷、《尚书通义》十四卷、《毛诗通义》十四卷、《集虚斋学古文》十二卷、《离骚经解》一卷、《五经说疑》、《四书大全》、《诗集》、《家塾晚课》、《读札记》、《朴山存稿》、《朴山续稿》等，参与编纂《会侯先生文钞》。

政商翘楚王文典

万事秋摇落，离乱起弦歌。

提到民国，我们总不免想起军阀割据、民不聊生的画面；想起你方唱罢我登台，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剧目；想起社会剧烈动荡、激烈变革的场景；想起一系列政权体制、新旧制度、文化思潮的冲击；想起四万万同胞都将面临不同的人生抉择。

民国社会堪称奇葩，但同时也创造奇迹，各种思潮的猛烈碰撞，撕裂开一个巨大的空间，给救世者提供了一个伸展手脚的理想场所，他们各亮其招，各显其能，各遂其愿。从政的、从商的、从军的、从文的、从艺的……奇才辈出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我们今天的主人翁王文典，便脱颖于这个离乱的社会，他既是政界的明星，又是商界的领袖。面对着“中国之命运”这道终极命题，他又是如何抉择的呢？

王文典（1882—1950），淳安浪川乡芹川村人。父亲王启畴，乃浙西名士。据芹川《江左王氏宗谱》载：“王启畴，字俊臣，芹川人，邑诸生，通经史，旁涉岐黄家言，尤善祝由科。因本邑风气闭塞，移住武林，俾子弟得文化上利益。长子文典，次子诚斋，已蜚声商界。晚年归居里门，好行其德，凡地方

慈善事，知无不为。综计概捐款项不下千金。人有急难，恤之唯恐不及。卒之日，里党咸为叹惋。段执政，特褒‘闾里矜式’额。”

王文典是家中的长子，他还有一个弟弟叫王诚斋。为了儿子今后的文化教育，王启畴决定移住武林（杭州），他的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，蜚声商界。他自己晚年归居乡里，乐善好施。

我在宗谱里没有查到王启畴的生卒年，但从这段记载来看，大致可以推知他的卒年，即段祺瑞临时执政时期，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十月至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四月之间。段祺瑞政府褒奖王启畴的匾额“闾里矜式”，意思是，王启畴的善举可以作为乡里的示范和楷模，值得大家敬重和取法。

王文典出生于芹川村，又名维清、扬清。父亲在杭州经商，开设了“王恒生”“泰亨”商行，以经营茶叶为主，他把芹川作为茶叶收购基地，辐射四邻八乡。由于茶叶品种多、品相好，包装佳，远销上海外滩的公司，商行的生意很是红火。

芹溪虽窄，水路悠悠，汇入新安江后，一路往东奔流钱塘江。到了王文典开蒙的年龄，王启畴举家移居到了杭州。在经过了几家私塾教育的洗礼后，王文典被送到杭州“东文学堂”接受新式教育。

所谓“东文学堂”，就是用日语进行教育的各式日语学校。甲午战争后，国人发出了“废科举、兴学堂、改旧学、倡新学”的呼声，效仿日本教育改革，随后在国内出现了一批“东文学堂”。杭州的“东文学堂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的。王文典在“东文学堂”受到极大的触动，经历了一次心理转折。日本明治政府学习西方文明，引进先进技术，发展现代教育，工业化水平得到长足发展，国力得到极大提升。岛国迅速崛起的可怕之处，便是发动侵略战争，肆意掠夺他国资源。清政府软弱可欺，腐朽入骨，中国之命运何去何从？救国之路在哪里？王文典向自己发出了拷问，每当这时他总是热血沸腾，跃跃欲试，想要重振眼前这支离破败的山河。

心动不如行动。王文典不等毕业，就去鼓捣丝绸机械，研究发明新式织机，他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，振兴民族工业，挽救民族危机。前路漫漫，道阻且长。新式织机研发成功，新的染法也有起色，但在腐败的清政权统治下，如何去实现实业救国呢？王文典陷入了迷茫之中。

此时，浙路风潮愈演愈烈。1905年7月，浙江商办铁路公司成立，要求废除1898年盛宣怀签订的出卖江浙路权的中英“苏杭甬草约”。浙路风潮是以拒借外债、保护路权为直接目的，而绅商的做法是维护民族尊严。清政府害怕洋人，对于浙商维护国家利权的正当请求，以“外交首重大信，订约权在朝廷”为借口，不予支持。于是，一场声势浩大的拒款保路斗争，在浙江大地迅速蔓延。

王文典早年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是同盟会会员，他敏锐地从这场保路危机中看到了曙光，猛然醒悟在反动的政权统治下，实业救国这条道是行不通的。于是发出了“浙路浙款浙人办”的呐喊声，积极投身到运动中来。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发起浙路拒款公会。他在绅商之间发布消息，广造舆论，不但自己慷慨解囊，还发动绅商捐款，一时社会各个阶层人士踊跃购买路股，从公职人员到贩夫走卒，从厨子、僧人到妓女、乞丐，皆纷纷响应。民气之感奋，大有燎原之势。

民心所向，大势所趋。王文典感受到民众的力量，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。浙路风潮很快波及周边，江浙沪连成一片，互为声势，再从赣闽到两湖、到四川，成为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索。

提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，耳熟能详的是“黄花岗起义”和“武昌起义”，很少有人去关注“南京之战”。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，江浙沪先后宣布独立，但南京尚为清政权控制，并且驻有重兵，始终威胁着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。革命党人几次策划南京守军起义，均以失败告终。最终决定武力夺取南京。

南京守军有徐绍桢的新军第九镇、江南提督张勋的江防军、赵会鹏的江宁巡防军和王有宏的新防军共二万余人。由于武昌起义是由新军发起的，所以，两江总督张人骏觉得新军不牢靠，下令他们从南京城内，移驻三十多公里的秣陵关，每个士兵只补充子弹五百发。不仅如此，张人骏还让张勋密切监视他们的动向。然张勋另有所图，欲暗中谋刺徐绍桢。11月8日，徐绍桢决心联络革命党人，临阵倒戈，宣布起义。

徐绍桢兵分三路，向南京城发起了进攻，直到弹药用尽，也未能攻入城内，只得退往镇江。此时，革命党人经过紧急协商，任命徐绍桢为总司令，组织了浙江军、江苏军、淞沪军、镇江军和徐绍桢的新九镇新军，总共三万余人，联合一起攻取南京。战斗残酷而激烈，虽然联军兵力占优势，但守军工事坚固，易守难攻，从11月24日总攻开始，到30日止，依然无法攻入城中，联军伤亡惨重。

王文典在军中前线指挥部，他向浙江军司令朱瑞建议，组织两支敢死队，并毛遂自荐担任第一敢死队队长，选择朝阳门作为破城目标，期以必死。

南京城内，不见了昔日“桨声灯影、十里秦淮”的美景，此刻，唯有枪鸣炮轰、十里沙场的血腥。年末的天气异常寒冷，就连河水也封冻结冰，没了以往的生机与活力。

风萧萧兮秦淮寒，壮士此去兮能复还？

没有人能回答，也没有人去考虑。敢死队员都是自愿加入，他们只有赴死的义务，没有贪生的权利；只有陷阵的果决，没有犹疑的盘桓。

12月1日黎明，敢死队在王文典的率领下，终于攻入城内。清军一见城破，士气发生了动摇，有的举枪缴械，有的负隅顽抗。张人骏等乘乱弃城而逃。次日，联军占领南京城。

王文典在这场战役中表现神勇，他身先士卒，视死如归，极大地鼓舞

了士兵的斗志,对攻城拔寨起到关键作用。南京又称石头城,历史上乃兵家必争之地,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,气度不凡的风水佳境,被视为汉民族的复兴之地。南京之战一举扭转了革命军的形势,给清朝政府致命一击,南京从此以后成为革命中心,为中华民国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奠定了基础。

1912年1月1日,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,他推翻了专制的封建王朝,建立民主共和制度,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

民国成立,百废待兴。孙中山要做的第一件事,便是到辛亥革命的滥觞之地浙江去巡行。这些年,孙中山为躲避清政府的追捕,辗转在日本、东南亚以及美国等地活动。孙中山作为政治家,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中国大地的一举一动,之前,他联系王文典组织议和会议,赞赏王文典实业救国的理想,并为之付出的努力,此番巡行江浙也希望有王文典陪同。他专程来上海与王文典会面。

交谈中,孙中山告诉王文典说:“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,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。从前为清政府所制,欲开发而不能,今日共和告成,措施自由,产业勃兴,盖可预卜。”王文典非常赞同孙中山的观点,要革命、要民主、要共和,要实业勃兴。

政治上王文典追随孙中山,主张共和,反对帝制。1915年,袁世凯复辟帝制他通电反对,发行了《人权报》《女权月刊》以及《共和新报》,为共和体制大声疾呼。1917年7月,张勋复辟,王文典愤而南下,以示抗议。

王文典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、实业救国的推动者、民族工商业的践行者、国货维持的倡导者,他是一个有良知的爱国者。革命成功以后,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民族工商业的振兴,是近代中国商界领袖。为寻访王文典故居,我曾多次造访芹川,沿着芹溪溯流而上,只为那一眼的瞻仰,聊表心中那一份敬意。

从外观看去，王文典故居与一般民居相比并无特别之处。它坐落在芹溪的东岸，两层砖木结构，硬山顶，马头墙，内有一个百来平方米的庭院，虽说墙体斑驳显得沧桑，却不觉得潦倒。进得屋内，迎面是敞开式客厅，堂前悬挂一副木制楹联：“瑟好琴耽澹俗情，竹苞松茂怀同气。”语出《幼学琼林》。客厅两侧是厢房，据王文典族裔介绍，王文典就出生于南侧厢房内。

王文典出生于1882年，这一年是清光绪八年，美国颁布排华法案，王文典就在这个中国人倍感屈辱的年代降生了。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三十多年后，王文典每次出洋各国，一律穿着中山装，他是为了显示中国人的尊严；中国工人赴美不准登岸，王文典一到美国便自称工人，为的是提高中国工人的国际地位。

1912年，他在上海与蔡元培一起，发起世界语学校，建议教育部凡大学均添设世界语一科；同年4月，创刊发行《社会世界》杂志，其中半用世界语，普及教育知识。他还创办了南洋女子大学，高度重视教育科学与文化事业的发展。

王文典身体力行，匡时济世，一生效力于振兴民族工商业，创办多家民族企业。历任国货维持会会长、上海商会会董、粤汉铁路维持会会长、京师总商会会长、天津总商会常委、天津卷烟业同业商会主席、天津国货展览会审查长等职。1925年，他出任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，全国国货提倡总会会长。

作为商界翘楚，王文典始终内敛低调，不但自己生活俭朴，还在社会上提倡生活节俭，反对奢靡之风，他曾在当时的《世界日报》上发表宣言：“何妨将鱼翅及白兰地等洋酒之费，一律节省？”“所省之款量助慈善事业，诚一举而数善备焉。”他在宣言中还说“又纸烟一项，即以京师一区论，每月消耗计五、六万元，损人神经，耗人血液，殊为无益之消耗品，寻常人

类能知之，兹不多赘，并请勿吸。”宣言发表时间是1927年5月17日，有趣的是在这个月的3日，他刚刚被推举为京师纸烟行公会会长，此外，他还有另一身份，天津南洋烟草公司北方总经理。

从小走出芹川的王文典，此后走向杭州、上海、天津、北京，走向国际大舞台，到他六十寿辰时，首先想起的仍然是故乡芹川，特意寄回寿照一册到芹川家中。可惜他没有机会再回老家看看，1950年，他在天津去世，享年六十八岁。

王文典弟弟早年也留学日本，学习商学，回国后随哥哥从商，他们兄弟俩都曾在南洋烟草公司任高层要职。

在王文典孙子辈中有王次昭和王次恒两兄弟，在中国音乐界，有不小成就，哥哥王次昭曾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，弟弟王次恒曾是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，我国首席笛子演奏家。他曾多次代表中国出访奥地利、法国、德国、美国等国家和地区，在国际社会获得了高度的赞誉。

王次昭曾写有一篇题为《家史》的文章，里面谈到了自己的祖父：“我出生在杭州，父亲的祖籍是遂安，后因修建新安江水库并至淳安。在淳安的县志里有我大祖父和祖父的记载，县志头条便是我大祖父王文典的条目，其中记载了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，当年革命军解放南京时，大祖父当过敢死队队长。祖父王诚斋早年也留学日本，学习商学。回国后随大祖父从商……亲戚告诉我，淳安县政府修建了我们祖辈的故居，把它列入重要的文物标志向游客开放。”

从王次昭这段叙述看，他们应该是王诚斋的孙子，所以称王文典为大祖父。

山川景物与气运相终始。《芹川八景记》有云：“深山大泽蕴龙蛇”，人杰地灵，相因并著。芹溪算不上大泽，但它清冽甘甜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芹川儿女。世德家风，子孙绍续，它无形无质，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子孙后

代,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。

我想,王文典最终是要归于大泽、遨游天际的。这正是：

政商两翹楚,芹溪蔚人文。

折戟沉沙邵瑞彭

提起邵瑞彭三个字,我眼前总会浮现出“铁马照山河,寒衣伴楚歌”抑或“书香涤月影,墨韵荡秋思”这类诗句。邵瑞彭是那种文可惊世骇俗、侠则豪气干云的儒侠形象,有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、率性不拘任我行的放达不羁。

时光穿梭回到1923年10月7日,北京的大街小巷,报童沿街奔走,叫卖声不绝于耳:“号外,号外。曹锟贿选总统,五千大洋收买议员。”“号外,号外。曹锟贿选总统,有图有真相……”

尖锐的叫卖声,刺激着无数市民的神经。几乎是在同一天,全国各大城市报刊的头版头条都刊发了这条消息,并附有一张五千两银票的照片为证。顿时,社会舆论一片大哗,讨伐之声,一浪盖过一浪。

此时的曹锟身在保定军营,大战胜出的他,正准备10月10日赴京就任大总统一职。得知消息后恼羞成怒,命令手下严查泄密者。很快,打听到了是国会议员、淳安人邵瑞彭捅给报馆的。

邵瑞彭何许人也?他出生于清光绪戊子年(1888)的淳安查林村。一名寿篋,字次公,又字次珊,别署梧丘,室名次室、榆庐、铁砚山房、小黄昏馆等。他五岁读经,七岁能诗,十五岁中秀才,十六岁补廪生。父亲邵秀亭于咸丰十八年(1858)岁贡,曾任瑞安县教谕。

光绪三十四年(1908),二十岁的邵瑞彭在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就读,鲁迅曾在这里当了一年多的授课老师。邵瑞彭在读书期间加入了光复会、同盟会,出任同盟会浙江支部秘书。宣统元年(1909),柳亚子在苏州创办南社,邵瑞彭闻讯加入,成为社员之一。他从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,恰逢辛亥革命,于是积极参与了光复浙江的军事行动。

1912年12月,中华民国国会成立,邵瑞彭被浙江选区推选为国会众议员,出席国会非常会议,追求民主与法治,开始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。三年后袁世凯复辟,自称皇帝,建元“洪宪”。对于袁氏的倒行逆施,邵瑞彭深恶痛绝,厌恶与之同流,宁愿回到岳父家,做台鼎小学的教员,也不愿意为袁世凯帮腔抬轿。

民国政府闹剧不断,你方唱罢我登台。袁世凯的帝制才施行不到三个月,便销声匿迹了。次年6月,黎元洪继任大总统,又召开国会,邵瑞彭应请再度北上,遂寄希望于黎总统,然而府院争权,张勋以调停之名,率兵进驻北京,拥戴溥仪复辟,搞得又是一地鸡毛。邵瑞彭心灰意冷,他渴望政治上有所作为,却每次都不得志。

1921年4月,孙中山先生号召国会议员到广州商议国事,邵瑞彭响应号召南下广州,5月5日,出席国会非常会议,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。结果又遭到了桂、滇军阀的极力诋毁。邵瑞彭心力交瘁,憔悴不堪,他北还京津,接受北京大学的聘请,担任哲学教授一职,同时应清史馆赵尔巽之邀,协修《清史稿·儒林文苑传》,闲时也为京津报刊写写稿,开始他亦政亦文的生活状态。

1923年,直系军阀首领曹锟谋任总统,私底下秘遣内务总长高凌霨、议长吴景濂替他出面收买国会议员。凡众参两院议员,只要选他曹锟的,每人五千大洋银票一张,开始紧锣密鼓进行贿选活动。议长吴景濂代表曹锟,私下找到邵瑞彭,递给他一张支票,告诉他这是曹锟的意思,只要他投

曹锟一票，便可以兑现这五千现大洋。

这乃曹锟的精明之处。他怕提前给这些议员们钱，却没得到选票，银子岂不是打了水漂？所以，他要议员们凭选票结果兑现大洋。议员也有自己的小心思，天平一头是大洋，一头是人性，此刻，天平开始出现倾斜，五千大洋沉甸甸胜出，把人性和良知搁在了半空中。有的议员甚至讨价还价，想在曹锟手下再谋个一官半职。

邵瑞彭见议长吴景濂甘愿当说客，便不动声色，佯装明白，顺手将银票袖入长衫藏好。回到住所思忖该如何处置。他脑子里灵光一闪，想起一个人——《京报》的创始人，浙江老乡加好友邵飘萍。邵飘萍为人正直，有“铁肩辣手，快笔如刀”之称，特别是他提出的“欲改造现实之社会，宜先明现实社会中事物之真相”的新闻主张，邵瑞彭深表赞同。

事不宜迟，他怀揣五千大洋的银票，跑到天津照相馆翻拍制版，随信一起火速寄给邵飘萍及各大报馆。邵飘萍不但将曹锟贿选照片公布天下，还配发了《驱逐议员败类》一文，责问：“国民何罪，而须承认此种代表？国家何罪，而须供养此类议员？”于是，出现了本文开头号外之声不绝、舆论一时哗然的场景。

曹锟顺利当选，说明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被成功收买，这也成为当时最大的一桩政治丑闻。参、众两院的议员共有八百四十一人，而真正敢于站出来揭露真相的是凤毛麟角。

不独如此，邵瑞彭还向北京地方监察厅举报高凌霄、吴景濂、王毓芝等人行贿，控告曹锟的十余项罪名，诸如：“破坏制宪、收买议员”“骚扰京师、诋戴洪宪”“勾结军警、驱逐元首”“遥制中枢、连结疆吏”“多方搜括、筹集选费”“不自敛抑、妄希尊位”等。

正义有时会迟到，却永远不会缺席。文化的力量一旦彰显，豪侠气概便油然而生，柔弱的书生意志也会变得无比坚强。

“贿选门”事件后，曹党的追杀令充满血腥味，也充满铜臭味。人性的考量在利益面前显得那么脆弱，北京再也没有邵瑞彭的容身之地，10月14日，他只得南下上海避难。此时，柳亚子、叶楚伦、邵力子、陈望道等八人发起成立新南社，召开第一次会议。邵瑞彭本身就是旧南社社友，他的到来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。三天后，他返回严州（梅城）、淳安时，淳遂旅严同乡会、石峡师范讲习所等，分别举行欢迎大会，民众与学生打着“揭发五千贿选，先生万里归来”的横幅夹道欢迎。邵瑞彭发表即兴演讲，怒斥曹锟不耻罪行，倡言民主总是会付出代价，贿选的总统不能代表民意，终究是不会久长的。淳安之行给了邵瑞彭莫大的鼓舞，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民主与法治才是众望所归，是时代潮流的趋势，是谁也阻挡不了的。

果然不出邵瑞彭所料，一年之后，1924年10月23日，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，曹锟被冯部幽禁，结束了他大总统的美梦。冯玉祥请段祺瑞出山，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（国家元首）。段祺瑞聘邵瑞彭为善后会议议员和参政院参政。次年，邵瑞彭再度返京，出席善后会议。

之后的一系列事情，彻底改变了他从政的热情。官场的扯皮和黑暗，让他意志消沉，萌生了弃政从文的决心。果断拒绝了当局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一职，坚辞不就。但接受了北京大学、民国大学教授的工作。1931年5月，又应河南大学之聘，担任国文系主任，定居开封，直至病逝。

正是他“弃政从文”这个决定，让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开宗立派的词学大师。邵瑞彭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，除了词学之外，他在朴学、齐诗、书法、古历算学、目录学等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。此外，他与鲁迅、胡适、张元济、章士钊、章太炎、蔡元培、范文澜、许宝衡、许寿裳、姚从吾、柳亚子、王蕴章、陈去病、叶恭绰、郑孝胥、谢无量、杨杏佛等贤侪俊彦也多有来往和交集。

我查阅了《鲁迅日记》，在1924年3月16日载：“寄邵次公以《域外小说

集》一本。”1924年12月8日载有：“晚子佩招饮于宣南春，与季市同往，座中有冯稷家、邵次公、潘企莘、董秋芳及朱、吴两君。”

淳安博物馆藏有邵瑞彭的书法真迹，前几年，我在编撰《淳安馆藏文物精品集》一书时，亲自给藏品拍摄照片，当邵瑞彭书法徐徐展开时，我眼前一亮。他的书法别具一格，离尘脱俗。可以看出瘦金体、褚体甚至玉版十三行的影子，却又不属于任何字体流派。

直到后来我看到他《赠冯冶吾肖吾二生》一诗，才明白他的字为何如此灵动：

我生六龄爱纸笔，九岁能作浯溪碑。
十三心折《洛神赋》，无那出手近灵飞。
当初旁薄蛟鼉走，长乃侧媚成委迤。
弱冠著文日千万，挥斥一气神不罢。
死蛇无意黄鲁直，墨猪悔作苏灵芝。
中间涉猎及篆隶，欲以书法副文辞。
戈鋌杂出喜宝子，北碑间取文公肥。
艺舟自幼轻慎伯，腕鬼终靳逢羲之。
迄今三十无一是，恨不投笔焚墨池。

诗中所涉及的《浯溪碑》、《洛神赋》、《灵飞经》、石鼓文、黄庭坚、苏灵芝、《爨宝子碑》、《郑文公碑》，以及包世臣、王羲之，无一不是书法名碑或是书法名家，其涉猎之广、用功之勤，超出我们的想象。但他依然对自己不满意，说三十年过去了仍然一无是处。

邵瑞彭眼界之高，远超常人。他曾在回复赵元礼（字幼梅）赠诗中，评论自己：“遇事旷放，米盐之计，不复撻心；贫富之界，不曾挂口；浮萍

泛梗，自适其天，虫啼禽唱，宁求声应？”他只为自己内心的真实，是活出本真之人。

河南大学校长许心武先生对邵瑞彭敬重有加，校方还单独给他租了一处宅院，地点在北财神庙街。在这里他完成了《泰誓决疑》《尚书决疑》《地冪古义》《齐诗铃》《元明曲萃》等开山之作。国文系学生在他的影响下，诗词创作热情不减，出现了许多好诗文，邵瑞彭奖掖提携后进，在刊刻词集《山禽馀响》时，也把学生的作品合编进去，甚至将学生习作编印为《夷门乐府》出版，并亲自为之作序。学生们感受到老师春风化雨般的风范，备受鼓励。

邵瑞彭词作意蕴情深，得传统之精髓，抒自家之胸臆，是那种无意于佳乃佳的境界，使得他圈粉无数。如《蝶恋花》一词：

十二楼前生碧草。珠箔当门，团扇迎风小。赵瑟秦筝弹未了，洞房一夜乌啼晓。

忍把千金酬一笑？毕竟相思，不似相逢好。锦字无凭南雁杳，美人家在长干道。

春草、团扇、清风，即景、即物、即事。词中借思妇的视角和口吻，来抒发情感。门前的青草绿了，我轻启门帘，手执团扇漫不经意扇着，清风拂面，我等着你归来。一曲未终，箏音犹在，春宵苦短。乌啼晨晓，你的影子似乎越来越模糊，你可曾记得当时为博我一笑而一掷千金？相思，相思，想你肝肠寸断，抵不过那一次的相逢，尺素虽传却杳无踪迹，你可知长干道上有人在等候着你？为何多情是女子？为何沉湎在往时？你不辞镜中朱颜瘦，你孤独相思为哪般？那个心上人他还会如你一般在苦苦等候吗？但愿，但愿，他能从某个路口翩然而至。

再如《虞美人》词：

相思似债原难了，莫怨佳期少。涕痕弹入玉笙风，生怕有人等我梦魂中。

珍珠密字言犹在，不信华年改。天涯容得几多愁，只有黄河如泪背人流。

这类爱情诗词，总是这般缠绵悱恻、凄婉动人。

邵瑞彭的情感状态我们不得而知，但从上述诗词里面多少能够窥见一斑。他描写女性的情愫细致入微，把握女性哀怨心理精准贴切，这恐怕与他长期奔波游宦，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状况有关。

1936年1月，河南大学学生的《救国先锋》报创刊，邵瑞彭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，他心情激动，慷慨出资捐助。次年12月2日，他在开封寓所怅然离世，享年五十岁。

他去世后，章士钊曾有《西江月·追忆邵次公》一词，悼念哀挽于他，词云：

一世才华无两，半生潦倒堪嗤。文章稗贩到君疑，总是名心害你。

未见人前卖老，却从词里寻痴。东京故事系人思，欲问齐诗那里。

章士钊所说的“齐诗”，属于《诗经》的另一学派，创始人辕固，是西汉齐地人（山东北部）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：“言《诗》，于鲁则申培公，于齐则辕固生，于燕则韩太傅……”齐诗学派喜引讖纬，以阴阳灾异推论时政。

曾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，北京大学、四川大学、华西大学教授的蒙文通，对邵瑞彭作过这样的评价：“纯就齐学而言，惟淳安邵次公洞晓六历，

于阴阳三五之故，穷源竟流，若示诸掌，自一行一人而外，魏晋及今，无与伦比，此固今世齐学一大师……是以齐学言，则邵氏《齐诗铃》之作，其深合于齐学家法，固优于廖师也。”（《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》）蒙先生认为邵瑞彭的成就甚至超过他的老师廖平。

“朱自清先生在其《读书笔记》中，称邵瑞彭《扬荷集》中令词“境界苍老，像诗中的宋诗”，“寓刚健于婀娜，前所少有”。钱仲联先生在《近百年词坛点将录》中将之比为“地空星小霸王周通”。在《南社吟坛点将录》中将之比为“天威星双鞭呼延灼”，并称赞其“《扬荷》词卷，含咀清真。厥品高华，藻采缤纷。《绮罗香》阙，金井招魂。仙云堕影，宫粉雕痕。一纸讨曹，声振九阍”。

面对这些外界的赞誉，邵瑞彭非但不会沾沾自喜，反而觉得是小看了他。河南大学同事卢前与邵瑞彭朝夕相处，也是最了解他的人。卢先生曾说：“次公是不甘心做文学家的，你要称他为词人，他一定觉得你小看了他。”（卢前《柴室小品·记邵次公》）这颇令人费解。我想这才是他最真实的想法，因为在他心里还是希望建功立业的，诗词只是退而求其次的副业，政治上无所作为已然成为他的遗憾和伤痛，既然选择了从文，就把文人做到极致，把政治抱负深藏于心底。我们在他少数怀古诗中，可以找到这份情怀。如《木兰花慢·邺城怀古》：

渡黄河北去，鞭不起，古漳流。想万里风烟，三更灯火，残霸中州。封侯壮心在否？听西陵歌舞使人愁。高树闲栖乌鹊，空阶长卧貔貅。

平畴，落日下荒邱，恍慷看吴钩。问倾泪移盘，沉沙折戟，谁记恩仇？回头，汉家宫阙，剩鸳鸯瓦冷雉媒秋。欲换南来王粲，为君重赋《登楼》。

邺城是六朝古都，北临漳河，南邻安阳，自古以来这里便烽烟四起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东汉末年（204），曹操北渡黄河，攻占黎阳，进而围困邺城，

数月后的一个深夜曹操攻占邺都，此后封侯定基于此，残霸中原。曹操死后，遗命诸妾、歌女每月十五到铜雀台上，面对西陵葬处歌舞一番，耳听衰音令人愁，到如今只剩乌鹊闲栖高树，貔貅长卧空阶。

眼前平野无际，落日照着荒凉的土丘，看一遍手中的吴钩总是心潮澎湃、慷慨激昂。曹操挟持汉献帝，运走仙人承露盘，就连铜盘上的仙人也流下眼泪，辞别汉宫。沉沙折戟，多少兴亡事，谁记恩仇？看看汉王朝的宫阙，只剩下宫殿上的鸳鸯瓦与雉媒，在深秋中显得清冷无比。此刻，唯有王粲的《登楼赋》，才暗合我忧愍世道，怀念故乡的心境。

词句中发兴亡之感、家国之痛，大有追昔抚今，壮志难酬之意。这种意境比较符合邵瑞彭的真实心态。

试想，一个追求民主法治、力图救国救民、自诩革命志士、梦想力挽狂澜的人，怎么会满足只做一个词人？从文是他理想破灭后，迫于现状的无奈选择。如今他只能通过怀古来抒发自己深藏已久的情怀。这正是：

折戟沉沙堪悲壮，好将《扬荷》续清音。

后 记

余昌顺和鲍艺敏,以各自的方式,为我们深入了解淳安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民,提供了新颖的视角。

余昌顺行走在淳安大地上,步履坚实,丈量着一座座山、一条条源、一个个村庄。他的脚印,随着大地的起伏向前延伸,包罗万象的世界涌动着进入敞开的胸襟,于是便有了一部书的斑斓与跌宕。读完《一个人的淳安地理》,你会看到,作者的足迹,与大地山河难舍难分,经冬复历春,花开花又落,淳安一方水土,因他执着的行走,于文学修辞中,得以重塑。

鲍艺敏溯游在淳安自唐以降的岁月长河中,目光盘桓在历史的幽微之处。他一一注视了三十二张面孔后,心中仿佛诸神充满,他想起大儒朱熹对“文献”二字的注释:文,典籍也;献,贤也。淳安自古乃“文献名邦”,名人辈出,这三十二张面孔,便是淳安先贤的优秀代表。披阅《淳安历史的32张面孔》,你会发现,作者对淳安先贤的长久凝视,使时光深处漫漶的淳安历史,逐渐清晰起来,且有了质感,有了生气,有了风云激荡。

《一个人的淳安地理》,说的是“一方水土”,《淳安历史的32张面孔》,写的是“一方人物”。两部作品联袂而至,是淳安人文地理的双玉合璧。

现在,两部作品一并付梓了,可喜可贺。对作者来说,书好比孩子,十月怀胎,一朝落地,遂了心愿。于我们而言,极力促成书的出版发行,为满

足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,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,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将继续努力。发挥政协文史工作的独特作用,为淳安“文献名邦”建设,一以贯之,聊尽绵薄,是我们肩上的一份责任,一种使命。

淳安政协文史和教文卫体委员会

2022年10月12日